

德州学院 学报

双
月
刊

1985年创刊

2023年第39卷第5期

(总第191期)

2023年10月出版



编委会主任：李甲亮

编委会副主任：张秀玲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家峰	马洪才	王鹤	冯琨
吕志轩	刘艳芹	许士才	孙乃龙
李甲亮	李春光	李洪亮	杜亚丽
杨颖	张秀玲	张宝泉	张锦辉
房敏	郭长友	段文	陈立华
陈伟	赵岩	顾相伶	徐慧清
唐延柯	谈家水	黄传波	曾强成

主编：李甲亮

常务副主编：张秀玲

副主编：陈立华 谈家水 徐慧清

德州学院学报

(双月刊)

2023年 第5期
第39卷(总第191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三环三色三育”党建品牌引领推动样板支部建设

——以德州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第一教师党支部为例……………伊连云 贾春晓(1)

文学·艺术研究

试论姜夔的诗学思想与词序创作……………王雨晨(4)

明代王门学者王宗沐刊刻《传习录》的礼教思想……………杜梅(10)

鲁迅笔下的“堂吉诃德”与“庄子”

——从译作《解放了的董吉诃德》谈起……………高闻(14)

解放区减租土改小说的叙事形态

——以李束为作品为例……………李慧(21)

埃默切塔《为母的快乐》中的非洲女性困境……………高文惠(27)

资深媒体人作为网络大V的传播行为研究……………游雨欣(34)

指示词“这”充任主语的受限性及其原因……………马超(38)

辜鸿铭《论语》翻译的跨文化互释……………史青玲(44)

儿童幻想小说中戏仿诗歌翻译的美学阐释

——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王焕(49)

地域文化研究·运河文化研究

清代黄运引河刍议……………郑民德 田昭煜(55)

地域文化研究·德州风物研究

夏津方言俗词俗语例释·····贺同赏(60)

东盟研究

面向德州对接东盟联络陪同口译人才培养研究·····崔静静(66)

历史文化研究

重黎一羲和氏族女子婚姻考·····张德芬(69)

浅论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的社会交往·····姜朝晖 李敏(75)

冀鲁边区—渤海区的文化建设述论·····张立胜 王瑞(80)

19世纪中后期英属印度贝拉尔地区棉花种植推广探析·····毛锐 白景旭(86)

高校制度文化的建构

——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视野·····王丽(91)

法学·社会学研究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以福利多元主义为视角·····常进锋 刘畅(95)

新时代我国家庭养老的主要矛盾与应对·····李松雷(100)

高校教学研究

基于反向课程矩阵学理的世界现代史教学设计探究·····王延敏(104)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 39 No.5

October 2023

MAIN CONTENTS

- The Ethical Thought in *Chuanxilu* Carved by Wang Zongmu,
a Scholar of the Yangming School in Ming Dynasty.....DU Mei (10)
- Narrative Form on Land Reform Novels in Liberated Areas
—— Taking Li Shuwei as an Example.....LI Hui (21)
- The Plight of African Women in Emecheta's *The Joys of a Motherhood*.....GAO Wenhui (27)
-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Gu Hongming's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SHI Qingling (44)
- Rumination on the River Diversion Project on the Yellow River and Canal in the Qing Dynasty
..... ZHENG Minde TIAN Zhaoyu (55)
- Examples and Commentary of Colloquial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the Dialect of XiajinHE Tongshang (60)
- On the Marriage of Women from Zhongli-Xihe Tribe ZHANG Desu (69)
- Cotton Cultivation Promotion in Berar of British India in the Mid and Late 19th Century
.....MAO Rui BAI Jingxu (86)
- Realistic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Construction Childbearing Friendly Societ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Pluralism.....CHANG Jinfeng LIU Chang (95)
- On Teaching Design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Based on Reverse
Curriculum Matrix Theory WANG Yanmin (104)

“三环三色三育”党建品牌引领推动样板支部建设

——以德州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第一教师党支部为例

伊连云, 贾春晓

(德州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00)

摘要: 高校基层党支部的建设, 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加强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德州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第一教师党支部是第三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 以“三环三色三育”党建品牌, 推动样板支部建设, 提升党建育人实效, 推动教师支部党建与业务高质量发展, 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工作经验。

关键词: 三环三色三育; 党建品牌; 样板支部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01-03

一、引言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 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抓紧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各种短板, 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2] 自 2018 年起, 教育部大力开展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 以点带面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推动全国高校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推动全国高校党建质量全面创优全面提升。^[3] 德州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第一教师党支部于 2022 年 2 月被教育部思政司授予第三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自创建以来,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第一教师党支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二十大精神, 努力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线,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育使命, 根据“七个有力”的任务要求, 以“三环三色三育”党建品牌为引领, 坚持举旗定向, 聚焦融合创新,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推进“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的培育创建工作, 推动第一教师党支部在党建、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三环三色三育”党建品牌的理论内涵

立足引领、服务、育人等功能, 以“三环三色三育”为品牌名称, 深入开展样板党支部创建活动。

三环——凝聚党委内环, 优化支委中环, 拓展党员外环。

三色——传承红色基因, 坚持绿色发展, 积蓄蓝色力量。

三育——创新他育载体, 选树自育榜样, 搭建互育平台。

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样板党支部创建活动, 打造三环聚力, 构建党建育人新格局; 三色合力, 创建党建育人新体系; 三育助力, 搭建党建育人新平台的样板支部党建品牌, 发挥党组织的凝心铸魂、聚力发展的战斗堡垒作用, 引领师生员工开拓进取, 踔厉奋发, 解决基层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问题, 实现党建与业务“一融双高”。

三、“三环三色三育”党建品牌引领推动样板支部建设的实践探索

(一) 三环聚力, 构建党建育人新格局

凝聚党委内环: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突出党建引领,

收稿日期: 2023-05-08

基金项目: 德州学院校级课题“新时代背景下校企党组织共建育人模式研究”(HXKT2022351); “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工作室培育建设”(2023-DJSZ-05)。

作者简介: 伊连云(1974-), 女, 山东德州人,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党建研究。

变“单向灌输”为“双向互动”，构建“有温度，知温暖，带温情”的党建工作体系，积极打造定心工作、安心教学、静心科研、强心发展、暖心生活的“五心”工程，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程，提高党支部书记薪酬待遇，建成教师休息室、专业教研室、专家工作室、支部活动室等，诸多举措有力保障了师生的学习、工作、生活，使党委成为推进事业发展的“领头雁”“指挥所”。

优化支部中环：以加强支部建设为着力点，按照“抓规范、强引领、重特色”的工作思路，聚焦主责主业，优化组织设置，规范组织建设，严肃组织生活，丰富活动载体，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使党支部成为凝聚、服务师生的“加油站”“动力源”。第一教师党支部加强支部建设，规范组织生活。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组织生活会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谈心谈话制度、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等制度。3名支委分别担任化学系主任和副主任，均为高级职称的博士教师，学历、职称高，业务能力强，充分发挥了“双带头人”的“头雁效应”，支部班子有活力，战斗力强，努力把党支部打造成“双融双促”的坚强战斗堡垒。支部活动创特色。每月一次的主题党员活动中，除了完成“第一议题”以及政治理论学习等“规定动作”外，结合党支部和化学系的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化学专业特色的“自选动作”，比如开展本科导师制，帮助解决学生思想引导、学业教导、考研辅导、就业指导的难题。开展“师范生从业技能大赛全面引入课程思政内容”“百年潮涌红韵山东”师生社会实践、“服务群众有力！助力学生考研！”“献礼党的二十大，同心奋进新征程”等活动，形式新颖有特色，团结、凝聚党员有力量。

拓展党员外环：以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为切入点，按照“深融合、促发展、验成效”的工作思路，锚定申硕、应用型转型、一流专业建设等重点工作，把党建与业务工作，一体考虑、一体研究、一体推进、一体落实，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服务地方等多个领域，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员成为干事创业的“先锋队”“排头兵”。第一教师党支部党员李洪亮和辛炳炜在山东瑞博龙化工有限公司设置了教授实验室，助力科技攻关，为企业创收百万余元。第一教师党支部涌现出山东省“教学名师”、德州学院“师德师风先进个人”董岩、山东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负责人张大帅、“毕业生心目中最美教师”支部组织委员吕超、“德州学院优秀班主任”王晓丽等一批党员先进个人。

（二）三色合力，创建党建育人新体系

传承红色基因：深入开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红色观影、红色党性教育、党员志愿服务、承诺践诺等一系列形式新、内容精、实效强的党建活动，弘扬红色文化，汲取奋进力量。

坚持绿色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融入化学专业教学。以硕士点建设、师范专业建设为抓手，狠抓绿色化学专业建设，成立专业建设团队、课程建设团队、课程思政团队、教学技能竞赛团队、学科竞赛指导团队、学生考研指导团队，多措并举培养兼具绿色发展理念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工程人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积蓄蓝色力量：第一教师支部党员充分发挥博士党员教师优势，支持青年教师从事科研工作，成立科技创新团队、科技服务团队。一年来，支部成员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省青创团队1个，主持横向课题、成果转化经费近400万元。党建引领把科研能力转化为服务地方经济能力，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要求。

（三）三育助力，搭建党建育人新平台

创新他育载体：第一教师党支部推行“党员先锋服务岗”，开展党员承诺践诺、发展论坛、政治生日、学习强国达人赛、微党课、成长讲堂等党员学习教育活动。

选树自育榜样：推出“身边榜样”，常态化开展“我来讲党课”、师生志愿服务活动。2022年疫情期间，化学化工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第一党支部党员李洪亮、支部委员吕超、支部党员赵江山、杜鹏等同志主动申请进校开展工作，先后驻守疫情防控一线90多天。样板党支部创建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党员先进典型。

搭建互育平台：师生支部互育、校企支部共建，党建与业务实现双融双促双赢。相同专业的第一教师党支部与学生二支部“一对一”共建互育模式初步形成，通过开展主题党日、师范从业绩能大赛训练、考研辅导、复试技巧培训等活动，达到同学习、同活动、同提升、教学相长的互育目的，促进师生党员共同进步。与山东瑞博龙化工有限公司校企党建共建模式，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发展。发挥“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的辐射带动作用，吸引省内十余家高校、乡镇、企业的党支部党员到校参观学习交流党建经验。

四、取得的实际成效

（一）制度成果

形成“三环三色三育”党建品牌。通过党建品牌建设，找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结合点，推进基层党建

工作制度创新。中国教育报对“三环三色三育”党建品牌进行宣传报道,党委作用发挥被山东新闻网报道。文章《“三个聚焦”激发高校党建“化学反应”》被《支部生活》《灯塔党建在线》刊发。第一教师党支部党员张大帅博士在“三环三色三育”党建育人品牌理念的启发下,将三环、三色、三育的元素特色充分体现,设计了化学化工学院院徽,获得师生广泛认可。

(二) 现实成果

“三环三色三育”党建品牌创建一年来,第一教师党支部建设成效显著,尤其在申硕攻坚、新上中外合作化学专业、样板党支部和一流学科申报、学科与专业建设、人才创新团队建设、新冠疫情防控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效:获得德州学院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课题立项(重点项目)1项;党支部与山东瑞博龙化工有限公司党支部签署校企党建共建协议,获1项横向课题;支部所属党员2人获校“优秀班主任”,1人获“毕业生心目中的好老师”,1人获校“师德师风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支部青年教师1人获德州学院教学比赛二等奖,1人获三等奖;入党积极分子黄兆慧博士获批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部党员张大帅获1项山东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人才引育计划;支部党员获一级协会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一级协会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支部成员作为主持人获得横向课题(含成果转化)经费接近400万;多名化学师范专业实习支教学生表现优异,受到实习支教学校表彰;化学专

业学生考研率高达53.8%,出现4个考研宿舍,其中1个宿舍全部被“211”高校录取。

五、结束语

党建品牌创建是新时代创新党建工作的有效路径,^[4]是增强党组织活力、凝聚党群合力的重要手段,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象和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化学化工学院以“三环三色三育”党建品牌为引领,拓宽了学院基层党组织工作渠道,解决了学院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问题,对样板支部“七个有力”的建设,做了很好的探索与实践,对加强高校基层党支部建设、提升党建育人实效、推动教师支部党建与业务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工作经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0-10-26(1).
- [2]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J]. 党建, 2020(7).
- [3]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的通知》[DB/OL](2018-07-0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moe-1417/201807/t20180705-342/26.html>.

The “Three Rings, Three Colors and Three Educations” Party Building Brand Leads and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l Branches ——Taking the Party Branch of the First Faculty of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Dezho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YI Lianyun, JIA Chunxiao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branch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grassroots party branches as fighting fortresses. The Party Branch of the First Faculty of the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Dezhou University is the third batch “National Model Branch of Party Building Work” cultivation and creation of units. It builds the “Three Rings, Three Colors and Three Educations” party building brand,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l branches, im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ty build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realiz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and business of the Party Branch of the Faculty of the School, and forms a work experience that can be copied, promoted and referenced.

Key words: three-ring three-color three-education; party building brand; model branch

试论姜夔的诗学思想与词序创作

王雨晨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州 510632)

摘要:姜夔的诗学思想是其诗歌创作经验的凝练,体现了其诗歌审美理想,并与词序创作存在相通之处。姜夔词序中的语言具有指事性与呈现性相融合的特点,这与他诗论中的诗学思想紧密相关。同时姜夔词序的部分语言体现出“韵度欲其飘逸”以及清空的特质,此类语言具有诗化特征,与《白石道人诗说》对诗人创作心态、诗歌风格的强调相一致。此外,姜夔词序中的精思与自然,也是其诗学与词序的相通之处。

关键词:姜夔;诗学思想;词序;关系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04-06

姜夔的诗学思想集中体现在《白石道人诗说》中,这是其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同时也反映在了姜夔的词序创作上。清人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读其说诗诸则,有与长短句相通者。”^{[1]3549}谢章铤认为,其诗说同时也是词话。清代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评价姜词小序:“白石好为小序,序即是词,词仍是序,反复再观,如同嚼蜡矣。词序序作词缘起,以此意词中未备也;今人论院本,尚知曲白相生,不许复沓,而独津津于白石词序,一何可笑!”^{[2]19}他在《宋四家词选》也说过:“白石小序甚可观,苦与词复;若序其缘起,不犯词境,斯为两美已。”^{[3]1644}周济对姜夔的词序有褒有贬,褒其艺术上“甚可观”,贬其“常犯词境”。究其原因,第一,周济认为词序的作用在于介绍“缘起”,与词的功能有所区别。第二,词与词序类似院本中的“曲白相生”,即词为曲,序为白。词作为韵文,序作为散文,周济认为二者应当避免艺术上的重复。通过周济的评价,正可见姜夔词序对“白”、对散文的背离,而趋向于诗、词等韵文的表达方式。结合谢章铤所言,姜夔诗说可作为词话,从而影响其词的创作。而周济认为姜夔小序“与词复”,可见《白石道人诗说》作为诗歌理论,与词通,也可与词序通。因此,姜夔的诗学思想对于研究其词序创作也有一定的启发。

一、词序语言的指事与呈现

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

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4]42}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按《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又谓之序,则对小序而言也。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按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也,对大序而言名之也。汉班固云:‘孔子纂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4]135}古人认为“序”用于说明作者意思,交代创作缘由。其次,序中的叙事说理要有条理,要“次第有序”。因此,从功能来看,序具有叙事性即指事性的特征,主要用于点明时间、地点、人物、所咏对象、写作缘由、考证词调、生平经历等。

词序创作之初作为散文文体,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对词的注解,作家大多使用指事性的语言。如苏轼《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序:“时太守闾丘公显已致仕居姑苏,后房懿卿者,甚有才色,因赋此词。”^{[5]357}序中交代创作缘由,是为了歌咏太守闾丘公显的小妾。《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序:“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数语桥上。”^{[5]367}序中时间、地点、事件始末交代完整。苏轼的词序拓宽了表达范围,不只有指事性的语言,更融入了个人生命体验,这是词序发展中的一大变化,但总体来看苏序仍以实用性为主。至南宋,特别是在姜夔笔下,词序的抒情功能大

收稿日期:2022-09-05

作者简介:王雨晨(1999-),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大增强。

姜夔词序中叙事部分多为指事性语言，写景部分多为呈现性的语言。如姜夔《浣溪沙》序点明时间、地点与创作缘由：“己酉岁，客吴兴，收灯夜阖户无聊，俞商卿呼之共出，因记所见。”^[512799]《暗香》《疏影》序记录了词调的创作过程：“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512808]姜夔的词序中有一部分指事性的语言值得注意，即他经常在序中论及交友，这与他的创作历程息息相关。如序中论及与萧德藻、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人的交往，从中可以看出，姜夔的创作思想或多或少受到了这些作家的影响。据夏承焘先生考证，淳熙十三年（1186）姜夔依萧德藻客居长沙，次年至杭州，通过萧德藻的推荐，拜谒杨万里，继而又赴苏州探访范成大。^[614]《白石道人诗说》（以下简称《诗说》）也于此期间完成。姜夔拜见杨万里时，正是杨万里力图摆脱江西弊端而独钟晚唐之时。《诗说》提倡的“美刺无迹”“以心会心”“语贵含蓄”等，皆与杨万里的观点有一脉相承之处。在他们二人身上，都表现出从江西入又从江西出的特点。因此，通过此类指事性的语言，可从中窥见姜夔的创作环境，进而了解他诗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词序中呈现性的语言具有画面感、抒情性，多为名词之间的排列组合，更具有诗化特征。此类语言在姜词小序中常以意象并置的方式呈现。这两类语言均体现出了姜夔诗论的形成过程与思想观点，因此不能将其词序与诗论割裂来看。

姜夔词序中呈现性的语言具体表现为以四言句式写景，一句一景，这种描写方式类似于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并置。意象并置指“中国古典诗里，利用未定位、未定关系、或关系模棱的词法语法，使读者获至一种自由观、感、解读的空间，在物象与物象之间作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7118]如《角招》中“山横春烟，新柳被水”^[512809]，这些意象之间并不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没有时间的推移，空间联系也是比较跳跃的，它们只是并列在一起，其他则由读者进行想象。“烟”本身是缥缈的，会随着温度、风向更改不同的位置与形状。“横”字或许点明了山与烟的相对位置，但解读时却不能将空间关系就此定下来，把此句简单理解为“山前横着一道春烟”。这样就破坏了从不同角度进入景观的可能，无法感受词句的多义性，究竟烟是在山前，还是烟笼罩在山的周围，又或是烟遮挡住了山的一部分？这种在景物描写上的若即若离，为小序增添了诗歌般

的灵动。因此，姜夔词序中呈现出的意象往往是疏散的、留有空白的。这种松散和散文又有很大不同，散文的叙述多是线性向前的，是时间维度的；词序中的呈现性则与诗歌类似，是画面的，是空间的。意象并置的手法在姜夔的诗歌中同样常见，如：“细草穿沙雪半销，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其一）^[81173]前两句写远景，融入诗人身世飘零之感，后两句写近景，写出了梅花风神缥缈之态。诗中的草、沙、雪、吴宫、烟、水、梅、竹、石桥呈现出一种萧索幽冷的气氛。又如“苑墙曲曲柳冥冥，人静山空见一灯。荷叶似云香不断，小船摇曳入西陵。”^[81195]（《湖上寓居杂咏》其九）这首诗一句一景，描绘了西湖上所见的烟柳、孤灯、荷叶、小船，由远及近，把看似无关的景物连缀在一起，营造出清幽之境。可见，姜夔在诗歌中使用的意象并置的手法同样运用在了词序之中，其词序便具有了诗歌呈现性的特征。

总体来看，姜夔词序呈现出了指事与呈现相融合的特点，且以呈现性的语言居多。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先指事后呈现。《玉梅令》序中先写石湖邀请自己填词，“石湖家自制此声，未有语实之，命予作。”^[512798]后又描写自己到达后，看到石湖宅院中的梅花、落雪与竹院。即首句叙述时间，然后以四言句式呈现。《杏花天影》序：“丙午之冬，发汴口，丁未正月二日，道金陵。北望淮楚，风日清淑，小舟挂席，容与波上。”^[512798]先写作者行旅历程，再写途中所见之景。另一类是先呈现后指事。《浣溪沙》序先写“子女须家沔之山阳，左白湖，右云梦；春水方生，浸数千里，冬寒沙露，衰草入云”^[512799]，随后才展开叙述丙午之秋与外甥秋游的种种场景。小序前半部分是呈现性的语言，可以看出时间地点在不断变化，从少时之景转到当前之景，景物又从春到冬不断变化，这些四言句之间的呈现具有很强的跳跃性，造成了指事性的降低，由此可见姜夔小序中的诗化特征是明显增强的。

二、词序中的韵度与清空

《诗说》中谈到：“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91680]韵在形式上是指诗歌声调和谐，节奏起伏错落。在语言层面上，韵追求一种“意在言外”的美感。《诗说》中的“韵度”在协韵律之外，更追求语言表达上的“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91681]在作品中表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是姜夔“韵度”的重要内涵，这是一种掌控语言而又超越语言之上的境界。同时，《诗说》中也曾言：“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处。模仿者语虽似之，韵亦无矣。鸡林其可欺哉！”^[91683]

此处“各有韵声”阐释了不同的创作者艺术个性相异，作品也各有风味。其中不同创作主体的性情、气质、才学决定了不同的创作风格，别人难以模仿，这也说明了“韵度”与主体人格是紧密联系的。

“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9]680}《诗说》以“飘逸”作为“韵度”的标准和审美理想，并指出了过于追求飘逸的境界容易产生“轻”的弊端。“逸”在白石诗说之前，皎然《诗式》中也有相关论述，他总是将“高”与“逸”并提，“其体裁如龙行虎步，气逸情高”“高、风韵朗畅曰高。逸、体格闲放曰逸”。^{[9]35}可见“飘逸”中蕴含着高雅的格调与自由超脱的创作态度，这也是对创作者所提出的要求。创作主体人格的高尚可以作为文学作品厚重的根基，防止作品过于“飘逸”而陷入浅薄轻浮的地步。

姜夔身上较为典型地体现出了“文如其人”或是“韵如其人”的特点，其作品所追求的“韵度”“飘逸”正是他自然平和的心境以及高雅性情的表现。《诗说》中提到：“体物不欲寒乞”^{[9]682}，描写对象的格调要高，同时不能有寒乞之态，不要刻意钻研于琐屑之物。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有相类似的表述：“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10]15}姜夔在创作中以其高逸的理想人格为统摄，驾驭语言，继而达到超脱的境界。如刘熙载曾称赞姜夔之诗，“在乐则琴，在花则梅”，琴、梅便是诗人理想人格的外化。姜夔不慕名利，向往淡泊洒脱的生活，他在诗歌中直言“沉思只羡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8]202}。他羡慕天随子那样的隐士，不愿被世俗所打扰。又如《次韵武伯》：“杨柳风微约暮寒，野禽容与只婆间。道人心性如天马，可爱青丝十二闲。”^{[8]237}前两联微风、野禽表现出从容恬淡的状态，后两联直接表达自己不求名爵、超然物外的心境。姜词小序中同样有表达高逸情怀与潇洒情思的内容。《角招》序：“予每自度曲，吟洞箫，商卿则歌而和之，极有山林缥缈之思。”^{[5]2809}《湘月》序：“山水空寒，烟月交映，凄然其为秋也。坐客皆小冠練服，或弹琴，或浩歌，或自酌，或援笔搜句。”^{[5]2812}《鹧鸪天》序：“逸兴横生，遂成痛饮，午夜乃寝。”^{[5]2796}《浣溪纱》序中：“山行野吟，自适其适，凭虚怅望，因赋是阙。”^{[5]2799}姜夔向往的是一种游历自然，与友相偕，快意潇洒的生活，他将高雅情怀寄托于游赏、诗酒、交友中。然而姜夔一生布衣，又处于国事衰微之际，此种生活状态极为可贵。由白石的诗、词序可见，他的高逸品格在作品中表现为对飘逸、超脱审美理想的追求，这种审美理想也反映在了他各种文体的创作当中。

韵度还体现在作品中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姜夔词序情感回环往复，表现出了韵度的审美特征。夏承焘在《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中曾这样评价《浣溪沙》序：“序与词不相似，低徊往复之情不欲明言也。”^{[6]16}这点明了姜夔序与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尽管姜夔主要以词来抒写感情，但他同样也在部分小序中表达出回环往复的情感，这种情感相较于词更为婉转幽微。例如《浣溪沙》序明写游观，实则怀人。作者列举了一系列游玩的场景，“予与安甥或荡舟采菱，或举火置兔，或观鱼簞下”^{[5]2799}，表面看起来是怡然自适的，但其中包含的感情并未明言，需要结合词才能感悟到，姜夔是在怀念合肥恋人。此类小序表达情感是回环的、隐约的、令人想象的。这与《诗说》中“韵度”所追求的“言外之意”的审美特征相似，同时序中朦胧的意境，不欲明言的感伤使之具有了清空的特质，也给读者留下了许多遐想。

又如《探春慢》“予自孩年幼，从先人宦于古河，女须因嫁焉。中去复来，几二十年”^{[5]2805}。作者言明自己几十年来不断辗转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流逝，心中累积了许多感情。接着又言及“丙午东，千岩老人约予过苕霅，岁晚乘涛载雪而下，顾念依依，殆不能去”^{[5]2805}。当姜夔赴约要离开所在之地时，他的内心极为复杂，词中虽然明确写到“谁念漂零久，漫赢得幽怀难写”“长恨离多会少”，但序中的情感是克制的，是不断叠加的，作者把自己过去几十年的曲折经历以平淡的口吻写出，将离别之情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可见作者在词作中书写内心情感之前，就已经层层渲染，结合姜夔生平经历，才能更好地体悟序中的感情。

另一种回环往复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表达方式，如《庆宫春》序中两次过垂虹亭。因此词中的情感是多重回忆、多重情感的组合，而并非是一时之感。词人两次经过同样的地方，心境早已不同，第一次过垂虹亭也许是“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8]2800}的孤单寥落。第二次更多的则是物是人非，“然意所耽”的悲哀、执着、超迈。多重时空造成了情感上的回环往复，同时序中指义并不明晰，虚实结合，朦胧的意境中夹杂着淡淡的愁绪。

任中敏《词曲通义》云：“诗人之词源于齐梁乐府之‘糜’，五七言绝句之‘逸’。‘糜’者渐成词之‘婉约’；‘逸’者渐成词之‘空灵’。”^{[11]88}诗歌中的“逸”在词中往往表现为“空灵”，姜夔论诗所秉持的“韵度欲其飘逸”在词作中也同样表现出了空灵的特征。张炎在《词源》中以“清空”概括白石词，而吴调公先生在《说“清空”》中谈到，“清空之作，一其境界必有高度，其思想基础

首先应该是具有高超洒脱的情趣。其特征是：秀劲中见挺拔，飘洒中寓沉着，优美含有某些崇高因素”^[12]。可见“飘逸”与“清空”是一体两面的，它们共同具有高逸的因素，由创作主体高尚的品格、超脱的心态所生发，进而在不同的文体中表现出相似的特点。姜夔的诗偏向“飘逸”，词则偏向“清空”，而姜夔词序既具有诗歌呈现性的特征，又与词有着相近的境界，便同时具有了“飘逸”与“清空”的特质。

姜夔词序中的“韵度”与“清空”还具体表现为意境上的空灵，主要通过意象的营造呈现。

在意象的选择方面，据统计，姜夔词序中出现较多的意象依次是水、梅、雪、月、柳、云等。其诗歌创作中意象使用较多的是云、月、雪、竹、柳、梅等。从中可见姜夔对于朦胧缥缈意象的偏爱，这些自然景物本身就具有空灵的特质，作者将主观感情投射在景物上，更营造出一种清旷之感。

姜夔词序中梅和雪总是一起出现，梅花虽然被放在清冷的环境中描写，但并不会给人寒冷滞重的感觉。如《夜行船》序：“己酉岁，寓吴兴，同田几道寻梅北山沈氏圃，载雪而归。”^[512797]《角招》序：“观梅于孤山之西村。玉雪照映，吹香薄人。”^[512809]作者游览时的心情是悠闲畅快的，当他寻得梅花，看到梅花被白雪掩映，更是欣喜愉悦。

姜夔在描写景物时还喜用颜色字，序中多使用白描手法，使意象具有一种静态的、绘画的美感。姜夔在构造意象时，很注意颜色的表现力，色彩非常明朗。如《一萼红》序：“穿径而南，官梅数十株，如椒如菽，或红破白露，枝影扶疏。”^[512802]《鹧鸪天》序：“苍山四围，平野尽绿，隔涧野花红白，照影可喜，使人采撷，以藤纠缠著枫上。少焉，月出，大于黄金盆，逸兴横生，遂成痛饮，午夜乃寝。”^[512796]词序中还经常出现白色与青色，表现出了清爽、澹静的氛围。如《念奴娇》序：“秋水且涸，荷叶出地寻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亦一乐也。”^[512802]《满江红》序：“书以绿笺，沉于白浪。”^[512801]对于青、绿、白的喜爱同样体现在姜夔的诗歌当中，“白水日以长，仅存青草芽”“此时羡白鸟，飞入青山阿”（《昔游诗》其二）^[8149]“游人去后无歌鼓，白水青山生晚寒”（《湖上寓居杂咏》其四）^[81192]“绿葑自来还自去，来时须载白鸥来”（《湖上寓居杂咏》其六）^[81193]。白色幽静雅致，绿色清新自然，这些颜色字的使用也为作品增添了清雅的韵味。

姜夔善于将意象虚化，他在词序中经常使用借代的手法，用颜色、气味等来代指事物本身。如“数往

来红香中”^[512809]以“红香”代指荷花，“绿云自动”^[512802]以“绿云”代指荷叶，这使得意象由质实变为清虚，使意境更加空灵。而写景时融入听觉，同样可以使意象虚化。如《玉梅令》中的“梅开雪落，竹院深静”^[512798]，作者把动与静、视觉与听觉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也许是落雪使得竹院更加寂静，又或许是因为竹院的寂静才使人听到了雪落的声音。“梅”“雪”“竹院”三个画面组合在一起，正是其独特的传意方式。因为“梅”和“竹院”的空间位置可以由读者自由想象，作者又从“梅”和“雪”的近景延伸至远景，描写落雪时一片寂静的竹院，扩大了空间感。

通过探究姜夔词序的创作心态与艺术手法可以发现，姜夔论诗时谈到的“韵度”在其词序中有所体现，同时他的序又与词一样具有“清空”的特征。

三、词序中的精思与自然

《诗说》中强调了精思的重要性：“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为？”^[91680]同时他以“自然高妙”作为最终的审美理想。姜夔认为：“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91682]姜夔的作品通常表现出自然的特点，但他在《送项平甫倅池阳》曾言：“我知切切秋虫语，自诡平生用心苦。神凝或与元气接，屡举似君君亦许。”^[8194]自然浑成的背后是苦思所得，欲达到自然高妙的境界需要精思独造。

姜词小序中也体现出了精思与自然相交融的特征。一方面，精思体现在词序中的精心布置。姜夔早年师法黄庭坚，《诗说》中也有江西诗派的色彩，讲究章法的布置与安排。姜夔词序中的布置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类，层层铺叙渲染，与词文相互对照映衬。《扬州慢》序中写到“夜雪初霁，茅麦弥望”“入城则四顾萧条”与词中“过春风十里，尽茅麦青青”“废池乔木，犹厌言兵”^[512807]相照应。而序中的“黍离之悲”奠定了作品的情感基调。第二类，序中说明所咏之物。如《齐天乐》一词中有很多描绘声音的字句，但观《齐天乐》序方知，此词乃白石为咏蟋蟀而作。第三类，以序为线索，序中暗含作品主旨。白石虽一介布衣，但心系故国，其诗词中也常常寄寓着故国之思以及对统治者不思进取的讥刺。如《翠楼吟》一词，白石虽然未在词中加以批判，但其愤恨之情已流露在“安远”二字之上，具有讽刺意义。山河陷落，在短暂的苟安局面里，营造所谓的“安远”楼，如何安远？此二字在有限的语言中传达了无尽的意蕴。

姜夔词序上的精思还反映在他作词时态度非常认真,总是反复斟酌修改。《庆宫春》序云:“因赋此阙,盖过旬涂稿乃定,朴翁咎予无益,然意所耽,不能自己也。”^{[5]2800}一首词“过旬涂稿乃定”,可见用心程度。

另一方面,《诗说》中强调了创新独造的重要性,“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9]680}《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作诗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是而不能不异。”^[8]他想言“人所难言”“求与古人异”来突显自己的创作风格。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其学盖以精思独造为宗,故序中又述千岩、诚斋、石湖,咸以为与己合而已不欲与合,其自命亦不凡矣,今观其诗,运思精密,而风格高秀,诚有拔于宋人之外者,傲视诸家,有以也。”^{[13]2160}姜夔精思的背后是独造的精神,而精思作为一种才学涵养又支撑他追求创新与独特的风格。

创新在姜词小序中的体现,首先便是长序多。白石对于题序的态度并不像他之前的一些词人们,如苏轼、辛弃疾,他们是随意抒写,序多起补充说明的作用,姜白石则是把它当成一种单独的文体,一篇单独的作品去用心经营的,强化了序的独立抒情作用。

姜夔还在序中仔细考证乐调,详细介绍了乐曲的创作过程。这点前人并非没有,如苏轼《如梦令》序、《水龙吟》序,都有涉及编曲、改曲,但只是略谈,仍侧重叙事。白石此类词序则是专业的音乐考证,阐述自制词调的过程、方法,如《满江红》序、《凄凉犯》序。值得注意的是,姜夔在序中写这一部分考证词调的内容,是有意为之,《长亭怨慢》序:“余颇喜自制曲。”^{[5]2807}《暗香》序:“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5]2808}自己的独造、创新让自己感受到愉悦。

《白石道人诗集自叙》言:“三熏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8]姜夔从江西诗派入又从江西诗派出,他想要摆脱“法”的束缚,有意规避江西诗派枯瘦生硬、堆砌典故的毛病,并在之后转向学习晚唐诗平淡自然的韵味。《诗说》谓:“雕刻伤气,敷衍露骨”^{[9]680}“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9]682}。姜词小序注重语言的精工锻炼,但并非像词一样字琢句炼。小序中有布置的痕迹,但也体现了不求雕琢、不拘于法的特点,序中以平实之语抒写自然情致,具有灵动而朴实的色彩。姜夔所说诗的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自然高妙”则是“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

知其所以妙”^{[9]682}。即作诗不要求以语言的奇与怪来出新,要去掉文字的藻饰,归于自然平淡,“不知其所以妙”也表明了这种“自然高妙”境界的难得,因此姜夔以“自然高妙”作为诗的最高境界,姜词小序中便体现出了对这种境界的追求。

《徵招》序:“越中山水幽远,予数上下西兴、钱清间,襟抱清旷。越人善为舟,卷篷方底,舟师行歌,徐徐曳之,如偃卧榻上,无动摇突兀势,以故得尽情骋望。”^{[5]2809}作者运用白描手法,不加雕饰,随意书写。景物是随船行自然涌入作者眼中的,并非刻意营造,显得潇洒自然,余味悠长。姜白石所追求的这种自然正如他在《自叙二》中说:“其来如风,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苏子所谓不能不为者乎。”^{[8]3}同时,白石小序中的自然还体现在句式上的灵活自由,如《一萼红》:“有卢橘幽篁,一径深曲;穿径而南,官梅数十株,如椒如菽,或红破白露,枝影扶疏。著屐苍苔细石间,野兴横生,亟命驾登定王台。乱湘流入麓山,湘云低昂,湘波容与。”^{[5]2802}词序中长句短句相结合,四言句与五言句交错进行,韵律和谐自然。

姜夔那些随心、随性而发的内容也是造成词序自然特征的一个因素,如《扬州慢》序:“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5]2807}《一萼红》序:“兴尽悲来,醉吟成调。”^{[5]2802}《浣溪沙》序:“凭虚怅望,因赋是阙。”^{[5]2799}《摸鱼儿》序:“辛亥秋期,予寓合肥,小雨初霁,偃卧窗下,心事悠然。”^{[5]2806}《齐天乐》序:“予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亦得此。”^{[5]2801}姜夔将个人情感融入小序,表达了他在不同环境、时间,经不同景物触发而产生的种种情感,不过他的感怀并不总是被愁绪笼罩,更多地是宁静淡然。

《诗说》最后一则提到:“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能诗而后能尽我之说,是亦为能诗者作也。虽然,以我之说为尽,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为能诗哉?后之贤者,有如水投水者乎?有如得兔忘筌者乎?”^{[9]683}姜夔在这里所强调的:一是《诗说》“为不能诗者作”,因此其中必然会涉及诗歌的艺术技法作为他们学习的门径,这与江西诗派追求的“法度”一脉相承。二是当初学者经过不断练习成为“能诗者”,就要重视自得,一定程度上要忘记这些艺术技法,正如《诗说》第二十五则:“沈着痛快,天也。自然学到,其为天一也。”^{[9]682}这是一种从有“法”到无“法”的过程,从学习具体的艺术技巧到追求自然高妙的境界,做到“得意忘言”。但精

思独造与自然高妙在创作中不仅仅是阶段性发展，二者更类似于艺术手段与艺术境界，是难以分割的两个部分，姜夔词序中就同时呈现出了精思与自然的特点。赵晓岚评价姜夔词序：“他继承了苏序风行水上的自然，又加以文字的琢磨，他具备辛序回环吞吐的特点，却又避免了辛序的纵横习气，显得天真幽淡，古韵悠然。”^[14]姜夔精思独造与自然高妙的审美思想是中和、圆融的，其词序风轻云淡处有精思独造，逸笔草草处有经营布置。

通过探究姜夔词序与诗学思想中的内在联系，可以发现《诗说》中的重要理论，如“韵度”“飘逸”“自然高妙”等都在他的词序中有所展现。姜夔词序中的“韵度”与“飘逸”与其词的“清空”特质相融合，这种特点也与作者的创作格调紧密相关。“自然高妙”作为姜夔最高的审美理想离不开精思与独造。姜夔《诗说》中的创作理念融入其诗、词、词序的创作中，因此，研究其诗学思想对于研究其词序也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 [1] 谢章铤. 赌棋山庄词话[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 周济. 介存斋论词杂著[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 [3] 周济.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 吴讷，徐师曾. 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5] 唐圭璋，编. 全宋词[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6] 夏承焘. 姜白石词集编年笺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7] 叶维廉. 中国诗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92.
- [8] 孙玄常. 姜白石诗集笺注[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 [9] 何文焕. 历代诗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0]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11] 任中敏，著. 金溪辑，校. 散曲研究[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 [12] 吴调公. 说“清空”[J]. 文史知识，1984（1）：28-32+38.
- [13] 纪昀，等.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4] 赵晓岚. 论宋词小序[J]. 文学遗产，2002（6）：38-49+143.

On the Poetic Thinking and Ci-Preface of Jiang Kui

WANG Yuchen

(School of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poetic thinking of Jiang Kui is the condensation of his poem composition experience that can reflect his ideal poetic aesthetic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related to his creation of Ci-prefac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language used in Jiang Kui's Ci-preface is endowed with an integration of referential and presentational aspect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etic thinking embedded in his poetic treatises. Simultaneously, the elegant rhythm as well as the feature of emptiness can be demonstrated in the Ci-preface written by Jiang Kui. Such language has the poetic characteristic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emphasis on the poet's creative mindset and poetic style in *The Poem Theory of Baishi Daoren*. Additionally, the exquisite thought and naturalness in Jiang Kui's Ci-preface are also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his poetics and his Ci-preface.

Key words: Jiang Kui; poetic thinking; Ci-preface; relationship

明代王门学者王宗沐刊刻《传习录》的礼教思想

杜梅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杭州 310023)

摘要: 明代王门学者积极刊刻阳明文献, 他们尤为重视《传习录》的刊刻。作为浙中王门二传弟子的王宗沐, 依然积极热情地传承阳明心学思想, 极为严谨细致地刊刻《传习录》。王宗沐刊刻《传习录》的经过和目的展现出修己治人, 忠君、尊师, “以心言礼”的礼教思想。

关键词: 王宗沐; 《传习录》刊刻; 礼教精神

中图分类号: B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10-04

礼教思想是儒家思想之核心, 新文化运动以来, 一度遭到人们质疑。但 20 世纪 80 年代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它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秩序中发挥的作用。明代王阳明在反思朱熹思想的基础上, 创立了心学, 心学的核心“致良知”强调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 承担了礼教的功能, 其礼教思想先是通过阳明的讲学得以传播, 后是通过阳明后学刊刻《传习录》得以不断的传承。

明代之初就极为重视出版业的发展。《明史》载: “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 复诏求四方遗书, 设秘书监丞, 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1]2342} 朱元璋定都后, 下令搜集图书, 目的是加强思想文化的管控, 但也推动了京城和地方刻书业的迅速发展, 形成官印、藩刻、民间梓行多层次并举的出版体系。明代中叶得益于发达的出版业, 学者们相继组织刊刻《传习录》以研习、传播、弘扬阳明心学。

《传习录》是集中体现阳明学术精神的重要文献。最初《传习录》仅一卷, 由阳明先生的弟子徐爱于正德七年(1512)刊刻成册。正德十三年(1518), 薛侃在徐爱初刻《传习录》的基础上, 将徐爱、陆澄及自己所录三卷合为一册, 刊成《初刻传习录》, 后人称该本为《传习录》(薛本), 即今通行本上卷和中卷。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任绍兴知府, 他以薛本为上册, 另以选编《答徐成之》等 9 篇阳明论学书信为下册, 汇刻成《传习录》(南本), 确定了《传习录》“语录+论学书”的编排模式。自南大吉《传习录》(南本)

刊刻以来, 阳明弟子纷纷刻印《传习录》。嘉靖七年(1528), 阳明先生去世后, 钱德洪与同门不断增订、精编阳明语录, 力图使各版本《传习录》说法统一。嘉靖三十五年(1556), 钱德洪在湖北刻《传习录》。

王宗沐(1523-1591), 字新甫, 号敬所, 浙江临海人。作为阳明后学二传弟子, 王宗沐继承了一传弟子们积极刊刻阳明文献的精神。他在钱德洪版本基础上刻印《传习录》, “合续本凡十一卷”^{[2]32}。本文将王宗沐的仕宦经历、学术思想、交游情况与其刊刻《传习录》的背景、经过、影响相结合, 探析明中后期阳明文献刊刻所蕴含的礼教思想。

一、修己治人的礼教思想

王宗沐的仕宦经历对其刊刻《传习录》有重要帮助。据《明史》载: “(王宗沐)与同官李攀龙、王世贞辈, 以诗文相友善。宗沐尤习吏治。历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洞书院, 引诸生讲习其中。”^{[1]5876} 王宗沐曾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至嘉靖四十年(1561)三月, 历任江西提学副使、江西参政、江西按察使、江西右布政使, 均分管书籍官刻。

前人早已对明代不同地区的刻书情况加以统计。袁栋在《书隐丛说》说: “官书之风至明极生, 内而南北两京, 外而道学两署, 无不盛行雕造。”所谓“官书”即是指各省布政司涉足出版业。王宗沐于江右任上分管地方文化教育、书籍刊刻时, 刻书风尚十分浓厚, 明代“刻书最多的布政司有: 山西、云南、河南、陕西、江西、四川、福建等, 刻书最多的府有: 苏州、

收稿日期: 2023-05-23

基金项目: 浙江外国语学院 2021 年度博达科研提升专项计划青年基金项目“浙中王门学者王宗沐文学思想研究”(2021QNYB10); 2022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明代江右王门的礼教思想研究”(2022M71177)。

作者简介: 杜梅(1989-), 女, 山东聊城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宋明理学方面的研究。

南昌、福州、常州、扬州、西安、武昌、成都、开封等”^{[31]02}，其辖内的江西南昌是刻书较为活跃的地区。发达的刻书业为王宗沐刊刻《传习录》提供了良好的刊刻条件，而其修己治人的思想是其刊刻《传习录》的精神来源。

宋代程颢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予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却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4]51}至明代，王阳明则继承修辞立诚之观念：“文字思索亦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凡作文字要随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了，亦非修辞立诚矣。”^{[5]111}

刊刻《传习录》是王宗沐继承圣人之志、坚守儒家之道的人生理想之体现。王宗沐在《刻传习录序》中说：“先生（王阳明）顾其始亦尝词章而博物矣，辗转抵触，多方讨论，糅缀于平时者，辨艺华藻，似复可恃。至于变故当前，流离生死，无复出路，旁视莫倚，而向之有余者。茫然不可得力，于是知不息之体……事功文词，固其照中之隙光也。”^{[2]32-33}阳明先生早年好词章，曾将渊博的学识和充沛的精力用在为文上。历经政治低潮，在生死边缘悟道后，其文学思想有所转变。他批判当时溺于文辞的创作风气，曰：“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於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5]37}王阳明不仅批判当时人溺于文字的现象，还要求创作主体正心诚意。对王阳明这一思想的记录说明，王宗沐也意识到在修辞上下功夫，亦可以修己。因为辞诚乃致知的具体功夫，亦是成圣成贤的表现。

除此之外，王宗沐同僚刊刻《传习录》，也体现出修己治人之精神。大约与王宗沐同时在江西任上的还有学者蔡汝楠。蔡汝楠（1516—1565），字子木，号白石，德清人，他曾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至嘉靖四十年（1561）两次出任江西，在赴江西之前，曾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出任衡州知府四年。在衡州期间，他修葺石鼓书院，聚徒讲学，与孙应奎刊刻《传习录》。孙应奎（1488—1570），字文卿，号蒙泉，余姚人，嘉靖四年（1525）十月尊父命赶赴绍兴，拜阳明先生为师。王阳明去世后，孙应奎深感阳明后学对师说的理解较为驳杂纷乱，不利于阳明思想的传播，故于衡州任上同蔡汝楠一起刻《传习录》。因孙应奎曾亲受阳明先生教诲，故《刻阳明先生传习录序》：“乃出先生旧所

手授《传习录》，俾刻置石鼓书院。……嘉靖三十年夏五月壬寅，同邑门人孙应奎谨序。”^{[5]1587}此版本《传习录》共7卷，前3卷即薛侃辑录部分，后4卷参考钱德洪、南大吉辑录内容，此版本最大程度保留和传达了阳明心学之旨。

王宗沐与蔡汝楠二人不只是普通的同僚关系，还是知己和道友。嘉靖三十三年（1554）至四十年（1561）期间，蔡汝楠由衡阳知府转任江西，而王宗沐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至江西任上。蔡汝楠曾同孙应奎共同刊刻《传习录》，在江西任上也支持和帮助王宗沐刊刻《传习录》。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月，《明世宗实录》卷五零五：“给事中梁梦龙、御史唐继禄等以考察拾遗，劾奏山西左布政使王宗沐、右布政使陈效古、福建按察使刘天授、贵州按察使董策……”可知，王宗沐被弹劾，后被调任广西左布政使。尽管王宗沐调任广西，但他与蔡汝楠仍保持通信往来，《敬所王先生文集》载《与蔡白石太守》：“三月入柳州，始拜闽庆，远来手书中所发挥旨出自胸臆，独得一洗训诂，此岂独衡之诸生受益，抑且庆吾道尤人矣，幸甚幸甚！”^{[2]182}王宗沐离开江西，次年三月抵达广西柳州任上之后，就立马写信告知蔡汝楠自己的近况，并于书信中相与论学，述及自己追求修己治人的理想。

可见王宗沐刊刻《传习录》的动力因素，无论是个人内在的理想追求，还是外力友人的相助，皆与修己治人的礼教思想息息相关。

二、忠君、尊师的礼教思想

无论为官还是居家，王宗沐都忠君、尊师，重视教化百姓，推动社会基层秩序的构建，并致力于阳明心学的传播，这体现出明代中后期士人在君臣和师生关系中的礼教思想。

（一）忠君行道的礼教思想

王宗沐为官约40年中，不仅在各地任上兢兢业业，还十分重视教化和传播阳明心学。

嘉靖二十九年（1550）二月辛亥，王宗沐升任广西按察司僉事，提调学校。在广西期间，他重视教化百姓，修建宣成书院、建造崇迪堂，聘请经师教育士子。

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据《明世宗实录》载：“升广东布政使司左参议王宗沐为江西按察副使。”^{[6]7466}另《明史》载：“宗沐尤精吏事，历江西提学副使。”^{[1]5876}在江西任上，王宗沐重建正学书院、怀玉书院，主持书院讲学活动，并支持刊刻阳明文献。

万历元年（1573），王宗沐升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在治理漕运之暇，他在淮安创建政学书院，“会聚问难，示以学脉所在”^{[7]81}。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1557）王宗沐于江西任上，密切联系当地阳明学者，积极教化当地民众。王宗沐作为江西提学，曾延请阳明先生高足邹守益聚讲于白鹭洲书院，并率千余儒生听讲。除了讲学之外，王宗沐还为阳明嫡传弟子邹守益等人编纂刊刻的《阳明先生图谱》作序，“（阳明）今歿才三十年，学亦稍稍失旨趣。……嘉靖丁巳冬十有一月长至，赐进士出身中顺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奉教再提督学政临海后学王宗沐书”^{[18]468}。

王宗沐与邹守益的密切交往有利于推进对当地百姓的教化。正德十四年（1519）王阳明制定《南赣乡约》：“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15]600}这种适用于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乡规民约，其目的是约束个人行为，避恶扬善，敦风化俗、改造民众。阳明心学强调心即理，而强调民众自治的乡约，即是王阳明践行心学主张的具体实践，是他弘学的一部分。这种深入百姓日常生活的弘学活动是江右乡土乐于接受的。因而，江右地区有识之士传承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等思想，旨在维护江右地区社会的稳定，并践行“觉民行道”之旨，提升地域个体的修养和能力。王宗沐刊刻《传习录》传播阳明心学思想，体现出他忠君行道的礼教思想。

（二）尊师守道的礼教思想

王宗沐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至嘉靖四十年（1561）三月，于江西任上以钱德洪版本为基础刻印《传习录》，合续本凡 11 卷。他之所以像前辈一样积极热衷于刊刻《传习录》，一方面是因为江西乃阳明先生“提戈讲道处”，江西却无刊本，王宗沐深以为憾，正如他于《传习录序》所言：“《传习录》，录阳明先生语也。四方之刻颇多，而江右实先生提戈讲道处，独缺焉。”^{[12]32}因此，当他至江西任上后，便立刻组织修缮阳明祠堂、积极刊刻《传习录》，传播阳明心学，“《传习录》刻成后置于学宫，供众生阅览传播”^{[21]32}；另一方面，阳明心学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对阳明旨归的偏离，因为有的学者未能做到修辞立诚。故王宗沐《刻传习录序》曰：“先生之所以得者，岂尽于是耶？嗣后一传，百讹师心，即圣为虚无滂荡之论，不可穷诘，内以驰其玄莫之见。而外以逃其践履之失。……今袭先生之语以求入，即句句不爽，尤之无当于心，而况不能无失乎！心不息，则万古如一日；心不息，则万人如一人。”^{[21]32-33}由于有些阳明弟子一味溺于文辞，而未能真正领会阳明心学之旨，从

而对阳明旨归有所曲解并误传阳明心学之旨。

学术思想借助语言进行传递，易偏离原意。王宗沐意识到阳明后学在传递心学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讹误，因此在刊刻《传习录》过程中极为谨慎、细致。正如他于《与钱绪山先生》中言：“《传习录》就梓已完，讹误未别，尚须役便。徐生特遣送阳明先生像去，谨此附问，弩身未鞭，进退寸尺，成物切劘，本公素旨，幸有以教之。”^{[12]229}他致力于刊刻《传习录》的根本目的是还原并传承阳明心学旨归，力图完整保留师说。尊重师说，是王宗沐刊刻《传习录》的动力支持，可见其尊师守道的礼教思想之深。

三、“以心言礼”的礼教思想

江西是理学思想发展的重镇，宋以来，陆续出现许多重要的理学家，如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曾于江西任职十余年，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今江西婺源人）、儒学新方向“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今江西今金溪人）、元代思想家吴澄（今江西乐安人）。他们影响了此后几百年的中国政治与文化走向，甚至可以说江西对于中国宋元明清的学术思想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浓厚的学术氛围下，江右地区的讲学之风也十分浓厚，且讲学带有明显的家族群体性特征。正如王士性所言：“江右讲学之盛始于朱、陆二先生，鹅湖、白鹿，兴起斯文。本朝则康斋吴先生与弼、敬斋胡先生居仁、东百张先生元祯、一峰罗先生伦，各立门墙，龙翔凤起。最后阳明先生发良知之说，左朱右陆，而先生勋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体有用无能过之，故江右又翕然一以良知为宗，弁髦诸前辈讲解，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江右俗以门第为重，其列版籍以国初黄册为准，其坊厢乡都里长，咸用古册内祖宗旧名，子孙顶其役不易其名也。家虽贫穷，积逋甚，然尚有丁在，则必百方勉力，众擎之，不肯以里排长与他家，与则恐他人侮且笑之。其新发产殷富之家，纵贫者不敢逊让。”^{[19]79}可见，江右地区十分重视门第，家族会聚全族之力兴办私塾或书院。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问题，如学什么内容，向谁学习等等，是江右地区的世家大族必然深思熟虑的问题。

阳明先生与江西的缘分极深，一生曾 4 次至江西。正德十四年（1519）阳明在江西闻宁王朱宸濠反，遂返于吉安，仅用四十多天的时间即平宁王之乱。阳明先生的军事才能和个人魅力吸引了更多江西弟子投入其门下，如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刘文敏、黄弘纲、何庭仁、陈九川、万廷言等皆为一传弟子，王时槐、胡直、邹元标等为再传弟子，皆理学名家。阳明思想一旦被家族长者认可，便迅速地在整个家族，甚至整个州县传播。

阳明心学思想一改朱熹天理为宇宙中心的说法，认为“心”是宇宙万物之心，可容纳宇宙万物。恢复心之本性，不仅能提升个体的道德修养，还可扩大道德修养影响的社会范围。正如沟口雄三所说：“阳明学在社会史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使朱熹学从官僚为本位的道德治世之学转向民间为本位的道德秩序之学；换言之，可以说是把儒教道德从士大夫的修己治人之学扩大为民间的日常性生活规范。”^{[10][133]}于是，人皆可成圣人，成圣则会遵守礼教，那么人人守礼教就变得有可能。这样阳明先生礼教思想的义理基础则由天理转向了良知，阳明先生在指导和强调人人成圣的同时，亦在期许人人皆成守礼之民，即“以心言礼”。若能够做到明心见性，以良知本体指导其礼教实践，则有益于良好社会秩序的构建。但若过度强调自我情欲，则容易误入歧途，背离礼教。

江右王门从一传弟子开始就重视道德践履，并非一味流于空谈，所以江右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其阳明思想与礼教思想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因此，王宗沐于江西任上积极推动《传习录》的刊刻，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在推动江右地区“以心言礼”礼教思想的实践化。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 王宗沐. 敬所王先生文集 (三十卷)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第111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3] 聂付生. 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 [4] 程颢, 程颐, 撰. 潘富恩, 导读. 二程遗书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 [5] 王守仁, 撰. 吴光, 钱明, 董平, 姚延福, 编校. 王阳明全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6] 张居正, 等. 明世宗实录 [M].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
- [7] 裘樟松. 王宗沐生平考辨 [J]. 东方博物. 2004 (3).
- [8] 邹守益. 阳明先生图谱 [M]// 四库未收辑刊 (四辑十七册).
- [9] 王士性, 撰. 吕景琳, 点校. 广志绎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0] [日] 沟口雄三. 中国的冲击 [M]. 王瑞根, 译. 孙歌, 校. 北京: 三联书店, 2011.

The Ethical Thought in *Chuanxilu* Carved by Wang Zongmu, a Scholar of the Yangming School in Ming Dynasty

DU Mei

(School of Chinese Culture, Zhejia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Yangming scholars of Ming Dynasty actively printed and engraved Yangming documents, and they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rinting and engraving of *Chuanxilu*. Wang Zongmu, as the second-generation disciple of the Yangming of the middle of Zhejiang, still actively and enthusiastically inherits the thoughts of Yang Ming's mind studies, and publishes the *Chuanxilu* with great rigor and detail. The process and purpose of Wang Zongmu's printing of *Chuanxilu* show the spirit of etiquette: the thought of cultivating oneself and governing others; the thought of being loyal to the king and respecting the teacher; the “heart to speak ceremony” ritual thought.

Key words: Wang Zongmu; printing *Chuanxilu*; the ethical thought

鲁迅笔下的“堂吉诃德”与“庄子”

——从译作《解放了的董吉诃德》谈起

高 闻

(山东大学 文学院, 济南 250100)

摘 要: 戏剧《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是苏联作家卢那察尔斯基对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戏仿之作, 1931年最先由鲁迅翻译了第一幕并发表于《北斗》, 后由瞿秋白按照俄文本翻译全文, 并由鲁迅写作后记。鲁迅在《后记》中对吉诃德的缺点与毒害加以明白揭示的同时, 也对嘲笑吉诃德的旁观者予以批评。于鲁迅而言, 卢那察尔斯基笔下的董吉诃德具备多重象征意义, 既是不辨是非、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同时也是怀有真诚信仰与实干精神的勇士。鲁迅对于前者自然持严肃的批评态度, 对于后者却加以肯定。这一态度通过与《起死》中“庄子”及其影射的现代“伪士”形象作对比得以凸显, 也可借由鲁迅杂文中对堂吉诃德的相关论述加以印证。以鲁迅对卢氏的董吉诃德的态度为切口, 得以透视鲁迅重视远离伪诈之“心声”、强调现时行动的革命观与文学观。

关键词: 鲁迅; 革命文学; 董吉诃德; “第三种人”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14-07

《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是1922年苏联文学家卢那察尔斯基创作的10幕喜剧。鲁迅以《被解放的堂·吉诃德》为名翻译了第一幕, 载于《北斗》第一卷第三期(1931年11月20日出版), 之后从曹靖华处得到原本, 发现德、日译本与俄文本相比均有较多删节, 因而中止了翻译。后易嘉(即瞿秋白)按照俄文本继续翻译, 更名为《被解放的董·吉诃德》继续发表在《北斗》(第一卷第四期, 第二卷第三、四期)上, “可惜的是登到第四场, 和《北斗》的停刊一同中止了”^{[2]136}, 后来觅得未刊的译稿, 由上海联华书局于1934年以《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为名出版了单行本。

1930年鲁迅于《“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 言及“就我所见的而论, 卢那卡斯基^①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 法克耶夫的《溃灭》, 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 在中国这十一年中, 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1]211}。在得知卢氏剧作在《北斗》

续登之后, “那时我的高兴, 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 并强调“现在有联华书局给它出版, 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 这是极可庆幸的”。^{[2]136}由此可见鲁迅对这一译作的极高肯定。鲁迅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深受卢那察尔斯基的影响, 1929—1930年间先后译毕卢氏的《艺术论》与《文艺与批评》, 由此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不过在卢氏诸多作品中, 鲁迅只参与翻译了《被解放的堂·吉诃德》^②, 其时“革命文学”论争趋于结束, 鲁迅多次在杂文中提及堂吉诃德来影射文坛与社会现象^③。从《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出发, 联系鲁迅翻译卢氏剧作前后所参与的文坛论争及其文学创作, 或许可以打开理解“革命鲁迅”的一扇窗户, 由此体察其一以贯之的革命观与文学观。

一、“革命文学”论争与“Don鲁迅”

鲁迅在1930年代翻译《被解放的堂·吉诃德》, 不由令人联想到当时中国的“堂吉诃德”热, 以及作

收稿日期: 2023-03-22

作者简介: 高闻(1999-), 女, 山东德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卢那卡斯基即卢那察尔斯基, 下文同。

② 鲁迅翻译的部分以《被解放的堂·吉诃德》为名发表于《北斗》第一卷第三期。鲁迅还曾校订柔石所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戏剧《浮士德与城》并于1930年6月作后记, 但据材料可知他并未参与具体的翻译工作。

③ 此句提及的堂吉诃德, 既包括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也包括卢那察尔斯基所戏仿的“堂吉诃德”。西班牙的“Don”是一种贵族的尊称, 无实际意义。就卢氏剧作而言, 鲁迅的翻译是“堂·吉诃德”, 瞿秋白则译为“董·吉诃德”, 但两种翻译的指代意义相同。本文在论及卢氏剧作时统一使用“董吉诃德”这一名称, 与出版的单行本保持一致, 且以此区别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

为其源头的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

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成员将批判的矛头对准鲁迅。冯乃超直言鲁迅“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百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3]；成仿吾认为鲁迅“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4]；而李初梨质问“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视鲁迅为专讲“趣味”的小有产者的代表^[5]；太阳社钱杏邨等则认为鲁迅的大多数作品都缺乏时代精神，没有现代的意味，并宣称“阿Q的时代是早已死去了”^[6]。被卷入这场论战的鲁迅自然无法置身事外，1928年2月23日写下《“醉眼”中的朦胧》，回应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批评，指出他们所言的革命文学脱离实际、近乎“投机”，使得这场革命文学阵营内的论争日趋激烈。同年4月，《文化批判》第四号相继刊出李初梨的《请看中国的Don Quixote底乱舞》、冯乃超的《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和钱杏邨的《“朦胧”以后》等文章，继续对鲁迅进行批评。这些文章将鲁迅戏称为“Don 鲁迅”“文坛的老骑士”“同风车格斗的Don-Quixote”^{[9]213-221}，堂吉诃德这一形象作为创造社批判鲁迅的工具，成为了落后腐朽、缺乏立场、脱离时代的老古董的代名词。

在鲁迅看来，创造社等人对于堂吉诃德的理解是有所偏颇的。他在《奔流》编校后记中说到：“中国现在也有人嚷些什么‘Don-Quixote’了，但因为实在并没有看过这一部书，所以和实际是一点不对的”^[10]。在论争的当时，*Don-Quixote*汉译本还只有林纾的文言译本《魔侠传》，且只译出了上半部分并有所删节。1908年，鲁迅于东京日本桥的丸善书店购买从德国邮寄过来的文学书籍，即德国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的《堂吉诃德》德译本，后一直珍藏。^[11]鲁迅主编的《奔流》第一卷第一期刊登了由郁达夫翻译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Hamlet 和 Don-Quichotte》，屠格涅夫认为堂克蓄德（即堂吉诃德）身上体现了对于理想的绝对信仰，对于自由的勇敢追寻，他有极强的行动力、道德力和为人类无私奉献的精神。^[13]这很像是借屠格涅夫之口为堂吉诃德进行的“辩护”，恰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对鲁迅的攻击形成了某种悖反。

在鲁迅看来，创造社等人自诩革命，却不敢正视目前的暴力与黑暗，所谓“革命者”即“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汗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

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14]他们一味摆出极左的面目，仿佛“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却不知道“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抬高文学之于中国革命的作用，但自身又并未作出显著有效的理论建树与文艺创作，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作品“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16]。尽管鲁迅对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批评有过激之处，但这论争无疑体现出其重视实干与强调韧性的革命观。于鲁迅而言，喊口号、挂招牌式的“革命文学”乃是拉着旧东西来保护和抬高自己，还不如堂吉诃德人道主义式的行动和抗争更具实效。而正如日本学者丸山升所言，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鲁迅“比较多的批判是针对‘新’思想和文学完全不曾扎下根、只是作为一时的流行很快消逝这种中国新文化根底之浅薄。这种批判有时与其说是批判，毋宁说更接近于叹息。”^{[17]55}

值得注意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创作的“董吉诃德”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卢氏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鲁迅的左翼文艺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不过除此之外，卢氏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戏剧作品，其中《被解放的董吉诃德》便是对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的戏仿之作，具体而言，是对《堂吉诃德》上部第22章的改写^①。在营救犯人之外，卢氏通过增设情节和人物，突出了革命与反革命阵营之间的对立以及董吉诃德在两个阵营之间的摇摆。卢氏试图在俄国现代革命语境下对历史上的堂吉诃德加以阐释，“堂吉诃德和桑丘在这个世界里将会被窒息，只要社会主义不开始付诸行动。而当社会主义开始付诸行动时，许许多多热心的理想主义者、堂吉诃德们、富于幻想的人，在革命工作中都能够为自己的英雄主义浪漫情怀找到用武之地，他们不再充当幻想中的骑士了，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践行者。他们越是相信自己的理想，越是成为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就越会成为我们共同事业可靠的强有力的战友。”^[18]卢氏对堂吉诃德的此番阐释似乎与其戏剧创作达成了政治立场的契合。事实证明，卢氏《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在捍卫社会主义革命立场的同时，的确给予了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者堂吉诃德以更多的宽容和理解。这或许构成了鲁迅翻译这一剧作的重要原因。

在1928年4月10日给《语丝》读者的回信里，鲁迅

① 参见[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2章“堂吉诃德释放了一伙倒霉人，他们正被押送到不愿去的地方去”。

曾论及《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①，这说明鲁迅应该在1925—1928年间就阅读过《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德译本或日译本^②。1929年8月鲁迅为卢氏的《文艺与批评》写译者附记时，再次提及这一剧作，认为“然而卢那卡斯基并不以托尔斯泰主义为完全的正面之敌。这是因为托尔斯泰主义在否定资本主义，高唱同胞主义，主张人类平等之点，可以成为或一程度的同路人的缘故。那么，在也可以看作这演说的戏曲化的《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里，作者虽在揶揄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的化身吉诃德老爷，却决不怀着恶意的。作者以可怜的人道主义的侠客堂·吉诃德为革命的魔障，然而并不想杀了他来祭革命的军旗。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卢那卡斯基的很多的人性和宽大”^[19]。这多少包含着对于创造社、太阳社等的暗中指涉，流露出鲁迅被卷入革命文学论争且被视为“反革命”作家之后的深沉慨叹，同时也表明其自身对“堂吉诃德”这一革命“同路人”的理解与宽容。创造社等人攻击鲁迅为“Don 鲁迅”时，鲁迅可能与卢氏这一戏剧产生了更多的情感共鸣，而这或许构成了鲁迅翻译《被解放的堂·吉诃德》的情感动机之一，尽管在那时身为左联“盟主”的鲁迅其革命认识与内心情感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翻译的初衷与目的也产生了微妙的错位。

二、董吉诃德的双重面孔

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共有10幕，背景设置于17世纪末的西班牙，按照革命阵营可将主要人物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国公、伯爵谟尔却·魏斯孔新等反革命势力；一类是巴勒塔萨等3个革命党成员；最后是持中间立场的人道主义者吉诃德及其侍从山嘉。剧本侧重描写了反革命势力的狡诈与凶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董吉诃德以人道主义之名对反革命势力的多次轻信与纵容。虽然在第一幕董吉诃德拼死救出了3个革命党，但在之后的情节发展中，董吉诃德一再堕入国公与伯爵谟尔却设下的圈套，认为银铛入狱的国公和伯爵等人属于被压迫者，并帮助谟尔却等人从监狱逃脱，最终导致反革命势力死灰复燃，革命事业受到重创。

剧本中的董吉诃德多次呼唤没有暴力和鲜血的世界，比如在与伯爵谟尔却对话时大声疾呼：“为什么一切都要蒙着一层罪恶的露水，跟着还有眼泪，还有

血？为什么兄弟要互相仇视，为什么要有强暴，要有奴隶？——要有愚蠢穷苦和没有良心？”^[2128]董吉诃德以生命为筹码救出了革命者，却又在紧要关头释放了反革命者，破坏了革命战线；他以为自己肩负拯救米拉贝拉与守护国土的责任而与黑人决斗，不料自己只是充当了滑稽戏的主角，成为国公等人的笑料；他被国公投入监狱，被救出后又立刻忘却了反革命者的丑恶嘴脸。他一心追求“人道”、渴求“正义”，希求能够消除暴力和压迫，让这世界充满鲜花和爱，并为此随时准备着奉献自己的生命，但缺乏明辨是非的判断能力，终究还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形而上学和乌托邦，是真理和正义的豫期，思想的洁白，禁止我们和宽慰我们的小说，或使我们成为走自己的任意的路，而不识现实世界的事物的梦游病的小说相妥协。”^{[20]278}在戏剧第四幕的起始有一段董吉诃德的心理活动和诗歌吟咏，开口便是“命运”“上帝”或“天神”，董吉诃德一边念着诗歌缅怀自己的姊妹，一边“决心还是要飞的”。这些言谈说教与“工夫诗”在艰险的革命斗争中确实不合时宜，倍显滑稽。

卢氏采用托古讽今的写法流露出了对董吉诃德的批判，极容易使人联想到当时托尔斯泰派所奉行的以善制恶的无抵抗主义与乌托邦理想。“原书以1922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21]34}，这其中就包括托尔斯泰派。在卢氏看来，无论是吉诃德主义者还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他们都是“只在这人生中，留作无用的东西，并不探求非历史底路而后退，但也不向前，却走向侧面，走向空虚里去了的那样的人们。”^[21]鲁迅显然认同卢氏的这一看法，他在《后记》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这一个剧本，就将吉诃德拉上舞台来，极明白的指出了吉诃德主义的缺点，甚至于毒害。”^{[21]32}

不过，董吉诃德果真百无一利、遭人嫌恶么？读过《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人大抵会因董吉诃德的

① 参见鲁迅：《三闲集·通信（并Y来信）》，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鲁迅原文为“苏俄的学艺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卡斯基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里，将这手段使一个公爵使用，可见也是贵族的东东西，冠冕堂皇”。

② 参见《〈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后记》，载《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一九二五的德国，和现在稍不同，这戏剧曾在国民剧场开演，并且印行了戈支（I. Gotz）的译本。不久，日译本也出现了”，可知德译本出现于1925年，日译本于不久后面世。

滑稽而发笑，甚而觉得怜悯，却鲜少会感到嫌恶与愤懑，这其中自然如鲁迅所说，能看出卢氏“很多的人性和宽大”，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大概也由于卢氏视董吉诃德为革命“同路人”的缘故——董吉诃德人道主义的虔诚理想与勇往直前的行动意志正是“同路人”与“建设者”的潜在品质。卢氏曾在《西欧文学史指要》中论及塞万提斯所作的《堂吉诃德》，不仅表现出对于堂吉诃德的宽容和欣赏，还指出“堂吉诃德”这一人物指向未来的潜能，“像任何一部伟大作品一样，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完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它是面向未来的。堂吉诃德很滑稽可笑，桑丘也很滑稽可笑，但他们比所有的人都优秀……可是他们都将死去，因为他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18]与之对应，卢氏笔下的董吉诃德同样也是面向未来的。正因如此，卢氏选择在剧本最后借知识分子巴勒塔萨之手放其一条生路，使其免于革命者的刀枪，得以通往未来的世界。巴勒塔萨把吉诃德们预支给将来，表明了未来的世界仍旧需要董吉诃德这样的人道主义者来建设。这一点鲁迅也是赞同的，他说，“巴勒塔萨始终还爱着堂吉诃德，愿意给他去担保，硬要做他的朋友，这是因为巴勒塔萨出身知识阶级的缘故”。

然而迫于紧迫的革命形势，鲁迅又不得不承认“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21]33}。鲁迅为译作撰写后记时正担任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成员，这一年希特勒在德国建立法西斯专政；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政府一边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并签订卖国协议，一边推行“民族主义文学”，不断加强对普罗文艺的审查，强化反革命“围剿”措施，实行文化统制；文坛出现保守趋势，“第三种人”等的软弱游移阻碍了左翼文艺的发展。经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失败，翻译过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目睹过反动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感受过“左联”同志牺牲后的悲痛无奈，鲁迅愈发认同阶级立场与“无产阶级文学”，对高呼“自由”“民主”的中间立场者逐渐丧失信任。在鲁迅看来，“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它文艺”^[22]，并不得不将吉诃德暂时驱逐出革命之地。

无法忽视的是，尽管鲁迅在后记中直接指明吉诃德的缺点与毒害，字里行间却难掩对其的同情与辩

护^①，并有意将批评的矛头指向那些嘲笑吉诃德的旁观者。在撰写后记的同时期，鲁迅曾撰写杂文论及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并于其后创作了《起死》中的“庄子”这一“伪士”形象。或许我们可以借助鲁迅杂文中对于“堂吉诃德”这一原型的相关论述，探讨现代革命语境中卢氏的董吉诃德之于鲁迅的现实意义。在鲁迅那里，董吉诃德具备多重象征意义，既是不辨是非、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怀有真诚信仰与实干精神的勇士。对于前者，鲁迅自然是持严肃的批评态度，而对于后者他却是称赞有加的，这一肯定态度或许要选取另外的参照物才得以凸显。

三、从“堂吉诃德”到“庄子”

1931年鲁迅翻译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第一幕发表于《北斗》，鲁迅于1933年由瞿秋白翻译的全文（后以《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为名出版）撰写后记，此后其文学创作以杂文为主。不过在1934—1935年期间，鲁迅集中创作了《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等5篇作品，收入《故事新编》中。孙郁曾点出《起死》与《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之间存在某种潜在关联，前者是对后者的戏仿，揭示出晚年鲁迅对“无是非”的是非观的批判，及其因现实战斗需要而呈现出的“油滑”^{[23][24]}；张亮在《〈起死〉的潜文本：与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对读》中，探讨卢那察尔斯基对鲁迅构思和创作《起死》的影响，及其对鲁迅思考与选择中国革命道路所产生的影响。^[25]

鲁迅晚年创作的5篇被收入《故事新编》的小说中，唯有《起死》一篇采用了近似于戏剧的形式。《起死》的创作是否受到了《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启发与影响呢？不妨先对比一下董吉诃德与庄子的出场。士兵眼中董吉诃德“那骑在白马上瘦子瘦得那么样，简直是《默示录》上说的瘟神”^{[21]12}，而庄子是“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道冠，布袍，拿着马鞭”。^{[26]485}1934年联华书局出版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扉页附了毕斯凯莱夫刻的骑马的董吉诃德木刻画，干瘦萧瑟，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起死》中同样黑瘦且骑马出场的庄子。此外，董吉诃德和庄子都进入了某种时空的错位——原本处于十六七世纪西班牙君主制统治下的董吉诃德被甩入现代革命背景中，而身处周朝的庄子执意复活500年前的商朝子民且试图与之闲谈。二者都败给现实：董吉诃德被革命者驱逐，庄子在巡士的掩护下落荒而逃。两者都是借古写今，

^① 参见《〈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后记》第131页，“那么，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进一步结合后文可知，鲁迅对吉诃德的出发点是持肯定态度的，与只知嘲笑的旁观者相比，吉诃德的立志与行动甚至是值得称赞的。

具有较强的讽刺意味，都深刻揭示了理想化的理论在现实中屡遭碰壁的事实，反映出对主人公的“无是非”“超时代”观念的批判。由此可知，无论是从写作形式与技法，还是从隐喻层面而言，《起死》对《解放》是有借鉴与参考的可能性的。

除两者的共性之外，其区别以及在鲁迅那里使得董吉河德不同于庄子的特质也同样值得关注。《起死》的前半部分取材于《庄子·至乐》中“庄子遇髑髅”的寓言，然而从出场开始，本来位居神坛的庄子就被鲁迅毫不留情地俗化——“出门没有水喝，一下子就觉得口渴。口渴可不是玩意儿呀，真不如化为蝴蝶。可是这里也没有花儿呀”，滑稽荒诞之感油然而生。在路遇髑髅后，鲁迅借用《庄子·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让庄子说出“这样看来，又安知道这髑髅不是现在正活着，所谓活了之后转来之后，倒是死掉了呢？请大神随随便便，通融一点罢。做人要圆滑，做神也不必迂腐的”，以此说服司命复活髑髅的生命。然而最具戏剧性的情节还是在髑髅变成赤身裸体的汉子之后，庄子与汉子的交谈与纠缠。庄子一心想要了解商朝轶事，而汉子只想要回自己的衣服和包裹，二者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在汉子第一次向庄子索要自己的衣物时，庄子责怪“你这人真是糊涂得要死的角儿——专管自己的衣服，真是一个澈底的利己主义者”；之后汉子着急地拉扯庄子的衣服，庄子说道：

慢慢的，慢慢的，我的衣服旧了，很脆，拉不得。你且听我几句话：你先不要专想衣服罢，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又怎么能说有衣服对呢？……

汉子——（发怒，）放你妈的屁！不还我的东西，我先揍死你！（一手捏了拳头，举起来，一手去揪庄子。）^{[26]490}

如果说到这里为止，我们能看出的是庄子消弭是非的相对主义观念以及这种哲学理念对于现实的失效，由此令人发笑，那么后续情节发展就颇具讽刺效果了。

庄子召唤司命大神失败后，吹响警笛叫来巡士进行调解，巡士让庄子赏给汉子一件衣服遮羞。主张衣服不重要的庄子，却因为要觐见统治者楚王而拒绝施舍一件衣服给汉子，这恰是其所云专管自己衣服的“澈底的利己主义者”，在无形中消解了看似高深奥妙的哲理。他在关键时刻颇为娴熟地掏出警笛召唤巡士，并用“见楚王去”和隐士局长为护身符得以逃脱汉子的纠缠，无疑违背其“绝圣弃知”、蔑视权威的思想。此外，庄子甚至混淆儒道文化，将儒家《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百家姓》中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秦褚卫，姜沈韩杨”等作为咒语念出，与道家的“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混作一团，令人啼笑皆非。

鲁迅创作《起死》，通过“油滑”笔法对庄子这一形象进行了漫画化改写，讽刺程度甚于《出关》中的老子。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1935年3月和5月分别创作了《论讽刺》与《什么是讽刺》两篇杂文，于前者中申明被人们称为讽刺作品的大抵是写实文学，于后者中进一步精确了“讽刺”的定义，即“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同时指出“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27]。以此为参照来看鲁迅同年12月创作的《起死》，或可作为其谈论讽刺的注脚，反映出当时鲁迅眼中文坛与社会的平常现象。

在创作《起死》之前，起码在鲁迅眼中，彼时的文坛在国民党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出现了保守与后退趋势。诸如“论语派”的林语堂等主张文学应远离政治，并将当时不同文学阵营的论争视作“文人相轻”。

“第三种人”们或是由于左翼文坛的“打击”而“写不出来了”^①；或是推荐青年到《庄子》和《文选》等古书里去寻找词汇，以提升古典文学修养^②；更有甚者在压迫加紧之后逐渐“右倾”并“坐上检查官的椅子”^③，因此鲁迅怀疑“第三种人”已逐渐臣服于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除此之外，左联内部也有成员陆续退出（如杨邨人、韩侍桁等），背叛革命，改换阵营。这些都引起鲁迅对于文坛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者的怀疑与不满、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深切忧虑，并促使其将观察到的文坛乱象与文人百态融于《起死》中

① 指“第三种人”苏汶声称处处感到左翼文坛的压力而写不出东西，鲁迅称此为“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并加以否定。参见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载《现代》，1932年第1卷第6期。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载《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② 指1933年10月施蛰存发表文章提倡青年读《庄子》与《文选》，此番言论立刻遭到鲁迅等的驳斥。

③ 1934年6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在出版业发达的上海先行试点，穆时英等受邀担任“审委会”的文艺“检查官”，在文坛产生了消极影响，鲁迅对此现象加以批评。

庄子这一形象。

尽管鲁迅对革命同路人持理解与宽容的态度，但他认为当时中国文坛相当一部分持“中间立场者”根本称不上“同路人”，而只是维持着“不偏不倚”的无所信者，在关键时刻极易被权力所拉拢和收编，避重就轻，投机讨巧：

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31]

这极容易使人联想到早期鲁迅所言的“伪士”。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写作《破恶声论》，认为“寂漠为政，天地闭矣。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黠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以此为出发点，鲁迅得出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的论断。^[32]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曾对“伪士”作出解释，认为其精神状态如同“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唯顺大势发声；同时“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得到“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33]以此审视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批评与讽刺，会发现于鲁迅而言，到底是“第几种人”并非决定性因素，关键是能否忠实于自己的艺术信仰并进行客观真诚的创作。换言之，鲁迅针对的并非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本身，而是以“忠实于自己的艺术”为幌子却沦为“资产阶级的帮闲者”的现代“伪士”相，而在那一边念着“无是非”一边依附权威并获得拥趸无数的庄子身上，我们无疑能够捕捉到现代伪士的虚假面孔。

与此同时，“在鲁迅看来，问题并不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能否存在中间阶层，或在资产阶级文艺与无产阶级文艺之间是否可以有第三种文艺，而是面对现实的社会矛盾，是竭尽所能去斗争呢，还是做一个局外人。”^[34]也许正因如此，他才会劝说老朋友林语堂少写些小品文，多翻译些英国文学名著，以使现在和将来的文坛受益。

参照上文，或许可以理解为何鲁迅笔下的堂吉诃德总是作为对照物出现。《起死》中庄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观念背后体现出的是“无所信”的虚伪、油滑与逃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堂吉诃德忠于理想、重视实干的赤诚形象，这构成了两者在鲁迅那里的根本区分。两相对比，不难看出鲁

迅对后者的肯定。而鲁迅所看重的堂吉诃德的品质，借由卢氏的戏仿之作《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在现代革命语境中得以再阐释。可以说，董吉诃德作为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的现代接续者，其性格侧面承载着鲁迅对于中国革命者的某种期许。尽管董吉诃德脱离现实、不辨是非，但他看到革命党人濒临危险便舍身相救，看到米拉贝拉受难时便挺身而出并与黑人搏斗，这是行动意志与实干精神的某种体现。在即将被革命党人驱逐出境时，他仍旧不为现实利害所影响，忠于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尽管这种理想看起来是不合时宜的），他的所信所为是发自内心，而不是为了迎合外界权威，这是远离伪诈之“心声”的体现。某种程度而言，堂吉诃德与鲁迅晚年推崇的墨家有相似之处。无论是在小说《非攻》《理水》中，还是在杂文写作里，鲁迅对墨家所象征的埋头苦干的行动意志与敢于牺牲的侠义精神都表示赞赏，并在与儒道的对比中突出其难能可贵；在他看来，堂吉诃德恰恰具备如墨子一般的赤诚心与行动力。面对革命遭遇挫折之时，鲁迅曾说，“现在〇〇（引者按：即指左联）的各种现象，在重压之下，一定会有的”“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37]，堂吉诃德恰恰具备这样的坚忍、认真与韧长，这正是革命文学者所需要的品质。也正是从这个层面而言，鲁迅感叹中国难有真正的堂吉诃德，多是冒充堂吉诃德的虚伪者与欺骗者，掩盖着自己的懦弱与卑怯。联系此前“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对于堂吉诃德的“辩护”，会发现彼时鲁迅针对的正是他所观察到的中国“革命文学”根底之浅薄、革命文学家群起高喊口号却鲜有作为的现象。在他看来，革命“不是作为暴风雨或雷电到来，而是作为需要‘卑俗麻烦的工作’的‘建设’，作为‘老老实实的东西’而到来的”^{[7]68}，并在“行动”层面对吉诃德人道主义式的抗争和战斗加以肯定。总之，从“革命文学”论争到与“第三种人”论争，鲁迅虽然不满于堂吉诃德的不革命、无是非，但始终赞赏吉诃德式的虔诚信仰和实干精神，而这恰恰构成其心目中“堂吉诃德”与“庄子”的根本区别。

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者的愚蠢越是显得真诚，他诚实正直的追求看起来越不像伪装。^[1]就此而言，或许我们可以将翻译《被解放的堂·吉诃德》视作鲁迅一次间接的反讽行动，这次“反讽选择单纯、头脑简单的人，不是为了嘲笑他们，而是为了嘲笑有智慧的人”^[1]。在这嘲笑中，我们可以窥见鲁迅一以贯之的立人与革命观念；而通过鲁迅对“堂吉诃德”和“庄子”的褒贬态度，我们能够进一步透视左翼时期鲁迅“转”而未

“变”的部分——其作为结构性主体对现实政治的选择,对外在权威的抵抗,对当下行动的执着,以及贯其一生的对“心声”“内曜”的寻觅。

参考文献:

- [1]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11.
- [2] [苏]卢那察尔斯基,著.瞿秋白,译.解放了的董吉诃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 [3]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M]//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88.
- [4]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M]//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00.
- [5]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M]//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16-121.
- [6]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M]//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34-143.
- [7] [日]丸山升,著.王俊文,译.“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M]//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8] 马良春,张大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12.
- [9] 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M]//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13-221.
- [10] 鲁迅.《奔流》编校后记(一)[J].奔流,1928,1(1):194.
- [11] 姚锡佩.周氏兄弟的堂吉诃德观:源流及变异——关于理想和入道的思考之一[M]//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22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325.
- [12] 周作人.塞文狄斯[M]//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卷一).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420.
- [13] [俄]I. Turgenjew,讲.郁达夫,译.Hamlet 和 Don-Quichotte[J].奔流,1928,1(1):1-40.
- [14]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2.
- [15] 鲁迅.文坛的掌故[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3.
- [16]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4.
- [17] [苏]卢那察尔斯基,著.柔石,译.浮士德与城——一篇为读者的剧本[M].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5.
- [18] [苏]卢那察尔斯基,著.郭家中,译注.西欧文学史指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31.
- [19] 鲁迅.《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M]//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31.
- [20] [苏]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M]//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四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189-280.
- [21] [苏]卢那察尔斯基.托尔斯泰与与马克思[M]//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四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330.
- [22] 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92.
- [23] 孙郁.鲁迅的暗功夫[J].文艺争鸣,2015,(5).
- [24] 孙郁.鲁迅对庄子的另类叙述[J].文艺研究,2016,(3).
- [25] 张亮.《起死》的潜文本:与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对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
- [26] 鲁迅.起死[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7] 鲁迅.什么是“讽刺”?[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40.
- [28] 鲁迅.致曹靖华[M]//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74.
- [29] 鲁迅.“文人相轻”[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8-309.
- [30] 鲁迅.三论“文人相轻”[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85-386.
- [31] 鲁迅.又论“第三种人”[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49.
- [32] 鲁迅.破恶声论[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
- [33] [日]伊藤虎丸,著.孙猛,徐江,李冬木,译.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3-14.
- [34] [日]丸山升,著.王俊文,译.鲁迅的“第三种人”观——围绕“第三种人”论争的再评价[M]//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7.
- [35] 鲁迅.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1.
- [36] 鲁迅.真假堂吉诃德[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34.
- [37] 鲁迅.致胡今虚[M]//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5-456.
- [38] [丹]克尔凯郭尔,著.汤晨曦,译.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01.

(下转第33页)

解放区减租土改小说的叙事形态

——以李束为作品为例

李 慧

(德州学院 学报编辑部,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 学界对解放区土改小说的考察, 很大程度上忽视减租减息运动与土改运动之间的承续关系, 忽视解放区由党的领导、作家创作、群众生活构成的三元结构文学形态的确立。而李束为作为晋绥五作家的重要成员, 其减租土改小说既体现了减租运动与土改运动之间的联系, 也为探讨上述三元结构文学形态的内在问题及其如何制约新的政治认同与乡村文化建构提供了典型案例。

关键词: 解放区小说; 减租; 土改; 李束为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21-06

考察解放区土改小说, 经常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作为案例, 实际上, 因为写作时间和历史语境的制约, 这两部作品都没有呈现出解放区减租减息运动与土改运动之间的承续关系。再者, 与启蒙主义文学是由作家创作和民众生活构成的二元结构形态不同, 解放区文学逐步确立起由党的领导、作家创作、群众生活构成的三元结构文学形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种三元结构文学形态权威的理论表达, 解放区的减租土改小说即属于这种三元结构文学形态。以往对解放区土改小说的考察, 并未自觉地把这种文学形态纳入考察范围。实际上, 这种文学形态存在着为了响应和诠释党的政策而概念化、公式化地表现群众生活的问题。这种文学形态能否避免概念化、公式化, 除了作家的写作技能之外, 关键取决于两个方面: 即能否准确地把握党的方针政策和是否内在于群众生活, 这两个方面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作家何种程度上内在于群众生活可以从作家的叙事视野在何种程度上内在于群众生活来观测, 这成为考察解放区减租土改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角度。

1946年5月4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 标志着减租减息运动向土地改革运动转变。1947年10月10日, 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作为土改运动遵循的纲领。为了响应党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政策, 晋绥

五作家创作了一批减租土改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有两种叙事模式: 一是在农民群众与地主的关系中展开叙事; 二是在干部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中展开叙事。下面以李束为的小说为例来讨论叙事形态问题。

一、叙述视野的内在性: 抗日战争环境下的减租叙事

1944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7周年, 晋绥边区举办“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晋绥五作家中, 西戎、孙谦参与创作的郿鄠剧《王德锁减租》获得戏剧类甲等奖金, 胡正、孙谦参与创作的道情剧《大家办合作》获得戏剧类丙等奖金, 马烽创作的“通俗故事”《张初元的故事》获得散文类乙等奖金。李束为没有参加这次征文, 但他早在1943年8月就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短篇小说《租佃之间》, 该小说后被选入《解放区短篇创作选》, 在这部作品之后, 他创作了《谈判》《老婆嘴退租》《红契》《土地和它的主人》《第一次收获》《十年前》等减租土改题材的小说。

《租佃之间》这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四个场景: 一、二小子误以为六十八从地掌柜(地主)那里夺他租种的土地, 气愤地跑到六十八家里不问青红皂白与六十八打架; 二、打完架, 二小子回到家中, 回想八年前地主黄三夺去他家仅有的一垧半土地的情景; 三、经老婆提醒, 二小子来到地掌柜金卯家探听情况, 就减租问题与金卯谈判, 中间插入二小子回想那年因收成不好少交一斗米而遭到金卯责骂逼迫、不得不补交

收稿日期: 2023-05-24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解放区‘土改小说’的政治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变迁”(2022DZZS063)。

作者简介: 李慧(1982-), 女, 山东诸城人, 编辑, 博士, 主要从事当代文艺理论及现当代文学研究。

的情景，还描写了六十八来到金卯家声明自己不会租种其土地；四、农会召开群众大会，二小子语无伦次地诉说自己减租的理由、金卯进行辩驳、经众人评议终于减租。

小说中这样描写群众大会上二小子对减租的诉说：

“我一颗租子没欠过他的，收好收坏到时节就送了去。这地我租种好几年了，租给我的时节是两垧，如今我掏坡掏的，两垧半也多了，要是夺回去……众人们评一评……年时交租子……”他的话渐渐地乱了头绪，……声音也微微地颤动，他继续说下去：“他怎的给我说：‘种吧，我只要不死，那地就归你种。’如今，他把我当娃娃耍，……年时冬天，日本人来咱这里，八路军在山上打仗，一天一夜我背了五趟伤兵，饿着肚子，要石头能吃……”由他那颤动的声音里，众人知道他的眼泪流下来了。“末了那趟，实在支不住了，头晕眼花，跌到山根底……不问糠窝窝稀糊糊，有吃上的……叫众人评一评，打仗的时节，金卯钻到洞里，我为了甚，那天黑夜，我跑去跟他家……借一碗米，他都不借给我。日本人来了，杀我，就不杀他啦……我的命没有他的值钱，我老婆娃娃，如今，众人们……”他呜呜地哭起来，两手捧着头，走下台来了，他伤心地，冤屈地哭着，像个无依无靠的孤儿被人投入水深火热中。^{[1]78-79}

这段描写生动地呈现出一个伤心的、难以清楚地诉说自身冤屈和减租理由的贫苦农民形象。二小子断断续续地讲出来的减租理由可以归纳为：一、自己一颗租子都没欠过，不管收成好坏都照数交租；二、因自己投入劳动“掏坡”，租种的土地已增加；三、金卯不守信用，耍人；四、为了支援抗战，自己吃苦受累，忍饥挨饿，而金卯只顾自己，非常刻薄；五、自己的老婆娃娃可怜。其实这些理由中前三条并不是减租的理由，而是说明金卯不应该夺地，其中作为减租理由的主要是第四条。这一条强调的是，抗战是为了大家活命，自己对抗战贡献大而金卯毫无贡献，他再不减租，就太不像话了。这里把地主和佃农在抗战问题上利益的一致性以及抗战中各自的表现作为最主要的减租理由，体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争环境对减租的影响，这一点与离战争较远、相对和平安定的延安不同。

对于二小子并未清晰道出的减租理由（上述第四条理由），在群众大会上，一个名叫四不郎的“小巧干瘪的老头子”又作了补充：

我说句话，看众人服不服。庄稼人一年到头熬在地里，风吹雨打，众人们都知道下不了籽，出不了苗儿，开不了花，结不了籽，收割了，打下了，再吃到嘴里……一下叫地掌柜弄去一大半。我不是胡诌，年时，打仗的时节，金卯也没出人力，也没出财力，……吃得饱，穿得暖，钻到洞里。日本人退了，他就出来，又多要租子，又夺地，这种样的人，在打仗的天年……^{[1]81}

这里补充了农民耕作的辛苦、地主的不劳而获和金卯作为地主在抗战中的表现。正因为金卯在“打仗的时节”的表现，才使得等“日本人退了”金卯“又多要租子，又夺地”，令人无法容忍。正是这样，金卯说：“四不郎说话真厉害，加个汉奸的名，枪崩我吧！”这表面上是表达金卯的不满，实际上是表达他感受到的压力。这里又一次强调了战争环境下的减租理由，体现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文艺的地方特性。

还需说明的是，与战争环境下的减租理由相比，以上所述涉及的地主阶级的剥削还没有成为明确话语。实际上，二小子的减租诉说断断续续、语无伦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没有说明阶级剥削的道理。小说中，金卯为了逃避减租，要把土地租给六十八，二小子却因此仇恨六十八、找六十八打架，这恰恰是缺乏阶级观念的体现。当二小子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和六十八一起离开金卯家走在路上时，小说中写道：“像有谁在他们的中间挖掘了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然而他们也都有这种想头，我们之间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有一天的功夫。”^{[1]76}从小说的叙事话语来说，两人心里的沟壑和仇恨是地主“日捣”他们造成的，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两人还缺乏阶级意识。不过，他们心中有了这样的想头和问题，也就意味着阶级觉悟的开始萌生。

在战争环境下，这篇小说塑造了金卯这个自私自利、狡猾刻薄的地主形象和二小子这个伤心的、难以清楚地诉说自身冤屈和减租理由的贫苦农民形象。小说中，地主黄三夺去二小子家土地的情景描写游离于情节线索之外，作者没有把黄三的行为加在金卯的身上。这说明在统战政策的影响下，作者还未把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表现得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这篇小说不仅描写了佃户二小子和地主金卯的减租斗争，还通过二小子与六十八打架表现了农民群众内部的矛盾。二小子与金卯的减租斗争是以谈判、辩理的方式进行的。在金卯家谈判时，金卯依据旧社会雇佣关系和租佃关系基础上的法理和情理，以二小子的恩人自居，并且还让二小子和他一起吃饭，借这种

乡间的礼俗与客套来拉拢二小子。在群众大会上，二小子伤心地、语无伦次地诉说减租理由，还诉说了这样一个事例：他“饿着肚子”，“一天一夜背了五趟伤兵”，“背到第五趟，就支不住了，他和伤兵一起滚到山根底，那个年轻的伤兵跌死了”。^[1178-79]这个事例除了说明问题之外，还会使读者感受到更多的意味：例如抗战的勤务组织工作问题乃至干群关系问题。由上述可见，这篇小说中作者把减租斗争置入当时乡村社会不同的人情事理（阶级的、礼俗的，尤其是抗战的）和人际关系（租佃之间、群众之间、干群之间）中来表现，这体现了作者的叙述视野内在于农民群众的生活。

李束为1943年创作的另一部小说《谈判》，描写了王廷邦及其他三个佃户和地主马寡妇之间关于减租的一场谈判。因为经过租佃双方的谈判就解决了减租问题而无须召开群众大会，所以小说中没有农会和村政权的干部出场。之所以谈判就解决了问题，一是因为马寡妇聪明反被聪明误，二是因为佃户之间的互助。

马寡妇是一个狡猾世故、能言善辩的地主，她以卖地为名逃避减租，她给出的卖地理由是家境衰落、生活困难和身世可怜。王廷邦诉说的减租理由一是政府减租法令，二是生活极端困难。其他佃户为王廷邦说情，“大个子农民”对马寡妇说：“甚事也要讲个人情。老婆歿了，给他舍下不大点的一个孩子，现在还不能受苦；你帮他点忙，再叫他租上三五年，过后，娃娃长大了，那会儿，哪怕你再抽地……”^[12]对此，马寡妇托词说王廷邦给五块钱现租让她“打过饥荒”，她就同意把地继续租给王廷邦耕种，也即同意减租。“马寡妇认为，别说五块钱，就是一块，或一角，在这样苦寒的春天，王廷邦都是掏不出来的；那么转租给别人，就不能说她不讲人情了。”^[12]没成想，她这是对情况的一种误判，结果弄巧成拙。王廷邦提出给三块现租，她深感诧异，于是进一步提出把地卖给王廷邦（她认为王廷邦肯定买不起）。最后，在其他佃户的说合下，王廷邦用10块钱买了她一亩地，另外四亩，她也只能同意王廷邦继续耕种。小说中写道：“她的聪明被农民的朴实战败了。”^[12]再者，王廷邦能够买得起马寡妇的一亩地，离不开其他佃户的帮助，佃户丁老头就答应帮他“三五块”钱。

这场租佃双方的谈判虽然以边区政府减租法令为前提，但主要是在乡村旧有的情理中展开的。无论是马寡妇通过哭穷以逃避减租，还是王廷邦诉说的贫穷，都诉诸的是传统的人情，而佃户之间的互助也是以传统人情为纽带。这篇小说以这种谈判的方式解决减租问题，一方面基于当时的统战政策及减租政策的

施行情况，另一方面也与马寡妇在性别和身世上的相对弱势有关。而且，小说中还提到马寡妇对抗战也有贡献，她购买了“五十元的公债券”。这篇小说以减租法令为依据，把减租斗争置入当时乡村社会不同的人情事理（减租政策的、旧有的、抗战的）中来表现，同样体现了作者叙述视野的内在于性。

二、叙述视野的游移：历史语境转变下的减租退租斗争叙事

《老婆嘴退租》发表于1946年，这篇小说也是在农民群众与地主的关系中展开叙事，基于抗战胜利之后语境的改变和减租减息运动的进展，与上述作品相比，这篇小说中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要尖锐得多，与之相应，地主的形象更加奸顽狡诈。其中的地主叫王丙红，因为嘴上没胡子，外号“老婆嘴”。

小说开篇交代“老婆嘴”曾逃脱两次减租大会，在这次减租大会上，他尝到了“庄户人恼了”的滋味。在减租退租已无法推脱抵赖的情况下，“老婆嘴”信誓旦旦地保证第二天“开窖”退租，众人怕他又要花招，他就主动要求留在村公所“坐一夜禁闭”。结果，他利用儿子来给他送饭的时机，让儿子在夜里和长工一起把窖中的粮食偷偷运到外村，以此来逃脱退租。他的儿子依计而行，但骗局很快就被佃户光裕子和长工拆穿，他的儿子也只好老实交待。最后，“老婆嘴”“扑通跪下，扑倒众人面前”保证退租减租，“再不要奸顽手段”。^[13]

这篇小说主要描写减租退租斗争达到高潮时地主负隅顽抗的戏剧性事件，其中的农民群众在减租斗争方面已经具有了同一性，作者用同质化的“众人”来代称，“老婆嘴”“剥削众人”成为众人明确的、一致的话语。正因农民群众同质化，群众内部关系难以获得表现。与这样的农民群像相对应，地主“老婆嘴”的形象变得脸谱化，小说中他的本名很少出现而用外号代称。作者描写他在减租大会上说话的样子时，这样写道：“他那老婆嘴就像母猪掀树根似地努了几下。”^[13]提到他给二小子双印娶第三个媳妇的时候，注明：“第一个逼得上了吊，第二个逼得跳了河。”^[13]为了凸显他的吝啬和反动，作者描写他给儿子娶媳妇都舍不得花钱买麻纸，偷来一张减租报告糊窗户。因为众人与地主阵线分明，众人坚决地进行减租斗争，小说中村长等干部就不用再发挥多大作用，因此也难以获得深刻的表现。这篇小说对农民群众、地主和干部的表现，显示出叙述视野的外在化。

与以上作品相比较可以见出，作者的叙述视野对于群众生活的内在于性是不均衡的，或者说作者在群众生活中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内外移动的。这种

不均衡或者移动既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之间,有时也出现在一部作品的内部。

《红契》也是发表于 1946 年,与《老婆嘴减租》相比,这篇小说表现了减租斗争的前史,在描写曲营村地主“笑面虎”(本名胡丙仁)如何逃避减租的同时,还讲述“笑面虎”以前如何霸占苗海其的土地,讲述苗海其消除顾虑、加入减租斗争的过程以及农会干部不同的工作作风。这篇小说中,区上青年部长小陈和农民部长老马不同的工作作风类似于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中的章工作员和老杨同志。

在减租运动中,领头的马驹子、福生子向“笑面虎”大声嚷道:“你剥削我们几十年,我们减租来了!”迫于减租斗争形势的压力,“笑面虎”假意配合。从表面上看,“这个工作做的真痛快,一天功夫就做完了。租子按二五减了,该赎的地赎了,霸占的土地也归了原主。”可是,“有许多人,不大敢接过新写的租约,苗海其就是一个”。^[4]之后,村里起了“八路军要走”“旧军要上来”“笑面虎要夺地”的谣言,苗海其经不住“笑面虎”的威吓,把“十垧地的红契”又交还给“笑面虎”,照旧交租。而且第二年秋天查租,“苗海其的事谁也没有发现”,直到第三年,深入群众、求真务实的老马到来,苗海其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在查租大会上,苗海其看到“笑面虎”被群众斗倒,在家中,又经过老婆的责问、老马来访讲解“众人齐心”的道理,苗海其终于在“笑面虎”夜里偷偷来收租子时与之斗争。最终,经过众人的集体斗争,苗海其和情况相同的三家佃户一起实现了减租退地。

关于干部工作作风问题,小说中首先描写了区青年部长小陈未能深入群众、缺乏调查研究而被减租假象蒙蔽。当“笑面虎”假意应承群众的减租要求时,小说中写道:

没来的时候,区干部小陈只怕斗不过地主,所以再三告给众人怎样喊口号,怎样说话,如今,又没喊口号,又没多说话,事情就办成了。他对众人说:“胡先生是开明的,我们大家欢迎。”小陈还鼓了几下掌,众人也不知道鼓掌是怎回事,开会以前,也没规定,所以众人都不鼓掌。^[4]

小陈脱离群众,对减租的实情并不了解,在以后查租时对苗海其这种明减暗不减的情况也没有发现。而老马则像《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同志一样,来到村中就和群众打成一片,深入了解减租情况,发动群众。小说中写道:“老马来了也不说召集人,也不说开会,黑夜找人谈话,白天就帮人抬粪。”^[4]通过这种鲜明对照,小说揭示出干部工作作风对于减租查租

运动的影响。

《红契》中地主“笑面虎”逃避减租退地的手段和西戎、孙谦参与创作的郟鄂剧《王德锁减租》中的地主赵卜喜类似,也是通过制造“八路军要走”“旧军要来”的谣言来恐吓威胁佃户。但不同的是,这篇小说并不强调减租要保障地主的利益,也没有像后者那样设置开明地主形象。这体现出创作语境的改变。小说中多次描写查租斗争中面对愤怒喊打的群众“笑面虎”惊恐失措、跪地求饶,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晋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存在群众的过火行为。^[5]

再者,《红契》比较详细地表现了地主的“良心”话语的欺骗性。为了拉拢苗海其,“笑面虎”请他一起吃喝。席间对话中“笑面虎”霸占苗海其土地以及他对苗海其的剥削通过“笑面虎”的话语讲述出来。在他的讲述中,苗海其的老子死后,苗海其还是十来岁的娃娃,没亲没故,老子留下的十垧地,也没法经营,是他看苗海其可怜,才把苗海其引到他家当长工,地也带过去。苗海其在他家“吃了穿,穿了吃,一直十年”。后来,苗海其要另过生活,他就把那十垧地租给苗海其。依据这种话语逻辑,他对苗海其说:“不要说你十垧地,你再有二十垧三十垧,把地卖了,也不够你十年的吃穿花费。海其子,没你胡大叔,你早就喂了狼啦。”对于笑面虎这套说法,苗海其说:“你老人家是恩人嘛,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4]这套把盘剥说成是恩惠的话语是基于旧有的租佃关系及地主与佃农之间的权力关系,依据这套话语,佃户要求减租就是“不凭良心”,所以减租退地斗争中才有“笑面虎”和苗海其关于“良心”的争辩。也就是说,减租退地斗争不仅要改造生产关系,还要打破这套话语的统治。

这篇小说中,地主“笑面虎”也是用外号来代称,以凸显其阳奉阴违、奸顽狡诈的性格特点。他以苗海其的恩人自居,利用虚假的客套、“良心”话语、政治谣言等手段阻止苗海其减租,这显示出这个地主形象内在于乡村旧有的权力关系。小说中,不敢减租的苗海其只是少数,绝大多数农民已经觉醒,已经获得了同一性,但苗海其的减租态度揭示了农民旧有的思想意识与减租政策之间的关系。小说中对干部问题的揭示和表现是作者叙述视野内在于群众生活的重要体现。

与《红契》相比,发表时间略早一些的《土地和它的主人》并未表现地主的“良心”话语及其背后旧情旧理的统治,而是以叙述者的话语直接讲述王海生的五垧地如何被地主半盆周霸占。小说中写道,十几年前,王海生的老子死后给他留下五垧地,半盆周逼迫他用五垧地顶两石欠租。王海生找人求情,结果被传进衙门,关进冷屋子,过堂时挨了二十板子,讨保

出来,还是把地给了半盆周。这样,原本是自己的土地,却要每年交两石租子。这样的盘剥令王海生对自己耕种的庄稼又爱又恨,他还要遭受老婆的怨骂。在这种情况下,减租运动开始后,王海生成为积极分子,不仅自己加入农会,还向大家进行宣传动员。面对老婆的担忧和顾虑,他说:“我们等什么?等天塌吗?说减就减。受了几辈子啦!还等什么?”^[6]在减租大会上,他带头和半盆周说理斗争。小说中,有两处细节彰显出减租前后半盆周和王海生两人之间地位的变化:减租前,半盆周讥笑王海生衣不蔽体;减租后,半盆周在王海生租种的地里偷剝水萝卜被王海生捉住,遭到王海生的奚落。小说最后一节描写王海生请客买地,在农会小组长老王元和邻居马久德的说合下,他用两石粮食向半盆周买回那原本属于自己的五垧地。

这篇小说中,半盆周盘剥王海生以及减租大会上王海生与半盆周的说理斗争,遵循已成常规的、一般化的叙述模式,缺乏细节描写,叙述视野显得外在化。与之相比,小说中减租前王海生对地里庄稼的复杂态度和老婆对王海生的怨骂,减租后王海生对半盆周偷剝水萝卜的奚落及其请客买地的情景,都描写得细致生动,这体现出叙述视野的内在性。由此可见,有时在一部作品内部,叙述视野的内在性也不均衡,或者说作者在群众生活中的位置也会发生内外移动。

三、“下乡干部”视角下的土改叙事

李束为以上几篇小说的减租退租叙事主要是在农民群众与地主的关系中展开,这种叙事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干部在减租斗争中的作用。因为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作者在群众生活中的位置并不容易观察。与之相比,李束为的小说《第一次收获》和《十年前后》则是在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中展开土改叙事,通过下乡干部的视角表现贫苦农民在土改前后生活的剧变。这两篇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与作者之间没有明显的距离,这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在群众生活中的位置。

《第一次收获》讲述“我”曾在何家庄工作过一段时期,离开何家庄几个月后路过那里,顺便看望一下土改中几位翻身的朋友,在路上遇到何来生老汉,“我”来到他的家中,见闻了他翻身后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通过“我”这次在他家吃饭与土改前在他家“吃派饭”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表现出来的。

他家有个小女孩叫小娥,这次吃饭时,“我”看到小娥打扮得又好、生得又俊,“我”拿起桌上一个白面馍馍给她吃,来生老汉没有阻拦,“我”叫小娥“和我们在一个炕桌上吃饭,老汉也不说甚,好像还很同意。小娥爱吃豆角,老汉就把自己碗里的豆角都夹给

小娥吃”^[7]。这让“我”想起土改前那次在他家吃饭的情形。“那时候,小娥偎在妈妈怀里,只有一件又白又不黑的小布衫,虽然已经是个七岁的女子,却没有裤穿。”吃饭时,来生老汉用仅有的一个米面馍馍招待“我”,他们一家只吃稀饭,“他家穷的没酸菜,也没盐”。来生老汉“觉得这顿饭很对不起我,并且怕我因饭不好生出事来”,“他老是让我吃那个馍馍”。“我”把那个馍馍递给面黄肌瘦的小娥,小娥接过去就吃。“老汉看见了,马上把那个馍馍从小娥手里抢过来,重新放在我面前,还打了小娥一巴掌。”他因为不小心,把一碗滚烫的稀饭弄洒了,“正洒在小娥的脚上”,“脚上烧起了一个大燎泡”。^[7]以上两次吃饭情形的鲜明对照,彰显出来生老汉对待女儿小娥态度的变化和家境的明显改善,这是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的第一次收获带来的。

小说结尾,来生老汉托付“我”给他捎一张毛主席像。“小娥老是看我胸脯上戴的毛主席牌牌,我取下来,戴在她的胸前,她把我的挎包也挂起,高兴极了”。来生老汉称赞小娥“像个女同志”。小娥妈妈说,到了冬天送小娥去念字,“长大了好工作”,“咱几辈子捣地圪塔的庄户人家,将来还要出个女工作员哩”。^[7]这些细节把贫苦农民生活的改善、对未来生活的希冀与政治认同紧密连接在一起。小娥这个小女孩的美感形象某种程度上冲淡了这种连接的话语痕迹。小说这样描写一直送“我”到大路上的小娥与“我”分别时的情景:

“老束同志!”小娥摆摆小手说道,“过路再到我们家,我们包饺子等着你。”

小辫子一甩,好像货郎鼓似的,跑回家去了。^[7]

来生老汉一家老小都称“我”为“老束”,村中农民群众对“我”也该都是这样称呼,由此可见叙述者“我”是作者的化身。这样,小说中叙述者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即作者与农民群众的关系。这种关系彰显出作者在群众生活中的位置,也即作者能够密切联系群众,但其身份还是从外面来的执行党的政策的下乡干部。

比《第一次收获》发表时间稍晚些的小说《十年前后》中,叙述者“我”同样具有这样的身份。小说讲述了“我”在山头村工作的时候所见闻的贫农赵满满一家在土改之前和之后的情形。通过“我”的视角,小说先是描写了赵满满因“我”住到他的窑里而收拾窑洞、给“我”烧水,表现了赵满满对生活怨愤绝望的情绪。小说中写道:“赵满满在窑里骂灶火不快,骂锅子太小,骂火柱太短,骂老鼠掏了他的炕洞,窑里

的东西几乎叫他骂遍了。”^[8]接下来,叙述者“我”回顾所了解到的赵满满的身世:十年前他因为地主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卖掉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最后,叙述者以见证人的视角,描写了分配土地时在外乞讨流浪了十年的赵满满的老婆孩子归来的情景。小说结尾写道:“赵满满一家三口,从十几年,几十年的苦难生活中,一步踏进了土地改革后的新社会里,乐得他们也眉开眼笑了。”^[9]

这篇小说开头是在“我”和赵满满的关系中,“我”作为亲身感受者,来描写赵满满怨愤绝望的情绪以及这种情绪的独特表现,体现出作者深入细致的观察;接下来,“我”作为听闻者,用第三人称讲述“从别人的口里”所了解到的赵满满妻离子散的悲苦身世,这种讲述因缺乏在场感而显得外在化;最后,“我”作为见证人和旁观者,见证赵满满的老婆孩子归来、一家团聚的情景,这一部分通过细节描写来营造现场感,但并未超出传统小说戏曲中亲人离散重逢的叙事常规。由此可见,这篇小说中作者的身份及其与群众的关系是明确的,但是作者叙述视野内在于群众生活的程度并不均衡。在同一部作品中,作者在群众生活中的位置发生内外游移。

上述李束为小说的减租土改叙事形态,在解放区减租土改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作为考察解放区其他作家相关创作的一种参照。解放区减租土改小说对于建构新的政治认同和新的乡村文化具有重要作用,而这种小说的叙述视野在何种程度上内在于群众生活制约着这种作用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李束为. 租佃之间 [M]// 束为文集(第1卷). 太原:山西文艺出版社,2004.
- [2] 李束为. 谈判 [N]. 抗战日报,1943-9-1.
- [3] 李束为. 老婆嘴退租 [J]. 人民时代(晋西北),1946,2(1).
- [4] 李束为. 红契 [J]. 人民时代(晋西北),1946,2(3).
- [5] 王志峰. 山西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左”倾偏向何以发生 [M]// 黄宗智,主编. 中国乡村研究(第十五辑).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 [6] 李束为. 土地和它的主人 [J]. 人民时代(晋西北),1946,2(2).
- [7] 李束为. 第一次收获 [N], 晋绥日报,1948-7-22.
- [8] 李束为. 十年前后 [N], 晋绥日报,1948-9-27.
- [9] 李束为. 十年前后 [N], 晋绥日报,1948-9-28.

Narrative Form on Land Reform Novels in Liberated Areas

—Taking Li Shuwei as an Example

LI HU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Academic research on land reform novels in liberated areas has largely neglected the continuity between the rent reduction campaign and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ipartite literary structure in the liberated areas: constituted by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creative output of writers, and the realities of community life: has also been insufficiently acknowledged. Li Shuwei, a key figure amongst the group of five authors from Jin-Sui,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through his novels on rent reduction and land reform. His works not only highlight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movements but also serve as paradigmatic examples in exploring the inherent issues within the aforementioned tripartite literary structure. Furthermore, they illuminate how this structure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of new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Key words: Liberated area novels; Rent reduction; Land reform; Li Shuwei

埃默切塔《为母的快乐》中的非洲女性困境

高文惠

(德州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埃默切塔《为母的快乐》中的艾格被塑造为各个社会生活空间的受害者。传统农村父权社会的女性期待使她在父女、夫妻、母子等关系中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性别创伤。而殖民时期的现代城市社会则在性别压迫之外, 在她身上又增加了种族压迫, 使她成为双重他者。艾格终生致力于在前殖民时期传统农业文化与殖民时期现代城市文化之间寻求平衡, 但她的努力均因意识的错位和价值选择的复杂性而以失败告终。她的人生困境可以视为在非洲文化转型时期由传统农村社会走入现代城市社会的非洲女性困境的缩影。

关键词: 埃默切塔; 《为母的快乐》; 社会性别; 双重他者; 非洲女性困境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27-07

女作家布奇·埃默切塔(Buchi Emecheta, 1944-2017)一向被视为非洲女性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她在非洲女性文学史上的地位, 正如学者沙利尼·纳达斯瓦兰(Shalini Nadaswaran)所说:“非洲和尼日利亚女性文学的源头是弗洛拉·恩瓦帕(Flora Nwapa), 第二代尼日利亚伊博族女作家布奇·埃默切塔的创作在非洲文学中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146}作为第二代非洲女性作家的一面旗帜, 埃默切塔的创作始终关注非洲女性的生存状况, 聚焦于揭示非洲父权制社会女性所受到的压抑和探索非洲女性的自我实现之路。可以说, 埃默切塔在《彩礼》(*The Bride Price*)《二等公民》(*Second Class Citizen*)《奴隶女孩》(*The Slave Girl*)《为母的快乐》(*The Joys of Motherhood*)《基宁德》(*Kehinde*)等作品中反映了从前殖民到后殖民时期非洲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面临的绝大部分问题, 在20世纪中叶依旧被男性作家所控制的非洲文学世界里, 埃默切塔“把真正的女性视角带入了当代非洲文学之中”^{[2]133}, 对父权制社会中很多传统的女性观念发起挑战, 因此有人称埃默切塔为“偶像破坏者”。^{[2]134}

发表于1979年的《为母的快乐》一向被视作埃默切塔女性题材的代表之作。小说的中心情节, 用埃默切塔的话来说, 就是“塑造了一个养育了8个孩子却孤独地倒在路边的女性”。^{[3]43}通过主人公努·艾格(Nnu Ego)在非洲社会转型时期不无悲剧意味的人生

的描绘, 埃默切塔集中反映了非洲女性难以自我实现的生存困境。艾格的人生故事在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城市社会两个空间展开, 所以对她的命运的审视, 也需要从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两个角度切入。

一、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社会性别创伤

随着女权主义的发展, “没有所谓的自然, 一切都是文化”^{[4]223}的意识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大众智慧深悉社会性别不同于性别: 性别是一种自然状态, 而社会性别则是用特定的、先于个人而存在的社会关系来重新表示每一个人。”^{[4]205}“社会性别是对一种关系、一种隶属于某个阶级、团体、类别的关系的再现。社会性别是对关系的再现。”^{[4]204}也就是说, 女性的社会性别是人为形成的, 是对某种关系反复再现的结果。一个女性缘何能成为受压迫的存在也需要放到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

20世纪初叶, 传统伊博农业社会依旧处于父权制时代。在伊博人的文化意识之中, 父亲是家庭的绝对家长, 埃默切塔在《彩礼》中借人物之口评价道:“父亲是我们的庇护人”“如果你失去了父亲, 就意味着失去了双亲。母亲仅仅是一个女性, 她不能为你做任何事情。”^{[5]12}艾格的故乡伊布扎(Ibuza)是传统伊博农业父权制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埃默切塔笔下, 伊布扎社区父女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等多重关系的观念、习俗都在反复强化着这一有关女性性别规范的模式: 女性是附属性的存在, 不具有自我的完整

收稿日期: 2023-05-02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南部非洲地区女性英语文学研究”(22CWWJ01)。

作者简介: 高文惠(1971-), 女, 山东德州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非洲英语文学研究。

性，女性的价值要由男性的标准来衡量。艾格的一生都在努力遵循父权社会对女性社会性别的规定，完成给定的社会角色，成为人们所期待的“完整女人”（full woman），但在实现各个阶段的社会性别规定特征的过程中，却逐步地失掉了女性的独立自我。

在传统伊博农业社会，只有男性被视作宗族血脉和财产的继承者，家中有限的资金大多会集中于男孩的教育。女孩则像一个寄居者，她们对于家庭的主要价值在于“嫁人之前，为娘家人服务”^{[6]207}①，出嫁时为父亲挣得一笔彩礼。艾格的第二个丈夫恩奈夫（Nnaife）从男方的立场反向证明了女儿对于家庭的这个价值：“能够给好女孩丰厚彩礼的男人才会是好丈夫，这是一种证明自己男子气概的方式。如果给不起彩礼，那他就配不上一个妻子。”^{[6]215}在这样的文化中，女孩明显是可以被量化估算的财产，一个没有主体性的被物化的存在。艾格名字的含义“二十袋贝壳币”^{[6]112}就是女孩物化的一个突出表征。父亲作为家庭的家长，有权安排女儿的一切，有权为“所有的女儿选择丈夫，因为她们太年轻不知道自己的想法。”^{[6]210}艾格的父亲阿巴迪（Agbadi）真心疼爱自己的女儿，也愿意实现艾格母亲的临终嘱托：让女儿“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想要的丈夫”^{[6]28}，但是在具体行为中，阿巴迪实质上并没有给女儿自由选择的权力，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了女儿的两次婚姻。更关键的是，他关于“生养众多的完整女人”^{[6]153}的观念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艾格的人生和自我评价。他对于女儿的期待在家庭的日常闲聊中得以尽显：“我的女儿们啊，你们以后都会儿孙绕膝。”^{[6]29}这种期待对艾格变成了一种重负，她的婚姻生活再不幸福也不敢向父亲诉说，她能想象她被父亲“屈辱地赶回她的责任中去”^{[6]137}的场景。

对于女性来说，生活的第二个阶段是成为人妻。对于女性社会性别的形成来说，两性关系是一种核心性的社会关系。而两性关系形态的基础，则是婚姻模式。传统伊博农业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酋长阿巴迪有好多个妻子，艾格的母亲奥纳（Ona）只不过是我最钟情的情人。尽管阿巴迪希望女儿能有一个独属的丈夫，但事与愿违，艾格还是落入了同父亲的妻子们一样的处境：艾格的第一个丈夫在新婚不久就娶了第二个妻子，在城市打工的第二个丈夫恩奈夫则先是按照家乡的风俗继承了去世的哥哥的妻子们，在战场回来后又在家乡娶了一位和自己的女儿们同龄的少女。阿巴迪对自己的妻子们疏于照顾，“只是保证她们不

被饿死；他把情人带到自己的院子里做爱，而任由他的妻子们为了和他说一句话而绞尽脑汁。”^{[6]36}艾格也被迫陷于多女共侍一夫的尴尬处境和情感困境。在这样的婚姻模式下，夫妻关系注定是不平等的，妻子的价值要由丈夫来决定。对于丈夫来说，妻子的主要价值在于为家庭传宗接代。按照这个标准，女性等同于母性，没有母亲身份也就意味着没有女性气质。在这种观念下，两性关系丧失了其浪漫的情感指向，沦为传宗接代的手段。艾格与第一个丈夫婚后的生活一度也是快乐的，互相吸引的，但因艾格久久不孕，丈夫迅速娶了第二个妻子，拒绝再与艾格发生性关系。被弃后的艾格渴望获得母性，然而，她诱使丈夫的第二个妻子的孩子吮吸自己乳房的行为让偶然撞见的丈夫勃然大怒。丈夫发怒的原因在于：他“不把她的这个行为视作母性的形式，而是令人厌恶的母性”^{[7]97}。艾格在第一段婚姻中的被弃表明一个不能生育的女性不再具有女性气质和性的吸引力了。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即使是心疼女儿的父亲阿巴迪也暗自认为艾格第一段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于她“太瘦、太干瘪”^{[6]33}而失去了女性魅力。这种普遍的观念也左右着受害者。艾格在第一个孩子夭折后曾经试图自杀，就是因为她感到自己再次陷入丧失母亲身份和女性气质的危机之中，因“不符合生命中的男性对自己的期待标准”^{[6]187}而对生存意义的否定表明艾格的自我价值完全被异性的价值所操控。在这种明显失衡的夫妻关系中，妻子们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嫁人的先后顺序，更取决于是否为丈夫生育了儿子。“伊博人会尊重勤奋工作的富有女性，但如果她没有儿子，那么她就什么也不是”^{[6]166}，只是家里的一个房客而已。恩奈夫另一个没有生育儿子的妻子阿达库（Adaku）在与艾格发生冲突后，恩奈夫朋友们的明显偏向促使她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处境，愤然离开了恩奈夫拥挤不堪的家，宁愿去当妓女也不愿继续当家中的房客。总之，通过对以艾格为代表的传统伊博社会中妻子们的生活事件和生活经验的描绘，埃默切塔全方位地呈现了“操控伊博女性一生的性的行为准则：女性的荣耀在于男性，没有儿子的女性是失败者，婚姻的目的是生下男性继承人来延续丈夫的血统，健康儿子的母亲才是完整女性。”^{[8]5}

在埃默切塔笔下，艾格人生第三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成为母亲。从父亲和丈夫的男性标准来看，艾格算得上是一个完美母亲。她相信孩子使女性成为女性

① Buchi Emecheta. *The Joys of Motherhood*[M].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9.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该版本。以下随文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的男性标准，也认同恩奈夫所说的“你必须照顾你的孩子们，那至少是个女性的工作”^[6186]的女性责任。作为母亲，艾格超越一般人，一生养育了8个儿女，她为儿女们操劳一生，付出所有，靠自己的坚韧多次从食不果腹和无处安身的困境中挣扎出来。她的儿子们长大后都很优秀，纷纷赴美国和加拿大留学，艾格成为令人艳羡的母亲，相当出色地满足了父亲和丈夫的期待。然而儿子们不再需要她的照顾之后，她发现自己“除了母亲之外，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是什么。我不知道如何和没有孩子的女性聊天。把孩子从我身边带走就像拿走我熟悉和习惯的生活一样。”^[61222]她对子女的爱所困住，“她对孩子们的爱和责任就像锁链一样捆绑着她，让她成为爱的奴隶。”^[6186]对艾格的感叹，研究者耶尔德（Gjerde）评价道：“艾格感到自己不仅是被爱，而且也被抚育孩子的实际劳作所囚禁。她的爱不是从自己内心生发出来，而是遵循传统和为女性制定的标准的结果。”^[91125]母亲身份实则变成困住她的自我监狱。艾格为母亲的责任牺牲了自我，换来的却是儿子们的抱怨和指责：长子奥沙（Oshia）因为拿不到学校的奖学金而谴责母亲没有给他一个安静富足的童年，儿子们还坚持认为是父亲在为他们支付学费而无视母亲的实际奉献。身处发达世界谋求个人幸福的儿子们不与母亲通音信的遗弃行为给了艾格致命的打击。艾格在人生终结之前，其实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作为母亲的困境：“我拼尽一生去照顾他们。我必须得给出我的所有。如果我有幸能寿终正寝，我甚至还必须要把我的灵魂交给他们。他们会向我的死灵祈祷以实现他们的愿望。如果风调雨顺，人丁兴旺，那我的灵魂就会被称颂，但如果不是这样，比如年轻的妻子不能生育，一家子吃不上饭，那么人们就会谴责我的死灵。我什么时候能够自由啊？”^[61186-187]但其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艾格就已经清楚地知道了答案：“永远不会，一直到死我都是自己血肉的囚徒……我们女性比男性更认同那个由男性建立的女性标准，在我们改变这个标准之前，世界依旧是女性一直在帮助搭建的男性世界。”^[61187]埃默切塔借艾格的感受想传达的信息是：在父权制传统农业社会，母亲身份是一座囚禁女性自我的监狱，无路可逃，来自包括女性自己在内的方方面面的观念编织起了一张罗网，女性至死被缠裹其中。

总之，《为母的快乐》详细地描写了主人公艾格人生三个阶段的被动性、依附性处境：“阿巴迪至死都在控制着他的女儿，她属于父亲和丈夫这两个男人，最后属于她的儿子们。”^[61185]埃默切塔借她的经历表明，在传统农业父权制社会，“女性总是被一些什么

东西所填满，早期是贞洁，后来是孩子。”^[101167]艾格在父女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这三重关系中努力按照男性标准完成父权社会的女性期待，但独独没有了自我，至死也没有实现那个“自足的女性，不是任何人附属的完整女性”^[61186]的自我要求。埃默切塔用这个所谓的“完整”女性的一生证明了在父权社会女性的“社会性别是一种创伤。”^[41227]在这个意义上，书名《为母的快乐》与作品的实质内容相悖，构成一种深刻的反讽。

二、现代城市空间中的双重他者

在《为母的快乐》中，非洲传统农业父权制社会按照男性标准界定女性，实则是对女性的一种性别压迫。然而在殖民时期的现代城市社会，女性依然没有得到自由。艾格的第一段婚姻失败后，父亲阿巴迪为她安排了第二次婚姻。她的第二个丈夫是在大城市拉各斯的打工者，于是，艾格离开了伊布扎的传统农业社会空间，进入了拉各斯的城市空间。《为母的快乐》大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殖民势力已经进入尼日利亚时期，此时城市空间的生存系统已经偏离了传统文化空间。城市空间里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已经让艾格困惑不已，欧洲对非洲的他者化和女性化又进一步加深了文化转型时期非洲女性的生存困境。

在传统伊博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一个男人可以从祖先那里继承广袤的土地与宽大的房屋，他的每个妻子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居室，但像恩奈夫这样来到城市打工的非洲本土居民，城市的居住空间非常逼仄。恩奈夫的工资仅能租得起只有一个房间的居所。艾格、恩奈夫、恩奈夫从去世的哥哥那里继承来的妻子阿达库、阿达库的孩子们等一大家子都拥挤在一个房间里。逼仄的空间已是令人窒息，二女共侍一夫的不堪处境也令艾格深感羞辱，生活在城市却遵循传统习俗的恩奈夫的愚蠢行为增加了艾格的痛苦。城市居民失去了对土地的依傍，以土地为纽带形成的家庭关系也变得不那么稳固。在传统伊博社会，儿子，尤其是长大成人的长子，就会接替父亲担负起养家的责任。城市生态改变了这种世代相袭的父子关系。生活于城市的孩子，哪怕是穷人的孩子也比乡村的孩子得到的教育机会更好，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延长，个体意识增强，对自我发展的关注远超家庭责任。恩奈夫期待长子奥沙尽早自觉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但奥沙则以个体发展为根本，他坚持去美国留学引发的父子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传统家族责任意识与个人发展意识之间的冲突。两个远赴美洲追求个人发展的儿子不仅没有对家庭有任何经济上的援助，而且也在情感上疏远父母，他们对父母的实质遗弃，也意味着传统社会家

庭关系的解体。

在传统伊博农业社会里，女性的地位虽然是附属性的，但女性的活动并不局限于家里，在完成女儿、妻子、母亲的社会角色使命之外，她们也是可以干农活、经商的。女性“在乡村市场的管理和运行方面发挥一部分作用。丈夫是家庭支出的首要提供者，但不是唯一提供者，人们允许女性有自己的工作挣钱养家。伊博社会也允许女性们一起工作，相互建立联系。”^{[9]119}学者范·艾伦（Van Allen）提出，在传统伊博乡村社会，其实存在着男性管理机构和女性管理机构并存的“两性政治制度”（dualsex political system）。女性有维护自己权益的组织：“妻子联盟和女儿联盟。”^{[10]162}“两性各自拥有自己的自治权力与责任范围，后来英国人建立了一种‘本土管理’模式，打破了这种两性力量间的平衡。”^{[10]162}所谓“本土管理”，就是选择一个男性以酋长的身份作为官方与村民联系的中介来管理村庄。在这种模式下，女性的传统管理地位被剥夺了。在艾格的母亲和艾格自己早期生活的年代，伊博乡村社会依旧在按传统管理模式运转。如艾格和第一任丈夫到田间从事农耕，艾格回家探访病危的父亲时途经的那个有很多女商贩的市场，而在艾格生涯的后半阶段，所谓的本土管理模式已经出现，但传统管理模式的痕迹依旧存在。艾格、阿达库等这些生活在拉各斯的伊博女性在生活困难时下意识地都会选择从事些小买卖来贴补家用，艾格在人生的几次困境中总是能得到父亲的妻子们、丈夫家的女性们、热心的女邻居们的关怀、抚慰与帮助。艾格在丈夫入狱，生活再次陷入困境后，心生懊悔，“如果她有时间和那些曾经向她伸出友谊之手的女性结交的话，她或许会好过很多”^{[6]219}，对女性群体关怀的渴望令艾格最终回到故乡伊布扎。

尼日利亚等南部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殖民历史的一个衍生物。也就是说，欧洲殖民是促动南部非洲各国由部族社会向现代社会急遽转型的重要推手，所以欧洲人在南部非洲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扮演着操控者的角色。这种操控在尼日利亚早期的城市空间中比乡村农业社会更为鲜明。与传统乡村农业社会的经济模式不同，城市人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为母的快乐》所反映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拉各斯，黑人男性可以从白人那里得到洗衣工、厨师、服务员、园丁、码头工人、船员等工作获得养家糊口的工资，但是女性却被排除在这种稳定的工资系统之外，她们只能做一些收入不稳定、甚至有违法风险的小买卖，由于没有土地，城市里的黑人女性们如果失去丈夫稳定工资的支撑，生活极有可能瞬间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在丈夫被骗去当船员、被英国人抓壮丁送到印度战场上失踪期间，艾格的生活几近崩溃，甚至一度濒临饿死。拉各斯由白人主导的城市工资系统本身构成了对黑人女性的一种压迫性力量。

殖民时期的城市空间对艾格这样的黑人女性不仅实施了经济压迫，还有更深层的精神压迫。在拉各斯，恩奈夫及其黑人朋友们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为白人服务，其地位如同拿工资的奴隶，恩奈夫的主人米尔斯（Meers）先生称他为“狒狒”，女主人总是记不住他的名字，白人不仅决定着黑人的生存，而且可以随意决定黑人的命运，正如同艾格所说：“英国人就像上帝一样拥有我们，就像上帝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取走我们任何一个人。”^{[6]148}外来的白人殖民者对黑人本土居民的种族歧视渐渐地内化为黑人的自我认知。恩奈夫对女主人的名字的发音也从不标准，但他认为“我只是一个黑人，人们并不期待我了解所有的事情。”^{[6]83}叙述者紧接着对他的这种想法形成的原因进行剖析：“他是那个时代习惯于被反复告知黑人是愚蠢的，然后开始相信自己是不完美的非洲人之一。”^{[6]83}《为母的快乐》集中反映了殖民时期欧洲人对非洲男性的他者化策略。在殖民话语的他者化策略中，除了降低异己的存在，还有一种对异己的女性化倾向。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到：“与所有那些被赋予诸如落后、堕落、不开化和迟缓这些名称的民族一样，东方是在一个生物决定论和道德—政治劝谕结构框架中被加以审视的。因此，东方就与西方社会中的某些特殊因素（罪犯、疯子、女人、穷人）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有一显著的共同特征：与主流社会相比，具有强烈的异质性。”^{[11]264}《为母的快乐》还以文学的形式反映了“东方是被西方男性征服的女人”^{[12]188}的殖民话语。恩奈夫的工作是被艾格视为具有女性特质的洗衣工，他有一个“瓦特妈妈”的女性外号，“他的味道闻起来不健康，他不像伊布扎的男人们身上散发着燃烧木材和烟草留下的健康味道，而是散发着肥皂水的味道，就像他被洗得太过了一样。”^{[6]44}恩奈夫的工作甚至改变了他的形貌，他“身材矮小，大腹便便，当他兴高采烈地在朋友们之间周旋时，上臂的肉都在颤抖。”^{[6]43}恩奈夫的工作、身材使艾格觉得自己嫁给了一个“中年妇女”^{[6]42}。恩奈夫的形象明显具有女性化的特征，是埃默特塔塑造出来的在将非洲他者化、性别化的殖民话语中，失掉自我的非洲男性的一个表征符号。

然而在被欧洲殖民话语他者化的非洲男性这个远低于白人的存在阶层之下，还有一个更低的阶层：非洲女性。艾格看不起丈夫的工作，嘲笑他为“洗女人

内衣的男人”^{[6]49}，但她在家里的地位就像恩奈夫所说：“难道我没有给你彩礼吗？难道我不是你的主人吗？”^{[6]48}作为丈夫的奴仆，照管家人的生活就成为女性天经地义的工作。非洲男人在白人主人面前卑躬屈膝，但回到家里在妻子面前飞扬跋扈。非洲男人是非洲白人的奴仆，非洲女人又是非洲男人的奴仆，这样，殖民时期的非洲女性在社会性别的压迫之外，又在承受着殖民的种族压迫，变成了他者的他者，或者说成为了双重的他者。

通过殖民时期艾格城市生活的悲剧性体验，埃默切塔“揭示了前殖民时期的传统女性观念不适用于殖民时期……尼日利亚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人们依旧期待女性扮演妻子、经济提供者、养育者等传统角色。这就为女性带来了很多问题。”^{[9]188}

三、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失败平衡

《为母的快乐》通过主人公艾格的一生反映了20世纪尼日利亚从前殖民到后殖民的社会生活。埃默切塔借助游走在两个文化时空里的艾格的生活体验不断地展开对传统伊博农业社会和现代城市社会的比较。这种比较最突出地体现在对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城市社会男性特征的比较之上。作为传统伊博男性的完美代表，阿巴迪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力量过人，他“是一个伟大的摔跤手，还能说会道，擅长演讲……他生活在勇武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时代，人们自然地选择他作为领导者。”^{[6]10}传统伊博男性与自然关系密切，浑身散发着野性的魅力：“他不属于这个温和的地方，他属于骄阳明月，属于农场和农舍，在那里，他能感觉到半隐半现的蛇和跑来跑去的蝎，他能听见鬣狗的嚎叫。”^{[6]10}在埃默切塔笔下，与充满阳刚力量的传统伊博男性相比，以恩奈夫为代表的现代城市男性懒惰、愚蠢、胆小、不太负责任且充满女性化特征，埃默切塔明显把这种城市非洲女性的女性化倾向归因于殖民与现代化进程。艾格的邻居科迪莉亚（Cordelia）在和艾格聊天时感慨道：“城市里的男人太忙于做白人的奴仆了，以至于不再是男人，我们女性在意的家庭，而不是丈夫。他们的男性气概已经被抽走。可耻的地方在于他们并不自知。他们看中的都是钱，闪闪发光的白人的钱。”^{[6]10}埃默切塔通过科迪莉亚之口传达的信息是：殖民与现代化进程剥夺了非洲男子的刚毅之气，导致了他们社会性别特征的异化与畸变。而隐藏在这种认识下面的，则是埃默切塔矛盾的女权主义思想，她一方面揭示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性别压迫，但另一方面，她似乎又在以传统的两性特征的规定标准来衡量两性的等级。她对传统男性与现代男性的态度显示出了这样一种意识：“传统

的非洲男性与自然亲密无间，是强壮、健康、有力、活跃的，他们扎根于历史与传统。现代非洲男性则脱离土地，无根，没有历史，性格软弱，而且女性化。真正的充满男性气概的非洲男性，在摩尼教寓言中，它的对立面是女性化的现代男性。女性化标志着劣等。”^{[7]100}

在对男性的审美上，埃默切塔显然更认可与土地和力量相关联的传统男性的阳刚之美，但就此认为埃默切塔对传统乡村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一褒一贬、一取一舍的态度，也有些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埃默切塔对这两种文化的态度要更为复杂且模棱两可。

小说前两章对前殖民时期艾格父母爱情的描写充满怀旧情感，是对传统伊博农业社会的理想化和浪漫化。艾格虽然在故乡遭遇了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但是伊布扎一直是她的身心疗愈之地。在具体着笔伊博乡村的生活时，埃默切塔不厌其烦地以民族志的手法来描写传统伊博人的习俗，这一方面说明西方读者是埃默切塔理想读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埃默切塔在作品中证明非洲有自己文化的叙述策略。但传统伊博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奴隶殉葬风俗、以是否生育儿子来评价女性的标准等父权制社会的衍生观念也是造成无法实现女性自我的传统女性痛苦的根源，所以，《为母的快乐》也显示了埃默切塔对传统伊博社会的批判与讽刺倾向。

埃默切塔借艾格的经历和感受揭露了殖民时期城市空间的逼仄、非洲男性的他者化和女化倾向、将女性排除在外的城市工资系统、家族纽带的松动等城市问题，并认为这些是加剧殖民时期非洲女性艰难处境的重要因素。然而，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的多元化也促生了具有女性解放色彩意识的出现。艾格在拉各斯逐渐西化，对恩奈夫刚从哥哥那里继承来的妻子阿达库说：“你的这位长妻就像白人女性一样，她不喜欢喧闹。”^{[6]124}受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约鲁巴人和欧洲人的影响，艾格难以忍受在传统农业社会被视为正常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阿达库刚来到拉各斯时，艾格愤怒不已，叙述者对此评论道：“她绝望地试图控制自己的情感，努力摆出一个富有经验的伊布扎妻子该有的愉悦的样子欢迎另一个进入她家的妻子，但是她做不到。她以所谓英国方式憎恨这件事情，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告诉她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6]119}“英国方式”在这里显现的是一种进步的意识，是非洲女性走向自我解放的推动性力量。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鼓动下，艾格和阿达库曾经联手进行家庭革命，拒绝给不负责任的丈夫提供饭食。阿达库在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寄居者地位后愤然离家，并决定独自供养两个

女儿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是非洲现代女性意识形成的一个鲜明标志。然而埃默切塔对于阿达库的这种决绝的女性反叛行为似乎并不欣赏，她借叙述者之口评价道：“阿达库变成了艾格不喜欢的无耻的现代女性中的一员。”^{[6]124}显然，现代女性的反叛被视为西化的结果，而“无耻的”修饰语则暗含着批判的态度。对非洲女性在接受西方现代两性观念后的觉醒与反叛的模棱两可态度，实则反映了埃默切塔及同时代的其他非洲女作家在非洲女性应该首先反抗什么的问题上的困惑，是先借助欧洲关于人的新观念进行启蒙实现女性解放，还是先反抗欧洲的殖民主义实现民族解放，这是一个难解的时代命题。埃默切塔的《为母的快乐》也没有给出清晰的解答。这是因为对曾经的殖民地来说，启蒙本身与殖民密不可分，“殖民主义是启蒙主义的毒瘤，是启蒙主义所带来的对财富的控制欲的恶性膨胀的结果，它在使现代文明提供给人的一切便利发生变质的同时，也把人类文明的发展从高尚的轨道上拖下来；在带给殖民地和宗主国文明之外的体味（包括血腥、劫掠、暴政、贪欲）的同时，使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发展历程之中。”^{[12]61}

与勇敢而决绝地冲破束缚、寻求自我实现的阿达库相比，艾格显得犹豫保守。她努力在传统伊博父权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两种文化符码间寻求平衡。然而无论是站在传统视角上审视现代城市生态，还是站在现代城市视角回望传统乡村习俗，都令她情感上深感不适，行为上不知所措，甚至沦为别人的笑柄。最典型的场景是在“女儿的荣誉”这一章，恩奈夫因女儿与约鲁巴族的男青年谈恋爱而愤怒伤人，在为恩奈夫作证的法庭上，艾格关于儿子的学费是谁给付的问题上表述的错乱引人发笑，她的解释是：“恩奈夫是我们家的家长，就像我们都是天上的上帝的子民一样，他拥有我。这样的话，我付了学费，然而我属于他，也就可以说是他付的学费。”^{[6]217}她关于男人就应该喝酒、敢于使用武力保护女儿的荣誉和彩礼的具有传统观念色彩的言论在庭审过程中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恩奈夫被判有罪。艾格因不能理解庭审过程及其结果而痛苦：“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嘲笑我？是我做错了事吗？事情的确发生了变化，但恩奈夫还是拥有我们，难道不是吗？”^{[6]218}阿达库点明艾格痛苦迷惘的原因在于旧观念的束缚：“在现代尼日利亚，恩奈夫拥有不了任何人……你相信传统，但你已经有了些改变，你要坚定你的信念。”^{[6]218}埃默切塔借阿达库之口揭示出：以艾格为代表的从非洲传统乡村社会走入殖民时期现代城市社会的非洲女性，在与新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产生了冲破传统社会男性标准的束缚以实现女性自我的

愿望，但又因抵制在城市中接触的烙有殖民压迫印记的现代文化而无法成为现代女性。

综上所述，《为母的快乐》中的艾格被塑造为各个社会生活空间中的受害者。传统农村父权社会的女性期待使她在父女、夫妻、母子等关系中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性别创伤，是而殖民时期的现代城市社会则在性别压迫之外，在她身上又增加了种族压迫，使她成为他者的他者。艾格努力在前殖民时期传统农业文化与殖民时期现代城市文化之间寻求平衡，但均因意识的错位和价值选择的复杂性而以失败告终。“埃默切塔是把艾格作为非洲女性，尤其是尼日利亚女性的代表来塑造的”^{[9]126}，她的人生困境可以视为在非洲文化转型时期由传统农村社会走入现代城市社会的非洲女性困境的缩影。她努力探寻不依附于他人的自足女性的实现而不可得的人生悲剧揭示了从前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期对女性实施压迫的尼日利亚整个社会系统。

参考文献：

- [1] Shalini Nadaswaran. The Legacy of Buchi Emecheta in Nigerian Women's Fi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2012 (2): 146-150.
- [2] Omotayo I. Fakayode. Translating Black Feminism: The Case of the East and West German Versions of Buchi Emecheta's The Joys of Motherhood[J]. *Revista Artemis*, 2019 (1): 132-143.
- [3] J. Adeola. *Their Own Voice: African Women Writers Talk*[M]. London: Currey, 1990.
- [4] [美]特里莎·德·劳里提斯. 社会性别机制[M]//佩吉·麦克拉肯, 主编.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5] Buchi Emecheta. *The Bride Price*[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6] Buchi Emecheta. *The Joys of Motherhood*[M].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9.
- [7] Louise O'Brien. Buchi Emecheta and the 'African Dilemma' [J].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001(2): 95-106.
- [8] Olusola Oso. The Treatment of Patriarchy in Buchi Emecheta's The Joys of Motherhood and Sefi Atta's Everything Good Will Come[J].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2017 (3): 1-8.
- [9] Mohamed Fathi Helaly. Cultural Collision and Women Victimization in Buchi Emecheta's The Joys of Motherhoo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English Literature*, 2016 (2): 117-127.
- [10] Ketu H. Katrak. Womanhood/Motherhood: Variations on a Theme in Selected Novels of Buchi Emecheta[J].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1987 (1): 159-170.
- [11] [美]爱德华·W·萨义德, 著.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上

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 [12] 姜飞. 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文化语境[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The Plight of African Women in Emecheta's *The Joys of a Motherhood*

GAO Wen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Nnu Ego in Buchi Emecheta's *The Joys of Motherhood* was portrayed as victims in various social levels. The female expec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ural patriarchal society made her undergo a series of social gender trauma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 and daughter, husband and wife, mother and son. The modern urban society in colonial period added racial oppression to her besides social gender oppression. That makes Ego become the double other. Ego kept seeking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ulture in pre-colonial times and modern urban culture in colonial times, but all her efforts failed due to the disloca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mplexity of value choice. Eger's life dilemma could be regarded as a microcosm of the plight of African women who moved from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to modern urban society during the period of Africa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Buchi Emecheta; *The Joys of Motherhood*; social gender; double other; the plight of African women

(上接第20页)

Lu Xun's "Dong Quixote" and "Zhuang Zi"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The Unchained Don Quixote*

GAO Wen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drama *Unshackled Don Quixote* is a parody of Spanish writer Cervantes by Soviet writer Lunacarsky. In 1931, Lu Xun first translated the first act and published it in the *Beidou*. Qu Qiubai translated the whole text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text, and Lu Xun wrote the postscript. In the Epilogue, Lu Xun, while clearly revealing the shortcomings and poisonings of Don Quixote, also criticized the onlookers who laughed at him.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for Lu Xun, Lunacarsky's Don Quixote had multiple symbolic meanings. He was not only an idealist who did not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and divorced from reality, but also a warrior with sincere belief and practical spirit. Lu Xun naturally criticized the former seriously, but affirmed the latter. This attitude is highlighted by the contrast with the "Zhuangzi" in *Death Rising* and the modern "false scholar" image it alludes to, which also can be corroborated by Lu Xun's essay on Don Quixote. With Lu Xun's attitude towards Dong Quixote as the incision, we can see through Lu Xun's attention to the "inner voice" away from the fake, emphasizing the current ac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view and literary view.

Key words: Lu Xu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Don Quixote; "The third kind person"

资深媒体人作为网络大V的传播行为研究

游雨欣

(德州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拥有便利、丰富的传播资源, 掌握了娴熟的传播技巧, 深谙传播之道。这类网络大V多专注于运营时评类自媒体, 他们抓取社会热点、点评时事, 凭借自身的“名人效应”“意见领袖”作用等传播行为, 在网络中大量吸粉, 成为网络舆论中的重要推手, 在舆论传播中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股力量既是正向力量, 发挥建设性作用, 亦可是负向力量, 起破坏性作用。引导自媒体发挥建设性作用, 需要从法律法规、政府监管、平台管理和网络大V自律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 资深媒体; 网络大V; 群体特征; 传播特征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34-04

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在舆论场中影响力强大, 值得重视, 但目前针对这一群体的专门研究比较少。体制内媒体人, 其自媒体虽然以个人名义注册, 但带有浓厚的机构媒体印象, 他们的自媒体是机构媒体人职业角色的某种迁移, 在内容、风格、价值观等各方面的底色依然是媒体人职业特色。^[1]这类个人自媒体的信息纪律性较强, 往往配合机构媒体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一类媒体人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畴。本文研究的是那些完全以个人名义, 以自媒体方式传播信息、影响舆论, 具有资深媒体工作经历的网络大V。这类网络大V具有多年机构媒体的工作经验, 他们或者因为退休, 或者因为离职转行而以自媒体为传播平台活跃在网络传播领域, 成为具有大量粉丝的网络大V。这类具有资深媒体人背景的网络大V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和传播行为特征。

一、资深媒体人作为网络大V的析出

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人类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 在此过程中, 出现了新的传播现象和传播群体, 网络大V是其中的典型现象。据已有文献, 网络大V一词最早出现于2011年的《南方周末》。^[2]随着网络的发展, 网络大V在数量上不断增加, 在领域上分布越来越广, 其影响力与日俱增, 少数大V甚至凭一己之力影响公众舆论。这种突出的网络传播现象引起学界关注, 网络大V的概念也随之更加清晰。有学者认为“大V”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微博

平台上获得个人认证, 微博昵称后附一个“V”形图标, 粉丝超过 50 万。^[3]粉丝超过 50 万逐渐成为辨识网络大V的普遍标准。随着多种自媒体平台(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的兴盛, 微博平台不再是承载网络大V的唯一平台, 抖音、西瓜视频、微信等都是网络大V活跃的网络平台。有研究对网络大V人群的职业做了分析, 这项研究通过对 100 位“意见领袖”的职业分析发现, 媒体人士最多, 其次是学者、作家和自由撰稿人。^[4]这里的“意见领袖”指的就是网络大V, 学界更习惯用网络中的“意见领袖”来指称网络大V, 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和使用“网络大V”的指称。

现有的研究多从网络大V的特征, 网络大V的识别, 网络大V的影响, 网络大V在舆情传播中的作用, 网络大V的谣言传播, 以及对网络大V的管理等角度进行探讨。这些研究多把网络大V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鲜少对这个群体进行分类研究。随着多种自媒体平台的推出和发展, 网络大V呈现出多种类型, 如公知型网络大V、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专家型网络大V、政务型网络大V、草根型网络大V、明星类网络大V等, 这些群体的传播行为呈现出各自的群体特征。

二、资深媒体人作为网络大V的群体特征

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具有一些较为明显的群体特征。

收稿日期: 2023-04-19

基金项目: 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发生机制研究”(2022DZZS055)。

作者简介: 游雨欣(1981-), 女, 四川邻水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网络传播研究。

（一）“名人效应”突出

资深媒体人在做自媒体之前就积累了一定的受众基础，为大众所熟知。机构媒体所赋予他们的身份印象使得他们在自媒体传播行为中容易达成“名人效应”的传播效果，他们在自媒体传播中更容易通过“制度化”程式将个人的“单元行动”转换为群体的“社会行动”。^[5]同时，与其他类型的网络大V相比，多年从事媒体工作的经历，为资深媒体人积累了广泛的人际网、丰富的信息源以及一定的受众基础。处于大V头部的资深媒体人，往往在国内外都有丰富的信息源，熟悉重要信息源头，与许多信息源头保持着良性的沟通或来往。这些在信息源和人际交往方面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获取信息，这在国际信息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网络“意见领袖”作用凸显

意见领袖的特征包括：权威、有知识、接近信源、善于交际。这些特征在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身上体现得较为突出。他们有较长时间的媒体职业积累，在媒体行业取得了为公众认可的职业成就，在社会上具有公信力和说服力，可以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6]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除了具备传统意见领袖的特征之外，还表现出网络意见领袖的一些特征，他们对网络信息传播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分享意识，对时政类热点尤为关注。传统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往往集中于他自身所处的群体，他们往往在某一方面比较擅长，甚至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因此在某一领域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其关注的信息领域宽泛，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个专业领域。他们热衷于信息传播，热衷于分析时政，热衷于评述热点新闻。对信息传播的热忱，使得他们在网络中不断地、持续地、长久地介入各类信息，并在网络中分享这些信息，积累大量粉丝。有的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甚至拥有上千万的粉丝。拥有大量粉丝的网络大V，其传播影响力不可小觑。有人说，粉丝量超过100的微博用户是一本内刊，超过1000的是布告栏，超过1万的是一本杂志，超过10万的相当于一份都市报，而超过1000万的就成了一家电视台。^[7]在传统媒体时代，报刊发行量超过百万份，就称得上是市场上的特大发行量报刊，对广告市场和舆论传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网络传播时代，一些资深媒体人类型网络大V的粉丝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时代的特大报刊，其传播力和影响力需引起重视。

（三）突出的“批判精神”和“思辨力”

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具有参与公共讨论

的强烈意愿，和突出的批判精神及较强的思辨力。他们对自身言论在网络中引起的反对声音甚至网络攻击表现出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无论是出于对流量所带来的利益的考虑（私人利益），还是出于对公共问题建言献策的考虑（公共利益），或者为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又或者多者兼备，这类大V的批判精神和言论的批判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有的言辞犀利，有的迂回曲折，但都表现出对公共热点问题和公共决策的质疑和批判。这里的批判，并不仅仅指狭隘的批评和纠正，它既可以是批评也可以是建议，是对问题的独立的判断和思考，并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凭借强大的思辨能力他们的言论和观点在网络中引起大量粉丝的关注。关注并不等于赞同，这类网络大V的言论也受到不少网友的质疑、否定甚至言语攻击。与大多数的一般网民不同，他们对网络否定甚至网络攻击具有较强的承受力，这些反对或攻击并不影响他们持续地介入信息传播，甚至会被他们作为自我调侃的内容嵌入到下一次的信息传播之中。

三、资深媒体人作为网络大V的传播特征

鲜明的个人特征和丰富的媒体人工作经历，使得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的传播行为具有明显的优势，表现出明显的传播特征。

（一）擅长从众多信息中抓取热点

通过热点新闻“说事儿”对热点新闻进行评论，是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屡试不爽的吸粉方式。少数影响力巨大的此类网络大V在热点事件中的舆论影响力甚至可与机构媒体相抗衡。多年的传媒工作经验，使得他们具备出色的信息收集能力和信息选择能力，他们能迅速地从众多眼花缭乱的新闻信息中辨别和选择出吸引粉丝的热点事件。此外，这类网络大V往往还具备娴熟的英文能力，加之他们多年在媒体行业积累了一定的国外信息源，在收集和选择国际信息时具有明显优势。时政新闻、中美摩擦、违背公序良俗的社会新闻是他们尤为热衷评论的话题。他们所选择的话题总是能够成功吸引眼球，对热点话题的判断和精心选择是他们成功吸粉的重要原因。

（二）擅长爆料热点和制造话题

对于流量为王的自媒体界来说，吸引粉丝眼球的热点话题非常重要。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深知什么样的话题或题材能够吸引粉丝带动流量。在少数此类型网络大V的自媒体中，偶尔会出现并不适合以自媒体渠道进行传播的、首发的、明显具有新闻特征的信息，引起舆论哗然。除了偶尔冒着风险爆料新闻之外，他们还擅长结合当下的流行风气，把旧题材（比如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进行新的解读，旧题

新读也给他们的自媒体带来不菲的流量。

(三) 信息呈现方式多元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 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 其信息呈现方式是多元的。这类网络大V深谙信息传播之道, 能娴熟地运用自媒体进行传播。在传播平台方面, 他们常常运用多个自媒体平台同步传播信息, 收获大量粉丝。在传播符号方面, 无论是文字传播还是当下流行的中长视频和短视频传播, 他们都显得比其他类型的网络大V更加专业。在文字类型的评论中, 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所发布的评论类文章, 明显地运用了机构媒体新闻评论的写法, 是规范的新闻评论式文章。他们在运用媒体报道引出话题、引出自己的观点、批驳对方观点、引用资料、运用逻辑等方面都表现得游刃有余, 具有强大的论说功底。资深媒体人(或其团队)所发布的视频类信息, 其专业水准也是比较高的。视频类信息较难由一个人自始至终地独立完成, 特别是资深媒体人需要出境的时候。由此, 或许可以推论, 在视频信息传播中活跃的这些资深媒体人, 其背后可能存在专业团队。团队至少为他们画面的高质量传播提供了技术保障。

(四) 个人表演痕迹明显

戈夫曼指出, 社会是一个舞台, 人生是一场表演。^[8]资深媒体人网络大V们的自媒体内容具有明显的个人展示性和表演痕迹, 这在他们的视频类信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类网络大V在出镜视频中, 其一本正经或玩世不恭的表情、配合语言的肢体动作、对他人的戏谑或对自我的调侃, 视频的场景布置等都明显地具有表演性, 这种表演具有给传播信息增添戏剧性、调动受众情绪、增强信息的重要程度等作用。事实信息、网络大V的评论和表演三者交相杂糅, 统一指向一个目的, 就是吸引粉丝眼球, 增加他们的自媒体流量。这种表演和展示除了表现在传播符号方面之外, 还表现在这类网络大V会适当地在信息中穿插他们个体的私人信息, 这些私人信息包括他们曾经的丰富经历, 他们的所见所闻, 他们的实时动态, 甚至与别的大V之间的互撕、与旁人的互撕、与粉丝的互撕。

四、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引起的传播问题及思考

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二元交织的自媒体载体中, 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以其特有的群体性特征和传播行为特征, 影响着受众, 也影响着主流媒体的权威及其的舆论引导力。

(一) “名人效应”溢出的负面影响

一些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其自媒体内容集中于

时政、国际关系、民生等领域, 由于其特有的“名人效应”, 其所带动的舆论力量是惊人的。在三年疫情和洛佩西窜访台湾事件中, 这类自媒体大V显示出了巨大的舆论带动力。这种舆论带动力并不总是正向的, 当他们在重大问题上曲解政府言论, 与主流媒体有明显分歧甚至完全相背离时, 对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则是一种干扰。

(二) “意见领袖”作用的过度放大

这些网络大V在国内外都有大量粉丝, 是粉丝们的舆论领袖。自媒体的跨国界传播使得他们的舆论影响力跨越国界。当他们的一些观点或意见迎合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刻板成见”时, 或西方国家选择性地把他们的一些过激言论作为攻击中国政府的论据时, 其传播所带来的客观结果与他们在自媒体中表达的“爱国情怀”和“站在民众的立场”很可能背道而驰。

(三) “个人表演”挑战媒体的“公信力”

有的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 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和熟练的采访技巧, 在重大社会事件中以私人的名义进行新闻信息采写, 并把这些信息发布于个人自媒体, 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机构媒体的公信力, 而且有违《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互联网新闻信息做了明确界定: 互联网新闻信息是指时政类新闻信息, 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 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8]依据该规定, 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的, 应当是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9]很明显, 私人性质的自媒体, 无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团队名义、网络公司名义, 都不具备新闻信息采写和发布权限。但在实际的网络信息传播中,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这一限制屡屡受到挑战, 不仅有商业网站打“擦边球”、踩红线, 违规开展新闻信息采写业务, 也有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资源越权采写、发布新闻信息。这不仅扰乱了网络信息传播秩序, 还影响到主流媒体的权威性, 干扰或带偏网络舆论。

(四) “批判精神”在“公共领域”的滥用

当某个以评点时政信息出名的资深媒体人拥有了大量稳定的粉丝时, 他就成为了网络中的公众人物, 他的自媒体也就成为了讨论公共问题的网络平台, 具有了公共领域的性质。梅罗维茨多年前就认为电子传播融汇了公私领域, 网络传播更是如此, 网络的性质决定了网络空间是一个公私杂混、混淆的空间。这些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网络大V们的自媒体平台, 往往

并不仅仅限于讨论公共问题，他们还把自己的私人信息作为吸引粉丝讨论的话题，甚至把私人间的互撕搬到网络平台成为公共讨论的话题。这种把并不具备公共讨论价值的私人信息、私人恩怨作为话题炒作提升热点的行为，是对公共传播资源的浪费。

五、结语

资深媒体人由于在传播方面的诸多优势，更容易成为网络中的“红人”。言论权为大众的网络言论提供了法律保障，网络的低门槛为大众的网络言论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便利途径。资深媒体人作为拥有大量粉丝的“网络大V”，具有较大的舆论动员力量。这股力量既可能是破坏性的，也可能是建设性的。若“大V”们三观正、立场正、发表言论的初衷和目的正，那他们所引起的舆论力量可以是社会团结的推动力量；反之，若只是为了博人眼球带动流量，仅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挑起公众情绪，那他们所引起的舆论力量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和破坏性。

要使这股力量，发挥建设性作用，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治理网络空间的规范性法律法规尽可能快地跟进网络传播的现状，利用法律法规治理网络空间，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2023年3月，中央网信办开展的为期两个月的“清朗行动”，专项整治自媒体传播乱象。这次整治自媒体的行动，包括从严整治“自媒体”蹭炒热点吸粉引流；从严整治“自媒体”造热点博流量。^[9]

各种自媒体平台需改变在监管方面的懈怠现状，对平台言论实行规范有效的审核，对违反规则的自媒

体账号（特别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自媒体大V）实施强有力的追惩措施。除了这些外力因素之外，更为关键的是网络大V，特别是深谙传播之道的资深媒体人类型的网络大V，需加强自身的言论责任意识，对自身言论在网络中产生的影响和在现实中产生的连带社会影响，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控制仅仅为了流量和私利而不惜消费粉丝注意力、挑起公众情绪的传播行为。

参考文献：

- [1] 张志坚. 媒体人微博的性质与功能[J]. 南华大学学报, 2012, 13(5): 133.
- [2] 何兵. 他们走在微博上[J]. 贵阳文史, 2012, 131(1): 5.
- [3] 杨晓霞, 靖鸣. “大V”传播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研究思考[J]. 新闻知识, 2014, 356(2): 6.
- [4] 祝华新, 刘鹏飞, 单学刚. 网络舆论场的“意见领袖”[J]. 国土资源导刊, 2013, 10(3): 50.
- [5] [美]塔尔科特·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M]. 张明德, 夏翼南, 彭刚,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 [6] 付晓静, 张德胜. 身份认同的转变: 基于媒体人微博公益实践的分析[J]. 现代传播, 2016, 38(10): 49.
- [7] 詹国枢. 网络大V的言论边界[J]. 紫光阁, 2013, 238(10): 32.
- [8] [美]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9]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7, 1604(29): 110.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Behaviors of Senior Media Experts as Internet Celebrities

YOU Yu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Senior media experts as internet celebrities possess convenient and rich dissemination resources, have proficient dissemination skills, and understand dissemination ways. Most of internet celebrities focus on running news media by commenting on current events. They grab social hot spots and comment on current events. By virtue of their “Celebrity effect” and “Opinion leader” role to spread behaviors, they attract a large number of fan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public opinions in the media. This force can be either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role or negative and destructive. To make it seek benefits and avoid harms,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aspect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government supervision, platform management and the self-discipline of network celebrities and so on.

Key words: senior media; network celebrities; group characteristics; disse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指示词“这”充任主语的受限性及其原因

马超

(德州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学界普遍认为指示词“这”可以作定语和主语, 作宾语却受到限制。其实, “这”不仅作宾语受限, 作主语也受限, 数据统计证明, “这”作主语时语篇功能受限, 此外, “这”作主语的句法条件也受限, “这”作主语的语句, 其谓语多为非自动词以及形容词, 如果谓语中心语是自动词, 则“这”一般指称动作的受事。“这”充任主语受条件限制有两个原因, 一是“这”作为指示词没有词汇意义, 二是指示词“这”指称单数个体的功能较弱。

关键词: 指示词“这”; 主语; 篇章功能; 句法条件; 受限原因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38-06

引言

指示词是体词, 体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作主语、宾语和定语。学界普遍认为指示词“这”可以作定语和主语, 作宾语却受到限制。如王力曾指出“指示词可用为首品”, “但以属于主位者为限”, 此外, “指示词可用为次品”。^{[1][2]212-214}此处的“首品”相当于中心语, “次品”相当于定语, “主位”也就是“主语”。^{[1]25-40}丁声树以及朱德熙也都指出“这”“那”单用时, “做主语的时候多, 做宾语比较少”。^{[2]-[3]}方梅在比较“这”与“这个”的语法功能时, 也指出“单音节形式作宾语受到限制”。^[4]然而, 依据我们对语言事实的观察, 指示词“这”不仅不常作宾语, 与作定语相比, 作主语的频率也低得多。通过对共计209152字的语料^①的观察, 我们共发现了1468个指示词“这”^②, 其中作宾语的仅有3例, 作主语的有328例, 作定语的有1137例, 作主语的“这”数量远少于作定语的, 比率为1:3.47, 可见, “这”作主语有一定的受限性。那么, 为何指示词“这”作主语的频率远低于作定语的频率? 作主语的“这”有何限制条件, 又为何受限呢?

一、指示词“这”充当主语的受限性

“这”作主语的受限性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主语时, “这”在篇章中的功能相对受限, 二是“这”充当主语受句法条件的限制。

(一) 篇章功能的受限性

综合Himmelmann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所概括的指示词的篇章功能以及Tao和Chen对汉语指示词篇章功能的分析^[5-7], 我们观察了指示词“这”的篇章功能, 认为“这”的篇章功能有情境用(situational use)、语篇用(textual use)、示踪用(tracking use)、预指(cataphora)、特殊共享知识用(shared specific knowledge use)、自包含联想用(self-containing association use)以及框架联想用(frame-based association use)等七种。此外, 指示词“这”还可用于指称某个确定而无须也无法识别的对象, 这种“这”的虚指用法, 本文不做讨论。经过统计, 我们发现, 除了语篇用以外, 在各种篇章功能下, “这”作主语的频率都比作定语的频率要少, 且“这”作定语时有全部的篇章功能, 而作主语的“这”没有后两种篇章功能, 详情如表1所示:

表1 指示词“这”在不同语体不同篇章功能中语法功能的统计表

语法位置	篇章功能							总数
	情境用	语篇用	示踪用	预指	特殊共享知识用	自包含联想用	框架联想用	
定语	453	88	386	10	113	80	7	1137
主语	138	152	32	1	5	0	0	328

收稿日期: 2023-04-26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现代汉语口语中指示词向话语连接成分语法化的研究”(20CYYJ02); 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当代口语中的9语言变异现象研究”(2022DZZS051)。

作者简介: 马超(1983-), 女, 山东德州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学研究。

① 本文所用的语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对《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等电视剧的语音转录; 二是对《鲁豫有约》《杨澜访谈录》《非常静距离》等谈话类节目的语音转录; 三是对相声录音的整理记录; 四是谈话实录《清华口述史》。

② 用于虚指的指示词“这”, 不在本文统计之列。

为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把“这”作主语与作定语的篇章功能进行详细的比较。

作定语的“这”具备指示词“这”的所有篇章功能，例如：

(1) 哎，就是这老头儿，交的钱。

(电视剧《我爱我家》)

(2) 除这三口外，还有一个奶妈姓周，这老太太脾气特别好。

(相声《双槐树》)

(3) 人年龄大了，就是怕压力，我就特别不喜欢比如说参加各种需要穿晚礼服的场合，啊，就不爱想这事儿，都是压力。

(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

(4) 我给大家讲的还是这句话——不是从学术性的追求出发的，一定达不到好的结果。

(谈话实录《清华口述史》)

(5) 你条件是好，可也别太挑了，挑花了眼。呵，这件事儿，就包在姐身上了。

(电视剧《皇城根儿》)

(6) 你所表达的这个艺术作品，它一定要有所谓我们的根基，我们文化这个特征，用那种方式去说，人家才会信你。

(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

(7) 看见前面牵过来一头驴，挺鼓溜，拿扇子一拍这驴屁股……(相声《古董王(糊驴)》)

例(1)－(7)中，“这”都作定语。例(1)中“这老头儿”指称交谈现场出现的人，“这”是情境用；例(2)中“这老太太”回指上文中的“一个奶妈”，“这”是示踪用；例(3)中“这些事儿”回指上文画虚线部分，“这”是语篇用；例(4)中“这”预指下文画虚线部分；例(5)中“这件事儿”指称听话人可以依据上文所述内容识别的所指物，“这”是特殊共享知识用；例(6)中“你所表达的这个艺术作品”和“我们文化这个特征”指称听话人可以根据短语的其他定语所表达的含义来识别的所指物，“这”是自包含联想用；例(7)中“驴屁股”与“驴”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这驴屁股”中的“这”是框架联想用。如上述例子所示，具有各种篇章功能的“这”都可以充任定语。

然而，只有具有情境用、语篇用、示踪用、预指、特殊共享知识用等篇章功能的“这”可以作主语。例如：

(8) 这是我大嫂，这是我大哥，都是自己人。

(电视剧《我爱我家》)

(9) 我怀孕完了，生完了三个月就去拍戏。

大家会说有必要去挣这个钱吗？其实这跟挣钱无关……

(访谈节目《非常静距离》)

(10) 就我头半年整的那个，龙潭山庄，这也是几个农民呐一块儿鼓捣胡诌的。

(电视剧《我爱我家》)

(11) 忘不了，这是金府的规矩，除了老爷子跟您谁也不能进。

(电视剧《皇城根儿》)

(12) 好多亲戚给我打电话，你怎么了全都新浪、搜狐、腾讯全都刷屏。后来我一看，吓我一跳，这也太火了……

(访谈节目《超级访问》)

例(8)中“这”指称的是交谈现场中出现的人，“这”是情境用；例(9)中“这”回指上文陈述的情况“怀孕完了，生完了三个月就去拍戏”，“这”是语篇用；例(10)中“这”回指上文中已出现的实体“龙潭山庄”，“这”是示踪用；例(11)中“这”预指下文画虚线部分；例(12)中，根据上文所述内容，听话人可以理解“这”指的是网上的情况，“这”的用法是特殊共享知识用。

如上述例子所示，“这”作定语时有全部的篇章功能，而作主语的“这”没有自包含联想用和框架联想用这两种功能。自包含联想用是通过短语中定语部分的信息来确认所指的，如例(6)所示，框架联想是通过“这+(量)+名”结构中的名词所指物与上文已出现的事物有框架关联来确认所指的，如例(7)所示，故“这”单独作主语不可能有这两种用法。作主语的“这”很少用于共享知识用，这是因为共享知识用的所指对象没有明确地在上文或实际情境中出现，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帮助听话人确认所指，而与“这+(量)+名”结构相比，“这”作主语单独出现时，显然不能提供更多信息。

此外，通过数据统计，我们也可以发现，无论是情境用还是示踪用，也更倾向于使用“这+(量)+名”结构。“这”作主语，情境用的数量为138个，“这”作定语，在“这+(量)+名”结构中出现时，情境用的数量为453个，比例为1:3.05；“这”作主语，示踪用的数量为32个，作定语、示踪用的数量为386个，比例为1:8.29。不过，语篇用则更倾向于单独使用“这”作主语，据我们统计，“这”作主语，语篇用的数量为152个，而作定语，语篇用的数量为88个，比例为1.73:1，这是唯一的反例。

那么，为什么情境用和示踪用更倾向于使用“这+(量)+名”结构，而语篇用更倾向于单独使用“这”？这种现象应该与“这”单独使用时的指称能力有关。我们将在下文中分析“这”作主语受限的原

因时进行解释。

(二) 句法条件的受限性

“这”作主语时，句子所表示的情状通常是状态和变化，一般不表示动作行为，谓语多为非自主动词以及形容词，且以“是+NP”结构为主，如果谓语中心语是自主动词，则“这”一般指称动作行为的受事^[8]。一般来说，“这”作主语，谓语中心语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是”。据我们统计，“这”作主语时，谓语为“是+NP”情况最多，在我们统计的328个“这”作主语的句子中，谓语为“是+NP”有242个，占总数的73.78%。各种篇章功能下，“这”作主语时，谓语都可以是“是+NP”结构，例如：

(13) 这不是你常带到我这儿来的那位芭蕾舞团的于小姐么？ (电视剧《我爱我家》)

(14) 项羽生前曾除义帝，杀子婴，这是项羽之过。 (相声《后补三国》)

(15) 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单间小屋。这是本主老妈子住的…… (相声《贼鬼夺刀》)

(16) 相亲时，心态一定要放松，大不了我们不做恋人我们可以做朋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友谊。 (访谈节目《非常静距离》)

例(13)－(16)中的“这”均为“是”字句的主语。例(13)中“这”的篇章功能是情境用，“这”指称交际情境中出现的事物，例(14)中“这”的篇章功能是语篇用，“这”指称上文陈述的命题，例(15)中“这”的篇章功能是示踪用，“这”指称上文中已引入的实体，例(16)中“这”的篇章功能是特殊共享知识用，“这”指称首次出现的，但可根据上文内容识别出的实体，听话人可通过上文推知“这”指称因相亲而产生的友谊。

2. 其他关系动词。“这”作主语时，谓语中心语还常常是除“是”以外的关系动词，例如：

(17) 这不像北京人啊？ (访谈节目《非常静距离》)

(18) 李武一提气，这叫什么功？这叫气功…… (相声《贼鬼夺刀》)

(19) 打现在说，顶到黑，这算一天。 (相声《古董王(糊驴)》)

(20) 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别的事儿就完全不管了，这就成为你的全世界了。 (访谈节目《非常静距离》)

例(17)－(20)的谓语动词分别是“像”“叫”

“算”“成为”，以上动词均为关系动词。

3. 形容词。除关系动词外，“这”作主语的句子，其谓语中心语还可以是形容词，例如：

(21) 你仗着没有工作，长期不往家交钱，白吃白喝，这不行。 (电视剧《我爱我家》)

(22) 一年 365 天再除以 1000，这蛮可怕的。 (访谈节目《超级访问》)

(23) 您怎么到妇联那儿工作了？这可真够新鲜的！ (电视剧《我爱我家》)

(24) 这是油条，这不脏，这个。 (电视剧《我爱我家》)

例(21)－(24)中的谓语中心语分别为形容词“行”“可怕”“新鲜”“脏”。

4. 自主动词。“这”作主语时，一旦句子的谓语是自主动词，“这”所指称的事物一般是动作行为的受事。在我们统计的328个“这”作主语的句子中，只有20个谓语是自主动词的句子，例如：

(25) 志新：那什么我来介绍一下。

燕红：嗨！这还用介绍吗？我们不是见过好几回了么！ (电视剧《我爱我家》)

(26) 十块钱一两的茉莉大白毫啊，嗨，你们谁都不许喝啊，这要是喝上一口，多滋润呐，多幸福啊。 (电视剧《我爱我家》)

(27) 董：我在小学那个女生的回头率百分之三百。

李：这我相信。 (访谈节目《超级访问》)

(28) 和平：这背后议论老人这毛病你们该改改！太不像话了！要不是咱爸是明白人，不往心里去，要换了别人……

志国：这受得了吗？(电视剧《我爱我家》)

例(25)－(28)中的谓语动词分别为“介绍”“喝”“相信”和“受得了”，这几个动词均是自主动词。

二、指示词“这”充当主语受限的原因

我们统计的语料显示，作主语的“这”有328例，作定语的“这”有1137例，比率为1:3.47，两者数量相差很大。“这”单独作主语的数量少，是因为“这”作主语有很多限制条件。上文中我们已指出“这”作主语在篇章功能和句法上都有一些限制性。我们认为“这”作主语受限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这”没有词汇意义，二是“这”指称个体对象的能力有限。

(一) “这”没有词汇意义

“这”作主语受限的原因之一是“这”作为指

示词只有语用功能而没有词汇意义。词的词汇意义包括理性意义和非理性意义，理性意义是与概念相联系的那部分意义，与事物（广义的事物，包括行为、动作、性质、状态等）具有对应性。^[9]指示词“这”的功能是指示近处的事物，它的所指对象是事物，但“这”本身不直接表示事物。“这”没有词汇意义，那么，“这”单独指称事物时，听话人只能依靠上下文来确定“这”所指称的对象。

因此，“这”作主语时，句子中其他词语的意义或句式的意义要有助于听话人确定所指对象，这也是“这”最常作“是”字句的主语的原因，关系动词“是”表示等同或类属，其后的宾语能为作主语的“这”提供足够的信息，帮助听话人确定所指对象。在我们统计的328个“这”作主语的句子中，谓语为“是+NP”有242个，占总数的73.78%。

（二）“这”指称个体对象的能力有限

方梅曾指出“单音节形式的‘这’‘那’用作独立指称的能力很弱，尤其指称个体对象能力有限”^[4]，该文主要通过单音节形式作宾语受到限制以及单音节形式作为并列结构作主语时受到限制来证明这个观点。我们认为“这”作主语单独使用时，指称个体对象的能力确实有限，必须借助上下文，才能指称个体对象。

指示词“这”指称单数个体的功能有限，在需要突出事物的个体性时，往往使用“这+（一）+量词”的形式。所以在比较句和并列结构中，“这”需要借助量词来突出事物的个体性。试比较以下几组句子：

(29) a. 这件衣服比那件衣服保暖。

b. *这衣服比那衣服保暖。

c. 这件比那件保暖。

d. *这比那保暖。

(30) a. 这件衣服和那件衣服都保暖。

b. *这衣服和那衣服都保暖。

c. 这件和那件都保暖。

d. *这和那都保暖。

如上述两组例子所示，只有当“这”后有量词时，比较句和有并列结构的句子才合法，也就是说，“这”只有和量词结合时，才突出事物的个体性。

并且，“这”作主语多用于指非个体化的事物^①，比如多个事物的集合，无界事物（布、肉、面粉、水

等）^{②[10]}、抽象的事物（想法、办法、问题、事情等）以及事件、命题、行为动作等。例如：

(31) (说话人手指着摊位上的土豆)

这多少钱一斤啊？（电视剧《父母爱情》）

(32) (说话人喝了一口水)

这太烫，给我兑点儿凉的。

（电视剧《我爱我家》）

(33) 志新：流氓犯罪是归那儿管吧？

傅老：嗯？这你也有？

（电视剧《我爱我家》）

(34) 我怀孕完了，生完了三个月就去接了个戏。大家会说有必要去挣这个钱吗？其实这跟挣钱无关……（访谈节目《非常静距离》）

(35) 我记性不好，这我们剧组的人都知道。

（访谈节目《鲁豫有约》）

(36) 接吻是工作啊，这不代表什么。

（访谈节目《非常静距离》）

例(31)中的“这”指的是一堆土豆，一堆土豆是物品的集合；例(32)中的“这”指称说话人喝的水，水是无界的事物；例(33)中的“这”指称上文中的流氓犯罪，流氓犯罪是抽象的事物；例(34)中的“这”回指上文的“然后我就怀孕完了，生完了三个月就去接了个戏”，这是事件，有完整的施事、受事且动作行为已完成；例(35)中的“这”回指上文中的命题——“我记性不好”；例(36)中的“这”指称接吻这一动作。

此外，我们还可以把指示代词“这”与指称第三人称单数的人称代词“他”相对比，来观察“这”指称单数个体的能力，例如：

(37) a. 他是初中生。

b. ? 这是初中生。

c. 这是个初中生。

d. 这是今天早上打人的初中生。

(38) a. 他是武警战士。

b. ? 这是武警战士。

c. 这是一位武警战士。

d. 这是曾经救过我武警战士。

(39) a. 他是老师。

b. ? 这是老师。

c. 这是个老师。

① 在“是”字句中，“这”单独作主语可以指示个体事物，比如：这是我的书。因为“是”本身表示等同，谓语部分可为听话人确定所指对象提供足够信息，“这”是借助下文的力量指称个体化事物。

② 无界事物和有界事物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1. 无界事物内部是同质的；2. 无界事物内部是同质的，所以有伸缩性；3. 无界事物没有可重复性。

d.这是张老师。

如上面三组例子所示,在“是”字句中,如果“是”的宾语是光杆名词,“这”作主语指称单数个体远不如“他”自然^①。如果“这”在“是”字句中,作主语指称个体人,宾语要么是(一)量名结构,如例(37)c、(38)c、(39)c所示;要么是具有指称唯一性的名词性成分,如例(37)d、(38)d、(39)d所示。与光杆名词相比,无论是(一)量名结构还是有指称唯一性的名词成分,都具有很强的指称单数个体的能力。

在人类的认知模式中,有生命的事物的个体化程度比无生命的事物个体化程度高,我们在谈论人时,往往侧重每个个体。指示词“这”自身指称个体化事物的能力有限,那么,说话人在用“这”指称个体人时,就要借助句子其他部分所提供的信息来帮助听话人确认“这”所指对象的个体性。所以,当“这”指称人时,其所在的句子大多是“是”字句,且“是”字句的宾语部分一般是能够体现事物个体性的成分,也就是(一)量名结构或具有指称唯一性的名词性成分。当“是”的宾语是(一)量名结构时,“是”字句表示类属,“这”的指称对象是某个不确定有某种属性的人;当“是”的宾语有指称唯一性时,“是”字句表示等同,“这”与宾语指称同一个人,宾语指称确定的个体。

同理,谓语动词是自主动词的句子,其主语大多是施事,是有生命的事物,人们在谈论有生命的事物时,更注重事物的个体性,而“这”指称个体对象能力有限,所以,“这”很少在谓语是自主动词的句子中作主语。当然,我们也发现了少数的句子,“这”作主语而谓语是自主动词,在这些句子中,“这”所指称的事物一般是动作的受事,且一般是非个体化的事物。

其实,“这”作主语在篇章功能上的受限性也是源于“这”指称个体的能力有限。如上文所述,无论是“情境用”还是“示踪用”,“这”作主语都比作定语的数量少很多,“情境用”,“这”作主语和作定语的比例为1:3.05,而“示踪用”,“这”作主语和作定语的比例为1:8.29。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指称个体化事物的能力有限,“情境用”的“这”多指称交际现场中出现的非个体化事物,若指称个体化事物,一般是在“是”字句中作主语,在语法上受限;而“示踪用”指“这”在文中追踪已出现的实体,还往往是主

要实体,而主要实体大多是个体的事物,所以作主语的“这”在篇章中很少用于“示踪用”。然而,指示词用于“语篇用”时,回指的是上文中所说明的命题或陈述的事件而非个体化的事物,所以“这”单独作主语,用于“语篇用”较多,并且出于语言的经济原则,在表意清晰的情况下,人们往往选用更简单的词语,所以,当回指上文时,说话人更倾向于单独使用“这”,而非“这+(量)+名”结构。

结语

在现代汉语口语中,指示词“这”作主语的数量远比作定语的要少,据我们统计,两者的比例大约为1:3.47。通过观察两者在篇章功能中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发现:“这”作定语时有全部的篇章功能,而作主语的“这”没有自包含联想用和框架联想用这两种用法,此外,无论是情境用还是示踪用,都更倾向于使用“这+(量)+名”结构。而通过观察指示词“这”的句法分布情况,我们可以发现“这”作主语时,谓语多为非自主动词以及形容词,如果谓语中心语是自主动词,则“这”一般指称动作的受事,而“这+(量)+名”结构是没有这些限制的。可见,相较于作定语,“这”作主语是受限的,之所以受限主要是因为“这”没有词汇意义,且“这”指称个体对象的能力有限。

其实,指示词“这”作宾语受限的原因,与作主语受限的原因是一样的。在近21万字的语料中,我们只发现了3例“这”作宾语的情况。“这”作为指示词只有语用功能而没有词汇意义,这就导致听话人要依靠语境来判断“这”的所指对象,而作宾语时,下文中一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帮助听话人判断所指物,因而指示词“这”一般不作宾语。

参考文献:

- [1]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212-224.
- [2] 丁声树.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51-151.
- [3]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85.
- [4] 方梅. 单音指示词与双音指示词的功能差异——“这”与“这个”、“那”与“那个”[J]. 世界汉语教学, 2016(2): 147-155.
- [5] Himmelmann, Nikolaus P. *Demonstratives in narrative discourse: A taxonomy of universal uses*[M]//Barbara A. *Studies in*

^① 笔者调查了42名对象,其中有12名汉语语法研究人员,10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10名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拥有本科学历的人,10名中小學生。其中有31人认为在口语中不使用(43)b、(44)b、(45)b这类句子,有11人认为可以使用,但一般在对比的情况下使用。笔者据此认为这类句子在汉语口语中是不自然的。

- anaphor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6: 205-254.
- [6] Tao Hongyin. The grammar of demonstrative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al discourse: A case study[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9(27): 69-103.
- [7] Chen Ping. Identifiability and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J]. *Linguistics*, 2004(42): 1129-1184.
- [8] 马庆株. 自动词和非自动词[J]. *中国语言学报*, 1988(3): 157-180.
- [9] 石安石. 语义论[M]. 商务印书馆, 1993: 10-14.
- [10] 沈家焯. “有界”与“无界”[J]. *中国语文*, 1995(5): 367-380.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eictic Word “Zhe” as Subject and Its Reasons

MA Chao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chool,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at the deictic word “Zhe” can be used as an attributive and subject, but as an object it is restricted. This paper holds that “Zhe” is restricted not only as an object but also as a subject. Statistics show that when “Zhe” is used as a subject, its discourse function is restricted. In addition, its syntactic conditions are also restricted. In the sentence with “Zhe” as the subject, the predicate is mostly non-autonomous verb and adjective. If the central word of the predicate is an autonomous verb, “Zhe”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object of the action. The conditional restriction of “Zhe” as the subject can be attributed to two factors: firstly, its lack of lexical meaning when used as a descriptor; secondly, its relatively weak function as a descriptor for singular individuals.

Key words: the deictic word “Zhe”; subject; the discourse function; the syntactic conditions; reason for limited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超星域出版数据库、中教汇据(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中邮阅读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稿酬不再另行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德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辜鸿铭《论语》翻译的跨文化互释

史青玲

(德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在鸦片战争后西学东传的背景下,辜鸿铭坚持“东学西行”,向西方宣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辜鸿铭的“交互”文化背景和他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使他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采取“以西释中”的翻译策略来推介中国文化。其翻译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多维对话,沟通中西文化;概念拆解,凸显儒学思想的普世价值;文体套嵌,增强读者认知;意象比拟,消除读者陌生感。辜鸿铭使用“以西释中”方式对《论语》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丰富了原文本意义,找到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阐释和表达方式。其译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是中西两种文化、思想的对等和互补。

关键词:辜鸿铭;中国文化;《论语》翻译;以西释中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44-05

一、引言

一百八十多年前,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西文化交流基本呈“西学东传”的趋势下,辜鸿铭却逆流直上,坚持“东学西行”。他除了用英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还翻译了儒家“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和《大学》(因故未能出版)。他的英译作品《论语》和《中庸》在国外大受欢迎。据报道这两个译本在全球售出超过一百万册,“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1]346}。其译本成为近代西方汉学家和学者有关中国儒家文化与东方文明著述的重要参考书和征引对象,如卫礼贤的《孔子与儒教》和庄士敦的《儒教与近代中国》都曾参引,台湾后来出版的“四书”定本选辜译本为底本,林语堂的《孔子的智慧》中也选用了他的《中庸》译本,他的翻译还对托尔斯泰产生过影响。日本学人清水安三认为读辜译本比读以汉语写成的原著更易于理解和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2]18}亚马逊网站有读者留言,“我认为辜译本是最好的,即使是过了一百年。”辜鸿铭因此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享有“中国最大的儒学权威”“东方文明的代言人”等声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人正以“四个自信”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然而,近两个世纪前的问题仍摆在我们面前:中国文化如何

走出去?研究辜鸿铭其人及其儒经翻译活动对于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同时有益于进一步思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其现代化走向问题。

二、辜鸿铭“交互”文化的背景与高度的中国文化认同感

《论语》西传过程中,最早对其进行翻译的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如159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翻译的拉丁文《四书》,英国传教士马希曼于1809年推出英文节译本*The Works of Confucius*,1828年英国传教士柯大卫出版*The Four Books*,1861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推出其个人首次独立完成的《论语》。1898年面世的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是对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人第一次独立完整翻译的《论语》。《论语》译者群中,辜鸿铭的“交互”文化背景尤为显著。其西方文化背景源于他青少年时期的留学生涯。他游学欧洲14年,精通西方文化,能操9国语言,善用英语进行创作;同时,他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深切体会到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种种误解和曲解。回国后,他开始习学中国文化,研读四书五经、兼涉群籍二十余年,最终凭借其学识成为罗振玉口中的“醇儒”。他毕其一生用英文撰文阐述中国儒家思想并翻译儒家经典。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少有识之士学西方、办洋务,寻求强国之路。而辜鸿铭认为,西方人只有向

收稿日期:2023-03-23

基金项目:2021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人机交互的大学英语翻译人才培养研究”(202102062008)。

作者简介:史青玲(1971-),女,山东德州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中国人学习文化，才能走出困境，因为以儒家为根本的中国文化能够给西方文化提供道德基础。他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希望让西方人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纠正他们对中国的种种偏见。在他看来，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们翻译的儒家经典，歪曲了原典意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理雅各博士在其译作中所展示的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的装备，正如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必定会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31]他首先选择《论语》向西方推介，“在所有用中文写成的著作中，正是这本书给了中国人一般英国人可以理解的智识和道德的装备”“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有国际交往的态度。”^[32]

深厚的“交互”文化背景和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使辜鸿铭深谙中西文化之异同及中国文化价值之所在，也使他能够摆脱单一文化视角，用他者文化视角的翻译策略来推介中国文化。

三、辜鸿铭“以西释中”的《论语》翻译策略

“弱势文化国家中的文学作品要想打入强势文化国家之中，开始阶段译者往往采取相对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符合目的语的诗学规范，用一种比较流畅的、透明的译文赢得读者的认可，给人一种仿佛用目的语写作的感觉。”^[475]辜鸿铭面对的读者是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他有意识地以西方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国文化，“按照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32]采用“他者”视角阐释和表达中国文化，决定了文本翻译的阐释特征，也使得辜鸿铭区别于其他《论语》译者。

（一）多维对话，沟通中西文化

辜译本不同于其他译本的地方在于译者在正副文本使用注释，形成了多层面、多视角的跨时空的对话，这些丰富的对话把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译者与多位西方哲人或思想家、作家链接在同一个文本里，对译文本进行说明、补充和引申，以帮助读者加深对原文本的理解，彰显了原文本的思想性，同时展示了译者沟通中西方文化及展现双方文化差异的努力。

在正文本中，他尽量保持译介范式，但不拒绝主动显性介入。有时他会跳出来，作为向导边译边释，在文中或给读者交代对话发生的背景，或介绍对话中人物的身份、关系、性格等。副文本中的注释主

要以两种方式呈现：一是引用西方名家话语做注。辜鸿铭给《论语》英译本增加了一个副标题：*A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这种翻译方法充分显示出其翻译策略的独创性。在前言中他写到，“为了使读者能彻底到家地理解文本内容，我们还加了一些注释，引用了非常著名的欧洲作家的话。通过征召这些欧洲读者熟悉的思想系列，对于他们或许会有帮助。”^[32]他征召西方读者熟悉的歌德、伏尔泰、华兹华斯、席勒、卡莱尔等名家出来与译者对话。巴赫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对话，对话“是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53]。这种对话形成的中外互文释经方式使得原文本和译文本意义相互阐发、相互补充，能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原典。因此，他被林语堂称为“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说他的翻译“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注入了古代经典的光芒。”^[6109]秦洪武通过分析发现，“辜鸿铭译的《论语》让孔子等人物像受过教育的英国人那样讲话……引用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来注释，……这一结果可以部分解释辜译本为什么广受欢迎。”^[71590]二是对正文本的信息进行补充说明。有些注释是重要的文化负载词，在正文本中难以交代清楚，需要在副文本中做进一步解释。如，“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中的人名“伯夷”“叔齐”在正文本简单介绍后，又在文后附上关于二人的姓名、身份、事迹等详细介绍。还有些注释是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或对其译文本的再思考。如在副文本中，辜鸿铭表达了自己对“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这句话的理解：“这是道家、哲学家和真正的宗教人士之间的认知差异。”另外，副文本中多次出现阿查立爵士对某一章节的翻译和解释，目的是帮助读者多角度理解原文。

（二）概念拆解，凸显儒学思想的普世价值

中国古文精练简洁，用词玄妙晦涩。儒经中术语的翻译对每一位译者都是一大挑战。辜鸿铭认为，西方人要想理解中华民族的观念和概念，“首先要找到它们在欧语中的对应物。假如这些对应物不存在，便要分解它们，看看这些观念和概念可以归属于普遍人性的哪一面。”^[1126]尽管语言符号难以共享造成了跨文化传播中的障碍，但是人性是普遍的，语言是洞察人类天性的窗口。辜鸿铭透过这一窗口，汇通了中西文化，展示了儒学思想的普世价值。他的术语翻译得到了林语堂的肯定，“本质上是正确的，有些甚至是聪

明绝妙的。”^[8]当代学者郝大维、安乐哲也有类似表述,“在比较哲学研究中,我们只能借助我们自己传统中的范畴和语言来说明其他文化传统。这些范畴和语言,应该是能够依靠某些基本的相似性而加以重新塑造、扩展以涵容新思想的。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孔子的思想只有诉诸西方自身文化经验的种种相似结构才会获得理解。”^[9]^[25]我们从辜鸿铭对于“礼”的翻译可略窥一斑,如下例: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

Confucius remarked, “He can rule a country by real courtesy and good manners that are in him, will find no difficulty in doing it. But a ruler who has no real courtesy and good manners in him, what are the mere rules of etiquette and formality avail him?”^[3]^[80]

“礼”是儒学中的基本概念之一,一般认为“礼”最初是统治者想与神灵建立和保持某种关系而制定的一种形式化程序,后衍生为社会礼仪、社会规范、习俗等,涵盖了越来越多复杂的关系、制度和惯例。“礼”之繁复,往往令西方人感到莫名其妙、难以理解。辜鸿铭曾说过,外在礼节中的打恭与作揖,他们就认为是繁文缛节,小题大作。其复杂形式之下内涵的不同也许只有置身其中的中国人才能体会到个中滋味。理雅各把它译为the rules of propriety,刘殿爵译为rites,安乐哲译为rituals,基本达其大意。比较而言,辜译更能显出这些礼仪之下的“东西”,黄兴涛称之为“礼意”。原文有三个“礼”字,前两个和“让”组成词组“礼让”,辜鸿铭把它们合译为courtesy and good manners,译出了“礼”的人本意义,及富含的人情味儿。“礼者,敬也”中的“礼”被巧妙地拆译为rules of etiquette和formality两个词组,意指礼仪形式化、冷冰冰非人性化的一面。

另外,他把“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中的“礼”译为art,并做了注解。art在英语中一般有几个意思:工艺品;工艺制作;(相对于自然的)人工制造的;(相对于自然原理的)工艺原理或制作原理;严格的艺术理论,本质、根源。辜鸿铭认为art的最后一个语义可以对应“礼”的“非天然、有创造性、美好”之意,凸显了“礼”是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文化,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人的人性之中,成为个人修养的必备工具,君子行为意义的典范。黄兴涛认为,“辜式对‘礼’的理解的确比较深入,他所揭示的‘礼’的那层人文的、脱

离了质简野蛮阶段的抽象而微妙的礼意,正是孔子和先秦儒家不断标榜的东西。”^[10]^[283]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充分显示出辜鸿铭对于中国文化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和高度认同感。

在不同的语境中,辜鸿铭还把“礼”译为correct forms, honors, honor, rite, the principle of rite, the fine arts, rituals, art and civilization, judgement,甚至根据上下文,把“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灵活地译为If you say Guan Chung was a man of taste, who is not a man of taste?他从来都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其意义与表达方式之间做到了愉快配合,因此,他的翻译被林语堂称为“天启”。^[6]^[109]

对于《论语》中出现的儒家学说的其他重要概念,辜鸿铭都是根据语境灵活翻译,突出《论语》是一本“给予了中国人智识和道德装备的书”^[31]。如,君子a wise and good man, a wise man, a gentleman;仁 a moral life, a moral character, men of moral character;道 order and justice, wisdom, principles;孝 duty of a good son, be dutiful to one's parents等。

(三) 文体套嵌, 增强读者认知

辜鸿铭认为翻译时内容很重要,同时承载内容的文体也很重要。因此,作为译者,要彻底了解原文意义,以对等原则译出原文文字,同时也要再现原文的风格。^[11]^[507]这一观点,和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不谋而合。比较起来,儒学和孔子的《论语》有些像西方基督教的《圣经》。辜鸿铭说,“通过《圣经》中人事的类比进行了解孔子思想,非常形象并易于被接受,反而会使人认识到孔子思想更富有人情味,更容易使人升华到高尚、纯粹的社会的人,而不是基督之所谓神。”^[11]^[507]因此,辜译本中随处可见《圣经》语言。其典型词汇、句式给译文读者造成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既展示了《论语》深邃的哲理、文学上的价值,又展示了《论语》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下面的例子显示出他在文体的移植方面做出的努力: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

The Emperor T'ang, when he ascended the Imperial throne, thus offered up his prayer to God: “I, Li, who am one of thy children, do here take upon me to offer up to thee in sacrifice this black heifer, and to

announce to Thee, O supreme and sovereign God, that sinners I shall not dare to pardon; and, in the choice of thy servants, I prayed Thee, O God, that thou wilt let me know thy will and pleasure. If I do sin against Thee, let not the people suffer for my sin. But if the people shall sin against Thee, let me alone bear the penalty of their iniquities.”^{[3]428}

孔子虽“述而不作”，但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物”“兴灭继绝”“全面复礼”，孔子希望恢复远古礼制，强调爱护人民，要求责任和错误由首领来承担。原文庄重典雅、古意盎然，辜氏译文从意义到表达方式均凸显了原文的这一特征，如thy, thee, thou, wilt等词属于中古英语，否定副词not用在否定的动词之前，常见于诗歌与《圣经》中，是古英语的一种用法；句子结构层次清晰，复合句式使表达凝重得体；文中频频出现的God, O supreme and sovereign God, O God, prayer, sacrifice, servant, pray, penalty, sin, sinner等词，形成了《圣经》的语义场，提示西方读者，《论语》作为中国的经典，在中国人心中神圣之犹如《圣经》。

值得注意的是原文的“玄牡”（用在祭祀中的黑色公牛），在译文中变成黑色小母牛（heifer）。red heifer（红色小母牛）是《圣经》中多次出现用来祭祀的。“儒学思想在海外没有与中华文明相同的生存土壤，译本接受状况与译文质量有关，但决定因素是读者的接受意愿。”^{[7]593}辜鸿铭改变意象颜色是基于他对基督教文化下读者的了解。

（四）意象比拟，消除读者陌生感

对于《论语》中的专有人名、地名、文化负载词，辜鸿铭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比拟的方式，换成西方读者熟知的意象。比拟是经典作品跨文化交流中，常常使用的一种变通手法，目的是帮助减少目的语读者因缺乏背景知识而造成的阅读障碍。最经典的例子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比拟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例如：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Only once in his old age Confucius was heard to say: “How my mental powers have decayed! For a long time now I have not dreamed, as I was wont to do, of our Lord of Chou.”

[The Moses or Solon of Chinese history: The Founder also of Confucius' native State, Lu (the

England of Ancient China); a man who combined the piety of Saint Augustine and the statesmanship of King Alfred of England]^{[3]139-140}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如何向西方读者介绍这样一名功绩卓著的历史人物？辜鸿铭把周公用摩西（《圣经》人物）、梭伦（古希腊政治家、改革家）来比拟，并说周公还集圣·奥古斯丁（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的虔诚和阿尔弗雷德大帝（英格兰国王，英国唯一获得大帝称号的国王）的政治才能于一身。这4人在西方世界可谓家喻户晓。同时，译者把鲁国比作英国“七国时代”的英格兰，意指鲁国是中国的文明发源地。

在书中，他还把颜回比作传播孔子思想的传教士圣约翰，把管仲比作俾斯麦，把夏朝比作古希腊，杞国比作当代希腊，殷朝比作古罗马等等，尽管这种类比的适切性还有待商榷，但这却是最简单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的方式，实现了“功能对等”。

另外一种方式是回避掉一些专有名称。“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英国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只要可行，我们都尽量去掉所有那些中国的专有名称。”^{[3]2}如在《论语》中，对于孔子的弟子除颜回和仲由外，他都直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对有的专门列举历史人物的章节，他仅用一个文中注释了事。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孔子，突出其思想性。

四、结语

辜鸿铭在特殊的历史文化情景下，选择“以西释中”的翻译策略传播中国文化。他对《论语》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丰富了原文本的意义，找到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阐释和表达方式。他并不是为了迎合西方口味，贩卖、兜售中国文化，反之，其译文呈现给读者的是中西两种文化、思想的对等和互补。“自我”的认识基于“他者”的阐述，辜鸿铭采用“他者”视角，阐释和表达中国文化，正是他认同中国文化的表现。辜鸿铭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大框架里，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文化独特而深刻的理解。“他积极帮助西人理解经文的同时，内心深处更寻求西人对儒家经典价值的认识，及其对儒家道德文明的认同。”^{[11]63}

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转换、信息的交流。翻译要展示文化的

多样性, 同时还要促进文化对话与和解, 构建新的文化。因此需要译者对两种语言、文化有全面、整体的研究, 能创造性地根据不同的翻译对象应用各种翻译策略进行信息的传递。辜鸿铭在英译《论语》中创造性地使用这种文化阐释的方法, 彰显了儒家文化的精髓、中华文明的价值, 重构了中国文化身份,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了贡献。在当今我国正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时期, 其翻译策略对更好地推动中国典籍走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 通过软实力“自塑”形象, 提高文化自信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黄兴涛, 等. 辜鸿铭文集[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6.
- [2] 孔庆茂. 辜鸿铭评传[M]. 南昌: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6.
- [3] 李泽厚. 论语今读[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 [4] 冯全功. 葛浩文翻译策略的历时演变研究 —— 基于莫言小说中意象话语的英译分析[J]. 外国语, 2017 (6), 69-75.
- [5] 董小英. 再登巴比伦塔[M].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95.
- [6] 林语堂. 我这一生——林语堂口述自传[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 [7] 秦洪武, 孔蕾, 徐欣. 《论语》英语多译本受纳状况多维数据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 (4): 580-594.
- [8] 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Confuciu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9.
- [9] 郝大维, 安乐哲, 著. 何金俐, 译. 透过孔子而思[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 [10] 黄兴涛. 文化史的视野[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
- [11] 谭晓丽. 会通中西的文化阐释 —— 以安乐哲、罗思文英译《论语》为例[J]. 上海翻译, 2012 (1): 61-65.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Gu Hongming's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SHI Qing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western learning spread to the East. In the background, Gu Hongming insisted on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and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with Confucianism to the West. Gu's "interactiv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his high sense of identity to Chinese culture make him adop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western-culture-oriented interpretation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It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applica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dialogue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d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s to highlight the universal value of Confucianism; the biblical style adopted to enhance readers' cognition; image comparison to eliminate the strangeness of readers. This paper holds that Gu reinterprets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enriches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finds the way of interpretation and expre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West. His translation presents to readers the equivalence and complementar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oughts.

Key words: Gu Hongming; Chinese culture; translation of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western-culture-oriented translation

儿童幻想小说中戏仿诗歌翻译的美学阐释

——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

王 焕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之经典不仅体现于奇幻冒险的故事,更体现于对经典诗歌戏仿所呈现出的文字游戏精神与气质,在翻译传播中,如果只局限在文本层面的对应,而忽视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与喜爱,就会影响作品的传播。从接受美学视角出发,通过贝叶斯统计与问卷调查,并结合第三方语言德语译本研究发现:译者既是源语信息的读者又是二度创作者,可以根据翻译目的进行更为自由地发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充分理解源文中的文字游戏精神和气质,同时根据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与喜爱,以实现对接源文的创造性翻译。如果脱离戏仿原型时代背景,把戏仿诗歌当作普通诗歌翻译,读者就无法产生共鸣,因而难以体会作品颠三倒四的荒诞之美。译者翻译中应考虑儿童读者的心理特殊性,以儿童读者理解接受为目标,实现风格的等效建构。

关键词: 儿童戏仿诗歌; 接受美学; 视域融合; 贝叶斯统计; 儿童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49-06

一、引言

戏仿必有原型,且原型多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作品,符合当时读者的审美期待,然时过境迁,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变化,在儿童文学的翻译中,如果忽视当下读者的审美期待,忽视作品与当下读者的视域融合,就难以传递源作荒诞之美的内涵,导致翻译作品的枯燥、僵化,从而失去作品原本的生机和趣味,降低儿童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中国有近3亿儿童读者,但市场上的儿童文学译本质量令人担忧。^[1]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风靡中国已有百年历史,自1921年6月1日至今,中文译本至少有179个^[2],相关书籍更是层出不穷,究其语言魅力大半来自对当时经典作品的滑稽“戏仿”,尤其是从经典诗歌戏仿而来的胡话诗,更是荒谬绝伦,令人忍俊不禁,然而这一作品的译本尽管琳琅满目,问题亦层出不穷。长期以来,学界对戏仿作品翻译的研究多集中在诗歌的节奏、韵律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化转向以来,以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审视了翻译评论、文集选编、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及体制等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2],

开始重视文化与翻译的互动,为译界做出重大贡献。本文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探究接受美学视角下儿童幻想小说中戏仿诗歌的翻译。

二、接受美学理论及对翻译的启示

1967年,德国学者姚斯发表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被公认为接受美学诞生的宣言,其核心成果还包括伊瑟尔的《文本的召唤结构》。^[3]接受美学聚焦于“读者与文本”,其核心观点是以读者为中心,强调文本具有不确定性,其娱乐和教育功能要在读者阅读的具体化过程中实现,而实现过程即是作品被赋予生命并最终完成的过程。^[4]接受美学理论的核心主张是“走向读者”,重视读者与文本的反应,读者成为文学作品闭环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接受美学视域下译者既是源文的读者与信息接收者,还是目的语的作者与传递者。作为主体性译者,他要兼顾译文读者需求对接源文信息进行二度创作。也就是说,读者的接受成为翻译活动的出发点与旨归点,作品只是一系列的文本符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读者的审美需求与期待视野,调动读者的主体能动性,根据翻译目的、时代背景、读者层次等对接源文作品进行补充与再建构,实现源文风格

收稿日期:2023-02-26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新冠疫情下翻译与国家形象建构”(22YCX066)。

作者简介:王焕(1987-),女,山东菏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与国际传播,智能翻译工具与技术方面的研究。

再造,以更好地为目的语读者理解与接受,从而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接受美学视域下译者的角色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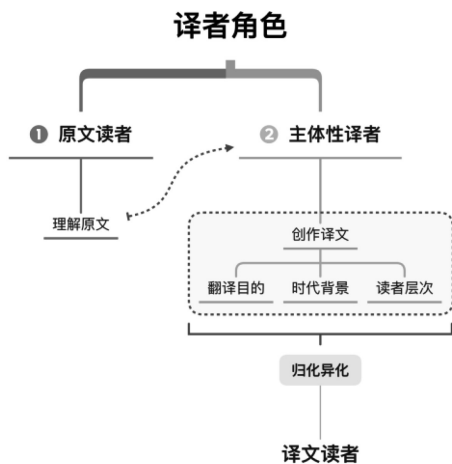


图1 接受美学理论下译者双重角色模型

忽视文本外因素,仅仅关注原文与译文而导致作品传播受挫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伊文·金翻译老舍的《骆驼祥子》时将末尾删减,把悲剧改为欢喜大结局,在美国大卖,翻译《离婚》时伊文·金故伎重演,不仅修改了原作的结尾,还在许多重要方面偏离了原著,引起老舍的不满,此后老舍找华人郭敬秋翻译,郭坚持忠实直译,但译本却并不被美国读者接受,导致其销路不佳。^①另外,大中华丛书,熊猫丛书系列海外“销售率非常低”^[5],而葛浩文译莫言小说,删减改动时有发生,不仅其译作获得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认可,亦给翻译界带来强烈震撼。^[6]从接受美学视角来看,这正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事实上,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翻译标准的多元性,对于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读者层次,应该使用不同的翻译标准,译者在翻译时也需要照顾到读者对象的接受能力和审美习惯,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段,以期达到译文在审美和接受效果方面与原文相近或是更胜一筹。本文以儿童文学中戏仿修辞的翻译为例予以说明。

三、文本外因素与翻译中视域融合的实现

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是阐释学的重要概念,由伽达默尔提出。伽达默尔认为艺术作品只有在被表现、被理解、被阐释的时候,才具有意义,其意义才得以实现。换言之,如果没有理解与阐释,艺术作品就不存在真理与价值。就翻译而言,译者对源语言的前理解有重大意义,它提供了阐释视域,译者翻译正是在理解与阐释中扩大视域,并实现视域融合。^[4]

在翻译视域融合中,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人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这都离不开文本外因素。

(一) 翻译目的:自由归化的德语译本

接受美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体现在译者的主体性上,它赋予译者更大的自由,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目的进行更灵活地发挥。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卡罗尔创作之初就旨在打破道德说教的枷锁,为儿童创造充满奇妙幻想的荒诞乐园,与儿童分享开心与快乐^[7],即趣味性恰是作者创作之初心,趣味性的呈现也应是翻译目的之所在。译者需在翻译中运用风趣幽默的笔调、富于儿童特色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将儿童生活、儿童心理的各种特点描写出来,使译作与儿童读者期待视野交融。第七章戏仿诗歌《小蝙蝠》的原文与德语翻译如下:

Twinkle, twinkle, little bat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at
Up above the world you fly
Like a tea-tray in the sky^[8]

O Papagei, o Papagei!
Wie grün sind deine Federn!
Du gr ü nst nicht nur zur Friedenszeit,
Auch wenn es Teller und Töpfe schneit.^[9]

融合本国特色的德国译本,完全抛开了源文字面意思的束缚,把“小蝙蝠”(little bat)译成“小鸚鵡”(Papagei),整首诗歌的字面意思为“哦小鸚鵡 哦小鸚鵡,羽毛颜色多么绿!不仅为了和平绿,天上下盘子和瓦罐时也绿”,译文和原文似乎已并无任何关联。德语译文采用了自由归化的翻译策略,归化即要求翻译以透明、流畅和隐形的方式进行,把译文的异质性成分减到最少。^[10]而“戏仿就是为了滑稽嘲弄而故意仿拟特种既成形式的修辞方法”^[11],以此为翻译目的,德译本从首句“Papagei Papagei”朗朗上口的叠音,到句尾押韵“Friedenszeit”“schneit”所体现出的游戏精神与气质与儿童读者期待形成视野交融,从而实现原文风格再造。而这种完全脱离源语字面意思的译法,在德译本中可谓俯拾即是,比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第二章的戏仿诗歌《小鳄鱼》,摇身一变成了《小蜜蜂》:

How cheerfully he seems to grin,
How neatly spread his claws,

①腾讯文化<https://cul.qq.com/a/20130813/004007.htm>

And welcome little fishes in
With gently smiling jaws!

Es war der grimme Zottelbär,
Bei dem ich eingekehret;
Mit süßem Honigseim hat er
Sich selber wohl genähret!

德译本的字面意思为“有一只愤怒的毛毛熊，我被它包围住了；它享用甜蜜的蜂窝，健康又营养”。译语与源语《小鳄鱼》的内容可谓天壤之别。对于这种脱离字面意思束缚的做法，作者卡罗尔给予充分的赞扬和肯定，与法语译本相比较，卡罗尔表示更偏爱德语译本。^[12]究其缘由，作者创作爱丽丝的目的正在于梦幻与趣味性，德语译本语码转译处处可见，但对于戏仿诗歌中的修辞与幽默风格的再造却符合源文作者的创作意图，并贴近儿童读者的文化语境和阅读习惯，易于为儿童读者所接受。译文在译文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和源文在源文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实现动态对等，如果译文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戏仿诗歌的字面意思则可位居其次。因此，在接受美学理论指导下，译者以翻译目的为导向，通过发挥想象力，去填补空白，“重构”译文趣味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在我们目前收集到的46个中文译本中，还未曾见到这样的翻译。

（二）时代背景：需要解释的戏仿原型

翻译中，除了趣味性目的的实现，儿童戏仿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亦不容忽视。1866年当《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准备外译成德语和法语时，作者卡罗尔十分担心地指出，“如果不了解戏仿诗歌的创作背景，戏仿内容就会变得晦涩难以理解”^[13]。在横向文化背景与纵向历史背景的坐标中，作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戏仿创作之初正是以当时的文化传统与读者的审美心理为重要依据，而时过境迁，尤其当该书被外译成170多种语言时，读者又能否体会译文所蕴涵的时代背景信息？请看该书第六章公爵夫人对孩子的一段歌唱源文及其中文翻译：

Speak roughly to your little boy,
And beat him when he sneezes:
He only does it to annoy,
Because he knows it teases.^[8]

对小孩说话要粗暴，
一打喷嚏就揍他；
打喷嚏就为惹你恼，
捉弄别人来这套。^[14]

首句“对小孩说话要粗暴”趣味性何在？若不考虑戏仿创作的时代背景，译文中的公爵夫人似乎只会打打杀杀、脾气暴躁，读者心中难免疑惑。研究发现，原来这首诗歌仿自当时权威机构颁发的《请轻声说话》（*Speak Gently*）^①：

Speak gently! It is better far
To rule by love than fear;
Speak gently; let no harsh words mar
The good we might do here!

戏仿原型《请轻声说话》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作品，社会主流意识宣传：对孩子“请轻声说话”，众人皆知：对孩子“请轻声说话”，因此，卡罗尔时代的读者读到“对小孩说话要粗暴”时，先入为主的心理预期扑空，从而产生既熟悉又陌生化的感觉，激起大脑中对戏仿原型也就是“本体”的联想记忆，“本体”与“仿体”之间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反差，读者在惊愕之余，亦是会心一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9首戏仿诗歌皆有其对应的戏仿原型：《小鳄鱼》（*How doth the Little Crocodile*）仿自《勿懒惰淘气》（*Against Idleness and Mischief*, Isaac Watts, 1715），《威廉爸爸》（*Father William*）仿自《老人之乐，乐从何来》（*The Old Man's Comforts and How He Gained Them*, Robert Southey, 1887），《对小孩说话就得骂》（*Speak Roughly to Your Little Boy*）仿自《请轻声说话》（*Speak Gently*, G. W. Langford, 1848），《一闪一闪小蝙蝠》（*Twinkle, Twinkle, Little Bat!*）仿自《一闪一闪小星星》（*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Jane Taylor's, 1805），《龙虾方阵舞》（*The Lobster Quadrille*）仿自《蜘蛛和苍蝇》（*The Spider and the Fly*, Mary Howitt, 1829），《这是懒汉在说话》（*The Voice of the Turtle*）仿自《懒汉之歌》（*The Sluggard*, Isaac Watt, 1715），《美味好汤》（*Beautiful Soup*）仿自《美丽的星星》（*Beautiful Star*, James Sayles, 1859），《红心王后》（*The Queen of Hearts*）仿自《鹅妈妈童谣》（*Mother Goose*, *The European Magazine*, 1782），《白兔证词》（*The White Rabbit's*

① 作者存在一定争议，权威机构称作者为乔治·华盛顿·兰福德（George Washington Langford），而1845年7月15日《费城询问报》第二页中出现了这首诗作者，却另有其人。

Evidence) 仿自《她是我的梦中情人》(She's All My Fancy Painted Him, Carroll, 1855)。然而在作品对外翻译之后,读者对戏仿原型的识别度如何?戏仿原型与作品趣味关联度如何?为此,我们随机从北京当地中小学抽取了4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过程:9首戏仿诗歌能识别出仿自哪首诗歌画对号,不能识别画叉号。在不了解戏仿原型的前提下让参与者对诗歌趣味性从零星级到五星级进行星级评定,然后告知参与者戏仿原型,并对趣味性再一次进行星级评定。

调查结果:根据36份有效问卷,发现戏仿原型识别度方面,30名学生不经任何提示即可以识别出第四首《一闪一闪小蝙蝠》的创作原型,6名学生在略微提示下能识别,另外8首戏仿诗歌无人能识别其原型。趣味性等级方面,在不熟悉戏仿原型的情况下,9首戏仿诗歌译本的平均趣味指数为2.4个星级,在了解戏仿原型之后,平均趣味指数为3.9个星级。

鉴于参与人数有限,结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从初步调查结果可见,读者已无法识别绝大多数的戏仿原型,而在了解原型之后,读者的趣味性评定增长了1.5个星级,由此可见,了解戏仿原型对提升阅读趣味性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而现实中,戏仿原型脱离当下背景,已被世人所遗忘,那些被记起的也恰恰是因为卡罗尔开了这些诗歌的玩笑,而“玩笑背后都是有笑点的,若不了解笑点,玩笑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而笑点有时则需要进一步解释”^[15],因此,要实现翻译的视域融合,利用注释、序言、附记等副文本信息进行补偿与解释,才能更好地唤起读者的联想记忆。

(三) 读者层次:需要谨慎的异化翻译

儿童戏仿诗歌的接受主体首先是儿童,“儿童的心理个性与成人差别甚远,这是一种性质上的差异,而不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16]儿童的认知水平处于初级阶段,他们通常喜欢阅读语言浅显、节奏明快、形象生动的书籍。伊瑟尔的文本的召唤结构(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认为文学作品只是一个文本,是一个意向性客体,同时文本又是一个多层次的“图式化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存在着许多的空白和不确定领域,而读者正潜藏在文本中。如果文本达不到读者的审美期待,就会与潜藏读者背道而驰,无法获得读者接受与喜爱。因此,在翻译中成人译者应充分考虑儿童读者的语体特征与心理特殊性,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第10章《美丽的汤》(Beautiful Soup):

Soup of the evening, beautiful Soup!

Beau-ootiful Soo-oop!^[18]
(Lewis Carroll, 1865)

赵元任译为:

半夜起来喝面汤,体面汤!
涕洟糜糜汤!^[17]

马爱农译为:

晚间的汤,美丽的汤
美一丽的一汤!^[18]

对于“Beau-ootiful Soo-oop”的翻译,赵元任译本把“体面汤”(tǐ miàn tāng)的读音延长“tǐ yí mí yàn tāng”,于是有了“涕洟糜糜汤!(tǐ yí mí yàn tāng)”,可谓匠心独运,然而“儿童文学是以浅语打底的,浅语即简易的语言,是儿童自己使用和熟悉的语言,从而区别于成人类文学作品”^{[11][19]}。因此,对于儿童读者而言,“涕洟糜糜汤”的表达显得过于古奥、艰涩。马爱农译本则保留了源语的连字符,译为“美一丽的一汤!”用语浅显,相对而言,则更符合儿童读者语体特征与阅读心理。

韵律之美亦是浅语的一大特点,儿童诗歌重在出声朗读,诗歌韵律琅琅上口,便于记忆与传播,如戏仿诗歌《小鳄鱼》:

How doth the little crocodile
Improve his shining tail,
And pour the waters of the Nile
On every golden scale!^[18]

马爱农译为:

小小的鳄鱼真机灵,
尾巴擦得亮晶晶,
尼罗河水哗哗流,
在鱼鳞片上闪金星!^[18]

何文安译为:

小鳄鱼啊小鳄鱼
尾巴闪亮怎么刷新,
他把尼罗河的水
倒在每片金甲上!^[14]

戏仿诗句“crocodile Nile”“tail scale”隔行押韵,马爱农译本“灵”“晶”“星”三处尾韵体现了儿童诗歌的音乐性与节奏感。何文安译本采用了忠实源文的异化翻译的策略,异化是选择一个外语文本,并采用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所排斥的翻译方法。^[20]何文

安译本异化的翻译导致了尾韵的丧失，音律上显得梗塞，可读性相对较差，不符合儿童读者的审美期待。而诗歌翻译中的合辙押韵是实现风格再造的必要元素，异化翻译需格外谨慎。本文研究选取6个不同时期《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译本，和源文的总押韵数分别进行了统计，请见表1：

表1 源文与6个不同时期译本总押韵数

不同文本	源文	冷杉译	德国译	赵元任译	马爱农译	王勇译	何文安译
韵脚数目	152	150	141	133	106	62	58

总体而言，韵律风格再造较高的赵元任等译本在读者中更为流行，韵律风格再造较低的译本可读性相对较差，流传度也不如前者。韵律之美可谓诗歌翻译的灵魂，但丁在《飨宴》里甚至提出“诗是不可译的，正因为诗是音乐”^[21]，可见诗歌对韵律之美的重要。儿童戏仿诗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与儿童读者审美视域相融合，易于为儿童读者接受与喜爱。而要实现韵律之美，就需要在归化与异化间进行取舍，换言之，就是需要在诗歌韵律与字面意思之间进行取舍，这种取舍的比例如何？本文以最新出版的2020年马爱农译本、在中国最早发行的1921年赵元任译本和第三方语言德语译本为例予以统计分析。

第一步，主观设定译者行为的“先验概率”。在贝叶斯统计学中，“某种类别的概率（比例）”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先验概率”^[22]。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押韵的实现是“按字面意思翻译”还是“未按字面意思翻译”，因此暂且把这两种概率视为相等，即两种情况的先验概率分别设为0.5和0.5，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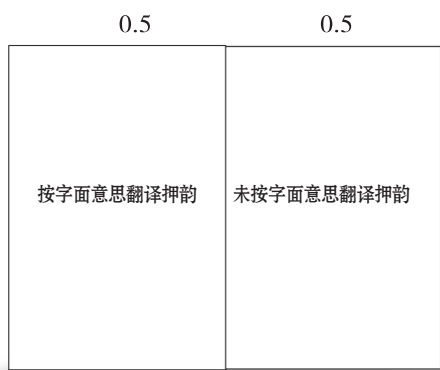


图2 理由不充分的先验分布

图2显示的是，译者在翻译之前，选择“按字面意思翻译”和“未按字面意思翻译”的可能性，哲学上称为“可能世界”^[22]。两个世界译者会做何选择？答案在译者心中无法断定，只能借助译文呈现出的翻译痕迹进行推测。

第二步，通过译文数据，设定“条件概率”。

针对能够观察到的不同译本获得统计性数据，设定不同类别的条件概率。卡罗尔源书196句诗歌，152处押韵，押韵概率78%。马爱农译本“按字面意思翻译”169句诗歌，96句押韵，73句不押韵；“未按字面意思翻译”27句诗歌，10句押韵，17句不押韵。概率见表2：

表2 马爱农译本的条件概率

类别	押韵	不押韵
按字面意思翻译	0.57	0.43
未按字面意思翻译	0.37	0.63

第三步，根据获得的行为信息，排除不可能存在的可能性。表中概率指某一特定类别下，各种行为的概率，是在了解“按字面意思翻译押韵”或“未按字面意思翻译押韵”数目情况下的概率。图3两个互不相同的世界，可以再各自细分为两个世界，如图3中各区域所表示的概率，也就是该区域的面积可以通过乘法求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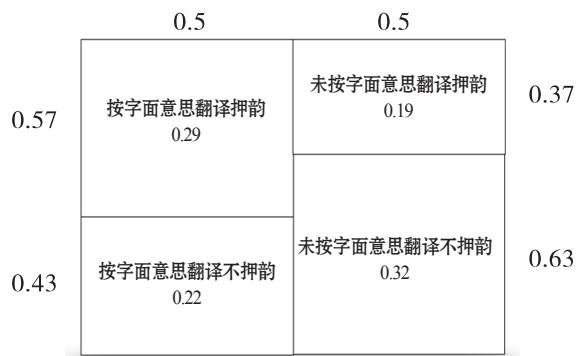


图3 四种互不相同的可能性概率

如果译者“按字面意思翻译押韵”，那么“未按字面意思翻译押韵”的情况就排除在外了，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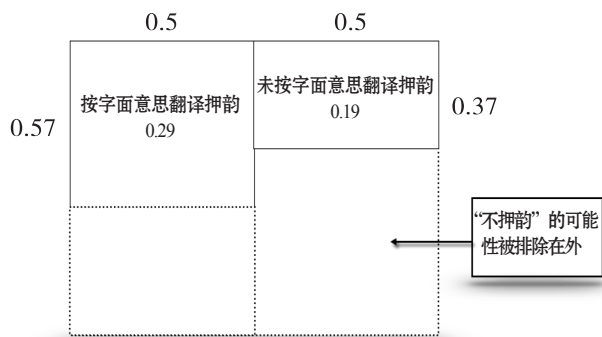


图4 信息限定了可能性

译者行为结果的可能性从4种减少到两种，在维持比例关系的前提下，以“相加之和为1”为目标来改变数值，恢复标准化条件。

左边长方形的面积: 右边长方形的面积= 0.29:0.19
= 29:19

因此, 把两边的比例分割成29+19=48, 由此得出,
左边长方形的面积: 右边长方形的面积=29:19=29/48:19/48

表3 三个译本按字面意思翻译的概率与
未按字面意思翻译的概率

	马爱农译本	赵元任译本	德国译本
按字面意思翻译的概率	60%	44%	49%
未按字面意思翻译的概率	40%	56%	51%

由此可见, 为了实现韵律风格再造, 译者不按字面意思翻译的概率接近50%, 也就是说, 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接受, 在追求整体韵律风格相似性的翻译过程中, 有一半的诗句脱离了源文字面意思的束缚。儿童戏仿诗歌琅琅上口、韵味十足, 这就要求译文也要尽量使用接近原生态的儿童浅语, 自由采用与源文风格最为契合归化的译法, 才更有利于传达源文精神内涵, 或许可为当下译者带来些许启发。

四、结语

进了兔子洞的爱丽丝发现, “这里, 所有人都疯了。”^[8]究其缘由, 作品中打破经典束缚的戏仿诗歌对这种疯狂效果的构建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作为儿童幻想文学的经典之作,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每一首荒诞的诗歌都有其戏仿原型。翻译中, 儿童文学译者不仅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信息的调解者, 同时也是源语价值观的传播者。^[23]译者翻译的不是孤立的字面含义, 而是整个语言和文化背景信息。^[24]接受美学理论下的儿童戏仿诗歌翻译以翻译目的、时代背景、读者层次为考量并“走向读者”, 从而打破了传统翻译与传播“两张皮”的困境。在翻译中译者既是读者又是主体性译者, 对作品意义的填充是能动性的, 译者可以采用归化的方法对译文进行更为自由的“建构”与信息补偿, 让儿童戏仿诗歌在译语环境中重新历经一场新的语言冒险, 与儿童读者审美视域相融合。儿童是最美的, 他们自然而开心, 呈现着生活的美好^[25], 为儿童而译, 为儿童读者所接受与喜爱, 正是译者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徐德荣. 儿童本位的翻译研究与文学批评[M].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7: 15-265.
- [2]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427.
- [3] 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3-317.

- [4] H·R·姚斯.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周宁, 金元浦,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5] 王燕, 李正栓. 《大中华文库》科技典籍英译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J]. 上海翻译, 2020(5): 53-57.
- [6] 陈嘉琨. 翻译家个案研究的普遍意义——《葛浩文翻译研究》评析[J]. 山东外语教学, 2020, 41(6): 129-133.
- [7] Woolf J. *The Mystery of Lewis Carroll*[M]. New York: St. Martin's Publishing Group, 2010: 129.
- [8] Carroll 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M]. London: A Public Domain Book, 1865.
- [9] Hartknoch J F. *Alice's Abenteuer im Wunderland*[M]. Leipzig: Autorisierte Ausgabe, 1869: 63-88.
- [10] Mo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M].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Francis Group, 2016: 226.
- [11]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59-66.
- [12] Collingwood S 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ewis Carroll (Rev. C. L. Dodgson)*[M].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2009: 54.
- [13] Douglas-Fairhurst R. *The Story of Alice*[M]. London: Harvill Secker, 2015: 159-182.
- [14] 刘易斯·卡罗尔.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M]. 何文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
- [15] Tenniel J, Gardner M, Carroll L. *The Annotated Alice*[M]. New York, London: W·W·Norton&Company, 1999: 11.
- [16] 蒙台梭利. 童年的秘密[M]. 金晶, 孔伟, 译. 北京: 北京发展出版社, 2011.
- [17] 刘易斯·卡罗尔.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M]. 赵元任,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
- [18] 刘易斯·卡罗尔.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M]. 马爱农,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 [19] 王焕, 张德玉. 从刘士聪先生“韵味”说意境与氛围的角度看现代散文英译[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5, 32(4): 138-139.
- [20] 劳伦斯·韦努蒂. 译者的隐形: 翻译史论[M]. 张景华, 白立平, 蒋晓华,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21] 但丁. 神曲[M]. 田德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 [22] 小島寬之. 统计学关我什么事[M]. 罗梦迪, 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9.
- [23] Lathey G. *The Role of Translators in Children's* [M].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10: 196.
- [24] Oittinen R.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3.
- [25] 黑格尔. 美学[M]. 朱光潜,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清代黄运引河刍议

郑民德¹, 田昭煜²

(1.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2.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 引河是清代黄运两河治理中的重要工程措施之一, 主要分为裁弯取直引河、控水导流引河、减水分溜引河等。与其他河道工程相比, 引河控水化险能力强, 解决问题较为彻底, 但同时也具有技术难度高、工程量大、后期维护成本高等缺陷。

关键词: 清代; 引河; 黄河; 运河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55-05

引言

引河是中国古代河道治理中重要的河工举措之一, 在保障河道安澜、航运通畅、农田灌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六部成语词典》给引河下的定义是“引江、河、湖水向别处流注的河”^[1]。明代治河名臣潘季驯在《河防一览》中提出“欲为万全之计, 不可无永赖之图, 议者欲于河北王家营开河一道, 引河北徙, 意非不善”^[2]的治河构想。“引河”作为一个河工名词直到清代才出现。

目前学界对引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王申的《清代钱塘江中小壩引河工程始末——兼及防潮方略之变迁》^[3], 该文是目前学界少有的讨论引河工程的专题论文; 李西萌的《乾隆四十六年黄河青龙岗决口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4]和李智萍的《屡筑屡蛰: 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的祥符、仪封大工》^[5]也有部分章节涉及到黄河引河工程。除此之外, 尚无从整体层面阐释清代黄运引河工程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以档案、舆图等文献为基础, 结合黄河、运河研究的相关理论, 专门研究清代黄运引河。

一、引河的分类

清代黄运引河大体可以分为裁弯取直、控水导流、减水分溜、农田灌溉等类型。

(一) 裁弯取直引河

清朝立国之初虽已开始采用挑挖引河的方法治理黄运两河, 但挑挖引河的次数较少, 规模也较小。康

熙时期, 黄河河道破坏严重, 康熙将治河作为首要之务。康熙三十八年(1699), 康熙南巡至高家堰、清口诸处, 谕漕运总督桑额、河道总督于成龙等:“朕欲将黄河各险工、顶溜湾处开直, 使水直行刷沙。若黄河刷深一尺, 则各河之水浅一尺, 深一丈, 则各河之水浅一丈, 如此刷去, 则水由地中而行, 各坝亦可不用。”^①康熙认为, 浚直河道, 水速加快, 泥沙不易沉积, 可减少顶冲、兜湾等河防险情。康熙大大提升了引河在黄运治理工程中的地位, 挑挖引河遂成为清代河官治河的重要方案。

裁弯取直引河是黄运治理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引河类型, 一般应用于黄河主河道的治理。其原理是在兜湾对岸沉积滩地上切滩挑挖引河, 沟通滩地东西两侧河道, 使主溜不再绕行兜湾。引河开成之后, 原有的河道淤成平陆, 河道由此划直, 险工随之化解。明中期以后, 黄河挟沙量不断增加, 河道淤垫日益成为黄河治理中的难题。如何解决黄河淤积而导致的溃决, 成为治黄的核心。比较著名的裁弯取直引河有康熙时期高邮运河越堤引河, 雍正二年(1724)挑挖的仓头口引河, 及雍正五年(1727)开工挑挖的仪封北岸雷家寺引河等。

(二) 控水导流引河

控水导流引河目的在于沟通河、湖, 实现河、湖之间水流的可控。这类引河一般在运河、淮河、洪泽湖等地形、水文环境较为复杂的区域挑挖。明代河

收稿日期: 2023-05-17

作者简介: 郑民德(1982-), 男, 山东五莲人, 教授, 主要从事运河学、运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研究。

①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92, 康熙三十八年正月至三月第1035页。

臣潘季驯制定了束清刷黄的治河策略，增修高家堰大堤，利用洪泽湖收束清水。至清代已在洪泽湖东侧开挖太平引河、裴家场引河、张福口引河、张家庄引河以及天然引河，与下游的黄运交汇之处相连。这五条引河平时堵闭，在黄运交汇之处泥沙沉积严重时择机开放，冲刷河道。运河沿线，尤其是江北运河，导流引河工程较多。如江苏境内运河与骆马湖多用引河沟通，旨在实现骆马湖水与运河水的季节性调剂。山东段运河又称闸河，地势较高，涵水性较差，需要南四湖、北五湖之水济运通漕，诸湖与运河之间的连通也是通过引河实现。这类引河工程可以根据河湖水势及周围的环境变化随时调整。

（三）减水分溜引河

减水分溜引河一般是在水量较大的黄河出现决口、漫口之时开挖。其原理是：黄河出现决口，主溜水量较大时，决口堵闭艰难，此时需于决口上游择地开挖引河，将黄河主溜引入引河，原河道水量减小之后，将决口堵闭坚固，再将引河堵闭；或于引河口修建挑水坝，使黄河主溜回归正道。道光二十一年（1841），河南祥符等处黄河屡屡漫决，祥符决口屡镶屡垫，堵闭艰难。受命治河的王鼎于祥符上游挑挖引河，将黄河大溜掣入其中，祥符等处决口、漫口陆续堵闭，并于次年二月十三日全部合龙。^①每当黄河出现决口、漫口，河政官员往往采用抢险堵闭法，但若水势过大，不仅堵闭不成，致前番工料付诸黄水，且决口会越来越大。开挖引河虽然成本较高，但只要设计得法，则会从根本上减水分溜，遏制水患。故在乾隆、嘉庆及道光前期国家财力相对充裕之时，每当出现大型决口，河政官员则会选择开挖减水分溜引河。

（四）其他类型的引河

除上述几种较为重要的引河类型外，农田灌溉、河道越闸、天然自成等类型的引河，也大量分布在黄运两岸，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农田灌溉引河在黄运河湖附近分布密集。在黄河两岸，以减水引河配合减水坝，一方面可以收容黄河过量之水，另一方面可以灌溉沿河民田。在运河两岸，月河或是溢水渠多承载着灌溉引河的功能。运河闸座众多，当闭闸蓄水或闸座维修时，则于闸侧挑挖引河，沟通运道，以为临时过闸通道。这类引河多被称作月河或越河。天然自成引河往往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清代河臣奏折中，经常看到地方督抚奏报某时某地自开天然引

河一道。天然引河大多被视为祥瑞，是上天垂示，表彰帝王功德。故各地出现天然引河，地方官往往争相奏报，以示地方承平，治理得当。奏报天然引河当以雍正一朝为最多，如雍正九年（1731），东河总督沈廷正奏报豫省考城自开天然引河两道。雍正十一年（1733），南河总督嵇曾筠奏报睢宁天赐引河一道等等。

二、引河的挑挖及维护管理

（一）引河的挑挖过程

挑挖引河是一项复杂且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涉及面广，动用钱粮多，若开而不成，不仅徒靡粮饷，而且影响全河大局，故挑挖引河之前必须进行实地勘测、走访。刘永锡在《河工蠡测·三急篇》中曾言：

“打量地势，不致高低滩形如牛舌，则引河难开。如葫芦形、如耳形者，便可挑挖。”^②在勘探过程中，河员需走访所涉地区，了解当地沙土形质、灌溉河渠分布、农田开垦状况、民居聚散情形。查看地势之后，择地确定河头、河尾，“河头有吸川之势……河尾尤贵有建瓴之势”^②，方可确为头尾。河头迎溜而开，不可太高，河尾顺溜而设，不可太低。如果河头太低，主溜之水容易倒灌，引河之水难出。确立河头、河尾之后，划定河身，河身宜直不宜曲，分段测量，封土标记，按段分别高低深浅。测量完成后，估计工料、夫价数目，奏请朝廷拨款挑挖。

夫役到工后，按段承挑，挑挖之前，先在河身两侧约50米之外各挑挖一道小沟，挑挖引河的余土需堆卸在小沟外侧。这样如遇雨水，泥土不会下卸入主河，小沟即为泄水通道。开挖之时，河头河尾各留300多米（一百丈），以隔水作业。引河中间按丈分段，每段之间留有土埂，不能概行挖通。如果发生意外，河水自河头涌入，土埂可以起到阻水的作用，降低抢修难度。河身全部挑挖完成之后，再将土埂挑去。开放之时，先将河尾余土300多米（一百丈）挑去大半，不必全部挖通，再相机挑开河头，引水入河，利用水势将河尾冲开，汇归主溜。如果河尾全部挖通河水倒灌入河，引河开放时水速缓慢，易于淤塞。短引河不可太弯，水激则漾，长引河不可太直，直则缓淤。引河开通数日，两侧越刷越宽，上下流畅，淤塞清除，即为告成。

（二）引河挑挖的难点与重点

1. 引河挑挖的难点。小型引河工程量有限，只

^① 王鼎，等.《奏报祥符大工河工情形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道光朝），文献编号：005233。

^② 嵇曾筠.《挑挖引河说》，载《防河奏议》，清雍正十一年刻本，第254页。

需在挑挖之前确立河头、河尾及河身位置和走向即可。大型引河的挑挖工作则庞杂繁复,关涉河工诸多方面。在挑挖过程中,每一步都要慎之又慎,稍不留意,非但不能助益河工,还会造成新的问题。挑挖大型引河最大的难点是确立河身位置和选择开放时间。黄河两岸挑挖的裁弯取直引河抑或减水分溜引河,动辄3000多米(千余丈),必须反复勘测走访,方能议定。雍正十三年(1735),仪封十六堡等处大溜汕刷堤根,本拟挑挖引河,但数月之后再行勘察,发现河势变动较大,原定河头位置已无顶冲之势,开河难有吸川之力。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奏请放弃挑挖引河,帮筑裹堤,得旨允行。^①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仪封南岸十六堡、十七堡之间黄河漫溢,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奏请紧挨漫口,于黄河北岸挑挖引河3000多米(一千一百余丈),掣溜回正。乾隆认为“所拟切滩处似觉太少,且距漫口太近”^②要求更正引河位置。高晋、姚立德等审度河势,遵旨将引河口向上游移动。九月,引河开放,大溜全行吸入,仪封漫口得以堵闭。

影响引河开放时间的因素有很多,如降雨量、河流水量、上下游河情等等。由于引河开放时需借大水将泥沙刷出引河,故需择水势较大时开放。乾隆四十四年(1779),仪工漫口屡堵屡开,大学士阿桂等奏请于上游北岸王家庄挑挖引河,引主溜绕越漫口,于下游汇入故道。王家庄引河于是年六月初挑挖完成,待机开放。七月二十六日,黄河水势略有增长,因接近白露,白露过后水势消减再无启放之机,阿桂等遂于是日开放引河。初开之时,大溜奔腾掣入,但很快流速放缓,开放仅仅半日,引河即淤塞^③。阿桂等惊恐万分,一面奏报朝廷,一面派人将引河挑浚疏通。经过不断挖沙挑淤,直到九月十五日,王家庄引河才疏浚告成。

2. 引河挑挖的重点。挑挖引河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涉及钱粮预备、夫料调集、河工技术等诸项工作,其中尤以钱粮夫料为要。河政官员勘估引河之后,一面奏请开挑,一面请拨河银,购办工料,雇募民夫。清代前中期,河工经费充足,挑挖大型引河工程往往拨银几十万乃至百万两之多,有时甚至几条引河同时挑挖。乾隆四十七年(1782),河南巡抚富勒

浑奏请于黄河南堤挑挖引河,乾隆拨银三百万两后,又命户部、内务府各追加一百万两,并谕知富勒浑,“若不足用,奏来再拨”^④。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朝廷将大量河工经费挪用于军事,大型引河工程为数极少。咸丰初年,黄河铜瓦厢河势弯急,大堤顶冲迎溜,本应挑挖引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因经费拮据,仅以埽坝进行镶补,最终于咸丰五年(1855)决口,导致黄河改道北流。

清初黄运两岸险工迭出地段往往育有柳林官地、苇荡官地,河工用料。但随着河患增多,河工用料也越来越多,加上河政败坏等因素,以致官地产料供不应求。雍正朝开始,民间采购成为获得河工物料的首要方式。清初河道工程多由河标兵丁承担,但河标人数较少,同时负责分守汛地、看守堡房等工作,不敷调配,故河工兴作多雇募民夫承担。如遇黄河决口或旱涝灾害,河政官员会专向受灾地雇募夫役,以工代赈。

在引河挑挖施工过程中,防止官员、夫役作弊是保证工程质量的一个关键。挑挖大型引河,需要由基层河吏或地方绅商分段承办,由小吏或绅商自募工人,限期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绅商往往与官府或料商通同作弊,以期赚取更多的利润。嘉庆二十年(1815),东河总督吴璥等在桃北等处开挑引河,分段挑挖完成后,吴璥查知引河有草率偷减工程十余段,立将山东兖沂曹济道熊方受等交部议处,赔补河银三万余两,并将承挑各员在工枷示。

(三) 引河的维护与管理

1. 引河的疏浚。黄河下游黄淮诸湖等地,地势平阔,水速较慢,易于淤积。除此之外,在运河两岸开挖的引河,水量较小,泥沙沉积也较为突出。自嘉道采用借黄行运之法后,黄水涌入,清口附近黄河、淮河、运河河道几乎每年都需要疏浚。

疏浚引河的方法有多种,常用的主要是挑淤法、刷淤法、浚船法。如果河道瞬间有大量泥沙涌入沉积,河道全行淤闭,甚至河中出現嫩滩这种最严重的淤塞,一般采用挑淤法进行疏浚。挑淤之前,先将河道两头筑坝封固,中间按段挑挖。这样的淤闭河段,泥中带水,滩不成形,疏浚的难度比开挑引河还要大。若引河上游紧靠水柜,则一般采用刷淤法。在

① 白钟山.《奏报仪封十六堡停挑引河帮筑裹堤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雍正朝),文献编号:2079。

② 高晋,等.《奏报引河遵旨改正缘由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乾隆朝),文献编号:035962。

③ 阿桂,等.《奏报王家庄引河开放淤垫情形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乾隆朝),文献编号:024399。

④ 富勒浑.《奏报改筑南堤挑浚引河部拨银两全数接收清楚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乾隆朝),文献编号:041932。

水柜与引河连接处置闸或坝,拦蓄清水,择机启除闸坝,放水冲刷引河,以达到清淤效果。如疏浚洪泽湖五条泄水引河即多用此法。浚船法是引河疏浚方法中成本最低、操作最简单的一种。在浚船后绑铁耙、木耙或柳条等物,于河道中拖行扒沙,沙随水走,引河渐深。

2. 引河配套工程。引河并不是一项独立的河道工程,它与挑水坝、顺黄坝、雁翅、滚坝、埽工等共同组成一个复杂的水利系统,发挥着化解险工的作用。

挑水坝多建在引河口对岸上游,引河挑成后需要大量河水冲刷,同时将原有旧河道淤闭,挑水坝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顺黄坝建在新开引河头下游旧河道,两岸各一,根据需要控制两坝间距。两顺黄坝越长,则旧河道水越少,引河之水越多。若引河完全开通,两顺黄坝相接,旧河道则完全废弃。雁翅一般建在引河口迎溜一侧,目的在于防止主溜长期冲刷造成河头移位。泄水、减水引河河头多建有滚坝,目的在于控制泄入引河的水量,使主河道水位保持均衡,同时防止大量河水泄入引河,造成引河下游泛滥。在险工处开挖引河,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与坝、堰、闸等诸多河工设施有效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清代诸多治河局部工程图中,都能清晰看到这些河工设施的位置,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古人治黄治运的思想和技术。

三、引河的优势与缺陷

(一) 挑挖引河的优势

挑挖引河在清代黄运治理过程中已经是一项非常成熟的河工技术,自有其优势。首先,从治河原理来看,挑挖引河的核心思想是疏导,修筑埽工、坝工、堤工等措施则着眼于堵筑。疏导是借水势以治河,堵筑则是杀水势以治河,故引河能更大程度上变失控的河水为可控,从而化解险工。其次,从持久性来看,引河相较于其他河工更为经久。引河挑成以后,成为河道的一部分,其主要作用是容水,河水对引河的破坏较小。堤坝工程则通过与河水直接冲突发挥作用。大多数情况下,引河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再次,从施工难度来看,挑挖引河采用的是隔水作业,挑挖的过程中并不会与河水直接接触,技术难度较低。堤工、坝工、埽工在修筑工程中很难隔绝河水,边修边毁的状况比比皆是。在抢险加固的过程中,时常出现突发情况,对河员、河夫、河兵的技术要求较高。

(二) 引河存在的缺陷

当然引河工程也存在很多缺陷。第一,引河工程量巨大,挑挖过程中耗用的钱粮、夫役较其他工程为巨,成本极高。大量挑挖引河的情况之所以出现在康雍乾三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财政充足。嘉道之后,朝廷库款日益紧张,大型引河工程明显减少。其次,在黄河中游连续挑挖裁弯取直引河,使主河道由曲变直,河水整体流速减缓,原先沉积于兜湾之处的泥沙转而沉积于主河道中,造成黄河中下游河床整体抬高,加快了黄河变为地上悬河的进程。再次,引河窄浅,极易淤塞,后期需投入较多财力、物力进行维护。引河开放之后,若挑挖深度、宽度与河情水势不相吻合,易出现淤塞,需要修造浚船、扒船,定期疏浚,所费工价往往超过挑挖引河的成本。最后,引河会不可避免地占据沿河附近百姓的土地,并且征发沿河百姓充当夫役,对百姓利益多有损害。

四、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治黄史。大量挑挖引河是清代治理黄运的一大特点。从河道工程角度来看,挑挖引河难度高、工程量大,标志着中国古代河工技术发展的高度。从经济背景来看,清中期以前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大量挑挖引河的有力支撑。从政治角度来看,清代政局稳定、施政思想连贯,为治黄治运提供了政治保障。对引河进行分类,探究挑挖引河的利弊,并以引河为中心,讨论引河与其他河道工程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探索清代黄河、运河治理的思想,为我们当今的黄河治理和运河保护开发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 [1] 陈鹏年,等. 清代六部成语词典[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438.
- [2] 潘季驯. 钦奉敕谕查理河漕疏[M]//四库全书本(卷十四).
- [3] 王申. 清代钱塘江中小壟引河工程始末——兼及防潮方略之变迁[J]. 清史研究,2019(4).
- [4] 李西萌. 乾隆四十六年黄河青龙岗决口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D]. 济南:山东大学.
- [5] 李智萍. 屡筑屡蛰: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的祥符、仪封大工[J]. 农业考古,2015(4).
- [6] 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办公室. 中国古代河工技术通解[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8:13-14.

Rumination on the River Diversion Project on the Yellow River and Canal in the Qing Dynasty

ZHENG Minde¹, TIAN Zhaoyu²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anal,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River divers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ngineering measures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two rivers in the Qing Dynasty, mainly divided into cutting bends to straighten the diversion, water control diversion, water reduction and water slip diversion. Compared with other river projects, river diversion has strong ability to control water and solve problems more thoroughly, but it also has high technical difficulty, large volume of work, and high maintenance cost defects.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River diversion project; the Yellow River; the Canal

(上接第54页)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Parody Poetry Translation in Children's Fantasy Novels —Take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s an Example

WANG Huan

(Faculty of Foreign Stud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6, 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c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fantasy adventure story but also the spirit and temperament of word games presented in the parody of classic poetry. In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f it is limited to correspondence at the text level, it will lead to dismal performance when the work is dissemin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through Bayesian statistics and questionnaires, combined with research on German translations as third languages, researchers found that the translator is both a reader of source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a secondary creator and can be freer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pla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translator need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pirit and temperament of the wordplay in the original text, and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acceptance and lov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to achieve a creative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If translators break away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rody archetype and treat parody poetry as ordinary poetry translation, readers will not be able to resonate with it. They, therefore, will need help understanding the absurd beauty of the work. Translators should consider the psychological particularity of child readers when translating and aim at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by child readers to achieve equivalent construction of styles.

Key words: Children's Parodic Poems;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Fusion of Horizons; Bayesian Statistics;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夏津方言俗词俗语例释

贺同赏

(德州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夏津方言中的俗词俗语丰富多彩。这些俗词俗语展现了夏津以至鲁西北村民关于天文、地理、农耕、纺织等方面的朴素认知和先前生产生活的画面,村民在家庭伦理、人物评价、婚丧操办、节令小吃、日常器物、河塘草虫等方面的生活场景与风俗画卷,以及村民日常行为、动作的丰富性与生动性。其中某些语词古已有之,少数语词词性发生变异,某些方音明显与古音有亲缘关系,而与普通话发音差异很大。这些俗词俗语,在总体上呈现出古今承续、雅俗交融、活泼生动的品格,富于表现力和乡土气息。

关键词:夏津方言;俗词俗语;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 H1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60-06

方言承载着其所属地方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所积淀的丰厚文化。“汉语方言是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宝贵的材料价值与重要的文化载体功能,值得人们重视并进行合理的保护。”^[1]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地处鲁西北平原。夏津方言属北方方言石济大片的西齐小片。夏津方言中的俗词俗语表意鲜活,多姿多彩,值得探究。本文借鉴德州学院中文系已故曹延杰教授的方言研究理路^[2],在数年调查、辑录的基础上,将夏津方言中较有代表性和特色的 131 则俗词俗语,大致划分为天地耕织、风俗名物、动作行为、形容修饰四大类,对每个俗词俗语从注音^①、释义、例句三个方面^②加以整理、解说。需要说明的是,夏津方言中的部分俗词俗语,天然地存在与周边区域通行共用的情形,本文不拟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细分。文中或有不当之处,敬请桑梓人士与学界专家不吝赐教。

一、天地、耕织类

爷爷儿:太阳。例句:冬天晌午暖和的时候,很多老头儿坐在南墙根底下,晒爷爷儿。

月姥娘:月亮。例句:八月十五的月姥娘,又大又圆又亮。

饭包渣子:冬天降水,由于气温低而形成的固体小颗粒。例句:哎呀!下饭包渣子了,地下滑,慢慢走着,可别捧着!

虹(单用时,方音 tciɑŋ˥):雨后天空中出现的彩色圆弧。例句:嗨!西半天出虹了,真好看!按:《礼记·月令》释文:虹,音红,一音绛。^{[3]1935}

头晌儿、晌午(方音 xu˥):过晌儿:上午、中午、下午。例句:我一天到地里转两趟,头晌儿一趟,过晌儿一趟。

黑了:夜晚。例句:今儿黑了你到我家玩玩儿,好酒好菜,等着你。

夜来:昨天。例句:我夜来过晌儿,上高庄俺姑家去了一趟。

壮地、弱地:分别指肥沃和贫瘠的田地。例句:村里分地,壮地、弱地都是按人头儿均分的。

耙、耩:①平整土地用的两种农具,都是长方形。耙的主体为木制,四边用厚重木板榫接呈框状,木框内纵横铺排轻薄的木条(皆榫接于木框);又在四边木框上有间隔地整齐地向下楔入直径约 2 厘米、长约 15 厘米的带长尖的铁钉,铁钉的长尖须在耙下露出 8 厘米左右(称“耙齿”)。耙可划、压土块,使耕过的田地变得初步平滑。耩的主体则用荆条编排(一般横穿三列木条)而成,荆条的前、左、右三边为木框,横穿荆条的三列木条榫接于木框上,荆条后部呈扫把状。耩可扫、压土块,使田地变得更加平滑。②用耙、耩修整田地。又,耙地、耩地之时,前有牛、驴等畜力大体保持匀速牵拉;在此

收稿日期: 2023-03-02

基金项目: 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研究课题“夏津方言俗词俗语例释”(2022DZZS059)。

作者简介: 贺同赏(1973-),男,山东夏津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及德州地域文化。

①以显著异于普通话发音为界限,标音的字以下划线提示。

②必要时,另加相关按语。

过程中，假如驾驭者（或另找人）站在耙、耩上面，用双脚摇晃耙、耩，则耙、耩的效果更好。例句：村里多数人家有犁、有耙，但没有耩。

垡头：耕地后形成的带状高土。例句：你用铁锨平平两边的垡头。按：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大豆》：“逆垡掷豆，然后劳（通“耩”）之。”

耩车：一种木制条播机，一般由畜力牵引、人工扶架。可用来播种小麦等农作物。例句：近些年，老式耩车基本被新式播种机取代了。

耩：（用旧式木制耩车或新型铁制播种机）播种。例句：耩麦子之前，先得用犁耕地，用耙耙地，用耩耩地；然后，再把地晾几天，等地里湿度适合的时候，才能开耩。

碾（方音xun¹）：石制滚压器。例句：咱家没碾，过麦轧场得借人家的。

刚（方音kaŋ¹）场：在村边或院中，选一片宽大、向阳的地面，泼水、辗轧，使地面变得坚硬、平滑、干净。例句：新刚的场就是好，就跟镜面一样！

轧场：在刚好的场里，用畜力或拖拉机牵引石碾，辗轧新收且干透的麦子，使麦粒脱落的过程。例句：轧场得在晌午最热的时候，不是个好活儿。

畜（方音tɕ^hu¹）力：指牛、驴、骡等能够助力农耕的家畜。例句：喂畜力是件细致活儿。

后鞮：套车时，半环绕地拴在驾辕牲口屁股周围的皮带或粗绳套，以便在倒车时牲口能够着力。例句：套车时，别忘了紧紧后鞮。

驾驭畜力拉车、耕田的一组口号：旧时，吾乡父老驱驾牛驴等畜力拉车、耕地，除鞭策而外，还需辅以口号指挥之。呼“i¹”，则牛驴向里（左）走；呼“u¹”，则牛驴向外（右）走；呼“tɕia¹”，则牛驴前进；呼“tɕo¹”，则牛驴后退；呼“y¹”，则牛驴驻蹄不动。累月经年，牛驴渐能领会主人的旨意。

贱年：荒年，庄稼歉收、人挨饿的年月。例句：俺爷爷说：早先过贱年的时候，连野菜、树皮都吃光了，村里饿死的人可不少。

纺线车子：指旧式木制纺车。例句：记得俺小时候，很多冬天的夜晚，俺娘都在昏黄的煤油灯前，用纺线车子“嗡嗡”不停地纺线。

织布机：指旧式木制织布机。例句：俺娘早年间用织布机织的老粗布存了不少，一直到现在俺还在用。

繅：用针线缝合。例句：你褂子上裂了个口子，脱下来，俺给你繅两针儿。

本节收入俗语 27 个。从中可以窥见夏津以至鲁西北村民关于天文、地理、农耕、纺织等方面的朴素

认知和先前生产生活的画面。其中，少数语词如爷爷儿、月姥娘等，体现出上古原始思维；某些语词，古书已见；某些方音，明显与古音有亲缘关系，而与普通话发音差异很大。

二、风俗、名物类

主子：为去世的亲人立的牌位。例句：过年时，村里很多人家都供着主子。

老的（方音 drər¹）、小的（方音 drər¹）：代指家中的老辈和晚辈。中性词。例句：人到中年，最不容易了；最怕老的得病，小的成不了器。

小儿、妮儿：男孩、女孩。父母及近亲属对于成年的儿女及晚辈，在私人场合也仍习惯性地称“小儿”“妮儿”。例句：大小儿、二妮儿，快家来吃饭！

公母俩：夫妻俩。例句：他（她）公母俩都长得俊，生的孩子也丑不了。

双胞胎（方音 tɕaŋ¹ brər¹）：双胞胎。例句：这俩双胞胎长得忒像了，外人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拼头：傻子。例句：张庄东门外，常有个拼头来回转悠，碰见了，别惹他。

拼货：傻子。其实并不真傻，只是做事比较愚笨。呵斥、辱骂之词。例句：三叔训他儿子说：“拼货！你说话连个弯儿也不拐，人家能不生气吗？！”

小（方音 ɕio¹）搯（ly¹）：小偷。例句：赶集的时候，小心小搯！

个人：自己、自身。例句：别等他们了，咱个人先吃饱了再说。

吃饱蹲：①吃饱了就蹲着，饿了接着吃。形容人好吃懒做。②指代好吃懒做的人。例句：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一个“吃饱蹲”，一直到死。

没（方音 mu¹）奈何（方音 xuə¹）：本意即无可奈何，在方言中动词性短语转化为名词性短语，用来指不听训教、不求上进的年轻人或丧失自控、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多含不满意的意味。例句：前街王家的二儿子二十好几了，光在家里蹲着，也不出去干活儿，真是“没奈何”！

墨客郎：指乡村中能喝酒，有见闻，到处游逛，喜好交友，不大顾家的一类成年男性。例句：二奶奶骂他大儿子：“你看你，都快成墨客郎了！成天出去喝酒，也不着家。”

腻歪头：指性格内向，做事磨蹭的成年男性。例句：你真是个腻歪头，人家半天能干完的活儿，你一天也干不完。

狗脑子：指智力超常，特别聪明的人。例句：俺那同学简直就是个狗脑子，他学半天玩半天，比俺吭哧吭哧学一整天都强。

矮地丁：指身材极矮的人（尤其是男性）。地丁，本是一种低矮的野生草本植物。例句：他长得跟“矮地丁”一样，好找媳妇呀？！

亲支近派：在血缘关系上比较亲近的同姓的人，即同姓近亲属。例句：他家亲支近派很少，前些年断不了受欺负。

主席：特指红白事儿上主管筵席制作和吃席次序的人。一般由村里热心里肠且有威信的中老年男性担任。例句：今儿红事儿上的主席，脾气大，没有人敢偷吃。

总理：特指红白事儿上统管全局的人。一般由村里热心里肠且有威信的中老年男性担任。例句：俺村东半截的红白事儿，五爷爷当了得有二十多年的总理，后来老了，才不干了。

红白事儿：喜事（男女结婚及小孩满月、生日）和丧事。例句：这两年，村里红白事儿办得越来越洋气了。

斗子：棺材。例句：俺小时候，有好几回看到出丧、抬斗子的队伍。

红案儿：特指红白事儿上负责肉菜烹饪的场所和人员。例句：甲：红案儿上，把刚买来的肉先整干净了。乙：嗯，知道了。

白案儿：特指红白事儿上负责素菜烹饪的场所和人员。例句：甲：白案儿上拌凉菜时，记着少放芥末。乙：嗯，记着哩。

糊包肉：乡村红白事儿筵席上的一种主要食物。用面糊裹肉块，在油锅里炸熟；然后，装碗，饪清汤。例句：主席说：“今儿，糊包肉一人一碗，不能多吃；签子馒头，管够。”

蝎子豆儿（方音druər1）：过农历“二月二”时，农家在大号铁锅（往往是被废弃的）里、加沙土（往往是专门从沙土岗子上拉来的），烧柴火将黄土烧热后加黄豆一起翻炒熟后的黄豆粒，是特有的乡村节令食品。例句：“二月二”离惊蛰不远，据说，人吃了蝎子豆儿，就能避开蝎子等毒虫的伤害。

面蛋蛋儿，又叫“土里蹦”：过农历“二月二”时，农家用大号铁锅（往往是被废弃的）、加沙土（往往是专门从沙土岗子上拉来的），烧柴火，翻炒而熟的小圆球状的面食，是特有的乡村节令食品。例句：过“二月二”时，俺最喜欢吃的就是“面蛋蛋儿”。

筒：用来打水、盛水的圆柱形、上敞口的容器，即桶。主要有铁筒和塑料筒两种。例句：一条扁担挑俩筒。

箸子：筷子。例句：二大爷抄了一大箸子菜，摆嘴里，接着又呷了一口酒。按：《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湘云使用箸子举着，说道：‘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讨桂花油。’”

志子：商店里测量、盛取醋、酱油、酒等的带长柄的容器。例句：售货员用志子给顾客打酱油。

溜（liəu1）子：漏斗。例句：往瓶子里倒香油，得用溜子。

家什儿（方音sər1）：指家具、工具、器皿等。例句：上供销社打柴油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带着家什儿。

庋（方音t^huo1）：人的两臂左右伸直所得的总长度。例句：这根绳子大致有三庋长。

阁（方音kə1）：传统建筑物的一种。架空的小型楼房，通常四周设隔扇或栏杆，供游观、藏书或供佛之用。例句：传说，“贺半仙”年轻时在张法寺的阁上连睡了三天三宿，醒了以后，就会给人看病下药了；他原本就是个不识字的普通庄稼人。

黑么老虫、大枕蛾子：每当春深气暖，于傍晚田头，常有两种可爱小虫集体超低空飞行。一曰“黑么老虫”，色深黑，体小如青豆；一曰“大枕蛾子”，色淡黄，身量稍大如花生米。例句：小时候，春天里，俺常跟伙伴们到村边地头去逮“黑么老虫”跟“大枕蛾子”。

臭大姐：臭虫。例句：捏起臭大姐时，可别用劲儿，一用劲儿，它就放臭气！

酒壶：即地黄。玄参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有食用、药用价值，曾遍布田间地头。例句：地黄的花朵是长桶状、红紫色的，花朵中含有甜甜的汁液，俺们小时候常采下来，像倒拿着小酒壶一样，放在嘴里细细咂摸。

苍子：即苍耳小球型的带尖刺儿的果实，果实风干后呈苍灰色，有药用价值。苍耳为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曾遍布村边田间。例句：李刚小时候很调皮，好几回他往前桌女生头发上撒苍子，逗人家玩儿。

湾：池塘。例句：俺村西南边有个大湾，东北边有个小湾儿。

本节收入俗语俗语 38 个。它们勾勒出夏津以至鲁西北村民在家庭伦理、人物评价、婚丧操办、节令小吃、日常器物、河塘草虫等方面的生活场景与风俗画卷。其中，某些语词，含义与现今常见义不同；少数语词，词性发生变异；某些方音，明显与古音有亲缘关系，如没奈何，阁等，而与普通话发音差异很大。

三、动作、行为类

缚（方音fə1）：打击、制服（对方）。例句：你再骂俺，俺就缚你！按：《中州全韵·歌罗韵》：“缚，房波切。”^{[3]1657}

奶（方音nə1）：哺乳、哺育。例句：家里事儿也不少，光奶孩子就占了她不少工夫。

卖话：大量地带劲地说话。例句：别卖话了，赶紧干活去！

絮聒：话多且重复。例句：二大爷对他已出嫁的闺女说：“恁娘越老越絮聒，甭听她的，快走吧。”按：元·张鸣善《普天乐·嘲西席》：“学生道：‘先生絮聒！’”

箍搐：（身体）蜷缩。例句：听说四爷爷病了，俺去看他，一进门，就看见他在炕上围着被子箍搐着。

噤喳（方音 tʂʰa ɿ）：压低声音说话。例句：恁俩大汉子，在那里噤喳嘛？！

填还：满足，献给。多含戏谑意味。例句：过年时亲戚拿来的那些点心，俺老了，吃不得甜，都填还这两小孩子了。

拌蒜：指（醉酒或生病引起的）身体摇晃、脚步紊乱。例句：他喝了将近一斤酒，才一出门，脚底下就拌蒜了。

风瘫：因中风而瘫痪。例句：他整天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得病了，差点儿没风瘫了。

仗恃儿（方音 ʂəɾ ɿ）：依仗、凭借。动词、名词并存。含贬义。例句：①前些年，王大龙仗恃儿着县里有人，在村里可横了。②你有嘛仗恃儿呀？

抱（方音 pəɿ ɿ）屈：感到委屈，内心难受。例句：她娘死得早，他爹怕她抱屈，对她可娇惯了。按：《红楼梦》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得（方音 tei ɿ）罪：招人不满或怀恨。例句：俺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见了面，根本不理俺。

发作：特指疖子、疮等红肿乃至化脓的病状。例句：你脸上的小疖子得抹点酒精，要是发作了就麻烦了。

冻着：因受风寒而感冒。例句：他这两天冻着了，在家躺着哩。

增寒负冷：感冒导致的浑身发冷。例句：俺冻着了，增寒负冷地，浑身不得劲儿。

闹症（方音 tʂɛɿ ɿ）候（xou ɿ）：多指未成年人因受惊吓而表现出特殊症状。例句：孩子吓着了，越到半宿里越闹症候。

闹神猴儿：装神弄鬼，使用非常手段，以达到目的。例句：这两天，她又闹神猴儿哩！

佯咳嗽：假装或故意咳嗽，非由呼吸道疾病引起。佯：假装地，故意地。例句：你佯咳嗽嘛？！烦人！

寻（方音 ɕɿɿ ɿ）无（方音 vu ɿ）常：指自杀。例句：有嘛想不开的？！为嘛要寻无常？！按：无常：佛教以为，世间一切事物（包括人）都处于生灭变异之中，不能久住。此处借指（人）死亡。

打能能（nəŋ ɿ nəŋ ɿ）：指说话支支吾吾，表达不清楚。例句：甭看他跟熟人说话挺利索，一遇到生人儿，就打能能了。

打罗（方音 luəɿ ɿ）打罗（方音 luəɿ ɿ）：打听，从中

联络。例句：俺家老三都二十七八了，还没人儿哩，姐姐你费心给打罗打罗。

说人儿：介绍媳妇。例句：大嫂，你看着要有合适的，跟咱二小说个人儿。

寻（方音 ɕɿɿ ɿ）人儿：介绍媳妇。例句：他一到关外，就寻了个人儿。

知不道：不知道。例句：甲：你知道这事儿吧？乙：俺知不道。

本节收入俗语俗语 23 个。从中可见夏津以至鲁西北村民日常行为、动作的丰富性与生动性。其中，某些语词古已有之；少数语词词性发生变异；某些方音明显与古音有亲缘关系，而与普通话发音差异很大。

四、形容、修饰类

茶：疲倦，缺少精神。例句：小孩子只要一发高烧，就茶了。

时样：本指时新的式样，常用以形容一个人穿衣打扮符合新潮，不落伍。例句：这个村就在县城边上，男女穿着都很时样。

嘹亮：形容人心胸豁达，说话爽快。例句：他从年轻就是个嘹亮人儿。

透脱：形容人不拘成规，头脑灵活，身手敏捷。例句：这小伙子可透脱了，真招人喜！附：宋·杨万里《和李天麟二首》其一：“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

迂磨：形容人办事拖沓，举止迟钝。多用于成年男性。例句：可别跟他一块儿干活儿，他忒迂磨了！

喜兴（方音 ɕia ɿ）：形容青年男女性格乐观，面带笑容的样子。例句：王家俩闺女都长得可喜兴了。

倒流（方音 liəu ɿ）：形容老年人脑力衰退，说话絮絮叨叨、颠三倒四。例句：王奶奶这两年可倒流了，给她说了五六遍了，可还是记不住俺的名儿。

懂（方音 duēɿ ɿ）局：懂行，了解内情。例句：要看戏，他是真懂局。

挖挞或鳍沙：①形容人（尤其是女性）的头发蓬乱或双臂张开的样子；②形容鸟的翅膀张开的样子；③形容人的行为张扬、跋扈。例句：三大娘鳍沙（挖挞）着头发，对小叔子笑骂道：“老四，你挖挞（鳍沙）嘛？！恁家再有钱，俺也不借一个分子儿！”按：宋·苏轼《於潜女》诗：“鳍沙鬓发丝穿杼。”

婆婆（方音 pʰə ɿ sa ɿ）：形容眼中含泪的样子。例句：前天晌午，在俺姥娘家，俺看见俺二姨眼泪婆婆的，可能有嘛伤心事，当时人多，俺也没好意思问她。按：清·奕绘《贺新郎五首》其五：“热泪婆婆下。”

落魄（方音 ləɿ ɿ pʰɛɿ ɿ）：形容人（由富贵得意转变为）贫贱失意的生活状态。例句：老李年轻时做买卖挣过大

钱,后来落魄了。按:宋跋本《切韵·陌韵》:“魄,普百切。”^{[3]2581}

彪流(liǎu 1):形容成年人(尤其是女性)性格强悍,喜怒无常。例句:她可彪流了,说变脸就变脸。

土鳖:本指一种生活在老墙根部缝隙中的昆虫。在夏津方言里,名词转形容词。常用以形容一个人穿衣打扮土里土气,跟不上潮流。例句:甬看他年纪不大,穿的可土鳖了。此词在各地方言里很常见,但含义互有差异。

相皮:在夏津方言里,名词转形容词。形容成年男性拿腔作调,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例句:张大爷从年轻就相皮,投合的人很少。

瓢糠:在夏津方言里,名词转形容词。形容物品质量差或人体格弱。例句:这孩子体格忒瓢糠了,得多下地练哒练哒。

次序:在夏津方言里,名词转形容词。形容家境富足,家庭用品齐备且摆放有序。例句:甬!新媳妇屋里摆设可次序了。

故事:在夏津方言里,名词转形容词。形容人(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排场大、讲究多,不容易应酬。例句:恁三娘子可故事了,给她做儿媳妇可不容易。

江湖:在夏津方言里,名词转形容词。形容成年男性见多识广,好友轻财,穿着不俗。例句:甬看恁大舅现在老了,不起眼儿;想当年,可是走过南闯过北,还在县城开过厂,朋友又多,可是个江湖人!

拮(方音 tciã1)据:贫苦,钱不够用。例句:这几年,他家孩子多,劳力少,过得挺拮据。

隆弯:(车轮)变形。例句:俺的洋车子跟人家撞了,后车圈隆弯了。

箍箍搐搐:形容人性格拘束,不泼辣。例句:他成天价箍箍搐搐地,见了生人连个话儿也不大敢说。

拿拿捏捏:形容人过分矜持,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例句:你整天拿拿捏捏地,不累呀?!

紫溜黄光:形容脸色紫里透黄且浮肿的样子。例句:他脸上紫溜黄光的,可能有病。

俗门老调:形容人说话的内容陈旧,令人厌烦。例句:你嘴里净是俗门老调,烦不烦呀?!

妖气不退:形容人性格蛮横,以强势压人。例句:我看你是妖气不退,你以为你是谁呀?!欠揍!

扭股儿(方音 kuēr1)翘腩:形容中青年女性轻佻、招摇的样子。例句:你光看她那扭股儿翘腩的样儿,就不是好人!

有时有晌儿:表示不经常。例句:你玩牌也不要紧,只要有有时有晌儿地。

趁着锅子热:趁热打铁,别拖延。例句:你为嘛不趁着锅子热,把这事儿了了哩?!

车动铃铛响:形容人做事抓不住主干,外围准备和花架子过多,以致阻碍了工作的正常进度。例句:尽量甬跟他一块干活儿,他无论干嘛,都车动铃铛响!

皱(方音 tʂou1)着鼻子扛着脸:形容人愠怒、不满的神态。例句:他今儿在地里皱着鼻子扛着脸地,也知不道谁得罪他了。

懒得腩里招蛆:形容一个人极端懒惰。例句:我警告你:你现在懒得腩里招蛆!再这么下去,你这个人就完了。

笨得翻不过身来:形容人脑子不灵活,不会变通。例句:可别跟他学,他笨得翻不过身来。

跟探头燕儿一样:形容婴幼儿期的孩子多,且都排成一列有所观望或有所等待的样子。例句:俺到他家里一看,甬!五个孩子跟探头燕儿一样,都在窗台上趴着哩!

体格跟茎(方音 t^hiŋ1)秆儿瓢儿一样:形容人极端消瘦而虚弱的样子。例句:他那体格跟茎秆儿瓢儿一样,根本不是干庄稼活儿的料儿。

瘦得跟茎(方音 t^hiŋ1)秆儿一样:形容人极端消瘦,身形细长的样子。例句:“他头年冬天大病了一场,病倒是好了,可瘦得跟茎秆儿一样。”

精得跟猴母一样:形容成年妇女极有心计,从不吃亏。含贬义。例句:恁三娘子精得跟猴母一样,嘛时候吃过亏儿呀!

哭得跟李三娘似的:形容已婚中青年女性哭得十分悲伤。李三娘,指元代南戏《刘知远白兔记》中女主人公,系刘知远之妻,与丈夫被迫分离,命运坎坷,艰辛备尝,最终夫妻团圆。例句:二叔学坏了,这两年一直在外边瞎混,连过年都不回家,二婶子三十晚上(除夕)哭得跟李三娘似的。按:在现今昆曲、越剧、京剧、评剧等戏曲舞台上及民间歌谣中,对《白兔记》故事的传唱不绝如缕。

长得跟黑杜梨儿似的:形容人(特别是脸)长得黑,不好看。例句:你看,这闺女个儿倒不矮,可长得跟黑杜梨似的,好找婆家呀?!按:杜梨,又称棠梨,落叶乔木,叶始绿终红,春开白花,秋结黑褐色小圆果。本例中的“杜梨儿”,即指这种黑褐色小圆果。又宋·王禹偁《村行》:“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热得跟下火似的:形容夏天特别炎热。例句:伏里天里,一到半头晌儿,就热得跟下火似的。

迤迤:逐渐地、缓慢地。例句:病来得快,走得慢,迤迤着就好了。按:宋·苏轼《与杨元素书》:“厥直(值)

六百千，先只要二百来千，馀可迤迤还。”

过逾：过度，过分。例句：他公母俩疼孩子过逾，结果把仨孩子都惯坏了。

一划：一概，普遍。例句：王家日子好，天井院里一划砖铺地。按：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八：“许多财礼，一划是好金银。”

净是：全是。例句：把车放到树底下才三天，车上落得就净是鸟屎了。

本节收入俗语 43 个。它们呈现出夏津以至鲁西北村民日常情态的多幅剪影，十分生动鲜活，表现力之强令人惊叹。其中，某些语词，古已有之；少数语词，词性发生变异；某些方音，明显与古音有亲缘关系，而与普通话发音差异很大。

总而言之，以上所举俗语，在夏津方言俗语的大湾里，不过是几筒清水而已。“从语言反映出来的文化因素显然对于文化本身的透视有很大帮助。”^[4] 仅本文所举俗语，亦可展现夏津以至鲁西北村民关于天文、地理、农耕、纺织等方面的朴素认知与先前生产生活的画面；夏津以至鲁西北村民在家庭伦理、人物评价、婚丧操办、节令小吃、日常器物、河塘草虫等方面的生活场景与风俗画卷；夏津以至鲁西北村民日常行

为、动作的丰富性与生动性；夏津以至鲁西北村民日常情态的多幅剪影，十分生动鲜活，表现力之强令人惊叹。另外，上述俗语在总体上呈现出古今承续、雅俗交融、活泼生动的品格，富于表现力和乡土气息。附带一提，笔者乃是土生土长的夏津人，三十多年来辗转多地，童年之忆故园之思至中年而愈炽。然则，辑录、整理、解说这些俗语，除去学术文化目的，乡情旧梦亦稍寓其间了。

（作者附记：本文之素材搜集、初稿撰写及修订由贺同赏完成；马超（语言学博士）为文中全部特殊方音标注国际音标，并对全文学术品格提升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吴永煊. 汉语方言文化遗产保护的意義与对策[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4): 39.
- [2] 曹延杰. 德州方言志[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1.
- [3] 德州方言实录与研究[M]. 北京: 线装书局, 2010.
- [4] 宗福邦, 等. 古音汇纂[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5]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109.

Examples and Commentary of Colloquial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the Dialect of Xiajin

HE Tongsh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e colloquial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Xiajin dialect are rich and colorful.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villagers from Xiajin to the northwest of Shandong have a simple understanding of astronomy, geography, agriculture, textiles, and other aspects, as well as their previous life and production scenes; the life scenes and customs of villagers in terms of family ethics, character evaluation, wedding and funeral arrangements, seasonal snacks, daily utensils, river grass and insects, etc; the richness and vividness of daily behavior and movements of villagers. The multiple silhouettes of the daily emotions of the villagers are very vivid and vivid, and their expressive power is astonishing. Among them, some words have existed since ancient times; minority language words, part of speech changes; some dialects are clearly related to ancient sounds, but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onunciation from Mandarin. These common words and sayings generally present a character of continuity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blending elegance and vulgarity, and being lively and vivid, rich in expressiveness and local flavor.

Key words: the dialect of Xiajin; colloquial words and expressions; cultural connotations

面向德州对接东盟联络陪同口译人才培养研究

崔静静

(德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通过对参加2022中国—东盟市长论坛学生志愿者联络陪同口译的调查发现,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障碍主要是由跨文化意识不足、英语变体和文化差异造成的,因此,建议进行项目式教学法、陪同口译文化专题和口译实践常态化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增强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注重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不断改进教学质量,以便为社会输送更多合格的口译人才。

关键词:联络陪同口译;项目教学法;文化专题选择;课外实践;口译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66-03

一、引言

自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山东省与东盟各国地方政府间交流合作也日益增多。2022年7月28日至30日德州成功举办中国—东盟市长论坛暨协同创新发展大会,成为首个举办如此盛事的北方城市。^[1]德州是山东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山东省连接京津冀地区和雄安新区的重要桥头堡,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随着对外交流活动的持续推进,外事接待、商务陪同、贸易往来等活动越来越多^[2],对翻译人才的需求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为了满足德州—东盟经贸合作、人文交往等领域对口译人才的需求,作为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地方本科高校,德州学院对翻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二、德州对接东盟陪同口译现状调查

“联络口译”顾名思义是以联络为主题的口译形式,英文为“the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联络意味着译员要为双方架起顺畅沟通的桥梁,因而区别于会议口译等职业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口译形式。理想的译员不仅是语言的翻译者,还应是文化的斡旋人^[3]。在联络口译中,译员要参与不同场景的沟通交流,包括迎来送往、日程安排、宴请接待、旅游观光、参观购物等等。联络陪同口译比其他口译工作更具临时性、机动性,对口译的要求也更加灵活,需要译员对

信息进行及时地加工、整合、编辑、传递。^[4]

德州学院几乎每年都会派出几十名学生参与德州市举办的“智汇德州”、经贸洽谈会、论坛等外事活动,担任翻译志愿者,参与会议接待等工作。学生的知识储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口译技巧、双语转换以及临场应变能力等在口译实战中提高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2022年7月,适逢中国—东盟市长论坛暨协同创新发展大会在德州举行,笔者的部分学生有幸被推荐参加本次论坛的陪同翻译等工作,笔者对此次论坛期间的陪同口译工作进行了访谈和调查。在活动开始之前,外事部门首先对志愿者们进行了礼仪培训。学生们根据外国驻华大使发言视频中的英语发音和汉语字幕,制作了国内外嘉宾的中文名和英文名的表格,有些不能确定的人名登陆Facebook进一步确认,以确保翻译得准确无误。

笔者利用问卷星进行的问卷调查是在2022年7月28日至30日中国—东盟市长论坛暨协同创新发展大会之后完成的。参加本次调查的是已经开过口译课的大三同学53名,由于本次论坛的召开恰逢暑期,根据论坛防疫要求,有10名同学经过选拔参加了本次志愿服务。调查问卷问题如下:

1. 您认为英语专业学生口译能力提升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学习?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口语能力需要加强的占88.64%,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重要的占72.73%,认为实践能力

收稿日期: 2022-05-27

基金项目: 2021年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新文科视域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路径研究”(21CRCJ01);
2021年第二批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人机交互的大学英语翻译人才培养研究(202102062008)。

作者简介: 崔静静(1977-),女,山东德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际研究。

重要的占70.45%,认为扩大知识面和听力理解能力重要的占65.91%,认为听力重要的占56.82%。

2. 您认为陪同口译中出现交流障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52.2%的被调查同学认为语言功底不扎实,13.64%的被调查同学认为知识储备不足和跨文化交际都不够,9.09%的被调查同学认为口译技巧不熟练,6.82%的被调查同学认为对本土知识不了解。

3. 在接到德州对接东盟陪同口译任务之后,您认为哪些准备非常必要?

93.18%的被调查同学认为查阅相关的资料非常重要,包括东盟各国的文化习俗、禁忌、社交礼仪等,而75%的被调查同学认为准备本土的文化知识非常必要。

4. 您认为提高联络口译能力最应该重视什么?

95.45%的被调查同学认为语言综合能力很重要,63.64%的被调查同学认为跨文化交际很重要,61.36%的被调查同学认为口笔译技巧较重要,而52.27%的被调查同学认为语音语调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是开放性的,要求参加本次论坛的10名同学对参加本次陪同口译作总结并对口译教学提出建议。所有参与作答的同学都一致认为参加本次论坛收获很大,对自己的专业学习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为将来走向社会贡献自己所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更加坚定了将来从事与翻译相关工作的信心。绝大多数同学认为语言基本功非常重要,知识面窄、百科知识不足、跨文化意识不强是造成翻译不畅的主要原因。希望学校相关部门和外国语学院多提供锻炼口语和口笔译实践的机会;课堂上应增加角色扮演的模拟口译活动;学生课外多了解本土的传统文化知识、旅游景点、历史故事等;充分利用外国语学院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平台,掌握有关东盟国家英语变体方面的知识,注重吸收多元文化,提升跨文化交际意识,确保陪同口译的顺利进行。

三、联络陪同口译现状分析

联络陪同口译有利于推动跨文化交际和中外文化交流。由于联络陪同口译具有多样性和不可预见性,译员难免会出现译错、漏译和译不出等口译问题。本文对本次德州对接东盟合作论坛联络陪同口译方面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供有关高校改进口译教学。

(一) 英语变体造成的交际障碍

东盟各国语言与英语不断交汇融合,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语言变体——东盟英语。东盟英语在词汇、语音及语法上都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对译员的听辨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也造成了英语交际的障碍。

联络陪同口译员要学会做预判,译员的听辨在于主动分析识别原语篇章关键信息,而不是单纯、被动地听。标准英语关键信息是通过重读的方式加以强调,突出原语篇章的信息焦点。但东盟国家英语语音和句子重读后移倾向的特征会严重干扰译员对新旧信息的判断和关键信息的把握,形成关键信息识别障碍。东盟国家英语存在元音不分长短,辅音不分清浊的现象,比如齿音/θ/和/e/发成/t/和/d/, theme/'θi:m/发成/tɪm/,轻辅音/t/、/k/和/p/发成了浊辅音/d/、/g/和/b/,卷舌音/r/常常发成/l/或者颤音。单词重音方面存在后移倾向,弱读、连读较少,句子没有轻重音之分,加大了听众(译员)抓取关键信息的难度。语调方面,东盟国家英语的特点是每个音节的长短差不多,声调鲜明,听起来像一个个蹦出来的英语单词。另外,在非正式的口语表达中,常常在句尾出现lah、ah、hah等情态虚词用来代替语调,表达不同的语气。

口译教学中,教师应选取东盟英语变体的试听材料进行口译训练。一是让学生熟悉东盟英语变体的发音规律,提高东盟英语语篇听辨分析能力。在听辨训练中要学会抓关键词和句子主干,理清逻辑关系,提高加工、分析信息能力。二是自建语料库,让学生熟悉变体的语音语调和句式特点,提高口译听辨的敏感度。只有在平时练习中不断总结,才能在陪同口译实践中不慌不忙,沉着冷静,顺利完成陪同口译任务。

(二) 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与应对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映射,既反映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反映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文化差异也就体现了各自民族的鲜明个性。王佐良先生曾说过“译者处理的是个别词,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5],一名合格的联络口译员的文化知识储备要远远超出两大片文化区域。东盟国家因社会制度、地理特征、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历史传统和社会习俗等不同而在成语、典故、诗歌,以及寒暄、称谓、禁忌、敬辞、谦辞和委婉语等方面存在不同。作为一名译员,务必要学习体会这些文化差异,以便在口译中能够避开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赵蜻认为,文化因素的考虑与否决定着翻译的准确性及翻译质量,而跨文化意识的有无或程度的强弱也是衡量一名优秀译者的重要准绳。^[6]作为译员需要在日常学习中注重积累跨文化知识,增强跨文化意识,提高对外传播的能力,最大化扫除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适应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中对复合型外语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以便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

经贸合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对高校口译教学的建议及对策

综观国内相关院校的口译教学，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口译教学理念的演进，其教学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口译教学已从“口译专题教学模式”过渡到了“口译技能教学模式”^[7]。以译员能力为目标的口译教学意味着教学理念的改革，教学理念具体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中。

(一) 以项目式教学法创新口译教学

根据联络陪同口译的特点和学生的学情、基础，教师可以采用项目式教学法，选取难度适中，融实用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教学项目。进行项目式教学时，可以尝试将模拟项目案例和主题的筛选与教学内容的连贯性结合起来，如把项目大致分为迎来送往、礼仪致辞、企业文化、商业展览、旅游购物等项目。口译课上教师可以采取小组模拟演练的形式，每组3-4人，让学生根据场景和模拟案例要求进行角色扮演和角色互换。项目式教学法实操的关键在于项目式评价，教师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学生的表现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及时发现、总结口译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建议。为方便教学，外国语学院可以根据教学需求和学生学情购买口译案例数据库；或者自建一部分数据库；也可以筛选、整理政府工作报告、机构或团体活动的相关视频、音频等材料；或者通过实际建设项目数据库渠道，即从口译教材出版社收集案例数据；或者从翻译公司购买口译案例数据等作为教学素材。

(二) 陪同口译文化专题教学

高校在口译课程设置时应根据文化专题设计口译技巧训练，讲练结合。教师需以专题知识为线索组织教学，教学设计要以理论统揽，以技能为主，语言和专题为辅，通过归纳、组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提高学生整体的文化认知，让学生对口译专题和口译技巧作出选择。

在文化专题的口译课理论教学中，要注重跨文化交际理论和口译技巧的传授，讲解内容包括文化差异、口译技巧、译前准备、现场反应、译者的主动性和职业道德等。教师通过案例教学为学生呈现翻译错误、漏译、句式转换和文化转换实例，加深学生对例句翻译对比的理解。

(三) 口译实践教学常态化

口译实践实现常态化要求在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时提高实践学分的比重，将口译实践融入到校企合作和大学生校内外活动的方方面面，优化实践教学策略和

教师指导，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一方面校企合作要真正落地，大三实习阶段将学生分批派到需要联络陪同口译的政府部门，比如外事办、实习基地、翻译工作坊等参加口译等相关工作。另一方面，要结合本地的市场需求与翻译公司合作，或将学生派到本地的洽谈会、合作论坛、招待会等进行志愿服务，让学生多参加口译实践，积累实战经验，从而提高口译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鼓励学生参加省级以上口译大赛，在大三大四阶段考取CATTI三笔、三口证书，为将来考取MTI奠定扎实的基础，以赛促学、以考促学，提升学生的口译能力和职业意识。总之，良好的语言能力、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体系是一名合格译员的必备素质。只有在口译实践中不断地强化输入、输出，口译员才能在陪同口译实战中应对自如。

五、结语

口译作为跨文化沟通的一项社会活动，在传播中国文化、推动文明互鉴中起着积极作用。^[8]一名合格的译员应该在注重语言能力提升的同时，重视提升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深入研究不同文化的差异，才能在联络口译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传达讯息、沟通思想、增进情感的积极作用，也为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作出自己的贡献。而教师应充分利用多种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构建培养复合型、实用性口译人才模式，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联络陪同口译人才，为文明互鉴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全面加强东盟对接工作！推动德州打造中国北方对接东盟支点城市[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1366013477664616&wfr=spider&for=pc>.
- [2] 携手东盟相约德州！中国—东盟市长论坛暨协同发展大会开幕 [EB/OL]. <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728A0BPUB00>.
- [3] 李秋义, 关熔珍. 2016中国—东盟博览会陪同翻译问题应对启示[J]. 潍坊职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7(2): 95.
- [4] 王佐良. 翻译: 思考与试笔[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24.
- [5] 詹成. 论口译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 2010(6): 78-79.
- [6] 赵婧, 杜婷. 反差: 八千万学子习外语, 翻译人才缺九成[N]. 光明日报, 2006-03-27.
- [7] Wang, B & L. Mu. Interpreter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Recent developments[J]. *Interpreting*, 2009, 11(2): 267-283.
- [8] 朱巧莲. 课程思政视阈下的口译教学[J]. 上海翻译, 2022(1).

(下转第85页)

重黎—羲和氏族女子婚姻考

张德苏

(山东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重黎—羲和氏族女子的名称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皆以其族名作为称呼。借助这个特点,可以较全面地观察这个部族的女性在从传说时代的帝俊、少典经五帝至三王这一段较长历史时期内的婚姻史,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得到重黎—羲和氏族在上古时代的政治地位、部族关系及兴衰进程等多方面的信息。

关键词:重黎;羲和;婚姻;五帝;三王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3)05-0069-06

“重黎”是颛顼“绝地天通”之举的核心力量,也是其部族走向历史舞台的关键人物。以重黎为基点,在时间轴上向后延展,则有尧、舜、夏初时“历象日月星辰”的“羲和”为其后代,向前逆推,则有神话时期的“日母羲和”“月母常羲”为其祖先。重黎氏族实为一个历史悠久、以“天数”“星历”见长的文化部族。对这样一个历时久远且史料指称颇多变化的部族,如何用一个恰切的、可以持续使用的名词称呼,是我们一直考虑的问题。为了既能覆盖周全又能特点突出,同时能兼顾明确简练,我们姑且称呼这个部族为“重黎—羲和氏族”,这一概念的外延则涵盖此部族的全部历史。

对于这个有着特殊文化积淀的重黎—羲和氏族,目前的研究还有很多的空白。笔者此前曾作《重黎氏族源试探》一文,对其族源及居住地进行过初步探寻。本文则意在揭示重黎—羲和氏族女子的婚姻状况。

为什么要限于对此族女子的婚姻状况进行揭示呢?因为现存史料中,重黎—羲和氏族的男子与他族的通婚状况,只有陆终“娶于鬼方氏而生六子”这么一种记载。其他如“绝地天通”之重黎、“历象日月星辰”之羲和仲叔,皆无婚姻状况的记录。与此相反,此族女子的婚姻状况资料颇为丰富,而且有着非常突出的独特性。理清重黎—羲和氏族女子的婚姻状况,不仅有其本身的意义,还能够让我们从一个特殊的侧面获知此族在上古时代的政治地位、部族关系及兴衰进程等多方面的信息。作为此前研究的一个推进,本文试由此切入,来对重黎—羲和氏族进行一个全新视角的探究与展现。

一、重黎—羲和氏族女子名称考

要考察重黎—羲和氏族女子的联姻状况,需先知晓重黎—羲和氏族女子的名称,这是关于此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重黎—羲和氏族女子的名称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皆以其族名作为称呼而载于史料(其道理或与周世所要求的“女子称姓”相类似),基本写法有三:“羲和”“常羲”“女和”。可以看到,她们的称呼,“羲”“和”色彩极为明显,具有良好的辨识度,又因其在史料中具有相当程度的持续性,故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但是因为此族活动是在文字发明之前,口头流传过程中难免的音转、文字写定时产生的字讹,使其名字在文献中有很多偏离,甚至是非常严重的偏离,所以,在利用其名称便利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辨析与论证工作。先列其变化概貌如下:

羲和—娥皇—倪皇

常羲—常儀—常宜—尚儀—嫦娥—皇娥—姮娥

女和—女媧—女皇—女瑩—女英—女媧

这些还不是重黎—羲和氏族女子名称变化的全部,而是与本文有密切关系的部分。这么众多的名字都是重黎—羲和氏族女子名称的衍化吗?是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文献与音韵这两重证据证明这一点。

先看第一组。《大荒南经》一云“帝俊妻羲和”,又云“帝俊妻娥皇”^{[1]381}。大舜之妃通常写作“娥皇”,而《大戴礼·五帝德》又说“帝舜……承受大命,依于倪皇”^{[2]122}。可见,在文献上,“羲和”可作“娥皇”,又可作“倪皇”。

再借助音韵学上的观察,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此三

收稿日期:2023-03-07

作者简介:张德苏(1969-),男,山东德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上古史及先秦两汉文化研究。

名在本质上是同一个名字的音转变化。“羲”转为“娥”最易理解：“娥”字从“我”得声；“羲”字，《说文》云“从兮羲声”^{[3]204}，而“羲”也是从“我”得声。段玉裁发现：“一声可谐万字，万字亦必同部。”^{[3]817}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羲”“娥”在上古时期是同音字。二者在本质上只是同一个语词所用的记音字的不同。

“娥”又可转为“倪”。顾颉刚认为：“倪皇即羲和之音转，其后又转为娥皇。”^{[4]24}王力古音系统认为，“娥”在疑母歌部，“倪”在疑母支部；郑张尚芳上古拟音，“娥”为 $\eta a:l$ ；“倪”为 $\eta e:$ ，双声而旁转。

“和”之为“皇”也是合乎音转规律的。“和”字，黄侃、王力皆认为在匣母歌部，郑张尚芳拟音为 $go:l$ ；“皇”字，黄侃认为是匣母唐部，王力认为是匣母阳部，实无区别，郑张尚芳拟音为 $g^w a:\eta$ 。如此二字则为双声关系，同时，在韵部上是阴阳旁对转。

再看第二组“常羲”一名的变化。《大荒西经》：“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1]404}《吕氏春秋·勿躬篇》云：“尚仪作占月。”^{[5]1088}可见“常羲”“尚仪”为同一人名之不同写法。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注云：“尚仪即常仪，古读仪为何，后世遂为嫦娥之鄙言。”^{[5]1093}由毕沅注又可知前人的一个共识：“嫦娥”也是“常羲”的异写。《世本·帝系篇》云：“（帝誉）次妃姬訾氏之女，曰常仪，生摯。”^{[13]83}而皇甫谧云：“女名常宜。”^{[15]14}则又显示“常宜”即“常仪”，它与“尚仪”“嫦娥”一样为“常羲”的不同写法。

这组名字的变化，也可以用音转关系来解释。“常羲”转化为“常仪”“嫦娥”，一如上文所言，“羲”“仪”“娥”三字声符相同，是同音字之间的转写。“常宜”之“宜”（疑母歌部，拟音为 ηral ），与“仪”（疑母歌部，拟音为 ηral ）发音全同；“常”“嫦”皆从“尚”得音，三者为同音字无疑。同音字之间发生通转假借，是上古文献中的通常现象。“皇娥”“姁娥”的写法，则是因为“皇”“姁”与“常”叠韵之故。

第三组。《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女和月母之国。……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1]358}月母而称“女和”，说明“女和”与“常羲”是一人之二名。郝懿行注云：“女和月母即羲和、常羲之属也。”

“女和”与“羲和”间也是有音韵关连的。上文“倪”字是由“羲”到“女”的转换中介。郑张尚芳的上古拟音，“羲”为 $h\eta ral$ ，“娥”为 $\eta a:l$ ，“倪”为 $\eta e:$ ，“女”为 $na?$ 。如此，则“女和”即“羲和”，即“娥皇”。

舜之次妃通常写作“女英”，而《大戴礼·帝系》作“女偃”^{[2]130}，《世本》及《古今人表》作“女火瑩”^{[13]85;[14]878}，此皆为“女和”因音转而形成的歧写。上文已论“和”与“皇”之间是双声并阴阳旁对转关系，而“瑩” $g^w re\eta$ 、“英” $qra\eta$ 、“偃”为 $qan?$ 又为“皇”音的旁转、旁纽

变化。

“女和”而作“女媧”也是由于音近相通形成的。二字上古音皆在歌部，“媧”音 $kro:l$ ，与“和”音 $go:l$ ，声纽同为牙音，只有清、浊之别，发音极为相近。又有文献为证：《淮南子·说山训》称“和氏璧”为“芮氏之璧”，“芮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让而进之以合欢，夜以投人则为怨”。高诱注：“芮，古和字。”何宁《集释》引杨树达云：“芮，《说文》训口戾不正，与‘和’异字，非古‘和’字也，音近假用耳。”^{[6]1139}高注以二者为一字，是表象；杨注以为音近假用，则是深因。故知“女和”之写为“女媧”，只是同一名字因“音近假用”而生成的不同写法。

下面我们就以这些名称为线索，广泛吸收可用资料，利用现有的理论工具，爬剔拣选，梳理羲和一重黎氏族女子的婚姻状况。上古荒远，不敢保其尽确，但我们一丝不苟，努力求其实情。

二、重黎—羲和氏族女子婚姻资料汇集及考证

帝俊妻羲和、常羲。《山海经·大荒南经》：“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1]381}《大荒西经》：“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1]404}“羲和”“常羲”是羲和氏族女子名称的典型写法，此条是重黎—羲和氏族女子婚姻资料，最为鲜明，无需辨析。它来源于神话时代，是重黎—羲和氏族第一代祖先的婚姻资料。

帝俊的身份比较复杂，或认为是帝誉、帝舜，或以为是殷商族的祖先，或以为是天帝。本文更倾向于“天帝”之说。但在神话时代，这些身份之间其实完全可以相容相通。这则资料可以看作重黎—羲和氏族自神其族的神话，说本族的老祖母与天帝结合而生日月，表现出羲和氏族的来历不凡，说明了本族与星辰历象的神秘关系，用神话的方式表明了本族这一能力的来源及无可企及性。它是重黎—羲和氏族女子婚姻记录的开端，也寓含了世间部族乐于与其构建婚姻关系的原因。

少典之妃“有媧氏”之女。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为少典妃。”自注：“按《国语》，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媧氏之女。皇甫谧以为少典、有媧氏皆国号。”^[7]由司马贞自注可见，《三皇本纪》的说法源自《国语》，然今本《国语·晋语四》作：“昔少典娶于有媧氏，生黄帝、炎帝。”^{[8]356}不作“有媧氏”而是“有媧氏”，“媧”“媧”孰为正字？朱起凤《辞通》卷四“佳韵”“有媧”条认为：“媧字先讹作媧，形与媧近，因此致讹。”^{[9]112}也就是说，此字本作“有媧”而讹为“有媧”。这一说法有理，从“媧”之字而误作从“喬”之字，古书中多见。后文述及禹妻涂山氏女媧，亦有作“女媧”者，

可为旁证。此处司马贞《三皇本纪》自注所引《国语》作“有媧氏之女”，则唐时司马贞所见《国语》本尚未讹误。

上文已证“媧”与“和”的音转关系，所以少典妃所属之“有媧氏”即“有和氏”。“有”字是上古时期部族称呼常有的发声词，如“有夏”“有殷”“有周”，并无实义。故“有和”亦即“女和”。由此可以推定，少典之妃“有媧氏”实为重黎—羲和氏族的女子。

少皋母曰皇娥。晋王嘉《拾遗记》卷一云：“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10]12}《路史·后纪七》言小昊之父清配“於類氏，曰娥”^[11]，“小昊”即少昊。“皇娥”即“常羲”“常儀”的变写。单称“娥”，亦即“羲”义。断其为羲和一重黎氏之女没有问题。

或云：“於類氏”显然不是羲和氏，何以知此“皇娥”非另一族之女子？答曰：“皇娥”一称无他族，“於類氏”亦羲和之族，为行文简练计，与下文帝喾一节“諏訾氏”合并分析。也有学者认为帝喾之子“摯”即少昊，其母是帝喾四妃媧訾氏女常儀。若此，则正与《拾遗记》少昊之母名“皇娥”相应。

老童之妻高緇氏。《大戴礼·帝系》云：“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緇氏，产重黎及吴回。”^{[2]127}此“高緇氏”之“緇”，与“媧”声符相同，故同音，皆与“女和”之“和”相通转。“高緇”之“高”乃东夷语之发声词，与“有”有相同功用，“高緇氏”即“有媧氏”，即“女和氏”。

《山海经》羲和氏处甘水之间。^{[1]381}老童所娶之竭水氏，《世本》作“根水氏”^{[13]81}，根、竭皆与甘音近，三字皆归牙音，根、甘在见母，竭为群母；而且它们的韵部也相近，根在文部，甘在谈部，竭在月部。故竭水、根水即甘水。“甘水”乃“羲和之国”之所处。老童之妻“竭水氏之子高緇氏”，完全可以读为“甘水氏之子羲和氏”。

高緇氏所产“重黎”及“吴回”，正是颛顼、帝喾所任以“绝地天通”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证明，“高緇”即“有媧”，即“女和”，即重黎—羲和氏族之女。更为具体的论证请参见本文《重黎氏族源试探》^[12]。

根水氏之子，《世本》又载其名为“驕福”^{[13]81}。《汉书·古今人表》又作“媧極”：“媧極，老童妃，生重黎。”^{[14]870}如上所言，“驕”为“媧”之误，“媧”又为“媧”之误。“驕福”“媧極”实皆带有“媧”即“和”的信息。

帝喾妃曰常儀。《史记·五帝本纪》：“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媧訾氏女，生摯。”《索隐》引皇甫谧云：“女名常宜。”^{[15]14}《世本·帝系篇》云：“（帝喾）次妃媧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摯。”^{[13]83}“常宜”“常儀”皆“常羲”之别写，上文已申明。《路史》

卷十八则直接写作“常羲”：“高辛氏次妃有隗氏，曰常羲，生而能言，发迨其踵，是归高辛，生太子廋及月十二。”^[11]此处“月十二”之说，显然与“帝俊之妻常羲”完全对应起来了。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喾次妃媧訾氏女曰常仪’。《大荒西经》又有帝俊妻常羲，疑与常儀及此经羲和通为一人耳。”^{[16]6}袁珂《山海经校注》赞同郝懿行“帝俊妻常羲与帝喾次妃媧訾氏女常仪为一人”的说法。^{[13]82}

且“媧訾氏”一称亦能与重黎—羲和氏族建立联系。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常仪为媧訾氏，媧訾亦作邹屠，邾娄之旧族。”^{[17]52}《拾遗记》卷一：“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10]18}邾娄乃陆终六子之一，属于重黎—羲和氏族系统。媧妃常儀出邾娄，则即“常羲”无疑。《路史》帝喾次妃不称“媧訾氏”，而称“有隗氏”。《山海经·大荒南经》吴任臣注也说：“羲和、常羲，有隗氏。”^[18]“媧”“隗”与“邾”皆音近可通，何况邾国到战国时期，则直称“邹国”，更是明证。

“有隗”之“有”即“有媧”之“有”、“高緇”之“高”亦即“於類”之“於”，皆东夷语之发声词，用于地名、族名之前。详论见本文《“句昊”之“句”追原》^[19]。而“隗”“類”上古音皆属侯部，一音之转，“類”字又可写作“類”从“娄”声，更可看出其与“邾娄”在语音上的关系。可见“於類氏”与“邾娄”都是羲和氏族。

《五帝本纪》中所言帝喾之妃“陈锋氏”，历来未被人注意。“陈锋氏”亦作“陈酈氏”。王献唐云：“酈即风，羲族姓也。”^{[17]372}如此，则帝喾之陈酈、媧訾二妃皆羲和一重黎氏女。

尧娶富宜氏之女皇。《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尧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20]214}《路史》卷二十：“帝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11]《御览》卷一三五引《帝王世纪》为“女瑩生丹朱”^{[21]656}。可见“女皇”又可异写为“女瑩”。根据上文我们对羲和氏族女子之名的辨析，“女皇”“女瑩”的名称皆由“女和”一名音转演化而来，可以确定尧妻出于重黎—羲和氏。

但是我们如何理解典籍中所说的“富宜氏”呢？《帝系》《世本·王侯大夫谱》《汉书·古今人表》不作“富宜氏”，而作“散宜氏”，对此罗莘在《路史》注中认为“缪”。本文也认为应作“富宜”而非“散宜”。“富宜”实为“伏羲”的音转，“富”pʷɣs、“伏”bʷɣs同属职部而帮、并旁纽。“羲”“義”“宜”皆疑纽歌部，可以通转，上文已证。《说文》：“羲，从兮義声。”“羲者宜也”乃古之常训，音义皆相应。

伏羲、女媧与羲和氏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羲和氏族或即伏羲、女媧的直系后裔，或者伏羲、女媧是“羲和”的分化。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已搜集到相

当多的证据,但这是一个大问题,将另文探讨。这里我们的认识是:尧所娶之“富宜氏之女皇”,实即“羲和氏之女和”。

舜之二妃“娥皇”“女英”。《尸子》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尧……妻之以媼,媼之以娥。”^{[20][215]}“媼”“娥”之名,若对应典型写法就是“和”“羲”。其为重黎—羲和氏女名无疑。有学者认为舜、俊、帝誉为一,传说歧为三人,若此,则娥皇、女英即羲和、常羲,更无疑义。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文献明言为“尧之二女”,何以归其为羲和氏之女?“娥皇”“女英”,这是典型的羲和一重黎氏族女子的称号,尧的女儿也用此称,本身就值得探讨。二女为帝尧之女与为重黎—羲和氏族之女,二者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而是可以并行的。这可能是由于羲和族行母系继嗣制带来的特殊景观,如上文所论,尧妻女皇既是羲和氏女,她的女儿即被承认为羲和一重黎氏女,可得“娥皇”“女英”这样的称号。同时,因为当时大部分部族已经改行父系继嗣制,为了与行父系继嗣制的尧氏族相协调,羲和氏也承认二女是尧族的子女。这在人类学上叫做双系继承(Bilateral Descent)。重、黎一代即已如此,请见拙文《重黎氏族族源考》中“重黎有独立的氏族源出”^[12]一节的讨论。

历史已经发展到尧时代了,羲和一重黎氏族却一直行母系,这个现象可能会使人觉得难以理解,但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天文历象文化传统的部族,保持更古老的生活方式,既是保存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保持其神秘色彩的可理解的做法,一如某些宗教仪式,其服饰仪规历数千年而不稍变更。

禹娶涂山氏之子女媼。雷学淇校辑本《世本·帝系篇》:“禹娶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媼,是生启。”^{[22][89]}据上文我们对羲和氏族女子之名的辨析,“女媼”即“女和”之音转,则禹妻亦羲和一重黎氏族之女。陈梦家《古代的神话与巫术》云:“羲若娥即卜辞之娥,即涂山氏女媼。”^{[23][528]}张澍粹集补注本《世本》作“女媼”^{[13][87]}。《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媼。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媼生启。”《大戴礼记·帝系》作“女媼”。^{[21][30]}《汉书·古今人表》作“女媼”^{[14][880]},这众多的异写皆根于“媼”字。上论“媼”乃“媼”因形近而讹。台湾学者王孝廉直言此事云:“女媼、女媼、女媼也就是女媼。《世本》说:‘涂山氏号女媼’,更可知禹的妻子是女媼无疑。”^{[24][5]}《乐纬动声仪》曰:“禹治水,昊天赐神女圣媼。”^[25]羲和氏之女正合“神女圣媼”之说。

羿妻嫦娥。《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高诱注:“姮娥,羿妻。”^{[6][501]}羿妻嫦娥之事,虽然神

话色彩浓重,但是“嫦娥”是羲和一重黎氏族女子的典型称呼,还是值得我们去进行一番探讨的。

羿以嫦娥为妻,与羿“因夏民而代夏政”之后,对天命的求取有关。夏初,“传天数者”仍为羲和,按照传统,羲和是帝王得天命的媒介,或至少是仪式的主持者。羿“迁于穷石”即为接近羲和、得到羲和的支持,却遭到拒绝。“胤征”则是在遭拒后的武力威胁,又不成,则以“废时乱日”之罪名灭掉了羲和氏,而挟嫦娥为妻。其因由在于,历代得天命之帝王皆娶重黎—羲和氏女,这一“惯例”经过久远的实行后,在巫风尚浓的夏初时代,足以成为王者得天命的象征之一。这方面的论述请参看本文的预备性文章《有穷后羿所迁“穷石”位置考辨》中“‘迁穷石’是为‘得天命’——释‘迁于穷石’之‘迁’”一节^[26]。羿妻嫦娥乃重黎—羲和氏女子婚姻记录之绝响。羲和氏被灭,同部族之昆吾、大彭、豕韦随后虽仍承担夏、商“传天数”之责,但不再以“羲和”为称,其族之婚姻状况亦不再见于史料。

以上皆人名证据非常明显的羲和氏女子的婚姻状况探索。可以看到,由远古之帝俊经五帝时代到三代时期之夏人,皆有以羲和一重黎氏女子为配的做法。至于殷、周之女祖——有娥氏简狄与有邰氏姜嫄,笔者曾因其名氏与“羲和”“常羲”之称差异较大,而未敢视其为羲和一重黎氏女。然而,近代以来诸大家却早已借助甲骨文字证明:殷、周二代之女祖,实亦“羲和”“常羲”之属。着实不可忽视,今介绍如下:

近代诸贤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源于对甲骨文中“媼”字(《前》四,五二,二)与“媼”字(《前》六,二,二)^[27]的探讨。罗振玉、郭沫若、丁山等皆释“媼”为“娥”,释“媼”为“羲京”。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认为“娥字除固有名词之外古无他用,……故此名娥之女性(字上从我下从女)当即娥皇,亦即羲和”。^[28]又论“媼”字云:“余谓此乃羲京二字之合书,人名合书乃卜辞通例。羲京由音而言则当即常羲若常仪(古羲、羲、仪均读我音,同在歌部,京、常同在阳部)。”^{[28][226]}至此,这些认识与上文所述并无差异,而接下来的观点则让我们耳目一新。

卜辞反映出,殷人对“娥”与“羲京”的祭祀规格相当高。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列举大量资料,并总结云:“观于卜辞屡次‘宜于义京’,至于殛人十余,卯牛十数,皆特祀而不卜日,可以想见其典祀之崇。”^{[29][66]}由此他们提出:“娥”及“羲京”即“有娥氏简狄”,亦为“周祖姜嫄”。

契母有娥氏即羲和。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认为,日母羲和就是有娥氏,他论证了“娥”与“娥”和“羲京”之间的关系:“娥母之娥,或从我作‘甲

我’，与羲京之羲（羲）、娥姜之娥，声母相同；然则，娥母实即日母羲和；凡《商颂》《离骚》等先秦载记所传说的有娥氏，都是‘日母羲和’之误。”^{[29]77}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说：“姜嫄、简狄，或娥皇、女英，或羲和、常羲，其初字则当为卜辞中之‘娥’与‘羲京’。”^{[28]227}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又从另一个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是挚即契，其母常儀，即《大荒西经》‘帝俊妻常羲’之常羲。”^{[23]490}这也证明契母简狄即皇娥，即羲和氏女。

几位大师的这些探索非常具有启发性，也切近于史实。由此，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古人称简狄为“瑶台之佚女”（《离骚》），又说“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吕氏春秋·音初》），而“**𡗗**”字，上羲下京，其象即是高台之娥，与简狄之处“九成之瑶台”完全可以对应起来。而“瑶台”之称又与羲和氏观象之“世职”直接相关。古人观天象须居高台，须以“璿玑玉衡”之类的玉制仪器来“历象日月星辰”，故其台又可称为“瑶台”。如此简狄之为羲和氏女，又多一证矣。

周族女祖姜嫄也是羲和。由对“羲京”的研究，多位学者又提出“姜嫄即为羲和”的观点。郭沫若：“帝喾之二妃姜嫄、简狄，亦当即娥皇、女英之变”“知帝喾高辛氏即帝舜，则姜嫄、简狄亦必即羲和、常羲”^{[28]226}。丁山认为：“娥简，在甲骨文里有时称为羲京、羲京，到了姬周，则又变名为姜嫄了。”其论云：“**𡗗**之上羲字，字本从羊，或可读为姜；其下京字，又可读为原。是则姜嫄者，固当为羲京之音转。所谓‘裸将于京’者，京，当是姜嫄的神庙。”^{[29]77}如此，则周人之女祖也是羲和氏女子。《山海经·大荒西经》早已存在这方面的证据：“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1]392}稷是帝俊之子，而帝俊妻一是羲和，一是常羲。若取对应，则姜嫄正是羲和、常羲之属。若以俊、喾、舜为一人的观点，则帝喾正妃为姜嫄，也与帝俊妻羲和、帝舜妃娥皇相应，又从另一条路上证明，羲嫄亦重黎—羲和氏族之女。

如此，则五帝、三王或以重黎—羲和氏之女为配，或以重黎—羲和氏之女为母。为了表达的直观，我们将重黎—羲和氏族女子婚姻状况总结成为表1，作为我们考证的收束。

三、帝王多与重黎—羲和氏族通婚的原因

从现有的上古史料看，没有哪个部族的婚姻状况能如羲和一重黎氏族这般完整，史料所记古帝王的妻、妃如所谓“华胥”“嫫祖”“女登”“女节”等多没有持续性，更没有系统性。然而重黎—羲和氏族女子的

婚姻资料却在一段极长的历史过程中有着连续不断的记载。这本身是极为值得思考的。

表1 重黎—羲和氏族女子婚姻状况

帝王	妻；妃；母	转换为典型写法
俊	羲和、常羲	
少典	女登，有嫫氏女	有和氏
少皞	母曰皇娥	常羲
老童	根水氏高緇	高和
帝喾	有娥、常仪	常羲
尧	女皇	女和
舜	娥皇、女英	羲和、女和
禹	女媧	女和
契	母曰有娥氏	常羲
稷	母曰姜嫄	羲和
羿	嫦娥	常羲

我们不能断言羲和氏女子皆以帝王为配，这可能只是史料记载的偏重带来的观感；但我们换一个角度，说远古帝王以羲和氏女子为配的情况很多而且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持续性，则是没有问题的。始自五帝前之帝俊、少典而至五帝之颛顼、帝喾、尧、舜，再到三代之始祖，其配或其母皆是重黎—羲和氏女。如果我们截取尧舜时期做一个断面观察，更会对我们这个认识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一时期的核心领导层中，作为帝的尧、舜、禹皆以羲和氏女为配，而在司徒、后稷之位上的契与弃皆羲和氏女之子。

何以如此？因为重黎—羲和氏族拥有强大的文化力量与原始宗教力量。重黎—羲和氏族的祖先羲和、常羲为日、月的生母；没有他们的祖先，日月是无法出现的。当然这绝非历史事实，如果用现代人类学理论解读，这个神奇说法可能意味着此族有着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和相对准确的日月运行规律的把握。但这种关于天文历象的知识与能力，在原始时代往往会被看作能够沟通上天、获知天命的“神性”，他们的祖先为日月之生母的神话，会被信以为真，这个部族的首领则会被看作“口含天宪”的大巫，从而受到众多部族的崇拜与依赖。

有崇高之位望，则帝王不可不借助之。当颛顼帝认为需要垄断天命沟通之权，以便使政治权力更加集中的时候，他便选择了这个部族的首领重黎来完成“绝地天通”的工作，改变“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局面，“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30]562}，从此“天命”出于一家。至尧时代，也继续任用“重黎之后”“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31]28}。这项工作一方面可以在技术层面提供生产生活节律的便利，另一方面可以在宗教层面聚拢人心、强化号令，增强统治力量。政治首领们也乐于渲染重黎—羲和氏族的神性。帝喾时期，号之为“祝融”。可以说，重黎—羲和氏族在五帝时期有着崇高的、不可或缺而又无可取代的地位。

有崇高之位望,则帝王不可不密切之,密切之则必系之以婚姻。婚姻是远古社会缔结同盟、密切关系的最重要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这是重黎—羲和氏族女子多与帝王联姻,帝王也乐于称扬与羲和部落的联姻的最根本的原因。

同时,在巫文化思维中,一件公认的、有持续性的事情本身就展现一定的神秘力量,上古时期的人们会把它的存在与自己所认为的一个结果联系在一起,形成不同于后世理性逻辑的神秘关联。当娶重黎—羲和氏之女为妃,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具有“受天命”的蕴意的时候,就会更有力地推动帝王与重黎—羲和氏族通婚。这是帝王多与重黎—羲和氏之女联姻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一点尤其能够解释羿灭羲和而妻嫦娥的“怪异”行为。

这类记录至夏初后羿之妻嫦娥就戛然而止了。这类事实未必不再发生,应该只是这类记录在史料中湮灭了。这种现象实际上显示了重黎—羲和氏族衰落,或者意味着与重黎—羲和氏族联姻的重要性已经大幅度降低。由此经殷商中叶巫文化转型,又至周初史文化时代开始,重黎—羲和氏族一步步淡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前边提到史书多记重黎—羲和氏女子的婚姻,而其男子的婚姻除了陆终娶鬼方氏之女外,其余皆不见于史料。远古时期的婚姻关系往往是相互的,一族的男子娶另一族的女子为妻,其女子也会以那一族男子为夫,如所谓“秦晋之好”。也就是说重黎—羲和氏族的男子应该也是多与帝王之家联姻,只是没有被记入史册。这个现象也许正说明重黎—羲和氏族主要是文化威望,而不是社会进程中的直接政治影响力。其男系的婚姻状况与社会进程的影响甚微,故史家不记。

参考文献:

- [1] 袁珂. 山海经校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2]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3]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4] 顾颉刚. 民俗学论集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 [5] 陈奇猷. 吕氏春秋新校释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6] 何宁. 淮南子集释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8.
- [7] 司马迁. 史记(卷一) [M]. 百衲本二十四史本.
- [8] 左丘明. 国语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9] 朱起凤. 辞通(卷四) [M]. 上海:开明书店, 1934.
- [10] 王嘉. 拾遗记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11] 罗泌. 路史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2] 张德苏. 重黎氏族族源试探 [J]. 德州学院学报, 2017(5).
- [13] 张澍. 世本(穉集补注) [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 [14] 班固. 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 [15]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 [16] 郝懿行. 山海经笺疏(卷十五) [M]. 上海:上海还读楼刻本, 光绪十二年.
- [17] 王献唐. 炎黄民族文化考 [M]. 济南:齐鲁书社, 1985.
- [18] 吴任臣. 山海经广注(卷十五) [M]. 康熙丁未本.
- [19] 张德苏. “句吴”之“句”追原 [J]. 德州学院学报, 2019(1).
- [20] 欧阳询. 撰. 艺文类聚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21] 李昉, 等. 太平御览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6.
- [22] 雷学淇. 世本考证 [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 [23] 陈梦家. 商代的神话与巫术 [J]. 燕京学报, 第 20 期, 1936.
- [24] 王孝廉. 岭云关雪——民族神话学论集 [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2.
- [25] 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五十四) [M]. 嫫嬛馆补校本.
- [26] 张德苏. 有穷后羿所迁“穷石”位置考辨 [J]. 德州学院学报, 2020(5).
- [27] 罗振玉. 纂辑. 王宏, 释文. 殷虚书契 [M]. 天津:天津古籍书店, 1993.
- [28]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 [29] 丁山. 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 [M]. 上海:上海书店, 2011.
- [30] 左丘明. 国语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31] 孔颖达. 尚书正义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On the Marriage of Women from Zhongli—Xihe Tribe

ZHANG Desu

(Culture Communication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dong 264209, China)

Abstract: The women from Zhongli—Xihe tribe had characteristic names which taken after their tribe's name. By this advantage, we can make an observation to the marital history of this ancient tribe in a long time from Dijun Shao dian to Five Emperors and Three Kings. Which can help us, from a special angle, gain much information about the political statu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tribes and its rising and falling of Zhongli—Xihe tribe.

Key words: Zhongli; Xihe; marriage; Five Emperors; Three Kings

浅论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社会交往

姜朝晖, 李敏

(德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的社交具有鲜明的世俗性。学校里派系林立, 人际关系复杂功利, 普通教职员必须努力争取成为各种权势人物的“自己人”, 才能保住饭碗。教师们的校外人际交往既是社会习俗, 同时也是教师拓展自己人脉关系的主观需求。由于社交对于许多教师来说几乎是一种生存技能, 所以使得民国教育界的社交活动功利性很强, 甚至出现庸俗化的倾向。另外, 民国时期某些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社交还隐含有一定的政治性。

关键词: 中小学教师; 社交; 民国

中图分类号: G645;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75-05

人是社会动物, 社交是一个人必要的日常生活内容, 是其个人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必要途径。民国中小学教师的日常人际交往是指当时的中小学教师们在家庭和其它一切正式组织之外的社交和人际关系。当时的中小学教师作为有一定社会地位、有一定智识能力和社会抱负的知识分子, 其日常人际交往不仅是其必不可少的社会生活内容, 也是他们有意地营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拓展自己的社会影响, 维护和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

民国中小学教师的日常人际交往主要从校内和校外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校内人际关系

民国时期中小学学校里人际关系的特点是派系林立, 纠纷不断, 人际关系复杂。一个普通教师想立身世外、独善其身, 那是不可能的。

民国时期造成教育界派系林立的根本原因在于, 社会经济不发达, 当时各级学校的工作职位是基层社会为数不多的公职, 也是当时读书人的重要出路之一, 这些学校也是地方权势人物力图把持的重要地盘。这样, 就形成一个地方人事更迭的套路循环: 行政当局一更换, 必然要更换教育厅长或教育局长; 教育局长随之任命各省立、市立、县立学校的新校长; 校长聘任制度下, 校长随之更换一批教师。这种人事任用环境必然造成各学校里派系纠纷不断。

有人回忆, 整个 1920 年代的北京公立中小学的校长教师几乎都卷入了京师“学务局内的三派之争”,

学务局这三派分别是“旧人”“官僚习气较深的国民党人”和“青年派”, 而且这三派之争又为“后来的‘京保争’打了基础”, 京派与保派之争一直延续到 30 年代初。至于上述派系之争的本质, 正像有人指出的:“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无非是为了各自地方势力”。^{[1]645} 马叙伦回忆 1920 年代初期杭州教育界的派系时, 这样说:“杭州教育界分成两系, 一系是前进的, 一系是保守的(其实是饭碗主义)”。^{[2]76} 而他自己当时在杭州任一师校长, 在他身边团结了一批北大和师大的青年, 因而被“杭州教育界保守派”称为“马黄党”(马指马叙伦, 黄指的是黄人望)。^{[2]86} 在民国年间当过两年省立小学教师和 11 年省小校长的许一默, 深谙民国河南教育界派系阵营的内情, 他说:“河南省小均被各个派系所掌握”, 据称有“河大派”“开封女师派”“省立开师派”“洛阳师范派”“百泉师范派”等等。^{[3]118} 同样, 有人评价江西中学教师当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之一就是“派系之见”, 而且他认为“查今日教育界派别之分歧, 实为教育破产之一绝大原因”。^[4] 即使是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 教育界也不平静。据安徽颍上县的文史资料记载, 民国时期颍上县的朋党之争很激烈, 在抗战之前县里的主要权势人物争权夺利、互相攻讦的主要领域就在教育界。“那时的斗争重点, 多在教育领域, 主要是争夺学校、校长。……也由于派别的对立, 用挑动学生闹学潮的手段垮掉对方校长的事件也有几起。”^{[5]70}

所谓的派系都是由私人关系——亲戚、同学、同乡、师生、校友等结合而成的松散团体, 地缘、亲缘、

收稿日期: 2022-12-06

基金项目: 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民国时期社会期待下女教师的社会角色研究”(2022DZZS022)。

作者简介: 姜朝晖(1968-), 女, 山东庆云人,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学缘关系是民国教育界比较认同的派系纽带。“河南省小均被各个派系所掌握。如省立一小、五小、九小属河大派。一小校长郑孟芳,是教育厅长李敬斋的小同乡,开封教育实验区主任李廉芳的高足,又跟李廉芳从事实验工作多年。五小校长戴秉忱,是河大前身留美预校毕业,李敬斋是他的校长,豫鲁监察使、国民参政会参议员郭仲隗是他的小同乡。九小校长胡兹奇,是河大毕业,跟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的人熟识。”^{[3]118} 陶钝这样描述 1930 年代的山东教育界由于何思源做教育厅长所形成的派系关系,“何思源作教育厅长,用人的系统,人称是:‘六中、北大、哥伦比亚’。他是曹州六中毕业考入北大的。六中的校长教员对于如何考北大,有一套考试经验和办法。……北大毕业除了回六中以外,由教育厅分配全省,拿着北大文凭,等于端着饭碗。何思源留学,又拉拢了哥伦比亚一个班子。他当了教育厅长以后,去哥伦比亚的留学生回到山东就有美差,推荐教育部就可以当教授和政府官员。所以人称六中、北大、哥伦比亚。我也是属于北大系统的,所以在毕业即失业的年头没有感到谋职业之困难。”^{[6]330} 可以想见,这种日常的同学、师生、校友、亲友之间的私人关系对于维系派系认同,保障教师个人的职业利益是多么重要。

有派系,自然就有争权夺利的派系纠纷。一般派系纠纷的目标都是为了争夺地盘,将自己人安插进学校;而派系明争暗斗的方式也无非是借助私人关系,背后拆台或请托,甚至拉拢学生、鼓动学潮。

“河南省小均被各个派系所掌握。……1946 年,一小校长郑孟芳当选监察院监察委员之后,校长位置引起河南各个教育派系的争夺,出面角逐的,据教育厅传出消息,多达 40 余人,动员的势力,涉及中央的部长,省级的参议长、参议员,省府的厅长、委员,省党部的主委和委员。河大的校长、院长和系主任、地方的豪绅等;纵横联系,层层 X 托,当面叮嘱,信电推荐,可谓极一时之盛。当时八面玲珑、神鬼不犯的教育厅长王公度,对一小校长的席位,迟至数月,未敢决定。”^{[3]118} 河南中等教育界同样也如此热闹。1928 年河南省立第一高中成立,王芸青任校长,“王芸青系北京大学毕业,从这时起,省立第一高中便成为北大派在开封的阵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省立一中当然也曾引起过其他派系的垂涎,期间曾有其他人继任校长,但引起轩然大波,大部分教职员辞职,学生公开反对新校长,不断地“哄教员”,“有一个班,一学期‘抬’(即哄赶之意)了 9 个物理教员”。新校长一年多时间“没过一天安静日子,无可奈何,只得辞职。”校长不得不又换上王芸青,同时辞职的教

职员工也陆续返校。^{[7]204} 陶钝曾这样描述 1930 年代的山东教育界的“北大系”与“师大系”的争斗与妥协:“那时,已经开始了北大系和师大系争夺校长的角逐了。因为北大出的校长多一些,师大系方面就不服气,掀起了一个反何运动,闹得满城风雨。这些反何的和共产党没有关系,可能在南京也有点根底,何思源不得安心,也怕被有力者弄下去,所以把省立学校平分秋色。高中、一师、一中等属于北大系;女中、女师、乡师等属于师大系,各自安心吃饭,不要抢夺。送出国留学学生就安排北大、师大和清华各一名,如果只有两名,那再看考的如何。”^{[6]330} 显然,派系斗争的起因是源于利益冲突,而派系妥协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各方利益的平衡。

学校里派系林立,纠纷不断,校内人际关系自然就很复杂。普通教职员工很难超然独立,必须努力争取成为各种权势人物的“自己人”,才能保住饭碗,所以,普通人际交往也是很功利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校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并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构成一种事实上的依附关系。校长聘任制下的教师任用制度使得教师的职位有无完全系于校长的好恶,必然造成教师为保住饭碗,不得不巴结校长,趋炎附势,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有人同情地说:“教师为着保持生活,往往出于奔走引援,或笼络学生,拨弄风潮,或树立派系,互相倾轧,这种行动,看来固然不当,但是现在的教师,在法律上并没有相当的保障。他们为保持自己生活起见,迫而出此卑下之举动,行虽可鄙,但是行政当局方面,多少也要负些责任。”^[8] 再加上当时学校管理不规范,校长腐败问题比较突出,所以校长与教员之间的关系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剥削关系。“凭良心来讲,过去主持地方教育行政的人,多数以政治的手腕,来主持教育行政,维持他私人的地位。……非但如此,甚至再向小学教师的本身上来剥削(如每月捺拨薪金,而取利润),如此这类的主管教育机关的领袖,其所属的校长,自然也照样用起微渺之政治手腕于教员。结果最吃亏的,只有那没有下属的教员!”^[9]

教师同事之间的关系就更复杂了,相互之间拉帮结派、明争暗斗、党同伐异是比较普遍的。“现在一般中学校的教职员,意见分歧,互相倾轧,差不多是普遍的现象。”^[10] 利益竞争,再加上文人相轻,使得学校教师之间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也数见不鲜。“先生和自己是同事的关系,同事之间,能本着‘同病相怜’‘同舟共济’的固多;而‘同行如敌国’‘倾轧排挤’的也时时会遇到。”^[11] 甚至在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里,寥寥几个同事之间都不能坦诚以待,而是各怀心思,互

相排挤,同事关系并不和睦。“这所学校,是乡村的公立学校,经费是由祖 X 拨助的,教员(校长在内)共有五个,校长兼教员。虽然这几个教员之内,可是学历非常之差(原文如此),由高小毕业的也有。笑话得很,各教员互相怀着一个鬼胎,大有你想我死我想你亡之势,只是校长一人,是个很好的吧了!我每日里下课,只和校长谈谈,其余的虽为校中同事,而实则如陌路之人,这真笑话啊!”^[12]

当然,对于教育界的人事环境,由于个人经历不同,主观感受也有可能不同。比如,有人曾经因教师生活清苦而离开了教育界,但在十几年后重回教育界,认为教育界还是一个相对“澄清的环境”。他说,“教师总是一个知识阶级,不像商人们唯利是图,不像贪污土劣之奸猾难于应付,所以教师之间容易互相体谅,决无利害的冲突,而有互相协助的精神,每一件事都能料理得非常清楚,大家都负责干,而且不能不负责。”^[13]所以在他看来,对比政界或商界,教育界的人际关系还是比较单纯的。

二、校外人际交往

除了与校内同事的交往之外,作为一个正常社会人的中小学教师,与校外各种人员的交往也是必要的。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校外人际交往的动力既有来自外在环境的要求,也有教师内在的需求。

由于多数中小学教师生活在基层社会封闭的小圈子里,邻里亲朋之间的人情应酬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习俗,回避不了。当时一个教师的能力并不仅仅体现在教学能力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他们能与当地民众相处融洽,而日常社交是他们快速融入地方社会的必要途径。陶钝在回忆录中就讲到他在故乡山东诸城做高小学生时的一位张姓教师,这位张老师本身是临县——胶县的一户大地主出身,为防土匪绑架勒索,不得已落户诸城。但是他本人在诸城是外来户,社会关系单薄,没有背景,这在当时的基层社会是一个很不利的处境。为缓解自己在当地的身份尴尬,张老师积极参加当地高小学生和教师们组织的新剧排演,“借演新戏和高小同学增多了联系,和绅士们的子弟,也有了来往。”^[16]^[176]

普通教师的世俗交往,特别是与那些权势人物的交往,拓展了自己的人脉关系,往往意味着社会晋升的机会。尤其是在校长聘任制这种用人机制下,学校用人往往形成派系把持,所以对于一个普通教师来说,校外社交圈子的大小、社交能力大小直接决定着教师饭碗的有无,所以普通教师主观上也有很高的社交需求。一个能够在教育界长期从业的教师,除了自己的业务能力之外,往往还有着比较强的社会背景,他的

亲戚、同学、同乡、老师、朋友、同事等各种私人关系都是他的人脉资源,都有可能在一时刻成为他谋职或晋升的阶梯。从民国时期教师的任职经历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私人关系是教师辗转入职的举荐人和敲门砖;如果跟对了人,则有可能长期受到照顾。比如,金景芳在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时就非常感谢金毓黻先生的帮助和提携。1931年4月间金毓黻做辽宁省教育厅厅长,当时在教育厅做股长的金景芳曾受命代金毓黻起草一篇序文,“自此以后,我受特知于金毓黻先生,前后近二十年,我在工作上、业务上,一直得到他的帮助。例如,九一八事变后,我在沈阳市第二初级中学任教,就是他介绍的。1936年8月,我从东北逃往关内,事前也是同他约好了的。1937年,金毓黻先生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我做他的秘书。1938年2月,我到鸡公山东北中学任教,是他介绍的。1941年11月,我由东山复性书院,调到三台东北大学任文书组主任,1942年转任中文系讲师,也是他介绍的。”^[14]^[175]

由于社交对于许多教师来说几乎是一种现实性的生存技能,所以使得民国教育界的社交活动有很强的功利性,甚至出现某些不正常的现象。

首先,大多数教师是通过日常交往来联络感情、交流思想,营建个人关系网络的,这种社交活动对于那些出身底层,刚刚进入社会,人脉资源短缺的青年教师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难关。那些功课虽好,学历也不错,但欠缺人脉资源的青年学子,如果再是书呆子,或者比较清高,那么他在谋职的时候就会遭遇挫折。一位在大学二年级时就在南京私立中学兼职的大学毕业生,这样谈到他毕业后在江苏谋职的心路历程:“顶着簇新的正方形的内切圆的方帽,同时又挟了自认为是可宝贵的服务三年以上的经历,一种岸然的高傲把梦想升得极高,满以为憧憬已久的江苏第一流省校的第一流教师的位置可以稳稳之取得了,但是教界领域里人浮于事,派系森严,专通关节的情形,并不亚于行政界,凡是带有十足的书呆子气的大学生,或是自认为有骨气而不善逢迎,假如对此情形果真要嗤之以鼻,不屑为伍,那就只好请你打轿回衙了。”在社会上蹉跎两年以后,这位大学毕业生终于获得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教职,而他将自己成功原因归因为——“这无疑是人关系成熟的一种表现”^[15],而不是自己的业务能力提高的自然结果。由此可见,人际关系几乎事关教师个人职业的兴衰。

其次,中小学教师的日常交往有时呈现出极其庸俗的畸形状态。对于身处基层的农村中小学教师来说,由于他们所处的乡村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人情

关系更重要,所有乡村公共事务都是本着乡村社会的习俗、凭借熟人之间的老关系、老习惯来处理的,所谓制度规定等可能并不起作用。对于大多数乡村学校的青年教师来说,与乡村社会打交道虽然是他们的“必修课”,但不容否认的是,他们在先天条件是缺乏融入乡村社会的社交优势的。首先,对于保守落后的乡村来说,新式教师就是乡村社会不熟悉的新文化的化身,先天地就可能遭到乡村社会排斥。其次,乡村教师大多数是外来人,在本地无亲无故,无人脉后台;而且他们普遍又比较年轻,不通地方习俗和传统,人情世故、社会经验和交往技巧等等也都不足,所以,处处遭冷眼、受排挤是经常的事。

有位视导员记述了这样一件实例,“某次我到一乡村小学去视导,那学校新换了校长,旧校长是一位办学老手,和地方联络得很好,新校长呢,是上海某女校高中师范科的第一名毕业生,新做教员,功课很好,教学法,办事能力,全够标准。只是在学校里高傲惯了,不通世故。在到任的第二天,镇上的一些流氓来讨赏钱,她满肚子的原理原则,教材教法,却不曾知道应付流氓的事,便连讽带嘲的抢白一番,流氓愤愤而去了。当天晚上,学校的黑板全部被窃,校长才知道流氓们的手段。连忙托人加倍奉承,到了晚上,黑板又物归原处了。但流氓们还余恨未消。该校的校舍与镇上的警察分驻所毗连,分驻所的巡官也是一个青年,于是流氓们题材来了(原文如此),平空造出许多谣言,说校长和巡官怎样怎样。把一个目空一切的校长,说的欲辩无从,不敢出校门一步。但也奈何他们不得!”由此,这位视导员这样总结乡村教师的工作经验:“新教师们最感痛苦的,除了待遇之‘清’和生活之‘苦’以外,就要算人事方面的应付了。”而这种所谓“人事方面的应付”是指“除了同事之间外,校外联络也要顾到”^[16]。显然,这里的校外人事就是指与乡村社会各色人物打交道、处理社会事务的综合能力,而不仅仅是专业教育教学能力。

民国时期研究乡村教育问题的专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乡村教师职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他们融入乡村社会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与乡绅打交道的能力。因为事实上乡绅掌握了乡村学校的办学大权,教师的聘任实际上由他们控制,学校招生和向学生收取学费也都由乡绅来实际操办,由此,取悦乡绅、与他们维护好日常关系就成为乡村教师的生存秘籍。当时有人这样描述乡村教师求职的一般的“奔走的路线”和生存之道:“第一步先要向村长接洽,卑辞厚币以求允诺;其次再哀求视学——劝学所所长——发给委任。……奔到了教员位置的人,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在村长前

献殷勤乞哀怜,以求自己的地位稳固。所以教员们对于村长的供养,简直比生身父母多要虔心好几倍。”^[17]总之,能不能获得当地乡绅的接纳,是乡村教师的生存之本,这就注定乡村教师在与乡绅的交往中是不对等的,有的交往几乎类似于行贿,甚至存在地方土豪劣绅刁难、乃至欺压乡村教师的现象。比如有乡村教师就反映,有些乡村土豪劣绅习惯性地敲诈教师,向教师“打秋风”竟成为一种乡村“流弊”。“每逢阴天下雨稍有闲暇的时候,便到学校里猜梅花拳,差遣学生打酒买肴遥街去跑,‘夜以继日,不醉无归,’学校成为茶坊酒肆,学生已经成了茶坊酒肆的小买办,这时候的先生你想担任什么职务,岂不成了茶坊酒肆的招待了吗?乡下人对于学校的信仰也就此消失了。”^[18]乡绅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如此不正常、不平等,在这种环境下的教师何来尊严?有些乡村教师难免会变得庸俗势利,将社会交往的世俗功利性发挥到极致。有乡村教师就老实地承认:“在乡村小学里的教师,最需要交际术,而且是以交际费的多寡来作位置与声望的保障与转移的,只要手腕灵活,多花几块钱多打几角酒给管理员吃吃,应付得他的心好似经过了熨斗那么舒服,这几项校款还有痛快支用的希望;反之,任凭你教学怎样的高妙,而这几项校款就不用打算如期拿来,并且还要节外生枝,故意为难。”^[19]

另外,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在日常社交还有隐秘的一面,即有些教师的日常社交是隐含有政治性的。这是因为民国时期是国内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学校师生是各派政治势力都极力争取的对象,教育界也成为党派斗争最激烈的阵地之一,所以,政治是民国时期的教师很难回避的现实问题。在政治气氛比较严峻的形势下,有些教师是借助普通人际交往的名义作为掩护参与一些政治组织活动的,这种情况可以以中共早期发展史为例。比如,有学者通过研究安徽农村党组织的建立和建设过程发现,在中共从城市转入乡村的革命斗争中,许多共产党员正是借助乡村教师的身份才在乡村中生存下来,并开展革命工作的,乡村教师这一职业是中共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媒介。^[20]又比如湖北宜昌文史资料中就记载:“‘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中共中央‘四大’召开以后,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人董必武、钱亦石派中共党员祖山竹来宜,以省立三师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中共党的创建活动。……1927年12月,中共宜昌县委在宜昌县第一、第二小学教师中发展部分党员,建立了中共宜昌城区文教支部。”^[21]从以上事例不难推测,当时很多教师看似普通的社会交往其背后其实是有政治性的。鉴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波诡云谲,中小学教师多数都

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既有改变个人命运的强烈愿望,也有改造社会的宏大志愿,在从教的同时,通过日常社交隐秘地参与政治活动,将个人价值与更广阔的事业、更高远的目标联系起来,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总之,民国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社交具有鲜明的世俗功利性和隐秘的政治性。通过日常社交所营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学教师可以更好地融入教师职业圈子,获得比较有利的职业平台;同时他们的日常社交表现出一定的庸俗化倾向。另外,民国中小学教师日常社交还含有一定的政治性,有可能使教师获得超越职业之外的更大的社会活动空间,有助于他们实现更远大的人生理想。

参考文献:

- [1] 畸书畊. 京师公立中小学纪事 [M] // 马玉田, 舒乙.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 [2] 马叙伦. 我在六十岁以前 [M] //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6辑).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3.
- [3] 许一默. 忆河南省立小学和廉方教学法 [M] //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7卷教育).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 [4] 唐突. 中学毕业会考与中学教师 [J]. 汗血周刊, 1934, 3(10).
- [5] 谢绍民. 颍上朋党之争简介 [M] // 安徽省颍上县文史委. 慎城春秋(第1辑), 1986.
- [6] 陶钝.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 [7] 高韦伯. 解放前的开封高中 [M] //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7卷教育).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 [8] 林锦成. 战时的中学教师 [J]. 教育研究, 1938(83).
- [9] 卢泽云. 小学教师生活问题讨论六篇·小学教师的保障问题 [J].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 1936, 3(18).
- [10] 吕绍槐. 中学教师应有的修养 [J]. 浙江教育校长周刊, 1934, 6(9).
- [11] 梁运涛. 我的教师生活底回忆 [J]. 教育生活, 1936, 4(1/2).
- [12] 王千勤. 我的教师生活 [J]. 教师之友, 1937, 3(6).
- [13] 张太敬. 我的教师生活 [J]. 江苏教育, 1942, 5(1).
- [14] 金景芳自述 [M] // 高增德, 丁东. 世纪学人自述(第2卷).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 [15] 朱伯孚. 教师生活杂谈 [J]. 江苏教育, 1942, 4(5).
- [16] 敬远. 与新教师谈甘苦——告将毕业的师范生 [J]. 教育建设, 1941, 1(6).
- [17] 革日水. 形形色色——陕西太谷县的小学教员 [J]. 生活, 1929, 5(1-52).
- [18] 翟芝轩. 一般乡村小学的实际写真 [J]. 基础教育, 1936, 1(12).
- [19] 张绳五. 乡村教育实地经验谈 [J]. 基础教育, 1936, 1(1).
- [20] 丁留宝. 乡村教师: 乡村革命的播火者——以安徽农村党组织建设为例(1923-1931) [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07.
- [21] 朱国楚, 黎祥清. 清末及民国时期宜昌县教育界的党派组织 [M] // 政协宜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宜昌县文史资料(第5辑). 1991(内部资料).

On the Social Intercours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Zhaohui, LI Min

(School of Marx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ocial intercours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had distinct secular. There were many factions in the school. Ordinary teachers must strive to be “one of us” of the figurer to keep their jobs. Teachers’ social interaction outside the school was almost a utilitarian survival skill for many teachers, so the social activities of the teachers had some Vulgarization tendency. The social interac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lso had political nature.

Key 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social intercourse; the Republic of China

冀鲁边区—渤海区的文化建设述论

张立胜, 王 瑞

(德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边区与渤海区在开展对敌军事斗争的同时, 在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开展文化建设,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冀鲁边区—渤海区的文化建设, 提高了边区干部与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思想觉悟, 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士气, 是践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个案尝试, 为渡过困难时期、争取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也存在着文化内涵建设不够系统等局限。

关键词: 冀鲁边区; 渤海区;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K2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80-06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六个战略区之一, 1944年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它东临渤海, 西接津浦铁路和运河, 南濒黄河, 北至独流减河, 直接威胁着当时日军侵占的天津、济南、沧州、德州等地, 控制着华北与华东的南北海陆通道,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

在政权巩固及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 在新闻出版、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开展文化建设,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新闻出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冀鲁边区—渤海区党委开展的新闻出版工作, 能够直接、快速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 开展对敌斗争。其中, 报刊不仅可以帮助干部和群众识字, 而且可以帮助干部和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国内外大事, 是当时首选的新闻宣传媒介。

中共冀鲁边区委员会创办了机关报——《烽火报》。在十分险恶的战争环境中, 《烽火报》冲破日寇的重重封锁, 刊登延安等地的消息, 报道冀鲁边区的斗争和生活, 把胜利的讯息送给边区军民,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烽火报》原来是部队的油印刊物, 创刊于1938年的秋季。3日刊, 4开4版, 每次印几千份。在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进入冀鲁边区后, “由纵队司令部

创办, 后改为冀鲁边区特委宣传部主办, 一周一期, 铅印, 十六开本, 刊物改为报纸, 定名《烽火报》, 总编为傅国光(后为张镛)。”^{[2]103-104} 1939年至1942年春, 先后在宁(津)乐(陵)边界、盐(山)庆(云)边界一带发行。这是《烽火报》的全盛时期。实际上, 《烽火报》当时已成为全冀鲁边区的抗战喉舌, 是“边区最高的领导报纸”^{[3]24}。据孙学文回忆:

当时有石印机五台, 每台机器每期可印白报纸一令, 共印五令纸。这时已改为双日刊, 对开报纸, 4版, 总印数五千份。

当时《烽火报》的组织情况大致如下:

社长: 傅国光

编辑室: 总编傅国光, 编辑张镛、刘晓声, 助理编辑工2人。

电台: 台长高科, 译电员李久泽、杨永正等约15人。

总务科: 科长贾玉坤, 采购员侯克明等约20人。

发行科: 科长殷瑞祥

通讯科: 科长殷瑞祥(兼)。

以上两科共有10余人。

侦察科: 科长马关祥, 有陈芳兰等6人。

交通科: 科长张天德, 有张本道等约20人, 其他勤杂、通信人员10余名。

收稿日期: 2021-11-16

作者简介: 张立胜(1972-), 男, 山东宁津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与德州区域文化研究。

出版科:科长孙学文,写版、排版、制版人员王玉章、阎秉恒、段犛子等8人。

司务长:殷林题

印刷工人:纪学曾、张云兴、孙长友、王金五、田奎荣及学徒工、通讯员、工友等33人。

《烽火报》总计一室、一台、六科,共有工作人员120余名。^{[4]71-72}

这反映了《烽火报》全盛时的大体情况。《烽火报》消息来自通过电台收听到的新华社消息及由豫皖边区每天按时送来的党中央报纸——《新华日报》,《烽火报》能够较快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及冀鲁边地区新闻。此外,李先念曾为该报寄过题为《胜利在望》的社论;冀南行署主任宋任穷也曾为其撰写过稿件;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萧华、政委王卓如、地委杜子孚、张维国、燕青,振华县委的史兴华、李光远等写了不少的抗战论述。如《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胜利属于我们》《反攻时刻即将到来》《冀鲁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等,文章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光明前途和目前斗争方向,坚定了边区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4]72}。《烽火报》更多的是报道边区军民打击日寇的胜利消息,以及根据地生产建设,民兵、青年、妇女活动的消息。如,1941年秋,《烽火报》报道了宁津县抗日游击队一举缴获日寇两挺机枪的胜利消息^{[4]63-64},教育和鼓舞了群众,受到人民群众的称颂。

为了应对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烽火报》报社不得不多次转移。孙学文回忆说:“五年来,包括以后的《冀鲁日报》时期,我们挪动了二十多次,行程五百多里,并挖建了四十多个大型地下室。每个地下室的面积相当于三四间房屋的大小,梁柱结构。迁移的地点有杨堡、太平店、马头孙、贺家庙、傅家、宁寨、小吴、魏家庵、三营盘。以后又搬到盐山县的张海、庆云、小山等地,约二十几处。”^{[4]72}由此可见坚持办报的艰辛,甚至有的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总文救会主任吕器,1942年被日寇杀害;总编辑傅国光(盐山县百尺杆村人)1943年秋被日寇杀害。吕器曾在《烽火报》上发表了多篇鼓词,深受群众喜爱。他就义前发表的最后一篇鼓词——《抗日鼓词》,至今为孙民有等一些老人传唱。^{[4]74}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烽火报》报社还出版过马列主义著作。经过约一年的艰苦努力,到1942年春,《烽火报》报社先后石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列主义初步》两部著作。报社发行人员把这两本书亲手送到边区党政干部手中,提高了边区党政

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1942年夏,日寇对冀鲁边区进行“大扫荡”,同时也对《烽火报》报社发起了进攻。边区党委根据敌情,指示报社迅速向盐山、庆云一带转移。1942年12月,冀鲁边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决定,《烽火报》和军区政治部主办的《前进报》合并为《冀鲁日报》,由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寄愚兼任社长,戴夫、张镛分别任正副主编。报纸石印八开,5天一期。《冀鲁日报》报社的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及时把党中央的声音传达给边区军民。1944年1月,冀鲁边区、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后,《冀鲁日报》停刊。^{[2]104}

总之,《烽火报》在创办的4年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正如当时的报道所言:“自创刊以来,在任何艰苦的情况下,从未停刊,健全的交通网表现了很大的成绩。边区最远和敌人封锁最严密的地方,七日以内都能看到它;每个村庄的抗日小学里,村公所里,和墙头上都可以见到为边区民众所拥护的《烽火报》,它的每一个号召都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3]24}

为统筹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10月,冀鲁边区成立了抗日文化教育救国总会(简称文救总会)这一抗日群众团体,并创办了《战地动员》等刊物。1940年1月,冀鲁边区文救总会改为冀南文化界救国总会第六分会。在各级文救会领导下,抗日救亡宣传广泛开展起来。后又创办《燎原文艺》月刊,并建立印刷所,印刷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书。

冀鲁边区的地方报纸还有:1938年10月中共冀鲁边区工委创办的油印小报《血花》,1939年2月中共宁津县委创办的《胜利报》,1940年初沧县青年救国会创办的《曙光报》等。这些革命报刊,为边区军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鼓舞着广大抗日军民坚持斗争直至胜利。^{[2]104-105}

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之后,即于1944年5月,由中共渤海二地委主办的《黎明报》创刊出版(至1945年10月停刊,坚持一年多)。《黎明报》是一张五日刊的石印报,八开,四版。它的前身是以“鲁北文化供应社”的名义出版的《大家看画报》,源于1942年设于平原第五区(平原、陵城交界处)的王定杆庄修建的“地下印刷所”,印刷重要文件和当时急需的抗日小学课本等。1943年初夏,由原来专署领导的“地下印刷所”,改由冀鲁边二地委宣传部领导,当时地委书记是郝炬,组织部长是李萍,宣传部长是关锋,归二地委宣传部领导后,主要编印抗日宣传品。当时由于各级党委机关绝对保密,因此编印

宣传品的公开名义为“鲁北文化供应社”，社长由关锋兼任，编辑主任由宣传部宣传科长张梦生兼任，崔石挺为印刷所负责人兼编辑部副主任。^{[5]327-331}创刊的《大家看画报》，十日刊、八开、四版，原平原县九区区长李少英任编辑，原二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尚忠任美术编辑。《大家看画报》主要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战道理和边区抗战的胜利消息。因图文并茂，文字浅显生动，深受抗日军民欢迎。另外，还经常编印一些瓦解伪军的宣传品。为了便于送入伪军据点，多半采用旧唱本的形式，如《小寡妇上坟》《王二姐思夫》等，向伪军宣传抗日道理，进行瓦解、争取工作。

1944年5月，抗日战争形势好转后，渤海二地委机关报——《黎明报》正式创刊。开始编辑人员较少，几乎是一个编辑负责一个版面。据崔石挺回忆：“地委宣传部长关锋主持第一版，宣传部宣传科长张梦生分管第二版，新调来的李泽民（即后来化名的李冰如）负责第三版，我任第四版副刊编辑兼印刷科科长。”^{[5]332}新华社发的稿件多占头条地位，内容包括国际、国内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重大事件，以及渤海二分区的每一个战役的胜利消息。

《黎明报》的工作人员，由开始几个人逐步扩大到几十个人，有编辑、校对，还有随军记者，报纸的发行也有专职人员了。为了将报纸进一步办好，曾派从军分区政治部调来的李资清到《渤海日报》（渤海区党委机关报）学习。此后的报纸内容与编排技术，都有显著变化。《黎明报》以特派记者崔石挺的名义发出“我军兵不血刃攻克临邑县城”的头条新闻，报道“1944年9月10日攻克临邑县城”。^{[5]334}这是渤海二军分区部队向日寇反攻后，攻克的第一座县城。1944年底，《黎明报》负责人关锋调鲁南高级党校学习，编辑主任李资清主持工作。

1945年，《黎明报》报道了不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有重大消息，还出号外，如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墨索里尼被枪毙，攻克柏林等等都是在号外发布的。1945年8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接受无条件投降前夕，延安新华社就发出预告，将有重大新闻发表，《黎明报》收到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胜利消息后，立即印出号外。^{[5]333-335}

总之，边区创办的《烽火报》《战地动员》《黎明报》等报纸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仅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还把党中央的号召和指示及时传达给边区军民，为打开局面、打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冀鲁边区一渤海区在文艺宣传方面也取得若干

成就。

第一，创办了被边区军民昵称为“孩儿剧团”的燎原剧团。剧团和《烽火报》《燎原杂志》合称为“边区文化生活中的三宝”^{[6]383}。据高光记述：

“整个剧团二十几个人，除了张团长和陈指导员比我大一两岁外，其余多半是十三四岁的娃娃。我十三岁小学毕业就务农，到十八岁已经是身高一米七六的楞小伙子了。在这群孩子当中，简直成了羊群中的骆驼。”^{[6]386}

边区党政军领导和文化救国总会，对“孩儿剧团”十分爱护。吕器还亲自为剧团创作歌曲，编写独幕剧，指导剧团的演出活动。剧团演唱革命歌曲、扭秧歌、演话剧和《放下你的鞭子》一类的小戏，深受抗日军民的欢迎。“我参加剧团以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挨村挨镇的画壁画，写大字标语。写得最多的一条标语，是‘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画得最多的，是一个头戴破烂钢盔的日寇，在八路军的刺刀下跪着投降。……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学会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员之歌》《冀鲁边进行曲》（吕器同志作词谱曲）《五月的鲜花》。还学会了《流亡三部曲》《高粱叶子青又青》《黄水谣》。当时，我最喜欢唱的歌是《国际歌》《伏尔加船夫曲》，高尔基的《囚徒之歌》和列宁爱唱的《光荣的牺牲》。”^{[6]386-387}他们在冀鲁边各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为抗日救亡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2年五一前后，日伪军对冀鲁边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力图用“铁壁合围”“篦梳战术”消灭边区抗日根据地抗日爱国力量。据此，上级决定将剧团一部分年龄太小的团员分散、隐蔽到敌占区；年纪大一点的分成两支小分队，由张团长和陈棕指导员分头带领活动。高光被分到陈棕的小分队，他们跟随连队转移，成功突围出去。秋后，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逐渐结束，高光所在的小分队又被送回，活动在乐陵县大桑树村一带。这时边区被分割封锁，三里一岗楼，五里一据点，又宽又深的封锁沟，把根据地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孤岛。部队不得不化整为零，隐蔽活动。到了10月，燎原剧团被迫解散。^[7]

第二，抗日根据地还成立农村剧团，举办文娱活动。这些活动往往配合农村的各项工作来进行，在减租减息、反奸诉苦、变工互助、帮助军属、动员上冬学、团结对敌等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各个剧团编写了大量的参军戏。在渤海解放区，大量的“参军戏”应运而生，《李秀风送郎参军》和《孙凤翥重

返前线》是宁津县保店高小业余剧团根据真人真事编演的两出京剧现代戏。这些参军戏都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过特殊的作用。在渤海区上演的吕剧现代戏有《破除迷信》《睁眼瞎》《识字班》《上冬学》《换新天》等。^[8]

总之,冀鲁边区—渤海区的文艺事业虽然在艺术上比较粗糙,但因地制宜,取得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打击敌人的效果。

三

在教育方面,冀鲁边区—渤海区党委着重抓了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县、区建立了抗日小学,组织识字班,掀起了识字、学文化运动。

冀鲁边区的干部教育最主要的成绩是创办了抗日军政学校。毛泽东曾总结到:“边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军队也有教育,有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9]冀鲁边区就建立了这样一所军队教育学校,其全称是“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军政学校”,前身是1938年7月创立的军政训练大队,由国民革命军敌后别动总队第31游击支队筹办,地点选在乐陵中学学堂(城南路东旧县衙大堂后)和附近农舍,以一个月为期,先后开办了两期,每期100余人。

训练大队第二期结业之际,萧华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边区。他在军政训练大队的基础上,正式创办“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军政学校”(下简称挺纵),通称冀鲁边军政学校,以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庭为校长,曾庆洪为副校长,朱子伟为教育长,王省身为教育股长。军政学校以“抗大”为榜样,提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学校招收第一期学员,分政治、军事、民运三个中队,400人,学制改为3个月一期,学习内容有关抗日游击战术、军队政治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等。^[10]

冀鲁边抗日军政学校的教师以兼职为主,冀鲁边区特委书记李启华、挺进纵队参谋长邓克明、挺进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长李青、宣传部长姜思毅、乐陵县战委会主任王国华等都给学员上过课。萧华曾亲自给学员上课,作过题为《放弃武汉后的形势与当前的紧急任务》《游击战术》等报告,报告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到中国抗战,从全国形势到边区抗战,从战略讲到战术,引人入胜,深受学员的欢迎。教育长朱子伟上的既是生动的政治课,也是严格的军事课。李全生是总支书记,负责军政学校党的组织工作。军政学校总支下设4个支部,3个队各有1个支部,还有一个直属

支部。教师的军事课主要讲授抗日游击战争,以《论持久战》为教材。每天早晨和下午在乐陵中学操场进行军事训练。学员学射击、刺杀,枪支不够便以木枪代替。

军政学校第二期可谓全盛时期,共11个队,1000多人。学员有正规部队的排长、地方部队的连排长,有“动委会”的干部、县区游击队的干部,还有进步学生。这些人经过学习,有的仍回部队,有的到地方担任区长、锄奸部长、民运部长、宣传部长等。另外,还有国民党地方杂牌部队的人员,如保安队长、警备队长,甚至还有土匪头子。接收他们来学习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改造,共同抗日。开学后1个月,得知日军回师华北“扫荡”,大部分学员提前结业离校,只保留了3个队,学校也更名为教导营。

1939年1月,乐陵失陷,“挺纵”各机关和教导营撤出乐陵县城。1939年的2月,教导营驻茨头堡,在这里又进行了整顿,撤销了三队,只保留一、二两个队。领导成员也有变动。此间,军政学校的第二期学员毕业,第三期开始。第三期约在8月结束。第四期开学后,环境日趋恶化,教导营的两个队合并为1个队,徐其江任队长,王猛任指导员。1940年初,第四期学员毕业,第五期开始,这是最后1期。第五期训练了1个多月,即随挺进纵队参谋长邓克明开赴鲁西。同年3月,最后1期学员毕业,教导营的干部和学员都被分配到各部队。

从1938年10月到1940年3月,共有5期学员结业,但军政学校实际只办了1期,其余各期均为教导营所办。军政训练大队是军政学校的前身,教导营则是它的继续,如果将三者统称作“冀鲁边区八路军抗日军政学校”的话,那么它总共培训了7期学员,共计2000余人。这些干部对边区各县发展党组织、开辟工作,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德县的抗日县长王哲,东光县的县委书记周劳工,济阳县大队队长朱宝成等,都是军政学校培训的骨干学员。军政学校的学员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均做出了贡献。^{[10]30-36, [11]}

为了提高干部素质,各级党组织利用办党校、上党课、举办训练班等形式,加强干部教育和培训,仅1941年到1942年两年中,全边区就培养训练了区以上干部290人,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2]105}

为反对日寇的奴化教育,变日伪学校为抗日学校,边区根据地在大多数村庄建立了抗日小学。抗日小学编辑新的教材,改进旧的教育内容,把文化教育和抗战教育结合起来。即使抗日战争形势紧张时,

也采取多种形式坚持办教育。如有的实行类似“导生制”教学方法，即一班编为几个组，教师先给组长上课，组长再回本组给同学们上课；有的则实行两套课本——敌人来了学《三字经》等老书，敌人走了再学抗日教材。虽然日伪军不断破坏，环境也常有变化，但小学教育却顽强地在对敌斗争中发展起来。据1942年统计，边区小学达260所，教员500人，学生6200人。社会教育，主要采取冬学、民校、识字班、识字牌等形式，动员男女青壮年参加夜校、午校学习。^{[2]105}“边区军民的学习热情很高。每村都成立了识字牌和各种夜校；新战士参加部队三个月后即能看简明的书籍，半年后即能写简短的文章，军队政权各种团体的干部学习，都非常认真，每天两个小时的学习一般都能保持，假如在战斗时挤不出时间，第二天还有补足。”^{[3]24-25}冀鲁边根据地还兴办了一些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乡农学校。据《大众日报》报道：“（冀鲁边区）每个村里都成立了乡农小学，儿童入学一律免费，十分贫苦的还由公家每天发给二斤粮食和七分菜钱；小学教育不但在根据地内普遍地发展，并且以灵活的方式，推行到敌占区敌伪据点里；每县都有了官费的‘游击’高小；各专员区的初中和边区的高中都有了具体的教育计划，正在着手筹办。”^{[3]24}

1946年春，宁津县建立了保店高小。迟俊泮出任校长，聘师招生，有近40名学生，共有3位教师。当时“算术用的是旧课本和《算术百题解》《四则一千题》。语文曾以《新民主主义论》为课本。我们这群十四五岁的小学生，天天在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保店高小使用《新民主主义论》作为语文课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曾经指出：“……以《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两书作两干部文化课本，似不适宜，因太深读不懂。还宜重新编课本，中宣部在着手。”^[12]这一看法对于高小的学生也是适用的。另外，为弥补课本缺乏等不足，保店高小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区政府领导很重视教育工作，尤其是区委书记辛生同志，工作之余经常到我们学校去，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战争形势，使我们受到教益。辛生同志热爱文艺，很重视宣传工作。在他的关怀下，我们学校成立了业余小剧团。大部分男女同学都是演员，唱歌跳舞演小戏，宣传工作很活跃。我们这个业余剧团十分简陋，服装随用随借，演什么人物借什么服装，乐器只有两把京胡、两支竹笛，都是学生自备的，借了一套扭秧歌用的锣鼓；没有幕布和道具，演出时，借用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或是几条板凳就开锣唱戏”^[13]。

总之，冀鲁边区—渤海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利用各种形式，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军政骨干，提高了边区人民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但与革命圣地陕甘宁边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等相比，其文化教育工作也存在着诸多局限。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成就斐然，譬如建立的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自然科学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对全国的抗日根据地有辐射和示范意义。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结合起来，构成了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宏图，为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4]。冀鲁边区—渤海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总体上与陕甘宁边区相比规模较小，尚未形成立体化的影响。

冀鲁边区—渤海区党的文化建设在某些方面虽然有肤浅、粗糙、文化建设内涵不够系统等不足，但是其文化建设成绩是主要的。概括起来，冀鲁边区—渤海区的文化建设传承了红色基因，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文化建设形式多样，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践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个案尝试，激发了边区军民打击日寇与国民党军队的积极性。这不仅推进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 [1] 中共惠民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 中共冀鲁边区清河渤海区党史大事记[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 [2] 李晓黎，主编. 中共渤海地区地方史编写组，著. 中共渤海地区地方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3] 中共乐陵市委党史研究中心，乐陵市冀鲁边革命教育基地管理中心，编. 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M]. 济南：山东齐鲁音像出版有限公司，2021.
- [4] 李继光，编. 沧州报刊史料（1924年至1990年6月）[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 [5] 崔石挺. 黎明前的“黎明报”[M]//中共德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鲁北烽火续集.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
- [6] 高光. 孩儿剧团片段[M]//德州地区出版办公室，编. 鲁北烽火.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
- [7] 乐陵抗战那些年那些事编委会，编著. 乐陵抗战那些年那些事[M]. 济南：齐鲁书社，2015：457.
- [8] 山东省沂蒙文化研究会，编. 沂蒙文化研究（第1辑）[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242-243.
- [9] 毛泽东.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J]. 党的文献，

- 1994 (5).
- [10] 张宜华, 等, 编著. 浴血奋战冀鲁边[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30-36.
- [11] 乐陵党史委. 冀鲁边区八路军抗日军政学校[M]//张本华, 仲守信, 主编. 枣乡风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1: 174.
- [12] 毛泽东文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58.
- [13] 中共德州地委史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编. 鲁北烽火续集[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9: 343-344.
- [1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中国抗日战争史 (中)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4: 228.

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Hebei-Shandong Border Region and Bohai Military Area

ZHANG Lisheng, WANG Rui

(School of Marx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task of Hebei-Shandong Border Region and Bohai Military Area led b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to wage military struggle against the enemy. At the same time, it had carried 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s propaganda, literature and art, Anti-Japanese War education and so on, and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Hebei-Shandong Border Region and Bohai Military Area had improved the cultural level and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adres and masses in the border area and boosted the morale of the army and people in the border region. It was a cas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emocratic culture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 period and winn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ggression and China's War of Lib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had some limitations such as culture insufficient systematization.

Key Words: Hebei-Shandong Border Region ;Bohai Military Area;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hina's War of Liberati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上接第68页)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preters in Liaison Accompanying Interpretation of Dezhou-ASEAN

CUI Jingji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student volunteers of Dezhou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in the 2022 China-Asean Mayors' Forum as liaison accompanying interpreters, it is found that obstacle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lack of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English varieti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carry out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s, cultural topics of liaison accompanying interpreting and normalization of interpreting practice to strengthen students'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subjectivity and initiative, enhance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consciousnes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so as to provide more qualified interpreters for the society.

Key words: liaison accompanying interpretation;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 cultural topic selection; extracurricular practice; cultivation of interpreters

19世纪中后期英属印度贝拉尔地区棉花种植推广探析

毛锐, 白景旭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济南 250358)

摘要:美国内战导致英国棉纺织业爆发严重的“原材料危机”,英国意图在印度贝拉尔地区开展棉花种植推广活动以挽救本国的棉纺织业。在英国棉花利益集团的推动下,殖民政府采取改造农村经济结构、打击棉花掺假以及改善交通条件等手段来扩大印度贝拉尔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和出口量。英国的殖民改造颇有成效,贝拉尔地区很快成为英国完美的原棉供应地,但与此同时,当地的家庭纺织业不复存在,民众陷入系统性贫困和周期性饥荒。英国在贝拉尔地区棉花种植推广的历史,是印度乃至整个第三世界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复杂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英属印度;棉纺织业;棉花种植推广;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 K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86-05

自18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由于英国本土并不具备种植棉花的自然条件,因此英国棉纺织业从一开始就严重依赖海外的原棉供应,北美长期是其最主要的原棉供应地。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导致英国爆发严重的“棉荒”,迫使英国政府开辟新的原棉供应地来确保棉花供应。位于中印度的贝拉尔地区(Berar)有着长期的棉花种植历史,被英国棉花供应协会认为“拥有最适合种植棉花的土壤和气候”,成为英国开展棉花种植推广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

棉纺织业是世界上最早的全球性工业之一,也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动机”,历来被学界重视。工业革命和棉纺织业的关系、棉纺织业的全球化发展以及棉纺织业的衰落等一系列问题均被学界关注。^①由于英国的棉纺织业严重依赖海外的原棉供应,一些重要的原棉产地,如美国、印度和埃及等也被纳入研究视野。这些地区一方面作为原棉产地被接入全球棉花网络,和英国的棉纺织业产生互动关系,另一

方面自身也有相关工业的发展。^②学界对英国棉花种植推广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较少关注对特定地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拟探讨英国在印度贝拉尔地区的棉花种植推广活动对其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复杂过程产生的影响。

一、英国在贝拉尔地区推广棉花种植的背景

英国早期的棉纺织业是在棉织品进口禁令的推动下开始的。18世纪初,大量廉价的印度棉织品涌入英国市场,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对英国传统的毛纺织业构成巨大威胁。在毛纺织从业者的压力下,英国议会颁布禁令,绝对禁止印度、波斯和中国的印花织品输入。然而对棉织品的需求并没有因为禁令而消失,人们不仅秘密购买走私品,还将本国产的棉织品视为一种可行的替代产品。在需求的刺激下,英国本土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

英伦三岛的气候并不适合种植棉花,因此英国的棉纺织业从一开始就严重依赖海外的原棉供应。原先的原棉供应地主要是西印度群岛和土耳其士麦那。

收稿日期: 2023-05-11

基金项目: 山东省外事研究与发展智库课题“黄河—湄公河流域地方合作的文化基础研究”(202255)。

作者简介: 毛锐(1969-),男,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国史研究。

^① 参见Stanley D. Chapman, *The cotton indust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mpshire, Macmillan, 1972; D. A. Farnie, *English Cotton Industry and the World Market 1815-18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SchulzeLars G. Sandberg, *Lancashire in decline: A study in entrepreneurship,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4; 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徐轶杰、杨燕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② 参见Roger Owen, *Cotton and the Egyptian economy, 1820-1914: A Study in Trade and Develop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Jonathan E. Robins, *Cotton and Race across the Atlantic: Britain, Africa and America, 1900-1920*,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6; Meena Menon, *A Frayed History: The Journey of Cotton in India*, Oxford, Oxford.

棉纺织业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技术革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迫使英国开辟新的原棉产地来满足迅猛增长的原棉需求。最先被纳入视野的是北美地区,这里既有满足种植棉花生长的最佳气候条件,还拥有大量可供耕种的土地,从而被英国棉纺织主们视为最理想的原棉产地。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棉纺织业开始在美国南部新开辟的各州中获得原棉供应,至19世纪初,在运到伦敦、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的棉包中,有60%来自美国,自此美国始终是英国最主要的原棉供应地。^{[1]328}到1860年,美国向英国供应的原棉已达11亿3520万磅,占英国原棉总进口量的82.4%(见表1)。

表1 1860—1868年间英国进口原棉统计(单位:捆)

年份	美国	印度	巴西	埃及	其他地区	总计
1860	2838000	422000	46000	129000	7000	3442000
1861	2026000	740000	45000	115000	7000	2933000
1862	80000	805000	60000	175000	13000	1133000
1863	145000	1043000	62000	242000	45000	1537000
1864	217000	1349000	109000	321000	84000	2080000
1865	488000	1056000	136000	410000	151000	2241000
1866	1282000	1619000	178000	205000	94000	3378000
1867	1361000	1350000	177000	223000	96000	3207000
1868	1350000	1370000	250000	236000	80000	3286000
总计	9787000	975 000	1063000	2056000	577000	23237000

数据来源: Harry Rivett-Carnac. *Report on the Cotton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868-1869*. Byculla: Education Society's Press, 1869, p. 150.

这种过于依赖美国的单一原棉供应存在着巨大风险。美国内战爆发后,北方海军迅速封锁南方的港口,切断了南方诸州对英国的原棉供应。南方诸州也以此为要挟,希望英国支持南方乃至承认南方独立。原棉供应的突然中断使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爆发严重的“棉荒”,英国进口自美国的原棉总数锐减至战前的2.9%(见表1),与此同时棉价暴涨,大量纺纱厂倒闭,战争仅进行了7个多月英国就有49家工厂停产,119家工厂缩短生产时间。^{[2]52-53}到了1862年,兰开夏郡超过40万棉纺织工人失业或半失业,被救济人数达全郡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要求救济的工人甚至在多地引发了骚乱。^{[3]95-96}在“原材料危机”的压力下,英国棉花利益集团加紧游说政府,要求开辟新的原棉产地以挽救本国的棉纺织业。

早在美国内战前几年,英国棉花利益集团就已经意识到过于依靠美国供应原棉存在着巨大风险,因为美国的原棉出口建立在奴隶制种植园的基础上,而随着北部工业的发展,美国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同情废奴主张的工业化国家。为了避免美国棉花产量波动对本国棉纺织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英国棉花利益集团向政府指出在各殖民地推广棉花种植的必要性。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学院派遣专家前往印度进行调查后认为,印度的潜力如果得到适当开发,可以满足整个兰

开夏郡的原棉需求。^{[4]255-256}

作为印度传统的产棉区,贝拉尔地区被认为“拥有最适合种植棉花的土壤和气候”,很快就引起了英国棉花利益集团的兴趣。贝拉尔地区大体分为南北两部分,北贝拉尔的山谷地带覆盖着一层特殊的“黑棉土”(Black Cotton Soil),这种土壤质地肥沃,富含微量元素,特别适合种植棉花,而南贝拉尔则存在大片荒地,拥有种植棉花的巨大潜力。贝拉尔地区属于典型的季风气候,分雨旱两季。由于黑棉土具有较强的保水性,可以在雨季储水,到旱季则大量蒸发,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在英国棉花利益集团的推动下,东印度公司以偿还债务为借口强迫土邦统治者割让贝拉尔地区,奠定了英国在此开展棉花种植推广活动的基础。当来自美国南部诸州的原棉供应出现危机时,英国棉花利益集团以最大的信心转向了印度,贝拉尔地区成为英国在印度开展棉花种植推广活动的重点地区。

二、英国在贝拉尔地区推广棉花种植的措施

尽管贝拉尔地区在棉花种植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却在种种束缚下无法定期向英国大量供应优质原棉。英国棉花利益集团很快就注意到当地农村经济结构对棉花生产的限制,此外,由于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棉花掺假,棉花出口也因此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交通问题,贝拉尔位于中印度的德干高原上,当地缺乏合适的道路和桥梁,这极大地提高了棉花出口的成本。因此在控制贝拉尔地区后,英国立即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改造贝拉尔地区的农村经济结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贝拉尔地区长期存在一种称之为巴鲁塔伊达里的制度(balutaydari system),该制度由地方上占主导地位的氏族或种姓对农村地区进行管理和控制,由下层种姓来耕种土地,并依据种姓等级来分配土地上的产出。^{[5]34}其本质是上层种姓对农产品拥有所有权,但并不控制土地本身,这使得土地私有产权模糊不清。英国棉花利益集团认为土地私有产权是增加棉花产量的先决条件,巴鲁塔伊达里制度损害了耕种者的积极性,也减少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在他们的推动下,殖民政府通过军事和行政手段深入贝拉尔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土地调查活动,未经登记的土地、隐藏的土地以及大片的荒地由政府登记入册,划分成不同的征税等级拍卖给个人。从政府拍卖中获得土地者被称为“卡特达尔”(Khatedar),他们拥有30年的土地私有产权,但必须定期向殖民政府缴纳土地税,任何拖欠税款的行为都会导致土地被强制收回重新进行拍买,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在官方注册的佃户。卡特达尔的总数成为贝拉尔土地私有产权的良好指

标,到19世纪末,约29万卡特达尔控制着贝拉尔地区近700万英亩的土地(见表2),大量无主荒地在地调查中成为登记注册的耕地,政府的土地收入翻了一番以上。

表2 1870-1903年间贝拉尔地区卡特达尔总数、所占耕地总面积以及人均耕地面积统计

年份	总人数(人)	所占耕地总面积(英亩)	人均耕地面积%
1870	226 207	5 361 375	23.7
1875	236 137	7 295 848	30.8
1892	290 828	6980125	24
1903	394 644	7 203 200	18.2

数据来源: Laxman D. Satya. *Colonial Encroachment and Popular Resistance: Land Survey and Settlement Operations in Berar (Central India), 1861-1877*, Agricultural History, 1998, 72 (1), p. 66.

其次,颁布一系列法令打击棉花掺假行为。印度棉花贸易的掺假问题屡禁不止,如在优质棉花中私掺劣质棉花混合售卖,将棉花暴露在夜间空气中,使其充满露水以增加重量,有时甚至直接往棉包中添加石头、垃圾和其他杂物。棉花掺假行为严重影响了印度的原棉贸易,政府一再出手打击棉花掺假。最早的棉花掺假立法可追溯到1829年的《孟买三号法规》(*Bombay Regulation III*),该法规将混合不同品种棉花的行为视作刑事犯罪。1851年颁布的《孟买十五号法案》(*Bombay Act XV*)不仅扩大了立法范围,还引入了有偿告密制度。这些立法均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是棉花从采摘到出口的过程中多次易手,诉讼的双方很可能都是掺假的受害者。

美国内战期间原棉价格暴涨,印度棉花掺假行为频频出现,棉花经销商甚至在印度河三角洲的卡拉奇(Karachi)等地设置代理机构,专门购买劣质棉花用于掺假。有增无减的掺假行为令棉纺厂无法忍受,他们集体要求政府就相关问题采取行动。1862年9月,以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t)为首的孟买棉花商人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制止棉花掺假行为的私人法案,经过激烈辩论后,这份私人法案成为正式的《棉花欺诈法》(*The Cotton Frauds Act*)。该法案要求从孟买出口的棉花中征收特别税来成立一个检查机构,任命棉花检查员专门调查棉花掺假和欺诈的案件,此外还规定轧棉厂必须持证经营,意在从源头上遏制掺假行为。该法案对打击棉花掺假行为十分有效,孟买总督巴特利·弗雷尔(Bartle Frere)于1865年4月宣布《棉花欺诈法》达到了预期目标,“它几乎阻止了印度棉花贸易中典型的和蓄意的欺诈行为。”^{[6]90}

最后,改善贝拉尔地区的交通条件。在引入铁路前,贝拉尔当地种植的棉花只得由专门从事运输业的班贾拉人(Brinjarahs)用牛车运送到孟买,耗时2~3个月,运费达孟买棉花市价的一半以上,整个过程近乎无利可图。格拉斯哥商会在1847年就指出了这一问

题,“中印度(贝拉尔地区)扩大原棉供应量或提高棉花质量的障碍是高昂的运费、时间的损耗以及暴露(在灰尘和雨水中)造成的变质……这都是由目前的运输方式引起的。”^{[7]184}

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棉花利益集团对原棉供应的担忧达到顶峰,他们要求殖民政府修建通往贝拉尔地区的“棉花铁路”(Cotton Railways)以解决当地的原棉出口问题。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地的棉纺织主们频频递交请愿书,由他们资助的议员也在议会中相继发起运动。在多方压力下,英国政府不得不于1861年宣布“为棉花运输提供便利无疑是一项主要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只要政府的财政资源允许,就不应该忽视这项责任。”^{[7]179}有了政府的支持,大印度半岛铁路公司很快就修建了一条通往贝拉尔地区的铁路线。这条线路从普萨沃尔开始,穿过阿姆劳蒂的大片棉花区,最后到达那格浦尔,横跨了整个贝拉尔地区。该路线正式将贝拉尔地区纳入铁路网,使棉花运往孟买的时间从3个月缩短至24小时。^{[8]416}随着卡姆加奥恩发展为印度最大的棉花市场,又新增了一条通往该地的支线。铁路线的开通极大地便利了贝拉尔当地的原棉出口,英国驻海德拉巴特派员桑德斯指出:“(棉花出口的)最后一个障碍已经被移除……这将使每一捆棉花都能够运到欧洲市场去。”^{[9]255}

三、英国在贝拉尔地区推广棉花种植的影响

英国在贝拉尔地区采取的一系列棉花种植推广措施产生了巨大效果,该地很快成为英国完美的原棉供应地。从1860年到1870年的10年间,贝拉尔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增幅达两倍以上(见表3),占贝拉尔总耕地面积的近三分之一。仅在1867年一年,贝拉尔地区就向曼彻斯特输送了与整个埃及一样多的棉花,进入20世纪初,贝拉尔一地独自生产了印度四分之一的棉花。贝拉尔地区原棉供应稳定且价格低廉,极大地缓解了英国对美国原棉供应的严重依赖。

表3 1860-1870年英属印度主要棉花生产省份的棉花种植面积统计(单位:英亩)

年份	孟买	中央省	贝拉尔	西北省	马德拉斯	旁遮普	总计
1860-1	1002196	358000	620000	950000	1060558	467513	4458267
1861-2	1140434	375623	650000	953076	1020184	482351	4620668
1862-3	1309484	427111	753571	985578	1309234	547414	5332392
1863-4	1517321	588436	1137833	1135688	1766312	537183	6682773
1864-5	1573447	691198	1196300	1730634	1747501	872851	7811931
1865-6	1186097	587398	910310	885102	1395697	613262	5578176
1866-7	1435183	598801	1238966	1112677	1316944	624193	6326764
1867-8	1436735	644271	1254522	987727	1486861	687321	6497437
1868-9	1436613	671336	1286742	891444	1341365	679294	6306734
1869-70	1978711	669593	1415786	1118560	1604028	835053	7621731

数据来源: Sven Beckert. *Emancipation and Empire: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wide Web of Cotton Production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4, 109 (5), p. 416.

棉花是一种高度市场化的作物,大量种植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在英国殖民统治开始后,贝拉尔地区同外界的联系不断加深,逐渐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农产品开始商业化,这意味着当地农产品的价格会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在棉花种植面积迅猛增长的同时,贝拉尔当地的家庭纺织业迅速走向崩溃,农民日益陷入贫困和饥荒的深渊中。

首先,贝拉尔当地的家庭纺织业不复存在。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贝拉尔虽然是印度传统的产棉区,但棉花在当地实际上是一种次要作物,主要用于满足家庭纺织业而不是出口。美国内战初期,印度棉价翻了4倍,贝拉尔当地的手织机因无力承担高昂的棉价纷纷停工。内战进行到第3年时,贝拉尔地区的手织机数量已下跌了34.5%。^{[8]425}到19世纪70年代末,贝拉尔当地的家庭纺织业已经彻底走向了崩溃,西贝拉尔的普尔纳山谷棉花种植面积超过40%,但当地市场上却大量充斥着来自英国的廉价布料,其农业和家庭纺织业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完全被专业化的棉花种植所取代。手织机行业的衰落导致一股“农民化”浪潮席卷贝拉尔,大批织工涌入日益扩大的农民队伍,实际上打断了当地的原始工业化进程。

此外,贝拉尔地区还在国际棉价的反复波动中迅速陷入了赤贫状态。美国内战期间印度棉价暴涨,贝拉尔农民在殖民政府的怂恿和高利润的刺激下迅速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在这个种植浪潮中,农民借债购买农具和种子,支付棉花生长季节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税款,这种贷款的最低年利率是12%,24%甚至60%也较为常见。^{[10]1425}美国内战结束重回原棉市场后,棉花因供过于求价格暴跌,大批贝拉尔农民资不抵债,成为了债务奴隶。到19世纪90年代,贝拉尔地区70%左右的人口要么是失去土地的劳动者,要么干脆是一无所有的乞丐。^{[11]310}英国殖民当局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军官埃尔芬斯通曾在一份定居点报告中写道:“自(美国内战导致的)棉价上涨以来,资金涌入贝拉尔地区,……但许多农民仍然住在肮脏的小屋和泥泞的村庄中,……事实上,他们没有任何明显的改善迹象。”^{[12]70-71}

随着当地贫困化的加剧,粮食危机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在贝拉尔地区,一户家庭正常情况下需要15—20英亩土地才能维持生计和纳税,但大多数贝拉尔农民在19世纪70年代只有户均7英亩的可耕种土地。^{[11]311}对于土地短缺的农民来说,种植高收益作物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否则他们会无力支付日益沉重的税收和债务,而一旦不能及时缴纳赋税,土地就会被

殖民政府强制收回。在这种情况下,贝拉尔农民只得种植棉花,然后用收成来换取粮食、缴纳税款和支付债务。作为高度市场化的作物,棉花价格深受国际市场影响,极度不稳定,谷物和棉花的相对价格每年都会发生变化,这导致农民周期性地面临饿死的风险。

在1864—1873年间,贝拉尔地区的粮价相比棉价翻了一番,到1878年又翻了一番,许多农民无力换取维生的粮食。在19世纪70年代的饥荒中,贝拉尔地区至少有10%的人口死亡,其中婴幼儿的死亡率尤其高,仅在一次大型救济工程中就有8000名死者是5岁以下的儿童。^{[11]173-174}1900年的印度大饥荒中,贝拉尔地区又有8.5%的人口死亡,其中1900年当年就有14.3万人直接死于饥饿,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就是从事棉花生产最专业的地区。^{[9]288-289}日益频繁和严重的饥荒并非自然现象,而是英国殖民统治特有的产物。

四、结语

作为一种显性的全球性工业,英国棉纺织业使原本相对孤立的地区同世界经济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英国在印度贝拉尔地区推广棉花种植,最直接的动机是为了挽救美国内战期间本国濒临崩溃的棉纺织业。在推广过程中,英国深入改造了贝拉尔地区的传统经济结构,将其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中。伴随着这一进程,贝拉尔当地的家庭纺织业迅速崩溃,手工业者日益赤贫化并加入不断壮大的贫农队伍,贝拉尔地区内部经济逐渐“脱节”,沦为英国棉花利益集团的附庸。

英国对贝拉尔地区的殖民化改造是印度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缩影。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印度经济的各个要素不在内部直接结合,而是通过发达的铁路交通网络与大都市相关联,并通过港口连接到英国。这使得印度的原始工业化进程被打断,手工业者和农民之间的本地交换不复存在,原有的封建生产方式转化为殖民生产方式。在殖民生产方式下,印度农产品商业化所带来的剩余价值无法在内部扩大再生产,而是被用于支持英国的资本积累,并在提升英国资本有机构成的同时使印度陷入严重的赤贫状态。

参考文献:

- [1] 埃里克·沃尔夫.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M]. 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2] W. O. Henderson. *Lancashire Cotton Famine, 1861-65*[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9.
- [3] Thomas Ellison. *Cotton Trade of Great Britain*[M]. London: Effingham Wilson, 1886.
- [4] Dwijendra Tripathi. *Opportunism of Free Trade: Lancashire*

- Cotton Famine and Indian Cotton Cultiv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1967, 29 (2) : 255-263.
- [5] Laxman D. Satya. *Cotton and famine in Berar, 1850-1900*[M]. Delhi: Manohar, 1997.
- [6] Peter Harnetty.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Lancashire, India, and the Cotton Supply Question, 1861-1865[J].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1966, 6 (1) : 70-96.
- [7] W. J. Macpherson. Investment in India Railways, 1845-1875[J].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5, 8 (2) : 177-186.
- [8] Peter Harnetty. Cotton Exports and Indian Agriculture, 1861-1870[J].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71, 24 (3) : 414-429.
- [9] 斯文·贝克特.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M]. 徐轶杰, 杨燕, 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 [10] Sven Beckert. Emancipation and Empire: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wide Web of Cotton Production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4, 109 (5) : 1405-1438.
- [11] 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M]. London: Verso, 2017.
- [12] Laxman D. Satya. Colonial Encroachment and Popular Resistance: Land Survey and Settlement Operations in Berar (Central India) , 1861-1877[J]. *Agricultural History*, 1998, 72 (1) : 55-76.

Cotton Cultivation Promotion in Berar of British India in the Mid and Late 19th Century

MAO Rui, BAI Jingxu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aused a serious “raw material crisis” in the British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Britain intended to launch cotton cultivation promotion activities in the Berar of India to save its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he British cotton interest group,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dopted measures such as reforming the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cracking down on cotton adulteration and improving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to expand cotton cultivation and export. The British settlement was successful, and Berar soon became a perfect source of raw cotton for Britain,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local household textile industry ceased to function, and the population fell into systematic poverty and periodic famine.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tton promotion in the Berar is a microcosm of the complex integration of India and the Third World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Key words: British India; the cotton industry; cotton cultivation; colonialism

高校制度文化的建构

——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视野

王 丽

(聊城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 高校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在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制度建设为高校“立德树人”提供了行动准则, 制度体系的建构为高校“立德树人”提供了法定保障, 制度文化的形成为高校“立德树人”提供了大学文化价值的遵循。建构高质量的新时代制度文化体系要始终围绕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关键词: 高校; 立德树人; 制度建设; 制度文化; 法定保障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91-04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 需要高校管理队伍、教师队伍、后勤保障队伍、学生队伍合力来实现, 需要整合学校理念、制度、队伍、资源、文化各要素, 制度建设是整合人力与办学要素的基础和前提。高校是一种社会文化组织, 具有个体自由与学术自由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取向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的特点。落实好高校“立德树人”职责、任务, 根本在于按照依法办学的规程, 建构起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体系和制度文化约束, 形成高校整体组织资源共同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发展合力。

一、制度建设为高校“立德树人”提供共同的行动准则

“立德树人”落实到高校教育教学中的全过程、各环节, 需要所有类型 and 岗位的大学教师、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在教育行动上具有共同价值遵循, “只有在所有成员都完全相似的条件下, 也就是说, 只有当他们都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一种既定的集体理想的各种基本特征时, 社会才能存在。”^{[1]87} 共同的价值遵循是高校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高校共同价值导向的教育行动既需要制度的约束更需要制度的引导, 制度文化是生成共同价值行为的根本。

制度文化是一个将制度与文化紧密连接在一起, 并深刻体现着制度与文化的统一性和一致性的重要概念或范畴。制度文化强调制度的文化层面与规则层面的内在统一和一致^{[2]37}, 即强调制度的文化精神、价值观、思想意识与制度的规范、习惯、规则和秩序的内

在统一和一致。高校制度文化即是高校的制度规则、组织运行机制和制度执行机制等所蕴含的文化底蕴, 是一所高校在长期实践和发展中形成的师生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系, 是高校各种组织机构正常运转的保障, 也是处理高校人际关系、规范师生言行的准则, 彰显、映射着高校自身的文化特色、文化品牌。高校制度文化从深层次指涉学校典章、机构、制度及程序法则背后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与经验习惯。制度文化形成后的稳定性决定了其对高校“立德树人”组织行为影响的必然性, 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基础支撑和基本保证。

高校制度文化并非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单纯外在因素, 其本身传递和反映着一定的价值观念、思想态度、立场观点, 任何一所高校的制度文化都是其价值体系的集合。高校制度文化确立了教育行为的价值导向, 是推动教育行动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之维。制度文化作为一种价值标准、行为规则系统, 以其价值导向功能, 为人们提供共同遵守的正式行为模式。共同的行为模式必须有机会对一个群体产生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 这种作用才能得到落实。

教育活动的根本特性是实践性。它的实践性深刻体现为: 明确的目的性、平等的主体性、高度的渗透性、鲜明的时代性。毋庸置疑, 这种实践性直接决定了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是实践的。“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 “立德树人”的教育行动是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的培养人的实践活动。高校制度文化

收稿日期: 2023-04-17

作者简介: 王丽(1983-), 女, 山东阳谷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研究。

以特有的制度环境为学生接受教育提供了生存场景,刚性地保障着同时又潜移默化式地实施着“立德树人”的使命和功能。因此,高校制度文化引领和规范着其“立德树人”的实践行动,同时作为一种以高校制度为载体的价值观念又通过制度的内化来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

二、制度体系为高校“立德树人”提供法定的机制保障

为谁培养人是立德的根本。其基本内涵为:高校要培养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之人。培养什么样的人,需要从国家、高校、专业三个层面来理解和落实:在国家层面,所有高校都要承担起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与使命;在高校层面,需要各高校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确定各类创新型、复合型或应用型人才的总体人才培养目标;在专业层面,要根据国家和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总体定位,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和实际,明确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具体目标和基本规格,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又要通过编制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与实施教学过程来实现。三级人才培养目标从设计蓝图到转化为“教师教”与“学生学”的教育行动过程,需要学校建立起课程大纲、课程与教学、学生学业评价等教学制度体系,以及学科专业、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学生服务、社会服务、教学经费、教学设施、后勤保障等教学支撑制度体系。

课程与教学体系和支撑体系的有效运行,最根本是要建立明晰的制度标准体系,让高校的每一位师生、员工知道“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应该怎么做,做到什么水平。确切地说,制度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一个重要途径和载体。教育本就是制度性活动^[3]。而制度与制度文化又是共生共存之物。正如日本学者横山宁夫所指出的:广义的制度就等于制度文化。这就合理解释了制度文化建设本身就是高校“立德树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高校制度文化为各类行为主体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行为提供了由机制、体制、规章、政策等所确定的制度保障。高校师生在共同遵守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言行习惯、价值取向。制度维系着高校的正常秩序进行和教育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是维护高校一切活动必不可少的保障机制。高校制度文化能通过各种规章制度来规范高校师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而,这种制度能够保障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与开拓创新,促进高校“立德树人”的实现。

制度创新是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之一。因此,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行大学制度体系的系统创新,明确谁来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的人怎么样,为高校师生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保障、环境保障、权益保障。同时,高校制度体系能够保证“立德树人”教育活动在井然有序中进行,能够保证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这里只需要深度思考的是:制度体系如何创新?能否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创新?创新的制度体系如何与更好的教育教学活动相契合?

三、制度文化为高校“立德树人”提供内在价值的遵循

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是:“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什么德,树什么人,怎样立德,如何树人等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立德”就是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4]。“树人”就是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5],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6],高校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7],“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4],“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5]这个目标的达成,需要制度文化作指引。

制度文化反映着“立德树人”目标的法定性,是对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的刚性约束,体现了高校制度文化建设和“立德树人”教育活动的价值主体是统一的,体现了党的教育价值理念和育人要求,其目的都是聚焦于培养出既具有高尚品德,又有真才实学的各类人才。通过制度建设,明晰良好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的培养标准,通过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的重建,使每一位大学生都成长为具有执着信念、优良品德、丰富知识、过硬本领的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6]。

因此，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构制度文化体系，规约高校师生思想和行为是一项基础性工程。涂尔干认为“道德的基本要素是纪律精神”，“道德不只是一个习惯行为体系，而是一个命令体系”^[123]。学术自由与教学自由的前提是学术与教学的规约与共同行为准则。制度文化具有调节师生行为和维护高校公共秩序的功能，它可以使素不相识的人为了各自的目标而相互合作。这种合作的特点是：人们相互获益，并不是因为他们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理解了这种秩序，而是因为他们交往中，可用这些规则来弥补自己的无知。“秩序之所以可取，不在于它能保持一切因素各就其位，而在于它能够生成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的新力量。”^[8]这在本质上意味着师生的言行要受到制度文化的制约，制度文化引导着个体言行朝着合乎道德范型的方向发展，使个体确立良好的德性和树立良好的德行，实现了制度文化“立德树人”的目的。

四、建设高质量制度文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要求

对高校制度文化的价值理解，终将落脚于新时代高校制度文化的建设。建设工作的初始点在对现实状况的剖析，对照目标，有针对性地提出重建对策和实现路径。

由于制度文化具有内隐性的特点，不易引起高校师生的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隐性育人功能易流于形式。而且在高校制度文化的建设实践层面，高校更多地关注于对上级教育行政制度的诠释与机械地执行，很少投入精力吸纳师生广泛参与，民主治校的机制和程序正义性略显薄弱，难以使高校师生理解与信服而产生能动的思想与行动。又由于各高校迫于竞争压力，急于追求“效率”，在制度制订上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重学术轻政治”“重科研轻教学”等价值倾向，“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诉求有效落实不足，制度的“合规性”与“校本”“人本”之间张力的失衡，使制度文化的“立德树人”保障功能和隐性育人功能难以彰显。制度文化是意义结构，是抽象层面的文化，对于一所高校来说，文化精神就是其心中的光明和幸福，也是其内在气质的彰显，可视为其血脉和最本真的存在，舍此，高校便成了无所依着的躯壳。从文化分析的角度说，制度与精神、价值观、思想等文化层面无法绝对分离。文化的精神必然会萌生、形成制度，制度又会使文化的精神转化成物质成果。^{[2]65}

高校高质量制度文化建设要考虑到制度文化的人文价值和伦理精神等更深层次的内涵，使制度文化建设彰显其教育功能、凝聚功能、制约功能以及激励功能等价值。具体而言，各项规章制度要按照制度的内

在发展规律来制订和修正，要充分适应高校长远发展战略目标，彰显高校成员各主体的地位，很好地契合历史时代性特征，清晰地厘定高校各部门间的明确分工。高校制度文化建设要避免教条化、形式化、简单化的倾向，避免师生因服从学校不科学的制度性安排而导致批判性思维与创新创业意识、能力和精神培养的弱化，却强化了依附从众、求静畏动、求同避异、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精神文化状态。高校作为研究高深学问和基础创新的主体，制度文化建设要在指导思想上契合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创造品格，使高校“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得到有力、有效的制度保障。

高校高质量制度文化建设要彰显共同价值追求。高校制度文化建设是高校管理者尤其是书记、校长与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努力奋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书记、校长的领导力起着关键性作用。领导力是一种推动组织或集体变革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一种建立在参与和民主基础上的相互信任关系^[9]。书记、校长是高校制度文化的领导者与设计者、管理者与创新者、继承者与变革者。制度文化建设需要书记、校长在全面准确地了解和分析学校文化现状和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确定学校制度文化的发展战略和文化目标，对制度文化进行诊断和改造，增强制度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高校制度文化建设成果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书记、校长的政治水平、教育理念、思维方式、学术修养等综合素质。但高校制度文化建设只靠书记、校长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应有广大师生员工的广泛参与，不仅因为师生员工广泛参与的制度文化建设的过程会成为汇聚全校智慧和统一全校意志的过程，更因为理解与认同是学校制度文化产生规范师生行为、内化学校共同价值观的前提，而且制度文化建设的民主机制更容易让全体师生员工成为制度文化建设的支持者、参与者、推动者和实施者。高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秉持共同理想和目标，具备共同价值行为，产生制度文化建设的合力来推动“立德树人”根本目的的实现。

高校高质量制度文化建设要体现办学特色。“特色”意味着对统一模式的超越，高校特色制度文化就是高校制度文化个性的积淀。一所高校独具特色的制度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展示了一所高校对教育特有的理解和贡献。高校制度文化特色的形成首先是一个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这自然要求我们在建设自己的制度文化特色之时不要割裂学校的传统。制度文化建设只有尊重和植根于高校自身的精神传统才能获得生机与活

力,也才能赢得广大师生的认可与行动。特色更具有时代性,需要不断培育文化敏感度,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弘扬时代精神,注入时代精神质素,凝练出既体现本校特色又适应学校和学生发展的制度文化^[10]。高校制度文化的特色建设,应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制度文化建设的目标和灵魂,用富有特色的制度文化引领和开创“立德树人”新局面,杜绝为特色而特色,为特色而标新立异。衡量高校制度文化优劣和特色的唯一标准,是看制度文化产生的人才培养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即高校的制度文化是否产生了持续较高的人才培养力和是否培养了真正的人才。

总之,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质量制度文化建设是基础、保障、准则和规约。“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11]高校的现代治理更是如此。在围绕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构高校制度文化过程中,要克服重“形式”“效率”“被动”“复制”倾向,把高质量制度文化建设作为学校未来发展、可持续发展、特色发展,凝聚人心、汇聚人智的保障和手段,以制度文化建设的法制化、科学化、合理化、民主化,实现制度文化的教育价值。生成富有特色的高校制度文化,用制度文化保证方向、提供动力、增强活力、生成凝聚力,彰显制度文化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途中的生命力和价值性。

参考文献:

- [1] [法]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M].陈光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2] 曾小华.文化·制度与社会变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 [3] 鲁洁.德育社会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69.
- [4]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03/c_1122774230.html.
- [5] 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910/c64094-30284598.html>.
- [6]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03/c_1122774230.html.
- [7]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08/c_1120082577.html.
- [8]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9.
- [9] 高靓.领导力,国外学校管理新概念[N].中国教育报,2009-02-17(3).
- [10] 叶澜.试论中国当代学校文化建设[J].教育发展研究,2006,(8):1.
- [11] 赵银平,王萌萌.习近平为何反复强调规矩意识[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3/02/c_1118150779.htm.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Culture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ity Education

WANG Li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s and cultivating peopl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ystem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s provides guidelines for the “moral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system provides legal guarantee for the “moral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culture provides the adherence to the cultural value of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quality institutional culture system of the new era should always focu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ies; morality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culture; statutory safeguards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以福利多元主义为视角

常进锋, 刘畅

(西北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 兰州 730124)

摘要: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是由国家、市场、社会、社区、家庭等多元主体,通过高效的互动协作而建立起来的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当前,我国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面临着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福利保障有待完善、女性职业福利供给亟待发展、社会组织生育福利供给体系尚需健全、社区生育福利功能有待发展、家庭内部福利功能发挥仍需提高的现实困境。未来应从打造生育友好的政策福利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以提高女性职业福利、拓宽社会组织生育福利服务路径、发挥社区载体功能推动生育福利发展等多方面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关键词:福利多元主义;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支持

中图分类号: C9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095-05

一、引言

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指对生育主体和生育行为友好的社会,即给予生育群体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上的充分尊重,使生育群体的福利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旨在不损害组织目标的前提下,促进儿童发展、生育主体个体发展及其生育需求的实现,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社会目标。^[1]2022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1962年以来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低生育率与人口结构失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是突破低生育率的重要路径,更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之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2022年,国家卫健委、发改委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一系列的政策构建起国家、市场、社会、社区等多元主体协同行动与互动合作的支持体系,以促进生育主体心理层面的生育意愿转为现实层面的生育行为。本文以福利多元主义为视角,探讨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各主体的福利责任、现实困境以及协调各个福利主体的作用发挥,探索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优化路径。

二、理论视角与文献述评

福利多元主义即福利的供给主体多元化,1978年

沃尔芬德委员会发布《志愿组织的未来》,首次提出并使用了福利多元主义的概念^[2],主张把志愿组织也作为社会福利的供给者,将福利多元主义运用于社会实践中^{[3]286}。这就打破了二元国家与市场对立的思想,推动国家、市场和家庭共同形成一个社会的福利整体,为福利国家发展提供了新路径。^[4]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演进过程中,福利主体也在不断拓展,福利三分法已不能有效满足研究需求,因此出现了福利多元主义研究四分法、五分法甚至于六分法。^[5]无论是几分法,均强调福利主体的“多元性”,即福利责任不仅仅由国家或市场主体承担,个人、家庭、社会组织也应是福利的提供者并承担相应责任。^[6]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打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提出了“社会保障社会化”的改革方向,反对国家包揽福利,强调政府与非政府部分的责任分担^[7],这与福利多元主义理念不谋而合,也正因如此,我国打造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借鉴福利多元主义在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推动国家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要求政府赋权生育、构建良好适度的生育文化,尊重不同的生育选择,与其他主体履行生育服务和生养教全过程的责任^[8],为生育主体提供更多的生

收稿日期: 2023-03-27

作者简介: 常进锋(1987-),男,河北唐山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研究。

育可能性^[9]。目前学界对于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研究主要集中于生育社会保障、生育与女性职业福利、生育与家庭福利、生育文化构建四个方面：

一是生育社会保障。生育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保障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为目标。具体包括生育津贴、医疗帮助、生育补助、生育休假等方面，同时也包括对生育行为的其他限制性或激励性措施。^[10]生育福利保障能够有效分担家庭的生育负担，构建女性生育权益保障机制^[11]，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为有效提高人口生育率，激励型的生育社会保障福利是必要的^[12]，而激励型生育保障措施的顺利实施需要构建起多元主体合作制度与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其提供体制保障^[13]，因此，在未来仍需密切多主体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共同构建完善的生育社会保障制度。

二是生育与女性职业福利。受性别文化、家庭分工模式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缺陷等因素影响，育龄妇女面临着较为明显的母职困局。^[14]女性肩负着生育的主体责任，而女性生育的黄金期也是自身职业发展关键期，职业发展同生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从而导致女性往往成为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的弱势群体^[15]。因此，生育支持政策中需要融入更多女性视角^[16]，警惕女性“母职”的进一步强化，给予女性职业福利，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推动夫妻的生育责任共担^[17]。制定平衡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的政策制度，确保男性更多地承担养育责任、减轻女性的母性角色负担，保障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平等的参与权利^[18]，切实推进女性职业福利。

三是生育与家庭福利。家庭是生育的主体，在生育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家庭生育福利体系。加强生育支持不能仅限于人口政策，更要依靠家庭生育福利政策的建立。^[19]若生育支持政策仅仅指向多孩而忽略家庭，则会极大限制家庭的生育意愿，降低人口生育率。^[20]因此，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中需要有效地纳入家庭视角，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的福利对象，提升家庭的养育能力，平衡女性工作与家庭的矛盾，促进家庭成员身心健康与自我发展。^[21]今后研究需要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于世界上已有的成熟的家庭政策进行深度剖析，借鉴他国经验逐步建立起中国的家庭福利体系。^[22]

四是生育文化构建。保证生育繁衍是所有文明关注的核心命题，而所有的文明建设都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活动中进行。从转变生育观念到培育新型生育文化，再到促进生育文明建设，是促进人口长期发展的有效路径。^[23]因此，要更多地从“养孩子”

的视角看待人口生育问题，思考如何构建新的生育文化，把从“生孩子”到“养孩子”的认知转变作为提高育龄人口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可行路径^[24]。注重新规范观念的推广，从人类自身生产的社会责任出发，建立生育责任感^[25]，将国家的发展责任与个体的生育责任相结合，引导新型生育文化的构建，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新格局。

综合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生育福利研究呈现出更为完善与深入的发展趋势。强调各个主体在生育中发挥自身功能，从满足生育主体物质需求深入到满足生育主体文化需求。虽然生育福利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更多从单一福利供给主体出发，缺乏综合性研究视角，因此本研究将采用多元福利主义理论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中的主体分工以及互动合作进行探索性研究。

三、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我国顺应人口发展规律，不断完善生育政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但人口生育低迷已成现实，需要通过进一步强化多元生育福利供给，来巩固拓展我国人口红利。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多元参与，即不能只依靠国家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市场与社会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各个福利主体协同参与并发挥功能是实现福利效能最大化的前提。^[26]现有福利供给体系中，市场、社区等主体的参与仍然有限，生育政策保障亟须完善。

(一)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福利保障有待完善

良好的福利供给是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有力保障。为缓解生育率下降、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我国不断健全完善优化生育政策。但现有生育保障事业仍难以有效满足生育主体的福利需求^[27]，生育相关制度保障仍需进一步优化。一是生育相关法律的系统性有待加强。目前我国对于女性的生育权益保护法律条款分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这些法律为女性生育提供了可靠保障，但法律条款的分散增加了生育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难度，限制了生育主体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效率与积极性。同时，我国对于女性就业歧视仍然没有严格明确的法律禁止，导致女性受到就业歧视以及变相就业歧视后无法有效依靠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二是生育友好的文化环境亟须培育。受我国长期限制性生育政策以及人们生育观念转变等因素影响，社会生育

积极性不断降低,市场、社会组织、社区等主体对于生育政策的贯彻也存在不足,影响了生育友好的文化环境的建成。三是政府引导能力有待提升。目前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大部分责任仍然由政府承担,市场、社会组织、社区等其他主体并未能有效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政府需要加强对各个主体的引导,以推进构建“多元主体”的生育福利体系。

(二) 女性职业福利供给亟待发展

青年女性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生育与劳动权益获得的主体。^[28]但部分用人单位歧视女性,导致女性在就业中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虽然加强了对女性的职场保护,但女性职业福利仍存在不足。一是在女性生育过程中企业提供的物质保障不足。究其因是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过于高昂,根据2021年相关数据测算,女职工每生育一个孩子企业平均需要承担3.2万元的生育成本^[29],加上“育儿假”等假期福利这一用人单位的时间成本,有些企业不堪重负,对“政策请客,企业买单”的女性生育政策消极对待。二是企业参与生育服务积极性不足。生育服务行业难以通过同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的有效对话协商构建符合社会利益、家庭需求的生育服务体系。三是部分市场主体缺乏社会责任感。企业固然以盈利为目的,但不应忽略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对于生育政策以及育龄女性的消极态度,阻碍了女性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不利于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构建。

(三) 社会组织生育福利供给体系尚需健全

社会组织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是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有益补充。2022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数据表明,截至2021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为901870个,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参与公共治理、进行政策倡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生育福利供给仍存在不足。一是福利、服务资源递送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即福利需求对象难以从社会组织中获取福利、服务等资源,福利资源的可及性较差,难以释放生育主体的生育潜力。二是部分社会组织参与生育服务专业性不足,难以得到生育主体充分信任。生育服务需要社会组织参与的同时,也对社会组织参与的质量有着更高期待。生育主体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幼有所育,而是“幼有优育”,这就对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生育服务质量有着更严苛的要求,而现有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生育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生育主体接受度低,限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提供生育福利保障。

(四) 社区生育福利功能有待发展

作为最接近人们生活的主体,社区曾为宣传国家生育政策、限制人口生育做出了重要贡献。生育政策转向后,社区在生育福利供给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其生育相关的服务亟待改善。一是社区合作意识需要加强。社区与合作可能性高、专业性强的公益慈善组织联系不足,致使公益慈善组织等主体不能有效下沉到社区提供生育服务福利。同时社区对所收集的生育服务信息运用不足,尽管社区相较于其他主体有着信息优势,却无法有效满足生育主体需求,而其他福利供给主体虽有满足其需求,但对于生育主体需求缺乏准确认知,因此社区未来仍需不断推进自身的信息运用能力,加强同其他生育福利主体的合作。二是社区难以为生育主体提供多方位便利。同其他主体相比,社区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更贴近生育主体,然而部分社区并不能有效地为生育主体提供便利,低质的生育服务质量使其难以成为育龄群体生育需求满足的可靠载体。因此未来仍需完善社区的生育保障功能。

(五) 家庭内部福利功能发挥仍需提高

家庭是生育的基本载体,家庭的经济基础、文化状况等因素影响着家庭的生育水平。相较于高额的生育成本这一“拦路虎”,家庭内部的角色缺位所导致的福利供给不足也成了不少家庭难以承受之重。一是难以有效发挥老年人在抚育中的作用。有人基于对五个城市的调查发现,照料孙辈对于祖父母的幸福度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卷入照料孙辈的程度越深,祖父母的幸福度越低。^[30]无论是老年人对于子女的责任还是家庭内部的成员功能配置,隔代照料只是祖父母基于其角色的一种责任,而高强度的孙辈照料不利于老年人的自评健康。^[31]同时老年人的隔代照料行为并不能突出其社会价值,致使老年人减少在家庭生育中的福利供给。二是男性在生育过程中付出较少。费孝通曾在《生育制度》中提出,在男女分工体系中,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之间的合作,不能由一男或者一女单独承担。^[32]^[122-123]生育友好不能仅强化或主要强化女性的家庭角色,而是要兼顾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平衡,兼顾男性对育儿的共同参与。^[33]目前男性参与抚育的积极性仍然不高,社会依旧采用传统的家庭分工观念对男女在生育过程中的行为进行规范,抑制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四、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优化路径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强调

多元主体在生育福利资源共享、递送、分配过程中的多元协作与良性互动,重点是多元主体的合作,从而有效避免某单一主体功能发挥失灵。因此,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优质政策环境的保障,离不开市场的福利供给,离不开家庭内部的良好协作,更离不开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积极参与。

(一) 打造生育友好的政策福利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既要优化生育福利保障制度,也要充分调动市场与社会力量乃至家庭的作用。^[34]一是整合现有法律条款,构建统一规范的生育法律体系。这不仅可以体现国家对于生育事业的重视,更能为生育主体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便利,帮助女性更好地通过法律规范维护自身权益。二是继续完善生育福利保障,推动生育保障的公平性,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生育保障需求,以全局性视角建立全面覆盖的生育福利制度。全面覆盖不单是指全方位,更要注重全过程,即生育福利不但要保障“生”,更要重视儿童保育在儿童福利中的作用,为生育行为提供全程的福利供给,给予人们足够的生育“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三是给予人民群众“生育自主权”,构建良好生育文化。当代青年更倾向于将自我视为责任与权利的主体,因此,我们应转变生育文化的构建方式,给予青年群体生育选择权。同时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也应积极参与,彰显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提升对生育的包容性。四是激励多元主体共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即政府、市场、家庭、社区层次有别、功能互补、相互支持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福利需要。^[35]进一步降低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所承担的生育成本,完善政府、企业、社会风险共担、协同共建的生育服务福利体系,拓宽其他主体参与生育服务的路径,建立生育支持激励机制,从而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活力。

(二) 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女性职业福利

市场是女性提高自身生活质量,促进自身全面发展,实现自身社会价值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场域。未来仍需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以发展女性职业福利。一是构建生育全过程成本分担机制,降低企业所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假、弹性工作制等生育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生育积极性,但在企业内部造成的人员短缺、工作效率下降等问题无疑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难以调动企业为女性提供生育福利的积极性。因此,降低企业所承担的生育成本是推进企业建立平等就业意识的可行途径,由企业、政府、家庭三方共同承担女性生育所带来的成本,给当年有女性职工生育的企业一定比例税收优惠。采取多种举措

切实平衡好家庭、企业等各方利益,为用人单位建设女性生育基础设施提供经济支持,对企业的生育问题反馈及时处理。二是以竞争促发展,积极发展生育服务行业,实现家庭养育功能社会化。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企业应积极投身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不断推进生育服务行业的规范化,为生育服务需求者提供价格低、质量高的生育服务,推进养育功能的社会化,减轻生育家庭压力。企业应积极完善内部的生育福利供给,在工作场所建设女性生育基础服务设施,如哺乳室、孕妇办公室等,不但为生育女性提供便利,也增强企业对高质量人才的吸引力,以一定的经济成本换取优质人才资源,肩负起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社会责任。

(三) 拓宽社会组织生育福利服务路径

作为生育福利供给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参与生育服务有助于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生育服务需求,形成全方位的生育服务体系。一是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慈善组织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递送功能。在未来生育服务的发展中应重视社会组织在生育福利递送中的重要地位,推动政府同社会组织互动互惠,以社会组织作为生育福利递送的枢纽点,将统一的生育政策支持转化为更灵活的生育福利递送,因地制宜满足育龄群体的生育福利需求。二是发挥社会组织自身优势,构建高质量的生育服务体系。尤其鼓励社会工作专业机构积极参与到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中来,运用专业理念与专业方法开展青年群体生育促进行动,提振育龄群体的生育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第三方优势,积极开展生育服务质量评估,建立严格规范的服务质量评估体系,以此激励其他主体生育服务的改进,提高社会整体生育服务质量。

(四) 发挥社区载体功能,推动生育福利发展

社区作为育龄群体生育福利供给的直接载体,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因此,社区需要采取多种途径满足育龄群体的生育福利需求。一是以社区为载体开展生育福利活动,接纳各个服务主体参与生育服务。社区有着其他生育福利主体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其同生育主体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未来发展社区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同其他主体构建高效沟通协作机制,建立生育福利供给平台,积极寻找具备高质量生育服务福利供给能力的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等主体合作,多元主体共同推进社区生育福利发展,让生育群体切实感受、享受到社区所提供的生育福利。二是拓展社区生育服务范围,发挥社区的信息优势。社区在生育服务中发挥的作用受限,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其生育服务范围受限,未来社区可以在不断扩展生育服务范围的同时兼顾生育服务质量的提高。为社区中育龄群体提供生育知识与技能培训,缓解育龄群体的精神与技能压力,给予育龄群体生育全过程支持,建立女性生育服务平台,推动生育女性相互交流,及时收集信息并建立生育问题反馈机制,发展社区生育的福利媒介功能。

(五) 构建以家庭为核心的生育福利保障体系

家庭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是两性共同选择的结果,必然受家庭状况影响。^[36]家庭不仅是生育决策的主体和产生新生命的场域,也是为女性提供家庭生育福利,为新生儿社会化提供安全环境与物质精神保障的重要保障。^[37]因此,未来需要以家庭为核心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一是推动老年人在隔代照料中发挥适当作用。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通过物质补贴、精神嘉奖等方式激发老年人在隔代照料中的成就感与获得感,提高老年人隔代照料的价值和积极性主动性。二是增加男性在生育劳动中的服务占比。目前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等较多地区都给予了夫妻平等的生育假期,为男性承担更多生育责任提供了可能。未来需构建以家庭为单位的、灵活性强的生育假期福利,为男性分担生育责任提供更多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 [1] 石人炳. 生育友好型社会:概念、目标和举措[N]. 中国人口报, 2017-7-26(3).
- [2] 郁建兴, 陈可鉴. 福利国家为什么需要慈善部门?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1): 69-80.
- [3] J. Wolfenden. *The Futur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M]. London: Croom Helm, 1978.
- [4] Rose R. *Common goals but different roles: The st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welfare mix* [M]// Richard Rose, Rei Shiratori. *The welfare state: East and West (13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5] 王家峰. 福利国家改革:福利多元主义及其反思[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9(5): 85-90.
- [6] 彭华民, 黄叶青. 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J]. 南开学报, 2006(6): 40-48.
- [7] 林闽钢. 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J]. 社会, 2002(7): 36-37.
- [8] 穆光宗, 林进龙. 论生育友好型社会——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的风险与治理[J]. 探索与争鸣, 2021(7): 56-69+178.
- [9] 胡梦芸. 中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基于欧洲低生育态势与政策实践的思考[J]. 新视野, 2020(4): 55-61.
- [10] 沈澈, 王玲. 互动式发展:新中国成立70年来生育政策与生育保障的演进及展望[J]. 社会保障研究, 2019(6): 27-36.
- [11] 段美枝.“全面二孩”政策目标下生育保障制度改革研究[J]. 卫生经济研究, 2018(4): 20-22.
- [12] 唐梅玲, 王浩. 三孩政策下农村激励型生育社会保障法律路径研究[J]. 理论月刊, 2022(6): 115-126.
- [13] 唐梅玲, 王浩. 三孩政策下激励型生育保障措施法治化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 2022(7): 121-130.
- [14] 吴帆. 三孩政策之下如何化解母职困局[N]. 社会科学报, 2021-7-15(4).
- [15] 张琪, 张琳. 生育支持对女性职业稳定的影响机制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 2017(7): 32-39.
- [16] 马璐. 加快构建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于现有实践与文献的思考[J]. 国际税收, 2022(4): 3-11.
- [17] 杨菊华. 生育支持与生育支持政策:基本意涵与未来取向[J]. 山东社会科学, 2019(10): 98-107.
- [18] 黄桂霞. 生育支持对女性职业中断的缓冲作用——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为基础[J]. 妇女研究论丛, 2014(4): 27-33.
- [19] 鲁全. 中国的家庭结构变迁与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研究[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1(5): 93-99.
- [20] 翟振武, 李姝婧. 把握生育新态势 建立整体性生育支持政策体系[J]. 人口研究, 2022(6): 10-16.
- [21] 杨菊华, 杜声红. 部分国家生育支持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探索, 2017(2): 137-146.
- [22] 王晓宇, 原新, 韩昱洁. 家庭生育决策与全面两孩政策——基于流动人口的视角[J]. 南开经济研究, 2018(2): 93-109.
- [23] 李志, 吴永江. 育龄青年的生育价值观影响生育计划的调查研究——基于生育支持的中介作用分析[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2(Z1): 84-96.
- [24] 风笑天. 三孩生育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98-105+2.
- [25] 沈笛, 张金荣. 新型生育文化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及启示[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36(3): 72-78.
- [26] 王卓, 常进锋.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的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J]. 中州学刊, 2022(9): 83-92.
- [27] 黄桂霞. 中国生育保障70年:回顾与前瞻[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20, 32(1): 66-73.
- [28] 常进锋, 胡奎.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下青年女职工的权益保障研究[J]. 青年探索, 2022(1): 82-91.
- [29] 杨慧. 三孩政策下企业生育成本负担及对策研究——基于延长产假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22(6): 17-31.
- [30] 肖富群, 李雨, 王小璐. 带孙子幸福吗? ——基于全国五个城市问卷调查的研究[J]. 社会科学, 2021(12): 81-93.
- [31] 黄国桂, 杜鹃, 陈功. 隔代照料对于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探析[J]. 人口与发展, 2016(6): 93-100+109.
- [32] 费孝通. 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33] 吴帆. 何以生育友好? ——基于国际经验和情境的分析[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22, 34(2): 36-43.

(下转第110页)

新时代我国家庭养老的主要矛盾与应对

李松雷

(德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家庭养老是最符合中国人意愿的养老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 家庭养老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家庭养老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要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就要继续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性地位,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鼓励老年人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推动“智慧养老”发展, 完善家庭养老的支持与监督机制,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关键词: 新时代; 家庭养老; 养老需求; 养老服务供给

中图分类号: D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100-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 一方面, 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2012年, 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9390万人, 占总人口的14.3%,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 占总人口的9.4%。^[1]2021年底, 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736万人, 占总人口的18.9%, 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056万人, 占总人口的14.2%。^[2]另一方面, 新时代老年人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对物质生活的需要转化为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现行的家庭养老服务供给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和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加强家庭养老体系的建设迫在眉睫。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对养老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家庭养老的地位、家庭养老的内容、家庭养老的政策支持等方面。

家庭养老的地位。居家养老是中国的传统养老模式, 费孝通先生将这一模式称之为“反馈模式”, 即“甲代抚育乙代, 乙代赡养甲代, 乙代抚育丙代, 丙代又赡养乙代, 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3]这种反馈模式被中国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和宗教所推崇。但是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家庭结构的变迁, 机构养老、社区养老蓬勃发展, 家庭养老不再是中国人唯一的养老模式了。

家庭养老的内容。西方学者将老年人的基本需要概括为三个“M”: Money、Medicare和Mental, 即经济需要、医疗需要和精神需要。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是养老的三个基本内

容。中西方说法有别, 大意相通。目前, 中国的家庭养老主要表现在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上, 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与发展需求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支持。

家庭养老的政策支持。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家庭养老是人类应对老年风险作出的自发回应, 是一种非正式的养老保障制度, 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和明确的责任分担机制, 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水平完全取决于家庭成员的资源多寡和主观意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家庭养老应该由家庭、政府、社会共同来承担。但对于家庭、政府、社会各自应当担负的职责尚未展开系统化研究, 只有一些碎片化的理论与措施。

当前关于家庭养老的研究与实践暴露出三个问题。首先, 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被弱化。很多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方面, 没有看到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型的背景下, 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更为凸显。其次, 忽视了家庭养老内容在新时代更为丰富和多样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老年人的需求也在不断转化、提升。最后, 家庭养老的支持政策缺乏整体性和协同性。碎片化的、分散的、不成体系的理论无法分析、指导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家庭养老体系。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没有认清新时代我国家庭养老的主要矛盾。

二、新时代我国家庭养老的主要矛盾

“家庭养老是指由家庭成员承担养老责任的文化

收稿日期: 2023-03-10

基金项目: 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阈下家庭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研究”(2022DZZS025)。

作者简介: 李松雷(1979-), 女, 山东即墨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模式和运行方式的总称”^[4]，是以血缘为基础由配偶或子女承担责任的一种养老模式。新时代家庭养老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家庭养老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一）老年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与家庭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前提是有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的经济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如期完成，“两不愁”（即吃不愁、穿不愁）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城乡老人的养老需求均由原来的以物质生活资料为主逐渐向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转化，即由老有所养转为老有所乐。老年人希望获得更多的精神产品、更为丰富的娱乐活动、更贴心的陪伴。

但是，多数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仍将养老仅仅理解为满足老人的衣食住行，不仅没有意识到老人的精神需求，也没有意识到精神需求会随着物质需求的满足越来越凸显。部分家庭认识到老人有精神需求，但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极少数家庭漠视、否定老人的精神需求，不仅不尊重老人，甚至压榨老人，让老人为他们服务。而大部分老人不愿给子女添麻烦，一般不会主动诉说自己的需求。因而，当前大多数家庭还不能满足老年人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很多老年人即使物质上较为丰富，精神上也比较贫瘠、情感上比较匮乏，成为“孤独的守望者”。

（二）老年人对发展的需求与家庭成员不支持之间的矛盾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在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等需求被满足之后，人会向最高层次的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迈进。老年人也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当前老年人的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即由老有所安到老有所为。某些领域有突出贡献的老年人的才能和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部分老年人特别是“低龄”老年人有发挥余热的发展需求。即使是有些从普通岗位退休的老年人，也愿继续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就目前来说，社会提供给老年人再就业的岗位并不多。同时，有些家庭担心老人的身体不能胜任新的工作，有些家庭为了面子（怕被说不孝），有些家庭则是从思想上不理解老年人的自我实现的需求，而不支持，甚至干涉、阻止老人再就业。大部分老人会顾及子女的感受，压抑个人自我实现的需求。

（三）家庭养老方式发展的不充分性

目前，家庭养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共居式

家庭养老。老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子女能够给老人提供及时、全面的生活照料，特别是能给予老人精神慰藉，满足老人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情感需求。同时，老人也能给子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而老人与子女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容易引发代际间的冲突与矛盾。为了避免冲突，老人往往“忍辱负重”；另一种是分居式家庭养老。老人不与子女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又离得不远，即“一碗汤的距离”。这种养老方式既能避免两代人共居一处产生代际冲突，又能让两代人保持比较亲密的联系，既分户又互助的格局让老人和子女过得都比较舒心。但是，这种养老方式需要老人和子女有各自的住房，现实中很多人无法满足这一条件。再者，多数子女忙于工作或个人的小家庭，虽然离老人很近，但给予的关注仍比较少。而大多数中国父母都是无私奉献型，“这碗汤”往往是父母端给子女。因而，不管是共居式养老，还是分居式养老，都是以老年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压抑自身的需求为前提的。

（四）城乡家庭养老水平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村60岁及以上老人占到了23.81%，比城镇老人比例高出了7.99%。65岁及以上的农村老人占到了17.72%，比城镇65岁老人高出6.61%。^[5]而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6]两组数据的对比充分表明：与城镇相比，农村老人规模大、收入低，农村的养老服务供给压力大。一是农村老人获得的物质生活资料不如城镇老人丰富。这是由老人及家庭的收入直接决定的。大部分城镇老人都有退休金，而农村老人的收入大部分来源于个人及家庭的劳动所得。也就是说，在农村，如果一个老人丧失了劳动能力，子女再不愿或无力供养，这个老人的生活会很难。二是农村老人获得的照料不如城镇老人。农村老人由于长期受所处环境的影响、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普遍健康意识淡薄，往往疾病缠身而不就医。而子女又忙于生计，很难及时带老人就诊或长期地照料老人。而城镇老人比较注重养生，大部分人会定期体检，身患疾病后会及时就医，子女一般也会陪护或者为父母请护工，城镇老人比农村老人获得的照料要及时、细致、周到。三是城乡老人获得的精神慰藉存在差距。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年轻人进城务工，导致大批老人“留守”农村。留守老人只能从子女那里获得有限的经济支持，心理和精神慰藉无法被关照。还有部分高龄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几乎无法与子女联系。相比较而言，城镇

子女与老人的沟通、交流、联系比较频繁,能够比较及时地了解老人的生活状况、心理和精神状态,并能给予一定的支持与帮助。

三、新时代提升家庭养老功能的对策

“家庭作为天然的养老单位,是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重要载体。”^[7]发挥新时代家庭养老的功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树立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性地位

新时代老人精神需求的满足需要家庭成员的理解与支持,发展需求的满足也离不开家庭成员的理解与支持。老人需求结构的变化不仅没有削弱家庭养老的基础性地位,反而更凸显了家庭养老时代价值。对中国大多数老人来说,家是港湾,是幸福的来源与归宿,是身体和灵魂休憩的最佳场所。家,有着其他养老机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据调查,绝大部分中国老人不愿意去养老机构,更愿意居家养老。

新时代要继续巩固和增强家庭养老的功能,传承弘扬“百善孝为先”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要把弘扬孝老敬亲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8]

(二) 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支持老年人的发展需要

新时代老年人的需求由物质转向精神,家庭养老的重心也应转移到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上来。子女要定期陪伴父母,了解他们的想法与需求,及时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鼓励、支持父母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扩大父母的生活圈与交际圈;子女还要做父母的表率,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多向父母传递正能量。对于身患疾病的父母,子女不仅要给予身体照料,也要为父母做好情绪疏导,陪父母共渡难关。

子女还要跟上时代步伐,正确看待老年阶段与老年人。老年阶段依然是可以奋斗、发光发热的阶段,老年人依然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服务他人、服务社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9]所以子女要鼓励、支持有意愿的老人再次走向工作岗位,帮助老人选择适合的工作岗位,为再就业老人提供和谐的家庭环境、适宜的交通工具,耐心倾听老人在新职场上的感受并同老人分享自己的职场经验,及时帮助老人解决在新工作中遇到的困惑与难题,做老人职场的坚实后盾。

(三) 创新家庭养老的方式,培育老年人生活服务新业态

共居式家庭养老和分居式家庭养老尽管各有所长,但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当下,已有一大批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步入老年。已婚的独生子女面临需要赡养的4位老人,往往分身乏术。如何在亲情和工作中做出取舍,如何在老人和孩子之间做好平衡,已经成为这些中年人不容回避的现实难题。同时,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对那些留守在农村的老人来说,“养儿防老”已不可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很多老人与子女都是相距千里,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家庭养老方式的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互联网+养老服务”的新模式能有力克服现有家庭养老方式的不足,使离家在外、分身乏术的子女也能为父母提供优质的服务。《“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指出:“鼓励互联网企业开发面向老年人各种活动场景的监测提醒功能,利用大数据方便老年人的居家出行、健康管理和应急处置。”^[10]有条件的子女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的便利条件,进一步升级家庭养老服务。如可以给独居老人的家里安装监控设备,也可以在网上下单,实现养老服务线上线下融合。“互联网+养老服务”必将成为未来家庭养老的重要模式。由于城乡家庭养老服务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因地制宜,开发新的家庭养老方式。如可以尝试家庭互助养老、寄养养老等。

(四) 加强政府的顶层设计,完善家庭养老的政策支持

当前,我国关于家庭养老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越来越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这些顶层设计是家庭养老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随着新时代养老需求结构的变化,顶层设计要聚焦在如何使家庭养老服务发展得更充分、如何缩小城乡之间养老的差距,以及如何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上来。

老年人能否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关键要看作为主要赡养人的子女。为此要完善家庭养老的支持政策,免去家庭照顾者(子女)的后顾之忧。一是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减轻赡养人的经济负担。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设立了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这项规定的初衷是好的,但实践中往往无法判断纳税人是否尽了赡养义务。因此应根据子女赡养老人的真实情况有

区别地减免税收。二是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破解赡养人家庭工作难以兼顾的困境。目前虽然有用人单位已经执行了探亲休假规定，但是力度还不够，应进一步完善对那些长期卧病在床的老人的政策支持。三是加强赡养人的养老护理培训，提高他们的照顾能力。“支持有关机构、行业协会开发公益课程并利用互联网平台等免费开放”。^[9]还可以在小区开展老年人护理技能讲座及现场演示，让更多的人掌握基本的老年人养护技能。四是建立常态化的指导与监督机制，督促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如果赡养人有能力赡养老人而不赡养，其行为可以纳入到个人社会信用记录。还可以引导用人单位在评优评奖时对其一票否决。五是家庭养老的支持政策要向农村倾斜。如提高农民的养老金，对尽了赡养义务的农村子女给予一定的补贴等，缩小城乡养老的差距，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晚年。

四、结语

家庭养老既是家之重事，也是国之大事。新时代老年人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养老需要老年人、家庭、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各尽其责。老年人要转变心态，主动参与家庭事务和社会事务，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家庭成员要尊重老人的真实意愿，以老人的需求为导向，尽可能满足老人更高层次的需求。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家庭养老的相关支持政策，对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完善，确保政策贯彻落实。政府要引导人们树立积极的老齡观，大力宣扬老年是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增强老年人自我养老的能力，为家庭养老提供支

持。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呵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创造一个老年友好型社会。

参考文献：

- [1] 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3-06-19). <https://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306/201306154747469.shtml>.
- [2] 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2-08-26). <https://images3.mca.gov.cn/www2017/file/202208/2021mzsyfztjgb.pdf>.
- [3]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3): 7.
- [4] 姚远. 中国家庭养老研究[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1: 50.
- [5]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EB/OL]. (2021-05-11).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
- [6] 国家统计局2022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EB/OL]. (2023-01-17).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301/t20230117_1892088.html.
- [7] 白维军, 等. 积极老龄化视域中的家庭养老政策支持研究[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63.
- [8] 习近平.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 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N]. 人民日报, 2016-05-29(1).
- [9]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EB/OL]. (2021-12-3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21/content_5674844.htm.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EB/OL]. (2012-12-28). http://www.gov.cn/guoqing/2012-10/29/content_5647622.htm.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amily Pens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LI Songlei

(School of Marx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Family support for the aged is the most suitable way to support the aged in China. Sinc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a new era,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family pension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family pension suppl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w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continue to consolidate the basic position of family pension, enrich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elderly, encourage the elderly to participate more in social activities, use the Internet and big data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pension”, improve the support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family pension, and let the elderly share the fruit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enjoy a happy old age.

Key words: new era; family pension; elderly care needs; elderly care supply

基于反向课程矩阵学理的世界现代史教学设计探究

王延敏

(德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1)

摘要: 反向课程矩阵理论意在促进学生主动、有效学习, 帮助教师实现世界现代史课程的教学目标, 依据反向矩阵理论设计的课程设计矩阵能够呈现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课程的评价指标。基于过程性考核设计的各教学活动评价量表的编制和应用是学生中心、成果导向的教学模式真正落地生效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 世界现代史; 学生中心; 成果导向; 课程矩阵; 反向设计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3)05-0104-07

一、世界现代史课程架构

世界现代史课程的基本任务是从宏观、中观及微观的层面考察分析20世纪上半期的世界历史, 既注重对个别国家、地区、民族、事件、人物历史的特殊性研究, 也注重考察历史现象间的互相关联, 寻找各国历史发展的共性, 进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世界现代史课程教学需遵循历史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1], 以培育“有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 有教育使命和事业担当”的中学历史教师为主要目标导向, 努力

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知识方面, 能解释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 能叙述世界现代史发展的4条主要发展线索。能力方面, 能运用所学理论和知识综合分析问题。价值方面, 从小组协作学习、小组专题讨论中凝聚团队精神; 从中外历史的纵横比较中厚植家国情怀, 坚定“四个自信”。

课程教学采用模块化教学方式, 共分4个模块, 每一模块都以4条主要发展线索的各自发展态势为思路展开。课程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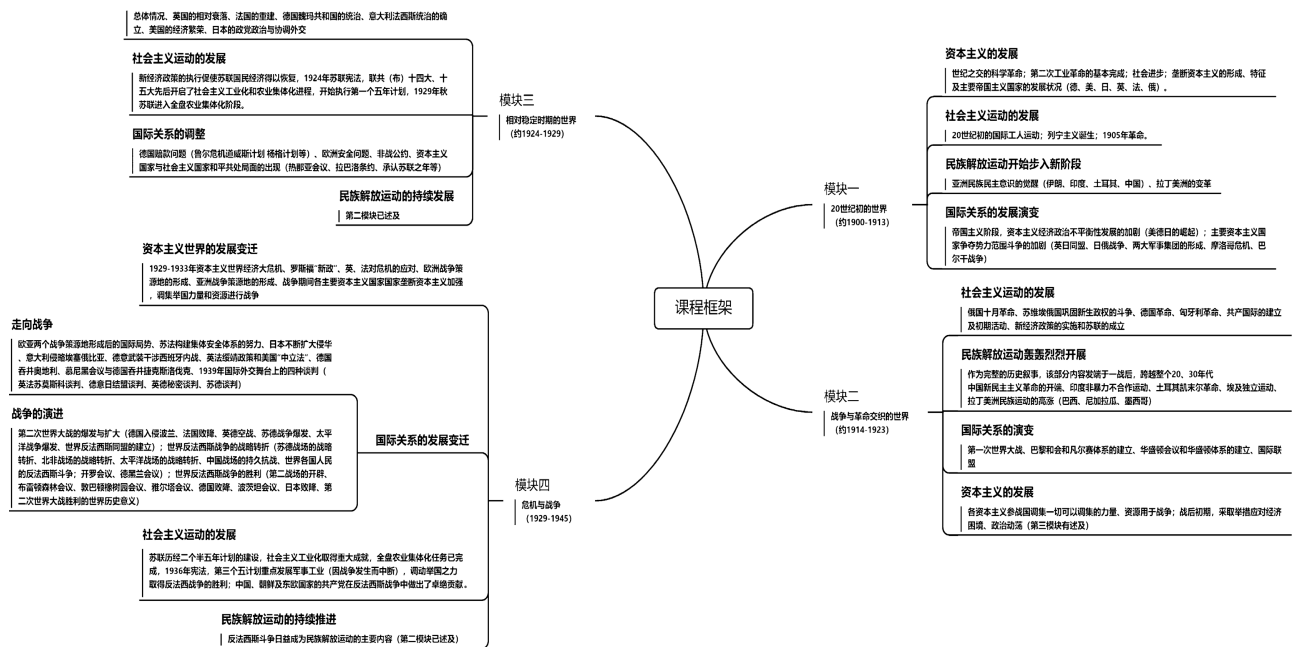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现代史课程框架

收稿日期: 2023-04-03

基金项目: 山东省教育厅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同向同行、协同育人: 世界现代史‘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M2020246)。

作者简介: 王延敏(1965-), 女, 山东德州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以色列政治文化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4个模块呈现了20世纪上半期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拎起了4条主要发展线索。关于4个模块的教学架构有三点需要说明。首先就模块划分而言:4个模块基本按时间顺序进行划分,但模块中的一些内容就其完整叙事而言会延展至两三个模块的时间段,这种情况下,该内容的教学会安排在一个模块中进行。如第二模块中“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是教材第5章的内容,直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2],它没有伴随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走向低潮而走向低潮或结束,而是持续高涨,在时间上跨越二三十年代,并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相连,成为“20世纪中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反帝、独立浪潮的序幕,对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3]

其次就模块教学目标而言:在模块教学中,要让学生明确完成每一个模块的学习后应达到的学习目标。模块一要求学生达到的知识目标见表6。主要价值目标是: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美国崛起及对外关系调整的探究,了解中西现代化的不同路径,深刻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本质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质。模块二要求学生达到的知识目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原因、进程、性质、结果和影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历史前提、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案例、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举措、新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异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性质及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特点和灭亡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初期活动;一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主要原因、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和共和国建立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改革及评价,甘地主义及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及评价,卡德纳斯改革及评价等。价值目标是:深刻认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探究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土耳其凯末尔革命,深刻领悟任何国家革命或建设道路的选择必须与本国国情、民情相适应,必须是社会现实所需要。模块三要求学生达到的知识目标是:相对稳定时期,英法美意日德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及主要利益关切;苏联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主要失误;围绕德国赔款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的国际关系调整。价值目标:探究斯大林模式,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重大成功的原因。模块四要求学生达到的知识目标是:20

世纪30年代大危机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解救危机的主要举措,罗斯福新政及评价,德日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及异同;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及美欧国家的“绥靖政策”,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后,世界是怎样由避免战争而一步步走向世界大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原因、进程和影响,大战中英美苏的合作与冲突及主要首脑会议与战争进程的关系,二战中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价值目标:分析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发展变迁,探究当国际社会遭遇困境和危机时,主要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的伟大贡献;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启示,深刻领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中国应对国际困局危局的中国智慧。与此同时,在每一模块的教学中还有学生能力目标培养的任务要求,主要是通过对课程内容深入的逻辑分析培养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通过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术研究能力、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最后就如何达成4模块教学目标而言:以上课程架构和分析反映了课程丰富的内容和多层面的教学目标,如何切实完成教学目标,还需要针对不同的任务要求和知识特点、遵循“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理念进行教学设计。通过多年来的教学实践及对诸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学习和探究,发现“反向课程矩阵教学设计”最具指导性和可行性,它的机理在于通过“目标驱动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变成教学活动的主体”^[4]。教师的角色主要是“为学生搭建‘脚手架’,帮助他们完成学习与发展任务”^[5]。

二、“反向课程矩阵设计”的基本学理

“反向课程矩阵设计”包含了“反向设计”和“课程设计矩阵”两个概念,是由美国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课程矩阵横向排列的是:一般目标、具体目标、教法、学法、评价与反馈5个要素,纵向排列的是按教学进度推进的课程教学要点(如表1),这样每一个课程要点的教学设计就可以填表完成。

该矩阵自左而右一目了然地展示了“教师教什么或学生学什么(一般目标、具体目标)”“教师怎么教和学生怎么学(教法、学法)”“教得怎么样或学得怎么样(评价/反馈)”的教学设计逻辑顺序,总体反映的是传统的教学设计思路。在“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生学习成果为中心”的大学教学改革日益深入开展的背景下,课程矩阵应突出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学得怎么样”的问题,故“反

表1 课程设计矩阵

课程设计要素	一般目标	具体目标	教法	学法	评价/反馈	
课程要点 (模块或章节)	一	A	A ₁	T ₁	L ₁	O ₁
			A ₂	T ₂	L ₂	O ₂
			A ₃	T ₃	L ₃	O ₃
	二	B	B ₁	T ₄	L ₄	O ₄
			B ₂	T ₅	L ₅	O ₅
			B ₃	T ₆	L ₆	O ₆
	三	C	C ₁	T ₇	L ₇	O ₇
			C ₂	T ₈	L ₈	O ₈
			C ₃	T ₉	L ₉	O ₉
.....	

表2 反向课程矩阵设计

课程设计要素	一般目标	具体目标	教法	学法	评价/反馈
设计步骤	第五步	第一步	第四步	第三步	第二步
课程要点 (模块或章节)	A	A ₁	T ₁	L ₁	O ₁
		A ₂	T ₂	L ₂	O ₂
		A ₃	T ₃	L ₃	O ₃
.....

向设计”的思路被越来越广泛地重视和接受。第一步要确定具体目标,明确通过课程学习应达成哪些知识、能力和价值素养目标(预期学习成果);第二步要确定评价/反馈,设计目标达成的考核题目和考核方式,即最终目标是否达成要有据可查;第三步设计学法,学生需要采取或参与什么活动才能达成目标;第四步设计教法,教师助力学生达成目标可采取的教学模式和该方法等;最后一步,总结课程教学的一般目标。^[5]

这一明显区别于传统教学设计思路的“反向课程矩阵设计”(见表2)源于学习成果导向的教育教学理念,即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应该围绕学生在学习结束时取得哪些学习成果来设计。在使用反向课程矩阵进行教学设计时,有三点需明确:第一,“具体目标”要用行为动词来表述(可参考布鲁姆认知模型中六类学习动词),这反映的是“学习是行动,通过行动学习”的原则。第二,教学法设计时,“学法”设计是重点,教师必须思考让学生做什么活动才能使其收获预期学习成果;“教法”设计的原则是,“凡是学生能自己学的一律不教,凡是学生自己学习有困难的要提供脚手架,学习任务要适当,要能把学生从舒适区带到发展区,但别送进恐怖区”^[5]。第三,评价最主要的不是给学生学习划定成绩,而是促进学生有效学习;另外确定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要具可操作

性,要“确保学生在每一个学习目标上的表现都能够得到恰当的评价”^[5]。第四,具体目标、评价/反馈、学法和教法四要素要形成一个支撑链条。评价/反馈要为具体目标的达成提供证据支撑,而教学活动则为具体目标的达成提供切实行动支撑。

三、世界现代史课程的反向课程矩阵设计示例

领悟了反向课程矩阵设计的基本学理,就可以据此对世界现代史课程进行教学设计。限于篇幅,重点围绕模块一进行较为详细的设计。教师在教学前必须明确,通过该模块的教学,学生应掌握哪些知识,应锻炼提升什么能力,树立怎样的价值观,这即是反向课程矩阵设计的第一步——确定具体目标。

确定具体目标必须了解专业培养目标和该课程的具体支撑作用,必须基于对具体课程内容的深入逻辑分析。据此确定的知识目标是:1. 学生能够概述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原因、主要特征、实质及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2. 学生能够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的具体表现及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3. 学生能够概述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概况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4. 学生能够阐释“亚洲觉醒”的思想内涵、历史背景、具体表现及影响。能力目标是:1. 学生分析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2. 学生自主学习和

研究能力; 3. 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价值情感目标: 1. 团队协作精神; 2. 学生在中西比较中, 深刻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本质, 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 进而加强“四个自信”。在上述知识目标的描述中, 使用了“概述”“分析”“阐释”这三个行为动词, 让学生明确应该怎样做, 在哪些方面应锻炼提升自己, 同时, 也让教师清楚应在哪些方面及怎样检测学生的学习成果。这彰显的是目标驱动、成果导向的设计原则, 正如有学者所说:“学习是活动, 活动获得经验, 经验改变大脑, 这是SC(以学生为中心)课程设计背后的科学原理。”^[5]

步骤二是确定评价方式。评价方式是检验具体目标是否达成的重要依据, 也是落实具体目标的根本指南。按照布鲁姆认知模型6类学习划分, 4个知识目标在“记住”“理解”“应用”低阶层面上的评价主要通过智慧树平台的评价标准自动给出, 以百分比, 主要由学分课的“单元测试”“问答”和“翻转课堂—问答

和作业”构成。这些评价方式属于伴随学生整个学习过程的过程性评价, 虽然综合成绩在课程结束后平台会自动给出, 但教师可随时在线了解学生的参与完成情况并给予个别督促和针对性帮助。

“分析”“评价”“创造”高阶层面上的评价主要通过“微知识点课堂展示”“小组专题讨论”“讨论笔记”等教学活动评价设计来完成, 而这又与能力目标、情感价值目标的评价方式紧密相连, 即针对知识目标中的某些知识点通过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创新以达到培养学生能力和价值情感的目标。高阶层面上的知识目标及能力目标和价值情感目标的评价标准由相应评价量表给出。评价量表见表3、表4、表5。表3为学生微知识点课堂展示评价量表, 表4为学生参与小组专题讨论评价量表, 表5为学生讨论笔记评价量表。

根据评价量表对教学过程中学生课堂展示情况、讨论参与情况和讨论笔记撰写情况进行评价是一种指导性、十分有效的形成性评价方式。通常教师在第

表3 “微知识点课堂展示”评价量表

评价等级	优秀 (90-100分)	良好 (80-89分)	一般 (70-79分)
内容	内容充实, 有知识的拓宽; 课件页面布局合理, 逻辑层次清晰; 生动有效使用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技术手段。	内容较充实, 课件个别页面布局有些拥挤, 逻辑层次较清晰; 能有效使用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技术手段。	基本照搬教材内容, 课件页面布局太拥挤影响了逻辑层次, 使用了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技术手段。
环节	课堂导入巧妙精彩; 课堂互动自然有效; 课程思政有机融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知识点讲授。	恰当应用课堂导入、课堂互动、思政融入教学环节,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知识点讲授。	导入、互动和思政融入教学环节有缺失。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知识点讲授。
状态	普通话讲授, 语言流畅, 声音洪亮, 表述准确, 教态自然。	表述准确, 语言较流畅, 教态较自然。	个别地方表述欠准确, 语言表达欠流畅。

表4 “小组专题讨论”评价量表

评价等级	优秀 (90-100分)	良好 (80-89分)	一般 (70-79分)	
评价内容	论前准备	在研读参考文献基础上认真撰写发言提纲; 有充分调动讨论积极性的组织策划方案; 主持人充分准备主题发言的初稿。	在研读参考文献认真撰写发言提纲; 较认真制定讨论的组织策划方案, 为主题发言做了一定准备。	个别同学没有在研读参考文献基础上准备发言提纲; 对如何开展讨论和主题发言准备不足。
	讨论现场	每位同学积极参与讨论, 踊跃发言, 小组讨论氛围热烈, 讨论的问题有深度。	每位同学积极参与讨论, 踊跃发言, 小组讨论氛围较热烈, 讨论的问题有一定的深度。	个别同学缺少参与的积极主动性, 影响了整个小组的讨论氛围, 缺少对问题的深入探究。
	主题发言	群策群力完善主持人的主题发言提纲; 主题发言视角新颖, 论点突出, 论据充分, 逻辑清晰; 语言流畅, 声音洪亮。	群策群力完善主持人的主题发言提纲; 主题发言论点突出, 论据充分, 能够有逻辑、较流畅地分析问题。	大多数同学为主题发言提意见建议; 主题发言论点突出, 论据较充分, 能够较清晰地阐释问题。

一堂课要让学生了解评价量表的内涵和用途, 使其明确课程学习过程中必须参加的活动和应达到的目标及评判标准。评价量表的使用是学生中心、成果导向的教学模式真正落地生效的关键环节。对教师而言, 制

定评价量表可以使自己的教学目标和任务更加明确, 可以使教学设计进一步优化, 公开化的评价标准也可确保评价过程的客观、公正; 对学生而言, 熟悉评价量表可以使自己明确学习任务, 聚焦学习目标, 清楚

表5 “讨论笔记”评价量表

评价等级		优秀 (90-100分)	良好 (80-89分)	一般 (70-79分)
评价内容	内容	有针对每一则参考文献(论文6篇以上,著作1部以上)的研读笔记,有读后感悟;内容充实,书写认真,逻辑有条理。	有针对每一则参考文献(论文4-5篇,著作至少1部)的研读笔记,有读后感悟;内容较充实,书写认真,逻辑有条理。	有针对每一则参考文献(论文2-3篇)的研读笔记,有读后感悟;内容较充实,书写认真,逻辑有条理。
	规范	每一则参考文献按提供的规范标注;主持人有思路清晰、能充分调动全体成员积极参与的组织策划方案;有讨论结束后对问题的深刻认识。	基本按提供的规范标注参考文献;主持人有思路清晰的组织策划方案;有讨论结束后对问题的深刻认识。	参考文献标注不统一;主持人有组织策划方案;有讨论结束后对问题的总结,但缺少自己的深刻认识。

自己的长处与不足,调整完善学习方案。^[7]

步骤三是设计学法,即设计学生要达成目标需做哪些活动。学法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多学科研究成果显示,内容的有用性、学习的真实性、任务的挑战性、环境的社会性和过程的互动性等,是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重要刺激因素^[8],这成为学法设计重要指南。基于此,该模块教学中学生学法有如下设计:线上预习后带着问题进“翻转课堂”和实体课堂,在课堂互动中解决问题;自选知识点、拓宽材料、制作PPT、按师范生技能要求准备课堂展示;研读学术文献、发现问题、撰写发言提纲、按小组讨论方案开展讨论;撰写、完善讨论笔记。

步骤四是设计教法。按照反向课程矩阵设计学理,教师教法针对学生学法来设计,遵循的原则是引导、帮助学生有效学习、完成学习目标。基于此,与学习方法设计对应的教学方法是:布置每周学习任务,分析回答线上、线下学生疑惑;评议学生课堂展示,既包括知识点内容的深度分析,也包括对师范生技能基本要求的强调;参与引导小组专题讨论有效开展,主要包括回答学生的提问、抛出问题引导讨论深入开展、观察评价小组及成员的参与情况和主题发言情况;批阅讨论笔记,将意见建议反馈给学生。另外,教师也通过案例教学法帮助学生深化拓宽知识并助力其专业能力的培养。

步骤五是总结概括一般目标。从课程内容到具体目标,模块一教学目标的一般性表述是:学生通过学习20世纪初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状况,认识20世纪初的世界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并且基于教学模式、方法的创新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获得能力和价值素养的培养和提升。进一步凝练即为:学习并深刻认识,20世纪初人类进入了现代史时期;在学习过程中锻炼提升历史学专业师范生的基本技能。

至此,模块一教学设计的五个步骤基本完成,将其一一填入表2,即完成了“世界现代史”模块一

的反向课程矩阵设计(见表6)。学生如何有效学,教师如何有效教,该矩阵有清晰的说明,可操作、能落地、有评价,充分反映了“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生学习成果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新三中”教育教学理念。

世界现代史课程教学共分4个教学模块,其余三个模块的教学设计如同模块一的设计思路。整个教学设计中涉及到的几个点需做进一步的说明。

第一,“微知识点课堂展示”。展示频次是每周1次,每名学生每学期展示3次,展示主题是伴随课程进度,学生根据兴趣自选。该教学环节的设计重在锻炼提升学生的师范生技能,主要包括导入新课、课堂互动、思政育人、课件制作以及教姿等等。课堂展示要求学生将某一知识点逻辑清晰地讲授给大家,这也是检测学生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手段。研究显示,会说、会做、会教是测量学生学习效果的最佳方法,先会“说”,再会“做”,才会“教”,三者之间存在着递进关系。^[9]笔者对75名学生的问卷显示,89%的学生受益于这种学习方式,认为自己的教学技能得到了锻炼,知识面得到了拓展或站在讲台上的自信心得到提升。第二,小组专题讨论。通常课程教学设置5次小组专题讨论,全员全过程参与,小组内推举一位学生作为该专题讨论的组织策划者。该教学模式在学生一次次围绕专题研读资料、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提升了其探究性学习能力,拓宽了学术视野;在小组的讨论中,学生的语言表达、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在小组讨论整体状况影响个人成绩的评价规则驱动下,每个人讨论参与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团队协作意识得到培养和加强。第三,讨论笔记是学生参与5次小组专题讨论的文字记录,不仅包括针对研读文献所做的笔记、参考文献的书写规范、讨论的发言提纲、讨论的组织策划方案,还有讨论后的概括总结及所感所悟。根据评价量表对讨论笔记采取组内学生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学生互评环节意在使学生更加明确专题讨论的目标和意义,在相互评价中,学他人之长、补自己之

表6 “世界现代史”模块一反向课程矩阵设计

设计要素	一般目标	具体目标	教法	学法	评价/反馈	
步骤	步骤5	步骤1	步骤4	步骤3	步骤2	
模块一: 20世纪初的世界	<p>学习并深刻认识, 20世纪初的人类进入了现代史时期; 在学习过程中锻炼提升历史学专业师范生的基本技能。</p>	<p>知识: 1. 学生能够概述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原因、主要特征、实质及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 2. 学生能够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的具体表现及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 3. 学生能够概述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概况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 4. 学生能够阐释“亚洲觉醒”的思想内涵、历史背景、具体表现及影响。</p> <p>能力: 1. 学生分析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2. 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能力。 3. 学生语言表达能力。</p> <p>价值情感: 1. 学生团队协作精神。 2. 学生在中西比较中深刻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本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 进而加强“四个自信”。</p>	<p>唯物史观培养重点案例分析: (1) 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原因分析。(2) “亚洲觉醒”原因分析。 提前布置小组讨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美国崛起及对外政策的变化(结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谈感悟)。 教师巡回参与、倾听每一小组的讨论, 分析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适时抛出问题引导讨论, 评议每一小组的主题发言。</p>	<p>课前, 在智慧树平台“学习任务”栏布置学习任务; 围绕重点难点及学生疑惑不解问题准备授课内容; 针对性在翻转课堂提出问题。 课中, 讲授重点难点问题; 解答学生疑惑; 评议学生课堂展示; 参与引导小组专题讨论。 课后, 引导帮助学生完成智慧树平台学分课“问答”。</p>	<p>按照学习任务要求, 课前完成智慧树平台相关知识点的学习, 并将预习中的疑惑发布于“翻转课堂-问答”栏; 做好课堂展示和小组专题讨论的准备。 课中, 认真听讲、积极互动; 完成课堂展示和专题讨论任务。 课后参与智慧树平台“问答”栏目的讨论, 巩固“20世纪初的世界”模块的重点知识。 跟随教师案例分析的节奏, 培养观察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围绕小组专题讨论的能力、价值素养提升: 讨论前, 围绕讨论专题及相关要求查阅资料、研读资料并拟定发言提纲, 主持者制定讨论的组织策划方案并准备代表小组的主题发言提纲。 讨论中, 积极参与小组专题讨论, 踊跃发言; 群策群力完善主持人的主题发言。 讨论后, 概括总结、完善充实讨论笔记。</p>	<p>学生回答智慧树平台“翻转课堂”问题。 学生完成智慧树平台“问答”。</p> <p>学生回答教师随堂提问。 学生参与小组专题讨论。 学生微知识点课堂展示。</p> <p>学生回答教师课堂提问。 学生微知识点课堂展示。 学生参与小组专题讨论。 学生讨论笔记。</p>

短, 进一步优化自己的讨论参与, 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讨论笔记。

四、结语

反向课程矩阵设计及应用既充分反映了“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育教学理念, 也是该理念真正落地的重要路径。基于专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内容和学生实际需要确定世界现代史课程在知识、能力、价值情感方面的教学目标, 借助网络平台教学工具(单元测试、论坛问答、翻转课堂)和评价量表使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有据可查, 通过“提”问题、“答”问题、“讲”问题、“讨论辩论”的方式突破课程的重点难点问题, 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研究能力, 使其掌握一些基本技能, 同时也可以从历史与现实、外国与中国、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视角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实

践证明, 反向课程矩阵教学设计及应用能切实推动教师不断完善教学, 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困难, 助其有效学习, 能过程性反馈学生学习成果, 促其积极学习, 有力支撑专业培养计划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德州学院历史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20年版)[Z].
-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68.
- [3] 《世界现代史》编写组. 世界现代史(上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121.
- [4] 邓春花, 等. 应用反向课程矩阵设计法进行“电类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建设[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20(2): 168-173.
- [5] 赵炬明. 聚焦设计: 实践与方法(上)——美国“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之三[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8(2): 30-44.

- [6] 巩建闰, 萧蓓蕾. 谁来制订课程大纲——兼论OBE人才培养方案设计[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0(4): 180-187.
- [7] 张所帅. 评价量表的内涵、特点及开发[J]. 教学与管理, 2019(9): 122-124.
- [8] 赵炬明. 打开黑箱: 学习与发展的科学基础(下): 美国“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之二[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4): 30-46.
- [9] 高筱卉, 赵炬明. 大学教学设计: 历史、实践与管理——美国经验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4): 47-54.

On Teaching Design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Based on Reverse Curriculum Matrix Theory

WANG Yanmin

(School of Marx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Reverse Curriculum Matrix theory is intended to promote students' active and effective learning, and help the achievement of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By designing the curriculum matrix, th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learn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the course are presented, which can promote students to study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rocess-based teaching evaluation forms is the key link to take effect for the student-centered and results-oriented teaching model.

Key words: Modern world history; student centered; result-oriented; curriculum matrix; reverse design

(上接第99页)

- [34] 郑功成.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现状评估与政策思路[J]. 社会保障评论, 2019(1): 3-29.
- [35] 彭华民. 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J]. 学术月刊, 2011(10): 16-22.
- [36] 任慧玲, 周庆元. “就业—生育”平衡视角下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研究——基于发达国家实践的考察[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2(5): 110-117.
- [37] 黄桂霞. 中国共产党对家庭生育功能的保障和干预[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22(2): 78-86.

Realistic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Construction Childbearing Friendly Societ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Pluralism

CHANG Jinfeng, LIU Chang

(School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73012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pluralism, the construction of fertility friendly society is a childbearing friendly social environment established by multiple subjects such as the nation, market, society, community and family through efficient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At present, we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bearing friendly society. However, we are also faced with a realistic dilemma such as welfare security of childbearing friendly societ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supply of female occupational welfare needs to be developed, the supply system of social organization birth welfare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community birth welfare function needs to be developed, and the welfare function within the family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build a childbearing friendly policy and welfare environment,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market to improve women's occupational welfare, expand the service path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for childbearing welfare, and perform a function of community carri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bearing welfare.

Key words: welfare pluralism; Child-bearing friendly society; Fertility support